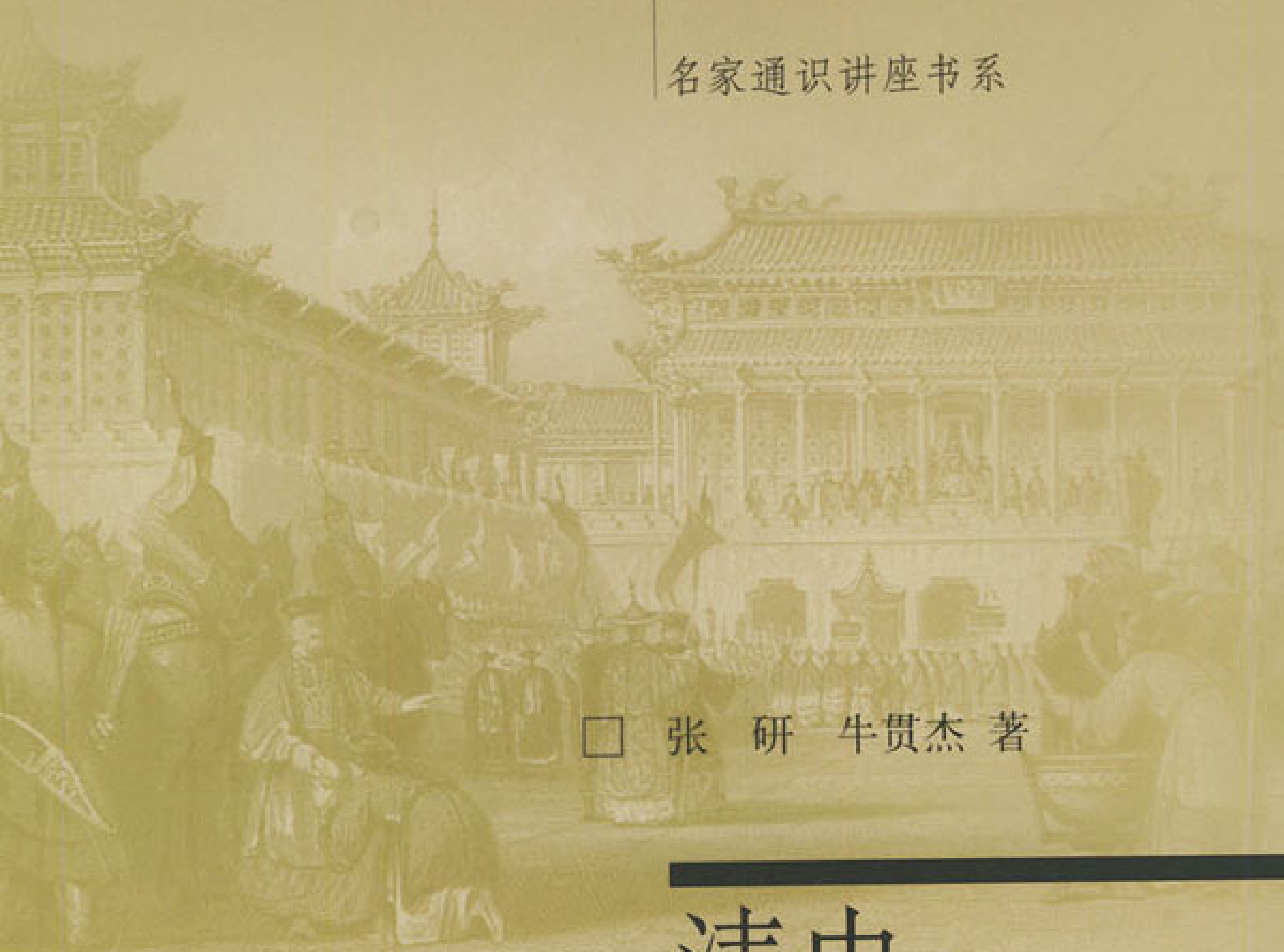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 张 研 牛贯杰 著

清史十五讲

清代作为中国古代、近代承前启后的朝代

它的历史

浓缩了中国传统社会兴衰隆替的历程、精华糟粕的内容

理应受到当代中国人的重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清史十五讲

张研 牛贯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史十五讲/张研,牛贯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ISBN 7-301-07543-0

Ⅰ.清… Ⅱ.①张…②牛… Ⅲ.中国-古代史-清代 Ⅳ.K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5641 号

书　　　名:清史十五讲
著作责任者:张　研　牛贯杰　著
责 任 编 辑:刘　方
标 准 书 号:ISBN 7-301-07453-0/K·0344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5.25 印张　350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编审委员会

编审委员会主任

许智宏(北京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生物学家)

委　员

许智宏

刘中树(吉林大学校长　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教授　文学理论家)

张岂之(清华大学教授　历史学家　原西北大学校长)

董　健(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教授　戏剧学家　原南京大学副校长)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历史学家　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章培恒(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教授　文学史家)

叶　朗(北京大学艺术系主任　教授　美学家　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徐葆耕(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教授　作家)

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教授　哲学家)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教授　文学史家　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原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执行主编

温儒敏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

本书系编审委员会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是由北京大学发起，全国十多所重点大学和一些科研单位协作编写的一套大型多学科普及读物。全套书系计划出版100种，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第一、二批近50种将在2004年内出齐。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出任这套书系的编审委员会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任执行主编，来自全国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主持各书的撰写。到目前为止，这是同类普及性读物和教材中学科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编撰阵容最强的丛书之一。

本书系的定位是"通识"，是高品位的学科普及读物，能够满足社会上各类读者获取知识与提高素养的要求，同时也是配合高校推进素质教育而设计的讲座类书系，可以作为大学本科生通识课(通选课)的教材和课外读物。

素质教育正在成为当今大学教育和社会公民教育的趋势。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拓展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造就更多有创新潜能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全国许多大学都在调整课程，推行学分制改革，改变本科教学以往比较单纯的专业培养模式。多数大学的本科教学计划中，都已经规定和设计了通识课(通选课)的内容和学分比例，要求学生在完成本专业课程之外，选修一定比例的外专业课程，包括供全校选修的通识课(通选课)。但是，从调查的情况看，许多学校虽然在努力建设通识课，也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缺少统一的规划，到底应当有哪些基本的通识课，可能通盘考虑不够；课程不正规，往往因人设课；课量不足，学生缺少选择的空间；更普遍

的问题是，很少有真正适合通识课教学的教材，有时只好用专业课教材替代，影响了教学效果。一般来说，综合性大学这方面情况稍好，其他普通的大学，特别是理、工、医、农类学校因为相对缺少这方面的教学资源，加上很少有可供选择的教材，开设通识课的困难就更大。

这些年来，各地也陆续出版过一些面向素质教育的丛书或教材，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到底应当如何建设好通识课，使之能真正纳入正常的教学系统，并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这是许多学校师生普遍关心的问题。从2000年开始，由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发起，联合了本校和一些兄弟院校的老师，经过广泛的调查，并征求许多院校通识课主讲教师的意见，提出要策划一套大型的多学科的青年普及读物，同时又是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这项建议得到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的支持，并由他牵头，组成了一个在学术界和教育界都有相当影响力的编审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有效地联合了许多重点大学，协力同心来做成这套大型的书系。北京大学出版社历来以出版高质量的大学教科书闻名，由北大出版社承担这样一套多学科的大型书系的出版任务，也顺理成章。

编写出版这套书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充分整合和利用全国各相关学科的教学资源，通过本书系的编写、出版和推广，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贯彻到通识课知识体系和教学方式中，使这一类课程的学科搭配结构更合理，更正规，更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从而也更方便全国各大学设计和安排这一类课程。

2001年底，本书系的第一批课题确定。选题的确定，主要是考虑大学生素质教育和知识结构的需要，也参考了一些重点大学的相关课程安排。课题的酝酿和作者的聘请反复征求过各学科专家以及教育部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并直接得到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支持。第一批选题的作者当中，有一部分就是由各大学推荐的，他们已经在所属学校成功地开设过相关的通识课程。令人感动的是，虽然受聘的作者大都是各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不少还是学科带头人，科研与教学工作本来就很忙，但多数作者

还是非常乐于接受聘请，宁可先放下其他工作，也要挤时间保证这套书的完成。学者们如此关心和积极参与素质教育之大业，应当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本书系的内容设计充分照顾到社会上一般青年读者的阅读选择，适合自学；同时又能满足大学通识课教学的需要。每一种书都有一定的知识系统，有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围和专业性，但又不同于专业教科书，不是专业课的压缩或简化。重要的是能适合本专业之外的一般大学生和读者，深入浅出地传授相关学科的知识，扩展学术的胸襟和眼光，进而增进学生的人格素养。本书系每一种选题都在努力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学问真正做活了，并能加以普及，因此对这套书作者的要求很高。我们所邀请的大都是那些真正有学术建树，有良好的教学经验，又能将学问深入浅出地传达出来的重量级学者，是请“大家”来讲“通识”，所以命名为《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其意图就是精选名校名牌课程，实现大学教学资源共享，让更多的学子能够通过这套书，亲炙名家名师课堂。

本书系由不同的作者撰写，这些作者有不同的治学风格，但又都有共同的追求，既注意知识的相对稳定性，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又能适当接触学科前沿，引发跨学科的思考和学习的兴趣。

本书系大都采用学术讲座的风格，有意保留讲课的口气和生动的文风，有“讲”的现场感，比较亲切、有趣。

本书系的拟想读者主要是青年，适合社会上一般读者作为提高文化素养的普及性读物；如果用作大学通识课教材，教员上课时可以参照其框架和基本内容，再加补充发挥；或者预先指定学生阅读某些章节，上课时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把本书系作为参考教材。

本书系每一本都是“十五讲”，主要是要求在较少的篇幅内讲清楚某一学科领域的通识，而选为教材，十五讲又正好讲一个学期，符合一般通识课的课时要求。同时这也有意形成一种系列出版物的鲜明特色，一个图书品牌。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既能满足社会上读者的需要，又能够有效地促进全国各大学的素质教育和通识课的建设，从而联合更多学界同仁，一起来努力营造一项宏大的文化教育工程。

前　言

清朝(1644—1911)是中华古老帝国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统治中国长达268年之久。

清朝历史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中国的版图疆域及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外交、边疆民族等诸多问题大都由清代演化、延伸而来;中国在清朝康乾盛世步入传统社会发展的巅峰,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受世人景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泱泱大国;中国在清朝康乾盛世之后逐渐拉开与西方先进诸国的距离,经历了屈辱苦难的漫漫长夜。

一个世纪以前,正当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华民族发展处于亘古未有大变局之时,梁启超痛切认识到史学的重要意义:"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史学研究应当"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势而立于万国者",他强烈呼吁,要使中国强大,使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则"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都应当如饥似渴地研学"本国史学","一刻不容缓者也"!

今天的中国同样处于社会大变革之中。今天的社会大变革较之梁启超面临的社会变革性质不同,其深度、广度、社会动荡与裂变的剧烈程度也与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历史同样可从根本上为民族和人民提供进行社会变革直到胜利的借鉴;民族和人民同样需要以历史为明镜深刻了解中

国国情、把握社会变革的方向，选择适宜中国而不是适宜别国发展的道路，增强爱国心凝聚力，认清生生不息为之奋斗的理想。

清史，作为连接古代近代、与当代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一个朝代的历史；作为经历了极盛极衰大喜大悲、浓缩着传统社会兴衰隆替精华糟粕的一个朝代的历史；作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风云变幻、集中反映历史多元化走向和具有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一个朝代的历史，理应为关注中国在社会大转型期间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的人们所瞩目，吸引他们从各种途径各种角度去做深入的了解、认识和思考，这是清史热、清宫戏等长盛不衰的深刻缘由。

《清史十五讲》适应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的要求，为各个专业的莘莘学子提供学习探究清史的平台，希望新世纪的大学生、更多的青年人能够从中拓展知识结构、了解中国国情、把握社会变革方向，成为有智慧、有识见、有素养、有创新潜能的复合型人才。

以下，对《清史十五讲》的编写做几点说明。

一、指导思想与理论武器

《清史十五讲》编写的指导思想与理论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

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其实质是“求实”；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其实质是“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二者的结合，则是“求实”与“实事求是”的结合。

从编写角度，《清史十五讲》一方面力求较为系统地还原和讲述真实的清史（特别注意摒弃因循传统印象、套用时髦理论、以鸦片战争为界“前后割裂”、以学科关注不同“上下脱节”的做法）；一方面适当接触和探讨学术前沿问题，在较高立足点上，引导不同专业学生跨学科学习和思考的兴趣，以达到高屋建瓴、博览通识之目的。

二、编写方法

《清史十五讲》的编写方法基本是时序与专题相结合。

一部历史著作，必须有基本的时序概念。《清史十五讲》以时序为经，在历史长河的源头、流程、流向中，引导读者把握历史演进的脉络。一部对新时代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通识教材，必须有启思开智的问题观念，《清史十五讲》以专题为纬，在历史长河的一个个波峰之上，引导读者深刻而集约地透视历史。

如第一讲在叙述明清鼎革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探讨了中国传统社会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转换；第二讲在叙述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进程中，探讨了清朝的民族政策和对边疆的有效管辖；第三讲通过介绍满汉两种文化、中西两个世界碰撞中的康熙大帝，探讨了清政权巩固的深层原因；第四讲在雍正死因评析中，探讨了领袖人物与历史发展进程及康乾盛世的基础性建设；第五至八各讲在叙述康乾盛世的方方面面时，分别探讨了清代集传统社会之大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如集权问题、人口问题等；第九讲通过介绍乾隆帝，揭示了清朝的由盛转衰；第十至十五各讲在叙述清朝后期外国列强的侵华战争与不平等条约以及各阶层救国救亡不懈探索的进程中，探讨了"天朝为何崩溃"、"下层民众爱国斗争的探索与实践"、"如何认识统治集团部分成员的求强求富运动"、"中国有无可能走维新之路"、"清帝何以退位"等问题。

三、内容与形式

《清史十五讲》的读者对象是各个专业包括诸多非文史专业的大学生以及各行各业的青年，因而在构筑基本专业体系、讲授相关知识的前提下，编写风格力求深入浅出、生动亲切、有可读性。对于影视频频出现、老百姓普遍感兴趣的人与事，如清初四大疑案、多尔衮与孝庄、康雍乾三帝、年隆之狱、清代最大贪污案、和珅、慈禧、曾国藩、李鸿章、洪秀全等给予可信的诠释与辨析。使读者在客观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过程中，增长知识、启迪思维、激发热情、得到真善美的精神享受。

前言、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各讲写作及统稿 张　研；第十、十三、十四、十五各讲　牛贯杰。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大型教材的编辑出版，是适应高校改革和素质教育的一个创举，能在其中承担《清史十五讲》的编写，我们既感荣耀又觉忐忑。面对特定的读者群，《清史十五讲》的整体结构、内容取舍、史实阐述、问题探讨，均只能是一种尝试。轻重得失乃至错讹谬误，有待方家读者批评指正，在此谨致谢忱。

作 者

思考题：

学习清史的目的与方法

参考书目：

1.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2. 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3.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第一批选目(52种)

*《西方哲学十五讲》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张志伟

*《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 复旦大学哲学系 张汝伦

*《哲学修养十五讲》 吉林大学哲学系 孙正聿

*《美学十五讲》 东南大学艺术系 凌继尧

*《宗教学基础十五讲》 清华大学哲学系 王晓朝

*《生物伦理十五讲》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高崇明 张爱琴

《艺术哲学十五讲》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所 刘 东

《文化哲学十五讲》 黑龙江大学 衣俊卿

《科技哲学十五讲》 南京大学哲学系 林德宏

*《政治学十五讲》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燕继荣

*《口才训练十五讲》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孙海燕

《社会学理论方法十五讲》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王思斌

《公共管理十五讲》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赵成根

《西方经济学十五讲》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方福前

《比较教育十五讲》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 王英杰

*《道教文化十五讲》 厦门大学宗教所 詹石窗

*《周易哲学与易文化十五讲》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所 廖名春

*《美国文化与社会十五讲》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袁 明

《佛教文化十五讲》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何 云
《中国文化史十五讲》 北京大学古籍研究中心 安平秋 杨忠 刘玉才
《儒家文化十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郑家栋
《文化研究基础十五讲》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所 戴锦华
《企业文化学十五讲》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钟青林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 厦门大学哲学系 陈嘉明
《日本文化十五讲》 北京大学中文系 严绍璗

*《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 北京大学中文系 陆俭明 沈 阳
《语言学常识十五讲》 北京大学中文系 沈 阳

*《唐诗宋词十五讲》 北京大学中文系 葛晓音
*《中国文学十五讲》 北京大学中文系 周先慎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 复旦大学中文系 陈思和
*《西方文学十五讲》 清华大学中文系 徐葆耕
*《通俗文学十五讲》 苏州大学 范伯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 孔庆东
*《鲁迅作品十五讲》 北京大学中文系 钱理群
《红楼梦十五讲》 文化部艺术研究院 刘梦溪 冯其庸 周汝昌等
《当代外国文学名著十五讲》 吉林大学文学院 傅景川

*《西方美术史十五讲》 北京大学艺术系 丁 宁
*《戏剧艺术十五讲》 南京大学文学院 董 健 马俊山
*《音乐欣赏十五讲》 中国作家协会 肖复兴
《中国美术史十五讲》 中央美术学院 邵 彦
《影视艺术十五讲》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系 尹 鸿
《书法艺术十五讲》 北京大学中文系 王岳川

*《中国历史十五讲》 清华大学 张岂之

目　录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

本书系编审委员会/1

前　言　/1

第一讲　明清鼎革/1

一　满族的崛起/1

二　清军入关/9

三　历史上的多尔衮/19

第二讲　康熙帝与清朝政权的巩固/27

一　两种文化的冲突融合/27

二　两个世界的初次碰撞/38

三　晚年的忧虑/47

第三讲　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53

一　清朝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统一/53

二　清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管辖/64

三　清朝独特的少数民族政策/70

第四讲　雍正帝死因评析/79

一　“暴病”说、“雍正夺嫡”与秘密建储制的发端/80

二 “金石”说、“年隆之案”与军机处的创立/94
三 “被刺”说、吕四娘真假与雍正功过/100
第五讲 清朝前中期国家政权的运行体制/105
一 国家政权结构及其运行/106
二 基层社会组织结构/118
三 双重统治格局与地方精英/127
第六讲 关于清朝人口与经济问题的思考/133
一 清朝人口问题的提出/133
二 清朝经济的发展/140
三 人口对策与政策/148
四 对清代人口与经济问题的几点思考性归纳/155
第七讲 清朝集大成的文化/164
一 清朝文学艺术繁荣兴盛/164
二 清朝学术步入高峰/172
三 清朝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清理与总结/181
第八讲 清人生活/190
一 等级化的衣食住行/190
二 生计来源/197
三 人生礼俗/202
四 岁时习俗/208
五 娱乐活动/212
第九讲 乾隆的“十全”梦/217
一 “十全老人”乾隆/218
二 “盛世”背阴之处/226
三 面对剧烈变化的世界/236
第十讲 守不住的大清门/243

一　守门之君道光帝/243
二　打开天朝大门的鸦片战争/247
三　第二次鸦片战争/256
四　大门失守之后/262
第十一讲　下层民众反抗清朝统治和列强侵略的运动/267
一　洪秀全与拜上帝教/268
二　天京事变/277
三　义和团运动评价/290
第十二讲　主宰晚清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299
一　一朝选秀/300
二　三次垂帘/304
三　千古评说/312
第十三讲　统治集团部分成员发起的求强求富运动/327
一　睁开双眼看世界/327
二　近代工业化的艰难起步/333
三　北洋海军/341
第十四讲　先进知识分子的维新与革命/347
一　戊戌变法/347
二　辛亥革命/363
第十五讲　乱世枭雄袁世凯/367
一　小站练兵/368
二　“新政第一人”/373
三　清帝逊位/380

第一讲

明清鼎革

满族的崛起

清军入关

历史上的多尔衮

一　满族的崛起

满族先世与建州女真

满族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夏商周时的息慎、肃慎，两汉时的邑娄，魏晋南北朝时的勿吉，唐五代以后的靺鞨、诸申，宋元时的女真等。明朝初年，东北女真族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满族以其中建州女真为前身。建州女真世代相传，一位叫作佛库伦的仙女，在长白山天池东北六十里一座名布库里小山中的水泊沐浴时，吞食神鹊衔来朱果有孕，生下建州女真始祖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命他乘舟顺流而下，往牡丹江与

松花江汇合处的斡朵里(今黑龙江省依兰南)地方,为三姓之主。从这个传说中可知,满族与其他各个民族一样,经历过“知母不知父”的原始社会阶段。神鹊是他们崇拜的凤系图腾。从佛库伦到布库里雍顺,是他们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的曲折反映。

明初洪武、永乐两朝在东北设立辽东指挥使司、奴尔干都指挥使司等数百个卫所,以各族首领担任卫所长官,赐以印信,对其部众进行管理和统治,并许其持所颁敕书定期来内地朝贡贸易及赴边关马市贸易。这些卫所随部落迁徙,职位可世袭,无年俸,使“各自雄长,不相归一”,分而治之。时居住在牡丹江上游长白山东南一带建州女真首领阿哈出被明朝封为建州卫都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努尔哈赤六世祖)被封为建州卫左都督。后建州女真部众不断迁徙,于明中期相继来到物产丰饶的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境内)定居。阿哈出之孙李满住任建州卫都指挥使,猛哥帖木儿之子董山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猛哥帖木儿之弟凡察任建州右卫都指挥使,合为建州三卫,分领部众,臣属明朝,所谓“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

而明朝如上述在沿袭历代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羁縻政策的同时,又沿袭历代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控制、打击和分化政策,以铲削其对中央的威胁。建州三卫势力日益壮大之后,明朝即于成化三年(1467)将其首领、努尔哈赤五世祖董山诱杀,随后以三路大军包抄血洗建州三卫。建州女真四五百座堡寨被攻破,1157 人被杀被擒,子女牲畜荡然无存。如此,各族各部互不统属,长时期处于分裂、飘零的状态。

努尔哈赤与女真族的统一

努尔哈赤(1559—1626),姓爱新觉罗氏,建州左卫人。是明初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的后裔。努尔哈赤出生时家业中落,加之生母早逝,继母虐待,使他十岁出头便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炼——夜晚棚居,白日挖参狩猎、采集榛蘑;十五岁时,带着弟弟舒尔哈齐,作为人质到外祖父王杲家为奴。

努尔哈赤的外祖父王杲是女真族传奇式的人物。他“有才辩，能解番汉语言字义”，且兵多财广，“九合诸酋”，号令建州三卫各部，并拥有女真进京朝贡的500道敕书（如同今日贸易许可证）。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将孙女（长子礼敦之女）嫁与王杲长子阿台；为四子塔克世（努尔哈赤之父）娶了王杲长女额穆齐（努尔哈赤之母）。至于努尔哈赤兄弟到外祖父王杲家作人质为奴，则牵涉到诸多深层复杂的政治关系和背景。努尔哈赤继母纳拉氏肯姐是明朝支持的哈达贝勒王台养女。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继额穆齐之后再娶肯姐，无非为了保持同王杲王台两大势力的均衡交往。王杲与王台有杀父之仇。觉昌安父子却多次与王台一起协助明朝官兵剿捕扰边的女真人，甚至暗引官军擒拿王杲，使王杲与觉昌安父子貌合神离，以至于令其送努尔哈赤兄弟入质。因此明人许多著述称努尔哈赤为王杲之奴。万历二年（1574），王杲因反抗明朝对女真的欺压，被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六万大军攻灭。1104名女真人惨遭明军屠戮。王杲被槛车送往边关，转押北京凌迟枭首。

努尔哈赤于此役被俘，做了李成梁麾下一员小将。史载他对李成梁“甚恭”，“谊同父子”；“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努尔哈赤也许对李成梁本人怀着敬仰感激之情，因为是李成梁使他得以在军旅中增长武艺智谋、领略兵略阵法、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但古勒城破、外祖父被凌迟枭首的惨景在他心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使他最终逃离了李成梁。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一经过为官书所讳。只清人编著的《史乘》有载：“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满族传说，李成梁收努尔哈赤为书童，李成梁小夫人与之交好。一日小夫人侍奉李成梁洗脚见其足下有七颗黑痣，随口说出书童足下也有七颗红痣。七颗红痣乃天子之像，李成梁顿起杀心。小夫人懊悔莫及，阴纵之归，随即在柳树上投环自尽。有大青马、义犬及乌鸦舍命掩护努尔哈赤逃脱。于是努尔哈赤后来建立的新王朝叫后金，满族则留下了不食狗肉、插柳立竿祭祀小夫人和神鸦的习俗。

王杲死后，建州“各部蜂起，皆称王称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

弱，众暴寡"。明朝则继续对之施行分化打击之策。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建州女真苏克素护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欲扩大自己的势力，引明军攻打王杲之子阿台据守的古埒城。尼堪外兰骗降古埒人，使之杀死阿台，打开城门。明军却纵兵屠戮，将古埒寨烧成了灰烬，蒙难的女真人达2200名。努尔哈赤祖父觉场安、父亲塔克世本站在明朝一方，因觉场安为搭救嫁与阿台的孙女入城劝降，塔克世为寻父亲驰入城内，城破之时二人均死于非命。努尔哈赤悲愤欲绝，奔至抚顺论理。明朝自知理屈，还其父、祖遗体，封其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但无济于事。明朝对女真人的凶残、勒索、屠戮，在努尔哈赤心中积郁已久，终因此次祖、父蒙难，化作熊熊燃烧的复仇烈火。他以父、祖仅留的13副铠甲起兵，揭开了统一女真战争的序幕。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一、统一建州女真。万历十一年至二十一年(1583—1593)十年间，努尔哈赤擒杀尼堪外兰、攻城略地，先后征服了建州部女真哲陈、苏克苏浒、浑河、完颜、栋鄂五部及长白部女真纳殷、珠舍里、鸭绿江三部，受明封都督佥事，在费阿拉筑城，定国政，颁法律，自称"淑勒贝勒"(汉译"聪睿王")。统辖区域西起抚顺，东至鸭绿江，北接开原，南连清河，实现了建州女真的统一。所谓"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

二、打败九部联军。努尔哈赤的崛起、建州女真的统一与万历十九年(1591)长白部山鸭绿江部被兼并，使海西女真感到了威胁。其首领叶赫部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纠集哈达、乌拉、辉发诸部以及长白山朱舍里、纳殷、蒙古科尔沁等部组成九部联军共兵三万分三路向建州攻来。建州女真按努尔哈赤诱敌深入、并力一战、专打头目的部署，将联军引入古勒山的深谷险壑。狭路阻隘，联军不能成列，如一字长蛇逶迤而行。突然伏兵一齐呐喊，石矢滚雷般飞下，建州铁骑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敌阵，奋力击杀。九部联军大败，尸满沟壑。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古埒山大战。从此，努尔哈赤"军威大震，远迩慑服"。万历二十三年(1595)努尔哈赤受明封龙虎将军，翌年亲自入京朝贡"谢恩"。

三、攻灭海西女真四部及东海女真大部。努尔哈赤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灭哈达;三十五年(1607)、四十一年(1613)分别灭掉海西女真辉发、乌拉后,于四十七年(1619)以"不克平叶赫,吾不返国"的誓言,率倾国之师踏平了统一大业最后一个顽抗者叶赫。

攻灭海西女真的过程充满着血腥、欺诈、背叛、武力。其中,"叶赫老女"故事可从侧面勾勒这一过程的复杂与残酷。

"叶赫老女"名东哥,是海西女真叶赫部前首领布斋之女、后首领布扬古之妹。东哥原是名扬遐迩的美女。据说没有人能描述出她那勾魂摄魄的美,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她的美之万一。东哥一生因各种政治目的被七次许配给各族各部。万历十九年(1591),海西四部纷争之时,哈达部首领歹商慕东哥艳名,首向叶赫提亲。东哥之父假意应允,以东哥为钓饵,在迎亲途中设伏杀死对手歹商,夺得海西四部的头把交椅。万历二十一年(1593)海西四部会盟之时,乌拉部首领满泰向叶赫提亲,为其弟布占泰聘娶东哥。东哥之父为巩固联盟,许诺婚事。布占泰以叶赫女婿身份率三千乌拉兵参与九部联军,于古埒山大战兵败被俘,留居建州三年,返回乌拉后未及迎娶,东哥之兄又将东哥许给了努尔哈赤,与之"联姻盟好"。努尔哈赤郑重下聘、歃血盟誓。东哥则誓死不嫁。不久,叶赫毁婚,以杀死努尔哈赤为条件向各部为东哥征婚。在叶赫进攻哈达、哈达求努尔哈赤出兵驰援之时,叶赫向哈达表示,如其倒戈击杀努尔哈赤援兵,则与之重修前好并将东哥嫁给其首领。哈达首领孟格布禄竟至应允。努尔哈赤因以率大军血战六昼夜攻克哈达,随即灭之。其时海西女真辉发部首领拜音达里杀了七个叔父自立,族人部众为避祸纷纷逃离、投靠叶赫。拜音达里两次求努尔哈赤出兵向叶赫索要逃众。叶赫则抬出东哥,允嫁拜音达里,以换取其对努尔哈赤的背叛。拜音达里神魂颠倒,撕毁与努尔哈赤女儿的婚约,备战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立刻指为口实,挥师攻入辉发城内,杀拜音达里、灭辉发。海西乌拉首领布占泰与努尔哈赤先后下聘叶赫美女东哥,均无结果。古埒山大战之后,布占泰与努尔哈赤却连续缔结了五次婚姻。感到恐慌的叶赫部又打出东哥这张王

牌，表示要与布占泰重续前缘。布占泰遂囚禁建州之妻，以子女及17个寨主之子为质，投向叶赫。努尔哈赤举兵往征富尔哈城，乌拉灭亡。东哥之兄布扬古以布占泰失国无用，拒绝将东哥嫁给他，终使寄人篱下的布占泰郁郁而亡。万历四十三年（1615）布扬古将33岁、待嫁20余年、人称“叶赫老女”的东哥嫁给了蒙古首领蟒古儿太。一年后，东哥病死蒙古荒原。努尔哈赤以“将已聘之女另许他人”作为口实之一，发起了最后消灭海西女真叶赫部的决战。

在统一海西女真的过程中，努尔哈赤没有忘记对东海女真即“野人”女真的征服。先后用兵瓦尔喀、库尔哈、窝集、萨哈连等部，取得乌碣岩等战之捷，“威行迤东诸部”，又招抚使犬、诺洛、石拉忻诸路；征讨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及附近岛屿，该地各部望风归附。

努尔哈赤由祖、父十三副遗甲起兵，用了30多年时间，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东海女真的大部，基本结束了女真社会长期分裂、割据、动乱的局面，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史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言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

后金国的建立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境内）建立“大金”政权，被推尊“英明汗”，年号天命。为与前代相区别，史称“后金”。

建立后金国的过程中，努尔哈赤曾先后采取过以下政权建设措施。

一、兴筑城池

明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于费阿拉（俗称旧老城）“筑城三层，兴建衙署、楼台”，作为指挥的据点。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以费阿拉城狭小简陋，水源不便，迁到苏子河与嘉哈河交汇处东岸，“因山为城，垒土为郭”，筑赫图阿拉城（俗称老城），在此称汗。赫图阿拉成为后金第一座都城。

后来，在努尔哈赤对明朝的征战中，迁都至赫图阿拉以西120里的界凡城，再迁至界凡城西40里的萨尔浒城，三迁至辽阳城。最后，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建筑起巍峨壮丽的紫禁城（沈阳故宫）。这紫禁城和城中的大政殿，成为努尔哈赤帝业的象征。

二、创建八旗制度

女真人原有行师出猎的牛录组织。史载：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额真”(满语“牛录”意为“大箭”；“额真”意为“主子”)。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左右，努尔哈赤以女真传统的牛录制为基础，按军事编制创建了后金耕战合一的社会组织，初设黄、白、红、蓝四旗，四十三年(1615)十一月又增设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合为八旗，正式建立了八旗制度。

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即位后，将降附的蒙古、汉人分编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以原八旗为满洲八旗。入关后八旗依防地分为京师八旗与驻防八旗。顺治年间多尔衮被罪后，其所辖正白旗收归皇帝自领，加上皇帝原所自领的正黄、镶黄两旗，合称“上三旗”，其他为“下五旗”。这是八旗制度不断完备的后话。

八旗制度实行牛录(汉名佐领)、甲喇(汉名参领)、固山(汉名旗)三级管理体制。以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牛录额真(汉名佐领)一人为统率官员；五牛录为一甲喇，每甲喇设甲喇额真(汉名参领)一人为统率官员；五甲喇为固山，每固山即每旗设固山额真(汉名都统)一人，副职梅勒额真二人为统率官员。每旗7500人，八旗共6万人。

八旗制度反映了女真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和变化。时农业已成为女真主要生产部门，普遍使用铁农具和牛耕，工商业也有很大发展，以煮熟晾干法长期保存的人参以及东珠、兽皮、药材等成为与汉族频繁交易的商品。八旗旗主拥有大量财富，有的田庄多达50余所，皆驱使奴隶耕作。八旗兵丁为各部平民，拥有耕地牲畜，或蓄奴数人，负担兵役力役。八旗包衣(满语意为“奴仆”)则是源于贫富分化及战争俘虏的奴隶，替主人从事生产及家内杂

役，分隶于内务府及各王府。

八旗制度将后金"一国之众"尽行编入政治经济军事合一的社会组织，严格控制管理。努尔哈赤作为后金国汗，是八旗的家长和最高统帅。他将八旗作为私产，赐予子侄，使之充任和硕贝勒（满语"和硕"为"一方"之意。绝大多数和硕贝勒充任一旗之主）。各旗旗主掌握本旗军政大权及旗下全体旗人。然旗主的权力、爵位、财产、属人均为努尔哈赤所赐，随时可被努尔哈赤剥夺或重新分配。各旗旗主互不统属，只听命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对八旗的绝对控制，是其得以掌握后金最高权力，实行专权统治的重要前提。

三、建立政权机构

努尔哈赤在创建八旗制度的同时，设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扎尔固齐十人"佐理国事"，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国政并预审案件。又设四十名判官，荐举八名办事大臣管理城防和乡间事务。其上是诸贝勒大臣议政会议。"众议既定"，再由拥有最高裁决权的努尔哈赤亲自定夺。

努尔哈赤的绝对专权始终以诸贝勒大臣议政会议为辅助，这既是女真氏族社会民主制的残余，也为努尔哈赤在频繁征战中集思广益而后决策所必需。后金建立前，努尔哈赤的主要辅佐者是与他有生死之交的开国功臣额亦都、费英东、何和里、安费扬古、扈尔汉等"五大臣"。进入辽东后，五大臣先后故去。诸贝勒大臣议政会议的主要成员以努尔哈赤四位年长子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即所谓"四大贝勒"为核心，包括诸小贝勒。后金高级官员退居次要，议政大权日益集中在努尔哈赤家族之手。

四、创制满文

女真族曾于前代金朝参照契丹文字创制过女真文。努尔哈赤时金朝女真文已不通行，凡政令文书，三分之二用蒙古字"代言"，三分之一用汉字"代言"，不利下达通行。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用蒙古文字母与女真语音拼成满文，作为满族统一的文字。满文的创制和颁行，对后金政权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二　清军入关

明清和战

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七大恨”主要内容有:无故起衅,杀我父祖;践踏盟约,出边驻戍;挟令我交出十人解边杀之;援助叶赫,致使我已聘之女转嫁蒙古;不准我世居明边部众收获粮谷并派兵驱逐;偏听叶赫之言,遣使致书凌辱于我;“偏助天谴之叶赫”等。“七大恨”表达了努尔哈赤对明朝民族压迫政策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也成为其南下西进掳掠明朝汉族居住区的借口。

誓师完毕,努尔哈赤亲率大军直下抚顺,全歼明总兵官张承胤一万援军,掠庄屯小堡500余处,俘获人畜30余万。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后金军再下抚安堡等大小11堡。七月,攻陷与抚顺同为辽东门户的清河等三城。

明军惨败,“全辽震动”。明廷举朝惊骇,做出了大举征剿后金的决策。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8)二月,明廷筹饷200万两,从各地调集11万大军,号称47万,命兵部右侍郎杨镐为经略,坐镇沈阳,兵分四路,直扑赫图阿拉,企图一举消灭后金。

努尔哈赤侦知明军作战部署,采纳降将李永芳“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建议,确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决策,只派500人阻击东路明军,集中六万八旗精锐全力对付西线之敌。西线无峰峦之阻,明西路军首先逼近界凡城。界凡城北临浑河东岸的吉林崖,西隔苏子河与萨尔浒山相望,是通往后金都城赫图阿拉的必经之途——过界凡城东向,距赫图阿拉仅止100余里。西路军统帅杜松留兵两万在萨尔浒山麓扎营,自率一万兵马渡过苏子河,进抵吉林崖,企图迅速攻下界凡城。努尔哈赤见杜松将三万兵马分作两处,当机立断,以绝对优势兵力直扑萨尔浒大营。萨尔浒明军仓促应战,“死者满山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首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

下”。努尔哈赤既得手,遂以五倍于明军的优势回攻吉林崖。吉林崖明军闻萨尔浒已破,兵败如山倒,杜松矢尽力竭,落马而亡。西路明军全军覆没。到达萨尔浒西北130余里尚间崖的明北路军,闻西路兵败士气陡降,转攻为守,分别在尚间崖、斐芬山和斡珲鄂漠扎营,又犯了兵力分散的大忌。努尔哈赤再次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全歼北路明军。与之同时,努尔哈赤命代善、阿敏、皇太极等率主力抢占阿布达里岗,伏击明东路军。待东路军半入伏中,皇太极部打着杜松旗号骗入军列,乘其无备突然出击,岗上八旗伏兵似山洪暴泻般冲入敌阵,明师大溃。明辽东经略杨镐惊悉三路丧师,急檄南路李如柏回撤。明军已成惊弓之鸟,李如柏部听到山上20余后金哨兵的螺号声,吓得“夺径路而遁,相蹂践死者复千余人”。仅仅四天,后金便粉碎了明军的围剿。

这就是战争史上著名的萨尔浒大战。

萨尔浒大战成为明金关系的历史转折点。战后,努尔哈赤乘势攻克开原、铁岭,吞并叶赫,完成女真统一,自称金国,废弃明“建州左卫之印”,用“天命金国汉印”,自此扬威天下,全力攻明。明朝辽东边事则一蹶不振,对后金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兵之力。

为挽败局,明廷起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熊廷弼“主固守不浪战”,“招流移,缮守具,简士马,肃军令”,精心部署,扼制了后金攻明的势头。然而不久明万历帝、泰昌帝相继病亡,天启帝即位,一年之内帝位三次更迭,政局不稳,党争加剧,熊廷弼被排挤罢免,袁应泰代之。临阵易帅,军之大忌。袁应泰任意撤换官将、改变熊廷弼防御固守的方针,导致前线混乱。努尔哈赤抓住时机,于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二月,倾后金之兵分八路攻克奉集堡,再下沈阳,克辽阳,随之迁都辽阳,轻取广宁,突破了明军辽河防线,为后金—清有朝一日叩开明关、直逼北京,扫清了道路。

后金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1625)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努尔哈赤再披征袍,往攻明孤城宁远(今辽宁兴城)。在宁远,努尔哈赤遇上了生平第一个对手——袁崇焕及明军购自西洋的11门

"红夷大炮"。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以兵部主事驻宁远监军。时宁远守军不满两万。袁崇焕前临强敌后无援兵,他临危不惧,集将士激以忠义,将城外百姓尽迁入城坚壁清野,誓死守城。努尔哈赤大军在宁远城下鏖战三日,遭到明军西洋大炮的猛烈轰击,伤亡惨重,被迫撤围。这是明与后金交战以来第一次大捷,也是努尔哈赤43年戎马生涯中第一次失利。年近70的努尔哈赤难以承受宁远之败的打击和耻辱,忧愤成疾——本已身负重伤又突发痈疽,于八月十一日病逝。九月一日,皇太极即位,改元天聪。

皇太极借袁崇焕吊唁努尔哈赤之机提出与明议和修好,稳住了西部明军,争取到时间,改革内政,缓和满汉矛盾,发展经济,壮大力量。与此同时出兵朝鲜,切断朝、明联系;征抚兼施,使蒙古各部归附后金;施反间计,使刚愎多疑的崇祯自毁长城,杀了劲敌袁崇焕,解除了攻明的后顾之忧。

后金天聪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于沈阳称帝,建国号大清,年号崇德。皇太极以"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的方针,屡次绕过山海关,由北部长城入口,对直、鲁、豫大规模扫荡。铁骑所至,城乡残破、百姓奔逃,人畜黄金白银珍宝衣物被掠无数。清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皇太极正式开始了进攻明朝、夺取天下的战争。

明关外宁锦八城防线首当其冲,成为皇太极攻击的目标。他亲率数万大军,指挥40余门红夷大炮强攻猛打,企图从城防陈旧的松山突破。然明守将金国凤等拼死抗击,清军死伤近两千人未能破城。皇太极被迫还师,转而采取围困锦州之策。他于广宁、锦州之间的义州筑城屯种,建为围困锦州基地。而后三月一期,轮番包围锦州。翌年,于锦州周围扎营32座,每营环深壕一道,沿壕筑高墙垛口,两营之间又挖长壕,密布逻卒哨探,使锦州与外界联系全部断绝,彻底孤立。不久,驻守锦州外城的明守军动摇瓦解,投降献城。明将祖大寿等率部退据内城,固守待援。明崇祯帝为挽救辽东危局,将得力干将洪承畴从镇压农民军的西线调至边防,任蓟辽总督,摆开与清军在松锦决战的阵势。洪承畴坐镇宁远,坚持"且战且守"、"使彼自困"的方针,指挥明朝援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其先头部队曾抵达松山,重创清军,

夺三旗营地，一度缓和了局势。然明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京官因"兵多饷艰"，力主洪承畴速战速决。时清军粮草将尽，故意扬言将乘虚攻入内地。崇祯帝既怕"内外受困"，又急于求成，密诏洪承畴出兵决战。洪承畴不得已，将粮草留于宁远、杏山及距锦州 70 里的海岛笔架山，率吴三桂等 8 总兵、200 余名战将、13 万大军驰援锦州。祖大寿乘机夺回锦州外城。皇太极下令满洲、蒙古 15 岁以上者悉从军，"空国以往"，与明军决一死战。明清之间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战役——松锦大战爆发。

清崇德六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八月十九日，清军抵达松山、杏山之间，横截大路绵亘扎营。翌日，皇太极命挖三道深壕，切断了松山通往各地的要道，将松山城外洪承畴援军团团围困；同时突出一军攻克笔架山，尽夺明军粮草。明军失粮草，绝退路，一片恐慌。二十一日夜，洪承畴决定突围。不料刚刚下令，明军已失去控制。大同总兵王朴乘夜黑先自遁去，唐通、马科、吴三桂等各总兵也纷纷率部夺路狂逃。马步兵自相蹂践，尸横遍野。皇太极已料明军当夜必遁，设伏痛击。"明兵窜走，弥山遍野，自杏山以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者不可胜计，海中浮尸多如雁鹜。"杏山明军残部出奔宁远，亦遭清军伏击，全军覆没。此役成为明清松锦决战的转折点。13 万明军"覆灭殆尽"，主帅洪承畴仅收缩万余兵马退守松山城。皇太极则移营松山城下，挖壕以困。松山地形中凹，恰如盆地，松山城即于盆底。洪承畴在皇太极眼中，正好比瓮中之鳖，釜中之鱼。然而，他却围而不攻，坐待明军食尽。松山被围半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守军先杀马，后食人。清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松山副将夏成德降清约为内应，城陷。洪承畴被俘，后降清。明将官丘民仰、曹变蛟等以下 3 千余人全部被杀。松山既陷，已被围两年、同样是"城内粮尽人相食"的锦州，军心瓦解。守将祖大寿待援无望，率部出降。清军入驻锦州城，以红衣大炮猛轰塔山、杏山。塔山 7 千明军与城俱亡；杏山 6 千明军开门投降。

至此，松山、锦州、塔山、杏山等关外四重镇全部落入清军之手。明朝山海关最后一道防线土崩瓦解，明朝精锐损失殆尽。明清力量对比发生了根

本变化。

松锦战后，清满蒙汉诸王将帅“争请直取燕京”。皇太极则按既定方针继续斩关而入，残毁明境，同时试图联络农民军夹击明朝，试图拉拢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叛明降清，且隆重欢迎西藏等边陲少数民族来归，直至明朝成为一棵孤立中空、辅根皆断、旁枝尽削的朽木。

吴三桂引清军入关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三月十九日，农民领袖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入北京。无力回天的明崇祯帝自去冠冕、以发覆面，缢死于宫后万岁山(俗称煤山，今北京景山)寿皇亭旁一棵古树之上。明朝覆亡。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谁主中原？

农民领袖李自成上一年攻克西安，本年初在西安称王，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而后掩兵东向，三个月内，渡黄河入山西、河北，进据北京，即欲先征辽东，后下江淮，夺取全国胜利。清太宗皇太极上一年去世，辅佐其子福临为幼主的摄政王多尔衮继承了“问鼎中原”的目标，急于中原逐鹿，倾全部重兵向南扑来。两股铁流，南北相向。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使驻守南北咽喉要冲山海关的一位青年将军突然变得举足轻重。他，就是吴三桂。

吴三桂(1612—1678)，字长伯、又字顾甫、雄爽，江苏高邮人，祖籍辽东铁岭。吴三桂出身将门，父亲吴襄是天启武进士，官至锦州总兵，后入京为中军府提督；舅舅祖大寿、祖大乐等人都是明辽东著名战将。吴三桂身材高大、面色白皙，“少年勇冠三军”，曾参加明清松锦州会战，洪承畴降清后，以宁远总兵总领辽东各部，扼守宁远、山海关等战略要地，有精兵四五万号称50万，其中三千子弟兵慓悍勇武，是清军在关外的主要对手。李自成进攻北京之前，崇祯帝曾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火速入京护驾。吴三桂内徙宁远兵民数十万入关，行至丰润，北京城陷，遂引兵北返，退据山海关，坐观时局变化。面对南北两方面压力，吴三桂自知己力不足以三分天下，只能二者

择一:或者投靠清廷,或者归顺李自成。

事情很明显。如果吴三桂归附大顺军,农民军可免北征之劳,以吴三桂北御清军、稳定辽东。如果吴三桂降清,山海关不攻自破,满洲八旗军可从容南下,夺取中原。山海关南北驿道上羽书往还,信使星驰。两大军事集团都在争取吴三桂。皇太极曾手谕并指使早已降清的吴三凤、祖大寿、祖可法以兄长、母舅名义招降吴三桂,许以"功名富贵"、"分茅列土之封"。吴三桂"答书不从"。李自成曾派明降将唐通、王则尧等人前往辽东劝降。又在北京监押吴三桂之父吴襄全家30余口作人质,由大顺军军师牛金星起草,命吴襄手抄寄发一封家书,劝吴三桂及早归降,"以全孝子之名"。吴三桂答书:"父既不能为忠臣,桂亦安能为孝子。桂与父诀,请自今日。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四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李自成为了抢在清军到达之前攻克山海关,与吴三桂在山海关附近交战。大顺军一字长蛇列阵,北至山,南至海,绵延数里。吴三桂率精锐首先冲击大顺军,炮声如雷,弹矢如雨,双方"阵数十交,围开复合",殊死酣战。至中午时分,双方均已精疲力竭,吴三桂兵被重重包围,渐渐难以支持。此时突然刮起了蔽日狂风,尘暴中一声号炮,拖着长辫的八旗铁骑如恶鬼猛兽般从吴三桂侧翼杀出,与吴三桂军合力向大顺军猛烈反扑。大顺军抵挡不住,纷然大溃。清军追杀40里。据载,该地"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

此役是大顺军走向失败、清军走向胜利的关键性一役。有人说,如果不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中国历史的面貌也许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那么吴三桂为什么突然降清、拱手交出"天下第一关"呢?

清初江南名士吴伟业(字梅村)写过一篇传世名作——《圆圆曲》,披露了吴三桂为陈圆圆而降清的"秘密"。诗中有:"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陈圆圆,名陈源,原姓邢,江苏苏州府人,江南名妓,通文墨,善音律,色

艺双全。崇祯末年,国戚田宏遇(一说周奎)以两千金买至北京,吴三桂偶于田宅与之相识,后以千金聘纳为妾。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吴襄一家被囚。有说大顺军首领刘宗敏派人拷掠吴襄,逼他交出陈圆圆据为己有。有说陈圆圆被李自成纳入宫中。据传,吴三桂本已决计归降大顺,接受了李自成4万两犒师银,率兵行至永宁。此时吴家一仆从京城逃出,带来吴襄被拷、陈圆圆被掠之讯。吴三桂正吃饭,闻说大怒,"抵几于地",拔剑斩案道:"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乃径自回师山海关,另谋"借兵助剿"之策。

重要历史人物的性格及个人恩怨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并非鲜见。陈圆圆被掠,无疑是刺激吴三桂降清的重要原因:明朝乍亡,形势复杂,年仅32岁的吴三桂难以稳妥斟酌损益,家门不幸,爱妾被夺,致使其英雄气短冲动一时,应当可以理解。然而这并不是吴三桂降清的根本原因。

这里,需要对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失败进行再思考。以往从传统印象出发,认为李自成农民军失败是由于他们进入北京后骄傲自满、腐化变质、沉溺于骄奢淫逸的享乐之中,因而丧失了到手的江山。然一些史家考证,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后纪律严明,并没有"腐化",他们的失败不在于"变质",正在于没有"变质"。当时人们(主要是地主士大夫)从内心认为明朝"气数"已尽,"十八子坐天下"天经地义,李自成就是新的"真命天子"。因而大顺军从西安到北京只遇到微弱抵抗,多数是望风迎降。即吴三桂本人也已准备归附大顺政权。但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骓马驰入北京之后,却以实际举措表明,他不是代表和保护地主士大夫利益的"真命天子"。大顺军并不缺饷,明朝府库所藏的金银足够支持其20年,李自成农民军却出于对地主贪官的积怨深仇,实行"追赃助饷"之策,拷掠官绅,杀戮降臣。大学士魏德藻交出1.3万两黄金,已故皇后之父周奎交出50万两白银,仍被打死。如此被打死的官员财主超过千人,且愈演愈烈,人人自危。吴三桂代表的地主士大夫切身感到,在农民的大顺政权下,他们的功名、地位、家室等一切利益都毫无保障,甚至不能保全一个小小的女子。大顺政权不是他们的政权,而是他们对立阶级的政权。吴三桂与清军对峙十数年,本来势同水火,但阶级矛盾上升

为社会主要矛盾，激化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吴三桂之流不能不饮鸩止渴，许诺“裂地以酬”，向清军“借兵助剿”。

汉族士大夫将此视为申包胥忍辱负重、求秦复楚之举，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君父之仇、亡国之恨。清军也顺应形势，暂时将夺取天下的野心隐蔽起来，打出了仁义之师的旗号。多尔衮声称，“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敌百姓也，今所谋者唯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必不尔害”。同时严明军纪：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受到当时汉族地主士大夫的拥护与支持。原望风迎降李自成的汉族地主士大夫一夜间几乎全部反水，倒向清军，协助清军剿杀农民军。

久未打过硬仗的大顺军在山海关与清军一战而败。李自成草草举行登基仪式后，退出北京。如同来时之速一样，兵败如山倒，一下败退至西安，又退至湖北，不久于九宫山被当地地主武装杀害。

短短三十二天中，吴三桂三事其主，两易新朝。应当承认，最初吴三桂“借兵助剿”、“复君父仇”的目标是鲜明的。有说多尔衮到达威远炮台后，吴三桂频繁往复，遣使八次。可能双方讨价还价、进行了一番复杂的谈判。《谀闻续笔》记载，吴三桂在山海关向多尔衮提出：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多尔衮允诺并“撵刀说誓”，双方达成协议。吴三桂甚至先行传火牌到京，命官员备法驾，著公服集郊外，迎太子即位。然吴三桂与多尔衮在山海关达成了哪些协议，永远也无从考辨。因为事实是，没有明太子入京即位，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二日，是多尔衮率清军浩浩荡荡进入北京。

吴三桂夺回了陈圆圆。他在军中设玉帐“结五彩楼，列旌旗箫鼓三十里”，迎接陈圆圆归来。“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盛大的场面不可能冲淡吴三桂内心复杂的情感——他一家包括父亲吴襄在内的 38 口被李自成所杀；他本人则成了助满人夺取汉人江山的马前卒。

吴三桂入云南后，造名园置美女侍儿十数人，“声色极一时之选”；清廷

又赐送四名满族少女随军转战，他与陈圆圆青年时代的恋情逐渐尘封淡忘。有说，陈圆圆后来易原邢姓，出家为道士，不知所终(一说死于昆明城破之时)。

民族矛盾的激化与波澜起伏的抗清斗争

多尔衮率清军进京之初，施行了各种争取汉族官僚地主士大夫支持的措施。如下令官民戴孝三天，为崇祯帝发丧，以帝后葬仪埋葬崇祯帝后；下令沿用明朝旧制，凡明朝官员不论东林阉党，降大顺与否，既往不咎，官复原职甚或加官晋级，山林隐逸也一体录用；下令召民复业，免除明末三饷加派；下令文官衣冠，暂用明朝旧制等。这些措施很快奏效，在汉族官僚地主士大夫的支持下，多尔衮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顺治元年(1644)九月十九日，多尔衮将顺治帝及宫眷自沈阳迎至北京城。十月一日，行定鼎登基礼，顺治帝二次告天即位，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

顺治定鼎登基之后，多尔衮不再掩饰吞并天下的野心，在派阿济格西征大顺军的同时，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清军征讨刚刚建于南京的南明福王弘光政权。

南明弘光政权却始终以“讨贼复仇”、“联清讨贼”为立国宗旨和基本国策，宁可自欺欺人地“相信”清军是为之“报君父之仇”的友军。甚至加封已降清受清王封的吴三桂为蓟国公，以褒奖他“借兵助剿”的功劳；派使臣携银十万两、金一万两、缎绢一万匹北上议和、犒劳酬谢清军，并以割地、岁纳白银十万两为条件，乞求其不要南下而联手消灭农民军。清军惟有冷笑，以雷霆万钧之势逼向南京。翌年四月中，兵至扬州，遇到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的英勇抗击。弘光小朝廷腐败透顶，朋党倾轧，使扬州孤立无援，终被清军重炮攻破。史可法被俘不屈，惨遭杀害。清军血洗扬州十日，五月渡江攻入南京。弘光君臣或逃或降，如鸟兽散。

南京既下，多尔衮以为可高枕无忧，转而以征服者姿态实行民族高压政策，于八月向全国颁布剃发易衣冠令，宣称“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所到之日，亦限旬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

一时间，清兵四出，游行于市，“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上示众。

剃光四周毛发只留中间钱币大的一撮编成长辫，是满族的发式习俗。汉族信奉的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丝毫损伤”。强迫他们改变自视为礼仪之邦的衣冠发式，屈从于他们一向鄙视的“化外夷狄”的衣冠发式，特别是作为归降标志的衣冠发式，不啻于奇耻大辱。前清军在江南血腥屠杀、奸淫抢掠等兽行已激起汉族民众的强烈愤慨，此时的剃发易衣冠令正如同火上浇油，更激化了民族矛盾。无数汉民或逃隐山林，或愤而自杀，或建发冢痛哭致祭。更有无数汉民提出“头可断，发不可剃”的口号，兴师聚众，舍身拼命，前赴后继，抗拒清军。江阴因之被屠城，昆山因之被屠城，嘉定因之被三次屠城。其中江阴仅由一典史阎应元率民众浴血奋战，整整固守了 80 日，外无援军，内无粮草，又遇暴雨城崩，清军大入。阎应元援笔题城门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杀贼，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毕掷笔，率千人上马格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江阴人或战死或自尽，无一降者。

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并立或相继的南明鲁王监国政权、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故明将领官吏，农民大顺军大西军余部，海上的郑成功，茅麓山上的夔东十三家，战斗到最后的李来亨……他们之间尽管有矛盾、有倾轧、有卑劣行径、有争权夺利，却交错联合，相互呼应，掀起了波澜起伏的抗清斗争。特别是顺治四年(1647)以后，一些降清的明朝将领如江西金声桓、王得仁，广东李成栋，山西姜瓖重又倒戈抗清；甘肃回族、广西僮族纷纷起义抗清。顺治九年(1652)大西军李定国在广西重创清军，致清统帅定南王孔有德手刃爱姬、闭门自焚，敬谨亲王尼堪阵前授首，“两蹶名王，天

下震动”。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张煌言率17万水陆大军北伐,围困南京……接连不断的抗清武装斗争,都曾使新立的清政权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清王朝征服全国的战争,长达20余年。这是一个被中原汉族政权长期以民族高压政策欺压的边疆少数民族反过来夺取中原政权的过程。这一过程,又因其以民族高压政策欺压汉族,举步维艰。

三　历史上的多尔衮

多尔衮(1612—1650),姓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第十四子。

在明清鼎革,特别是清军入关的进程中,多尔衮是仅次于努尔哈赤、皇太极的重要人物。他的身世——父母、婚姻、归宿,与清入关前后诸多疑案有关,因而成为影视作品倾力描绘与发挥的对象。

了解真实的多尔衮,有助于认识清入关前后的历史。

多尔衮与“大福晋生殉”

多尔衮的母亲,是努尔哈赤晚年宠爱的大福晋乌拉纳喇氏阿巴亥。而阿巴亥,是后金历史疑案之一“大福晋生殉”的主角。

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在距盛京(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去世。多尔衮三兄弟成为皇太极、代善之外惟一可能问鼎的力量,甚至有说努尔哈赤遗诏虽列多人候选,临终口谕则是传位多尔衮,暂由代善辅政。然关键时刻,代善突然宣布立皇太极为汗(事后得知,代善是被他的两个儿子说服,接受了皇太极的交换条件)。而皇太极得知此讯后的第一个反应,是率领诸贝勒一起赶赴大福晋阿巴亥所居之处,以先父“遗命”,逼其殉葬。实录记载,阿巴亥始“支吾不从”,后在皇太极等逼迫下无奈自尽。临终前她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

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幼子多儿哄、多躲，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

努尔哈赤16个妻子，殉葬的只有阿巴亥等三人，其他11人均未从殉。后金乃至清朝，除阿巴亥外，没有大福晋或正宫皇后殉葬的习俗和事例。努尔哈赤也没有可能“遗命”阿巴亥殉葬。第一，努尔哈赤重亲情。听说大福晋富察氏“欺夫”与太子私通，他悲愤异常，认为非杀不可，却又顾及“彼诸幼子生病，尚需看护服侍”，“若念此罪而杀，则吾爱如心肝之子，将何等悲泣”，而未杀，只“不与彼共处”，将其休弃。阿巴亥为努尔哈赤所钟爱，没有过失。她的两个幼子多尔衮、多铎，均只是十来岁的幼童，其丧父若再失母，在残酷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豪横兄长的欺凌下，将面临何等险恶的处境。第二，努尔哈赤疗养、病危、病逝均于盛京之外，即有这样的“遗命”，也没有机会告知诸贝勒大臣。更何况他病危之时召阿巴亥往迎，二人朝夕相处了四天之久，何不亲谕阿巴亥并对其“爱如心肝之幼子”作必要的安排？纵使他意欲保密，夙“有机变”的阿巴亥又怎么可能毫无察觉，在皇太极等迫令生殉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而束手就擒呢？

“大福晋生殉”疑案的背后，勾连着太子被废；富察氏被休两个疑案。

努尔哈赤晚年曾以长子褚英为嗣。在残酷的夺位斗争中，褚英被诛。其后，努尔哈赤立代善为太子。代善在所余十五皇子中居长，位居四大贝勒之首，佐父治国，屡建军功，曾被赐予古英巴图鲁（意为钢铁勇士，有清一代为代善所独有）的美称。他权势倾盖朝野，拥有正红、镶红两旗；其侄杜度主镶白旗，其长子岳托、次子硕托均为拥有牛录、统领军队的勇将。尤为难得的是，他为人宽厚谦让，从不居功自傲，故此深得人心。然不久，代善被废去了太子之位。

太子被废之前，发生了富察氏被休的大案。富察氏是努尔哈赤第二个大福晋，即史载与努尔哈赤患难与共、创业建国的衮代皇后。她以勾引代善、私藏私赐财物衣帛等四罪被努尔哈赤休弃。获罪关键，是与代善私通。其根据源于小福晋代音察和诸贝勒大臣的揭发，说她“曾两次备饭送与大贝

勒"，且"一日二三次遣人至大贝勒家"，又二三次"深夜出院"，在汗家宴会、聚集议事时，"用金饰、东珠装扮己身，眼望大贝勒行走"等，"谅有同谋"。这只是牵强附会的揣测，算不得真凭实据，诸多贝勒大臣却说是"属实"。可知他们暗中勾结，企图通过诬陷富察氏打击代善，以同继母私通的滔天大罪，废掉太子。

这是一场蓄谋的倒嗣政变。在此政变中直接得利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皇太极。褚英被诛以后，代善和莽古尔泰是皇太极夺位的主要对手。此次，他们同时遭到了惨重打击。富察氏是莽古尔泰生母。事情发生，莽古尔泰不知所措。他急于取悦努尔哈赤，竟亲手将生母杀死，从此声名一败涂地，与汗位无缘。代善同努尔哈赤之间则因之出现了不可弥补的感情裂痕。不久终被废去太子之位。第二个是小福晋代音察。她因首告有功，升为与努尔哈赤同桌共食的人。还有一个，便是侧福晋乌拉纳喇氏阿巴亥。富察氏被休弃后，她晋升为大妃，成为努尔哈赤的第三个大福晋。

完全有可能是皇太极联合阿巴亥，通过阿巴亥指使代音察诬告富察氏和代善，制造了这起冤案。

《满文老档》记载大福晋被休弃，没有指明是哪一位大福晋。努尔哈赤共有过三位大福晋。在迎娶第二位大福晋富察氏（即衮代皇后）时，褚英、代善之母——第一位大福晋佟佳氏已死。以后努尔哈赤又有乌拉纳喇氏阿巴亥为第三位大福晋。一种说法认为被努尔哈赤休弃的是第三位大福晋阿巴亥。影视故事多采用这种说法：

> 阿巴亥十二岁时被其叔父，乌拉部首领布占泰作为报答不杀之恩的一件礼物，献给努尔哈赤，作了侧福晋。她为努尔哈赤生养了最小的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深受努尔哈赤宠爱。阿巴亥与代善，美人英雄，两相情笃。或者是为了在年老的丈夫死后，为自己和自己的幼子找一个可以托身的靠山，而发生了皇太极指使小福晋代音察告讦之事。努尔哈赤忍痛将其休弃。然努尔哈赤临终前四天，终于不能按捺内心深处对她的爱恋之情，降旨令她迎驾与她重叙夫妻之情。最后她

被皇太极等诸贝勒逼迫，撇下三个幼子，为努尔哈赤生殉了。

如此情节，极富戏剧性。人物感情与命运一波三折，大起大落，适合影视编排。但从太子被废事件发生后，莽古尔泰手刃生母大富察氏，以及阿巴亥诸子地位上升看，被休弃的大福晋似乎不是乌拉纳喇氏阿巴亥，而是富察氏。

原居侧福晋之位的阿巴亥，在努尔哈赤晚年纷繁复杂的储位之争中与皇太极联手诬告大福晋富察氏与太子代善私通，二人各遂其愿：皇太极两个主要对手遭到灭顶之灾；阿巴亥登上大福晋的宝座。

六年中，阿巴亥发展得过快过强。阿巴亥成为大福晋后，她的儿子多尔衮三兄弟因母之故地位急遽上升。从废黜太子盟誓时诸贝勒的誓词中可见，努尔哈赤众多子侄辈中不少年高资深、战功卓著的人未成为和硕额真，而年方十四岁、八岁、六岁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已进入八和硕额真之列。努尔哈赤给予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极其罕见的殊恩，使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辖有汗父自领的正黄、镶黄二旗和十五牛录，并许诺再赐一旗，使其均为"全旗之主"。这一许诺虽因努尔哈赤故去未能实现，但多尔衮三兄弟即二旗六十牛录的实力，也已超过了包括皇太极在内三大贝勒，与大贝勒代善并驾齐驱。

阿巴亥的三个儿子，特别是多尔衮，成为有实力与皇太极争位的新的可怕对手。阿巴亥身为后金国母，权倾朝野，且年富力强，胸怀大志，精明机敏，知晓后金军国、皇太极乃至努尔哈赤的核心机密，她必然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完全可能以努尔哈赤"遗命"的名义，按自己意志左右政局。有她在，多尔衮兄弟的发展不堪设想。她只有死。

数日之内，年幼的多尔衮横遭大变，遽丧其父，又痛失慈母，且降居为受管辖的一般贝勒行列。而他并不知晓，这些变故深层潜在的原因竟然是由于可能（仅仅是可能）成为夺位的障碍。这样的身世可悲可叹。更为可悲可叹的是，年长 20 岁的皇太极，怀着复杂的情感恪守对阿巴亥"恩养"多尔衮兄弟的保证。他扶多尔衮作镶白旗旗主，将两白旗纳入自己的保护、当然也

是控制之下，而后，以兄长国君的身份对多尔衮百般拉拢提携，使多尔衮 24 岁时被封为和硕睿亲王，26 岁时授命大将军，统兵攻明，成长为大智大勇、军功卓绝的青年统帅。

多尔衮与“太后下嫁”

多尔衮成人以后，与诸多满族贵族一样，娶蒙古博尔济吉特氏为妻。他的婚姻平凡无奇，他的妻子鲜为人知。而他与顺治帝福临之母孝庄后的关系，却演绎成为清初四大疑案之一的“太后下嫁”案，被人们猜测议论了 200 多年。

崇德十一年(1643)，皇太极病逝。新的皇位之争发生在两黄、正蓝三旗支持的皇太极长子豪格和两白旗及多数诸王贝勒支持的皇太极十四弟多尔衮之间。然关键时刻，多尔衮突然宣布立皇太极九子福临为帝，由他本人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左右辅政，共管八旗事务”。这一决定使两黄旗大臣无话可说。他们打的是拥立皇子的旗号。而豪格已自行退出，且为无封号的继妃乌拉那喇氏所生。两白旗及多尔衮的支持者也能接受——他们的力量难以压倒对方，拥立年幼皇子摄政，可做不是皇帝的皇帝。满族帝基一旦崩溃的危机，竟以福临的即位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福临是只有六岁的小皇帝，站在他背后的摄政王多尔衮以及皇太后孝庄，遂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特别是二人关系引起诸多遐想和猜测，生发出无数版本的传闻和野史。

流传较广的是，多尔衮与孝庄本来即有私情，因此，在难以压倒对手自登皇位的情况下，多尔衮拥立了孝庄之子福临。而福临即位之后，孝庄下嫁了多尔衮，多尔衮终成皇帝。

这些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尽管孝庄 12 岁便嫁给皇太极，后为他生了福临；又是皇太极称帝所封五宫后妃之一的永福宫庄妃，但皇太极感情专一，只深爱孝庄之姐、关雎宫宸妃海兰珠一人。孝庄得不到皇太极宠爱，与少年

英雄多尔衮年龄相仿，且为近亲——多尔衮既为孝庄小叔，其妻还是孝庄堂姐，因而往来密切，即便无私情，久而心生爱慕之意，也在情理之中。但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孝庄无宠有势。五宫后妃中三名为博尔济吉特氏——中宫皇后哲哲是孝庄亲姑，东宫宸妃海兰珠是孝庄亲姐。庄妃上位虽有麟趾宫贵妃和她的儿子博木博果尔，但麟趾宫贵妃原为被俘获的蒙古林丹汗之妻，博木博果尔更幼，年方两岁。孝庄之子福临被多尔衮拥立几乎是必然的。

太后（孝庄）有无下嫁多尔衮，正史并无记载，史家也各执所见。

“下嫁说”以为寡嫂嫁叔是满族习俗，为当时道德规范所承认，更何况多尔衮大权独揽、野心膨胀，孝庄为保全儿子的皇位完全有可能采取下嫁之策。这一说主要依据有三点：一是入关后多尔衮的头衔从摄政王一直进加至“皇父”摄政王，试策、本章、旨意都改称其为“皇父”，且死后被尊为“义皇帝”，庙号“成宗”，祔于太庙。二是清初张煌言“建夷宫词”中有“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之句。三是孝庄死后没有祔葬皇太极，而是葬在远离盛京（今沈阳）昭陵千里之遥的东陵“风水墙”之外。

“未嫁说”则以为满族既已入关，又志在天下，便不能不受汉族礼俗的制约。他们对“下嫁说”的依据一一提出商榷，认为“皇父”等同于“尚父”、“仲父”，是古时君主尊臣之称，并非君主本人的父亲，不足为证；张煌言虽与多尔衮同时，却是远离北京的南明抗清名臣，不排除抱有成见，以传言加想像挥洒成诗；清代不祔葬的皇后并非孝庄一人，如顺治孝惠后、雍正孝圣后等也未祔葬。

入关以后，孝庄无论下嫁多尔衮还是做了多尔衮的情妇，都是从儿子和儿子的皇位出发。多尔衮无论同孝庄结合与否，都反映出他是清入关以后左右政局的第一人。

多尔衮与“顺治掘墓”

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赴边外围猎,病死途中,时年39岁。

多尔衮一死,年仅14岁的顺治帝立即亲政,不久,便以“阴谋篡逆”的罪名籍没了他的家产人口,悉行追夺所得封典,将其党羽凌迟处死,将其罪状昭示中外,传教士卫匡国记载:多尔衮的尸体被“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

顺治帝与多尔衮有何深仇大恨?

多尔衮罪名是“阴谋篡逆”,然多尔衮至死也未称帝。连乾隆帝都看到:多尔衮“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奉世祖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王果萌异志,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始以殓服僭用龙宾,证为觊觎,有是理乎!”

顺治帝与多尔衮的矛盾实际是满汉两种文化激烈冲突的反映。

顺治帝原本是作为汉文化“皇子继承”和满文化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一个折中,被满文化的代表人物多尔衮推上皇帝宝座的。顺理成章,满文化不但主宰了清初的政局,也主宰了清初的宫廷。

从清初政局看,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在击溃李自成数十万农民军的同时,以安置满族“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汉民“投充”旗下,强制实行落后的农奴制。原来的小农变成了奴隶,纷纷逃亡。清廷又行重治窝主的“逃人法”。留容逃人做工,甚至住宿的均算“窝主”,加上连坐,丧身亡家的不知几千万人。多尔衮颁布“剃发易服”令,将汉民族的情感、尊严乃至家园,统统践踏在八旗军的铁蹄之下。汉族人民理所当然联合起来激烈反抗,几乎颠覆了新建的清王朝。有朝臣提出非议,多尔衮则一意孤行、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竟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奏本不许封进!”

从清初宫廷看，君权旁落于多尔衮之手。孝庄为了维护儿子的皇位下嫁多尔衮或作了多尔衮情妇。多尔衮且行“皇父”之权，主宰顺治婚姻，为他迎娶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皇后并阻碍他学习汉文化。多尔衮本人则因袭被汉族士人耻笑的满族旧俗——不仅在同太后关系上不检点，且幽禁豪格后，公然册立其妻为妃。

而顺治已在皇帝之位——这皇帝是汉文化意义上的皇帝。顺治不能容忍这一切，强烈要求改变多尔衮的弊政，实现和证实自己至高无上的皇帝地位。这是他与多尔衮水火不容的根本所在。

作为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后继者，多尔衮挥师入关，迁都北京，西征南进，传檄天下，辅佐年幼的顺治帝，建立起新的全国政权。多尔衮是清朝的开国功臣，是率领自己民族驰入崭新世界、为多民族融合发展作出贡献的历史英雄人物。多尔衮的专权跋扈以及他所施行的在清初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圈地”、“投充”、“逃人法”、“剃法令”等弊政，则反映了他本人的历史局限和满民族向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向先进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过渡的历史进程。

思考题：

清军入关前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参考书目：

1. 谢国桢：《明清史论丛》，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1 年。

2. 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3. 周远廉、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年。

第二讲

康熙帝与清朝政权的巩固

两种文化的冲突融合

两个世界的初次碰撞

晚年的忧虑

康熙(1654—1722),姓爱新觉罗,名玄烨,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他年号康熙,死后庙号圣祖,人们习惯以年号、庙号代之,称他为康熙帝或清圣祖。

一　两种文化的冲突融合

顺治、孝庄与康熙

清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八日,玄烨,即后来的康熙帝,在北京紫禁城降生。

此时,满汉两种文化正在激烈碰撞。这种碰撞,不仅发生在明清鼎革之

际满汉两个民族的流血斗争中，而且发生在紫禁城内康熙的父亲与祖母之间。康熙之父、清入关后第一个皇帝顺治正自觉不自觉地代表着汉文化；而康熙祖母、顺治之母孝庄则理所当然地代表着满文化。

顺治初年，满族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转化为摄政王专制，皇帝形同虚设，王权高于皇权。顺治则强烈要求证实自己皇帝的地位。政治上，他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追求先进的汉文化，夜以继日"发愤读书"，曾经因之"呕血"。他从儒家"以文教治天下"的思想出发，明确了"帝王临御天下，必以国计民生为首位"的原则，亲政以后致力于促进两种文化的交融，仿照明制改革清朝政治，举行"临雍释奠"大典，将崇儒重道作为基本国策，并开始扭转多尔衮"重剿轻抚"的作法。在婚姻生活上，顺治以近乎狂暴的态度践踏满蒙联姻的祖制，毅然废掉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皇后，对其母孝庄再为他娶回的两位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后妃采取极其冷淡的态度，致使二人枯守一世空房，无一子嗣。与此同时，他无视"后妃之选，例不得及汉人"的旧制，爱上了定南王孔有德之女孔四贞。接着，又不顾一切将皇弟博穆博果尔的福晋董鄂氏抢到手。顺治的这些举动与其说是爱情至上的表现，不如说是想证明皇帝的意志至上。但是，清入主中原之初，政局动荡，百废待举，顺治个人无力抗拒仍然强大的本民族习惯势力，他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宫廷中，董鄂氏的儿子不明不白夭折，董鄂氏在丧子的巨大的打击下勉强挣扎了三年后故去，蒙古贵妇重又站稳了脚跟。仅仅过了四个月，顺治违心留下或是由他人矫拟的数十款罪己汉化的遗诏，将八岁继位的康熙和刚刚稳定的全国政权，交给了索尼、鳌拜、遏必隆、苏克萨哈辅政四大臣，离开了人世。

康熙的生母佟妃祖籍辽东，原隶汉军正蓝旗，其祖父即是清朝开国功臣佟养真。康熙即位以后，诏令母后一族由佟氏改为佟佳氏，由汉军旗抬入满军镶黄旗。佟佳氏虽是旗人，却仍是汉族的后裔。佟佳氏大约在顺治九年或十年初被选入宫。其时正是顺治帝意欲废后、后宫斗争趋于白热化的紧要关头。此时入宫的佟佳氏，无论作为孝庄为缓和后宫矛盾送来的小小礼物，还是作为孝庄为缓和满汉矛盾做出的某种姿态，都使顺治本能地产生厌

恶或戒备的心理。因而,佟佳氏虽生皇子,却一直遭受冷遇。特别由于顺治的五位博尔济吉特氏后妃均无子嗣,孝庄不得已而求其次,极力维护康熙,散布他生有"祥兆"、"必膺大福"。这可能更引起了顺治的反感,他借口康熙未曾出痘,竟令保姆携之搬出紫禁城别居。腥风血雨之中,康熙与夭折的皇四子同样是牺牲品,小小年纪,完全不谙世事,即被摒出宫门。直到晚年,康熙回忆起来还有凄恻唏嘘之感。他说:"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时未曾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憾之处。"然最终,康熙于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九在祖母孝庄的主持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康熙从自己所处的地位出发,对父亲、祖母予以同样的理解和同情,并由此衍生出由衷景仰敬爱之深情,这已远非一般亲情、孝心可比。这种情感,使人们以为他心中藏着顺治与孝庄两个秘密的谜底。

"顺治出家",是清初四大疑案之一。有传言顺治没有死,是到五台山做了和尚。其重要根据是康熙曾四谒五台山,且每次总要摒退从人,独登高峰。康熙二十二年(1683)秋,他亲自扶辇侍奉着71岁高龄的祖母孝庄前往五台。山岭峻绝、路数折不可上,孝庄遂还,命他代礼诸寺。此后康熙即再未往谒五台。人们猜测,康熙谒五台是去看望他的父亲,而最后一次,顺治已经过世了。

然经史学家缜密考证,顺治确系于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死于天花,并由茆溪森禅师举火焚化。事见《五灯全书》。那么,康熙四幸五台作何解释呢?应该说,康熙去五台山,虽不能作为顺治出家的根据,却与其父顺治有很大关系。董鄂妃之死,使顺治万念俱灰。他落了发,决意弃国出家,只是在玉林琇禅师的劝导下才暂时作罢。作为一种慰藉,玉林琇特意安排他去五台山进香朝佛。就在五台之行指日可待时,他撒手人寰。顺治帝发丧之日,众人"仰见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栏立,哭甚哀"。满汉文化碰撞中牺牲的毕竟是她亲生的儿子。灰飞烟散,何处寻觅儿子的孤魂?五台山成了惟一的寄托。康熙侍奉着祖母或遵祖母之命四上五

台山，不单单肩荷着一颗滴着血泪的母亲的心，而且怀着自登皇位以来对父亲与日俱增的理解、同情和思念。他最后一次谒五台，刚刚平定了三藩，收复了台湾。战争中局势出人意料的变幻，迫使他反复思索满汉文化冲突和融合的问题。他也许只能面对父亲的亡灵倾诉自己艰难的思绪，因为除了处境相同的父亲，再没有人可能理解他的矛盾和痛楚。

如前所述，"太后下嫁"，是清初四大疑案的另一个疑案，其重要根据是孝庄之葬。康熙是孝庄之葬当事人，于是他成了解开"下嫁"之谜的关键。

康熙对祖母孝庄的感情极其深厚，他自幼得到孝庄的慈抚严教，后又因孝庄扶持登上皇帝宝座，更重要的是他从中认识到祖母人格的伟大。孝庄一生经历三朝政局变幻，扶佐顺治、康熙两个幼主皇帝，晚年又协助康熙进行统一大业，是清朝举足轻重的开国元勋。她不喜专擅弄权，康熙即位时年仅八岁，有人曾以宋太后临朝称制的先例疏请垂帘，遭到她严厉斥责。孝庄是满文化的代表。正因为她是满文化的真正代表，她可以同汉文化进行血与火的碰撞，不惜牺牲自己的爱子；同时她也可以面对满文化同汉文化水与乳的交融，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她曾下嫁多尔衮或曾为多尔衮情妇，她也曾最先做出清算多尔衮及其党羽的决策。这些，于她个人有怎样的影响呢？孝庄去世后，康熙哀恸已极，将孝庄梓宫停放"暂安奉殿"整整30余年没有下葬。与其说他难以割舍思念祖母之情，不如说他不知如何才能消除世人对祖母的诋毁、猜疑和伤害。他不愿祖母高尚圣洁的灵魂哪怕受到一丝一毫的亵渎与玷污。康熙的儿子雍正，对孝庄已无康熙那种深刻的理解与感情，于雍正二年(1724)将其葬在清东陵风水墙外。

除鳌拜与平三藩

康熙帝于康熙六年(1667)14岁时亲政。亲政后，康熙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除鳌拜，一是平三藩。这两件事是铲除分权势力与割据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的重大举措。

康熙即位后，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奉顺治遗诏辅政。他们借口仰法祖宗，恢复了一些满族旧制。其中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是以“两旗换地”再度恢复的圈地恶政。

“两旗换地”直接源于四大臣中鳌拜的权势之争。鳌拜姓瓜尔佳氏，隶属满洲镶黄旗，为人孔武有力、专横暴躁，“人多惮之”。在辅政四大臣中，鳌拜位居第四。首位索尼是四朝元老，年迈多病；居三遏必隆是开国元勋额亦都之子，生性庸懦附和，二人与鳌拜同为两黄旗。于是位居第二、属正白旗的苏克萨哈便成为鳌拜的眼中钉。为打击之，鳌拜挑起了“两旗换地”事件。清初圈地时，多尔衮曾利用权势将本应划归镶黄旗的较好土地，划给了自己的正白旗。事隔二十余年，两旗军民已安生立业，鳌拜却重提此事，“立意更换”。消息传出，“无论旗民，怨声鼎沸”，京师周围“五百里尽抛弃不耕”，“京东各州县旗民失业者不下数十万人”。奉命经理此事的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同时上疏“请罢圈地”。鳌拜大怒，矫旨杀三大臣，强行换地，重掀圈地狂潮，灾难奇惨。康熙为此特召四辅臣询问，企图制止之。不料鳌拜根本不把13岁的康熙放在眼里，他厉声咆哮，一意孤行，践踏了四辅臣协商一致、得到皇帝准许方可行事的原则，自此益愈专横跋扈，甚至在康熙面前“嗔目起立”，“张以老拳”，“施威震众”。康熙亲政后，鳌拜把持议政王大臣会议，诬陷苏克萨哈“不愿归政”，议将其凌迟灭族。康熙“不允所请”，鳌拜竟捶胸挥拳，强争累日。最后仅将苏克萨哈改为处绞，其他维持原判。时索尼已故去，遏必隆依附鳌拜，四大臣辅政变为鳌拜个人专政。他广结党羽，“文武皆出其门”，政事先在他家议定，再呈康熙“逼勒依允”。他常于御前拦截章奏，呵斥部院大臣，将康熙已发科抄的朱批红本擅自取回改批，甚或公然抗旨不遵。

康熙则以陪练摔跤为名，瞒过鳌拜耳目，挑选忠实可靠的少年侍卫组成了一支贴身卫队善扑营（后为正式建制）。在时机成熟之时，果断地将已任吏部右侍郎的近臣索额图调回内廷复为一等侍卫；将鳌拜党羽以各种名义差遣出京。而后，于康熙八年（1669）五月十六日，乘鳌拜入朝没有戒备，突

令众少年将其一举拿下。议政王大臣会议审实鳌拜大罪30款,议将其立斩灭族。而康熙则于二十五日宣布:鳌拜效力年久,立有战功,免死拘禁。遏必隆"免其重罪",仅削太师及公爵(数月之后又"特为宽宥")。鳌拜死党除七人已杀之外,仅以九人处绞,其余人等一律免死从轻治罪。至于内外各官畏其权势依附及嘱托行贿者,俱从宽不咎。接着,为苏克萨哈以下被鳌拜处死革职降级者一一平反昭雪,废除辅政大臣,收回批红大权,整顿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

短短十天之内,康熙"声色不动而除巨慝",权力更迭而不株连。过人的智慧和勇气,不能仅仅从先天秉性上认识。决定16岁康熙具有这些优良品质、卓越才能的基础,是他在汉文化的氛围中,自信为"天子"、唯我独尊的心理状态。

除鳌拜后,康熙将解决三藩问题提上了日程。在他眼中,铲除割据势力与铲除分权势力一样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三藩指分镇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后其子尚之信袭爵)、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他们拥兵自重、各据一方,形成了尾大不掉的独立王国。经济上铸钱煮盐,贩洋开矿,横征暴敛。政治上挟制地方都抚,结党营私。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吴三桂,他任命,甚至向全国选派的文官武将,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称为"西选",以至于"西选之官几遍天下"。他们并借口"边疆未靖","要挟军需",致使"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藩镇割据与中央集权的矛盾不断激化,康熙将三藩作为亟需解决的三大心病之一,书于宫中柱上,"夙夜廑念"。

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以其子留镇广东。康熙抓住时机就势撤藩。此举使吴耿二王受到震动,分别上疏求撤,以探虚实。康熙认为"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断然下令三藩并撤。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反。

吴三桂率主力出黔掠川,进据湖广,陈兵长江南岸。而后上疏,企图要挟康熙收回成命,裂土罢兵。康熙为"寒老贼之胆","绝群奸之望","激励三

军之心”,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处死留京为质的吴三桂长子额驸吴应雄及孙吴世霖,毅然部署大军平叛。他以湖广为主战场,派主力正面设防,与吴三桂针锋相对,并伺机迂回江西,袭取长沙,断敌粮道。以陕甘川为西线,派重兵阻击叛军北上,并收复平凉、三边等地。以江西、浙江为东线,分兵驻守江宁、杭州、南昌、安庆等重镇,保卫江南富庶之地,阻止叛军打通江西、浙江通道。各个战场相互呼应,将叛军分割开来,逐渐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与此同时,“剿抚并用”,大力对叛军进行分化瓦解。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二藩”,进而招降了随叛的耿精忠、尚之信、王辅臣、孙延龄等,对投降的叛军“悉赦以往,不复究治”,“恩养安插”,彻底孤立了吴三桂。十七年(1678)三月,势穷力竭的吴三桂称帝衡州,八月忧病而亡。吴军人心涣散,在清军强大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土崩瓦解。二十年(1681),清军分三路合围云南。十月,下昆明。三藩叛平。

平三藩用了整整八年。八年中康熙每日三四鼓(凌晨三点左右)即起身赴乾清门御门听政。亲自听取前线都抚将领奏报、议政王大臣或九卿会议,亲自研究前线主帅绘制的敌我双方战场形势图,决定作战方略。尽管群臣屡次请上尊号,康熙却清醒地认为:若以平三藩为“摧枯拉朽,容易成功,则辞过其实”,“上尊号一事,断不可行”。

康熙没有料到,那个遭天下人唾骂、背主弃父不忠不孝的贰臣吴三桂,一旦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竟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而天经地义铲除割据势力的正义王师,却在朝野上下全国各地遭到了如此顽强的抗拒。以至于数月之间,六省皆陷,原明降官降将、遗老遗少纷起响应,加上农民、流民、蒙族等起事,“东南西北,在在鼎沸”,震撼了大半个中国,几乎断送了大清王朝。

康熙开始迅速调整统治政策。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特旨选送汉员张英、高士奇等入值内廷南书房。从此,南书房地位日益显赫,成为后世中枢机构军机处的前身。南书房当值汉员名义上陪皇帝从事琴棋书画、观花钓鱼等修身养性的活动,实际上备皇帝咨询军政,拟撰谕旨。三十三年

(1694)以后,南书房更成了汉官参与军机要务的阶梯,一旦入值,不管原来地位尊卑,一律授予翰林职衔,得到康熙的重用与眷宠,无异于感情融洽的同堂师友。如高士奇,原是"秃笔破砚坐报国寺廊下卖字糊口"的穷秀才,后因字写得好被大学士明珠荐入南书房供奉,不久官至礼部侍郎。而张英入值不满三年,即升为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张氏"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子孙五人入值南书房,子张廷玉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他们完全是康熙亲手扶植起来的汉族新权贵。

康熙十七年(1678),正值三藩平叛、戎马倥偬之际,康熙下诏开"博学鸿儒科"(又称"博学宏词科"),十八年(1679)三月初一日,亲试博学鸿儒,网罗汉族文人。试题一赋一诗。有人故意写得词句不通;有人借口目疾仅赋诗一首;有人不合韵律;有人用语犯忌,康熙一律曲意迁就,一一加以录用。未中、未试者亦被特赐内阁中书衔,以示恩宠。与此同时,康熙又网罗大批明朝遗老遗少参与纂修《明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图书。一时间,汉族士子纷纷出仕入馆,人称"遗民自此不世袭"。

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再次下令民间田地"自后永不许圈",最后结束了绵延数十年的圈地余波。三十八年(1699),康熙在逐步放宽逃人法的基础上,将专司督捕逃人的兵部督捕司改为刑部督捕司,"终岁不劾一失察之官,不治一窝隐之罪",基本解决了困扰几十年的逃人问题。

康熙带着他的民族扑向了先进的汉文化;而汉民族则最终接受了明清鼎革的现实,将康熙视为了真命天子,这是满族为主体、满汉联合统治体制在全国形成和巩固的标志。

统一台湾

平定三藩以后,康熙把进军的矛头指向台湾。康熙在天下百姓心目中和他自己心目中完成的转变,使他能够完成收复台湾的大业。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明天启元年(1624)被荷兰人侵占。康熙元年

(1662)，郑成功驱除荷人进据之。郑成功死后，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斗争渐趋平息，百废待举，人心思定，台湾郑氏政权成为分裂国家的割据势力，三藩之乱时，曾呼应吴三桂，"猖獗海上"，一度占据潮州、漳州、泉州、惠丰等地，"杀掠所至，十室九匮"，"亿万户渔盐耕织咸失业"。

康熙最初对台湾采取"循于招抚，不事轻剿"的方针。康熙二十年(1681)除鳌拜、平三藩后，康熙起用台湾降将、内大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任以"进剿海逆之责"，命其"底定海疆"，统一台湾。

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率战舰300余艘、水师2万余人出战。时值台风盛季，海战"最忌"，施琅却"出不意，攻无备"，劈波斩浪，直驶澎湖。二十二日两军决战。施琅各50艘战舰，于东西两侧牵制敌军；亲率主攻舰队大鸟船56艘居中，后续舰队80余艘紧跟其后，此时"南风大发，波涛汹涌，诸船扬帆而进，风利舟快"，"乘势奋击，以一当十"。战斗自早七时持续到下午四时，"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点，烟焰蔽天，咫尺莫辨"。清水师焚毁击沉敌舰200余艘，击毙将军以下军官300余员，歼灭敌军12000余人，"尸浮满海"，一举攻占了澎湖列岛。郑氏主力尽失，被迫请降。施琅率军至台，他早年降清，父弟子侄均为郑氏所杀，然他不负康熙所望，非但未行报复，反亲赴郑成功庙行告祭之礼，护送郑氏君臣登岸，赏赐并妥善安置投诚人员，严禁官军扰民，宣布"蠲三年徭税差役"，台湾欢声动地，万民安堵。施琅次子施世纶乃清朝著名清官，小说《施公案》比之为宋朝包拯、明朝海瑞，此是后话。

台湾既平。康熙陛前发生了新的激烈争论。部分大臣认为台湾乃"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加广"，"守则必设重戍"，设重戍一则加重内地人民负担，二则可能出现新的分裂割据，主张"迁其人，弃其地"。甚有人荒谬建议：不如"乘国威远播，畀其地与'红毛'(按：指荷兰)，而令世守输贡，似犹永逸长安之道"。施琅等则坚决反对放弃台湾。他们认为：台湾"实肥沃之区、险阻之域"，中国东南形势在海不在陆。台湾虽一岛，实腹地数省之屏蔽。弃之，则不归番，不归贼，必归于荷兰，"彼执其戈船火器，又得形胜膏沃为巢

穴”,无异于助其入侵。不要说台湾屯种尚可少资军食,即使它是不毛荒壤、须借内地挽运,“亦断断乎不可弃”! 这种观点已不再把中国大势等同于世界大势,而是敏锐体察世界大势,把中国大势放在世界大势之中思考。

康熙较少天朝大国皇帝的陈腐。他明确表态:“台湾弃取,所关重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他转问臣下:恐台湾将来会尾大不掉,那眼下怎样?臣下答:以皇上声威,几十年可保无虞。康熙豪爽大笑道:既如此便置郡县。若计到久远,十三省又能永保为我所有吗?

康熙二十三年(1686)四月十四日,康熙正式批准在台湾设置地方军政机构。自此,台湾隶福建省,设台湾一府(澎湖直辖于府),凤山、诸罗、台湾三县。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驻兵八千,分水陆八营(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二千)。其军政设施与内地完全相同,连衙署建筑也改变了原坐东向西的习惯,而如内地“衙门口,朝南开”。

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康熙赋诗纪盛,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全国统一之后,康熙像所有的开国之君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之上。

蠲免 康熙二十四年(1685)以后,康熙开始普免百姓上交的赋税钱粮。三年之中,直隶、河南、湖北、湖南、江南、四川、山东、贵州、福建等9省轮免一周。此后,年年都有大规模蠲免。“有一年蠲及数省,有一省连蠲数年者。”据载终康熙一世,全国共有20余省区获免税粮、丁银、逋赋545次,总数不下1.4亿两。蠲免,特别是大规模地普蠲轮蠲,能够有效地防止官吏舞弊中饱,成为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措施。如时人所云:“惟蠲免钱粮,率土均沾实惠。”

赋役改革 与蠲免同时,康熙大力进行赋役改革。为了均平赋役、防止

舞弊、减约征收，康熙先后试行了各种办法。

如赋役征收，最初沿用顺治易知由单(纳税通知单)，提前明示小民应纳税粮多少，以防官吏私派。后因官吏指称印费勒民，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停止刊刻。翌年，将征收钱粮的二联限票(串票)改为三联限票(串票)。原税户交纳钱粮按月份为十限，起征日发给限票，完纳一限截一票，未截，按数催追。限票分两联，官印钤中，官民各执其半。奸吏征收时常常借称核对，将纳户一联强留不给，以完作欠，以多作少，而三联限票一存州县，一付差役，一给纳户执照，扼制了舞弊行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又实行征粮滚单法，每十户五户合制一单，上列户名、田地、应纳钱粮，发给甲首，由甲首开始依次滚催，自封投柜。后人将这些方法概括为"催科四法"："以分限(分期征收)之法纾民力；以轮催(滚单)之法免追呼；以印票(三联印票)之法征民信；以亲输之法(自封投柜)防中饱。""催科四法"在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生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更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令直省都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查明，另造清册题报。"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固定了全国丁银总额，使小农负担相对稳定，为近一步赋役改革——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准备了前提条件。

治河　平定三藩、台湾归附、天下安定之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六日，康熙首次南巡。自此至四十六年(1707)，康熙六次南巡。康熙南巡的首要目的是治河。

明清战争之际，黄河河患无人问及，中原重地灾情惨重。康熙元年至十六年(1662—1678)，黄河大的决口达 67 次，不但灾民告困，且供运官俸兵饷的数千艘漕船受阻，京师"危急异常"。康熙亲政之初，曾将亟须解决的三件大事书于宫中柱上，"河务"赫然在内。他曾说："从古治河之法，朕自十四岁即反复详考。"南巡期间，他在高家堰等险工之地一日往返百余里，沿堤详勘地势，咨询河工要害，与河臣讨论和制定治河方案。康熙所依重的河臣名靳

辅，十六年(1677)出任河道总督。他发现并重用优秀水利专家陈潢作为幕宾协助治河。二人贯彻康熙“务为一劳永逸之计”的谕旨，批驳了只知保漕不知治黄，只看下游不看上游的观点，提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挑浚清口”、修高堰坦坡、减水坝、中河等具体办法，“不避寒暑，无分昼夜，与大工为始终者十年如一日”。三十七年(1698)，康熙总结靳辅等多年的治河经验，形成“上流既理则下流自治”的治河思想，设计了“闭六坝以束淮敌黄，通海口以引黄归海”的治河方针，翌年三次南巡具体部署、亲理河工。其后，除四、五、六次南巡亲临指挥外，更以治理京畿永定河作为试验，成功即向黄河推广。四十二年(1703)，治河显效。史载“海口大通，河底日深，去路甚速，淮水畅出。黄水绝倒灌之虞。下河等处洼下之区，俱得田禾丰收，居民安晏”。

发展工商 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后，康熙下令开放海禁。允许内迁之民回原籍生息，允许闽粤商人出洋贸易，允许外商在国内设馆经商。并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口海关与外国通商。进出口贸易空前活跃，仅苏州一地每年出海贸易的船只即达千余。

三十九年(1700)，康熙下令将班匠银陆续纳入地亩征收，结束了工匠劳役制。与此同时，康熙取消或放松了对手工业的诸多限制。织户拥有织机可超百张；民间可采铜铁矿；炼铜煮盐亦允许私营和官督商办等。

清初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中国传统社会进入了最后的太平盛世——康乾盛世。

二 两个世界的初次碰撞

雅克萨之战

17世纪4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整个欧洲。殖民主义扩张主义肆行宇内，亦步步向古老的中华帝国逼近。葡萄牙、西班牙、荷

兰、英国、法国在东南，沙皇俄国在东北西北，形成了对中国的钳形包围。特别是沙俄，在中国对黑龙江流域行使有效主权近一千年之后的明末清初，第一次发现世界上有这样一条“土地肥沃，远非东北荒漠冱寒之地可比”的江河。沙俄纵容其士兵在黑龙江流域猖狂窜扰、烧杀抢掠，甚至“用父母的尸体搭成烤架来烧烤孩子们”，灭绝人性地吃掉50多名中国居民，“用火与剑蹂躏了黑龙江”。自康熙十五年至二十一年(1676—1682)，沙俄变本加厉，调拨大量物资军火，派遣大批哥萨克进犯中国东北。继尼布楚、雅克萨、楚库柏兴三个最重要的侵略据点之后，在黑龙江各条支流建堡设寨、修筑工事。并以这些据点为巢穴，劫掠人质、强征贡税、勘察和开采银矿，不断侵扰我索伦、赫哲、费牙喀、奇勒尔等各族居民。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藩平定。康熙决心彻底解决东北边境的沙俄侵扰问题。于当年三月借赴盛京谒祭祖陵之际，实地考察边防情况，开始进行大战前的准备。九月，派副都统郎坦、彭春等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一带侦查。翌年三月，郎坦等回报，“发兵三千”足可攻取罗刹，建议立即出兵。康熙则下令进行更充分的准备。首先在黑龙江(即瑷珲，今黑河市)、呼玛尔两地建城驻军。任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从此盛京、宁古塔、黑龙江三将军鼎足而立，黑龙江城成为东北重镇。其次于吉林设厂造船、于黑龙江屯垦征粮。再次在盛京到黑龙江之间建立长达5000里的运输线；在乌喇到黑龙江之间开辟1400里的新驿道。万事俱备，始命清军扫除俄军外围据点。二十三年(1684)初，整个黑龙江中下游及各条支流的俄军据点均被拔除。收复黑龙江上游战略要地雅克萨的时机成熟了。

康熙坚持先礼后兵，三次咨照沙俄侵略军：“罗刹等若改前过，急回本地，则两相无事”，“倘犹执迷不悟，留我边疆，彼时必致天讨，难免诛罚。”兵临雅克萨城下，仍先礼后兵，遣返俄俘带入两函，发出最后警告，要求俄军撤离中国。俄军恃巢穴坚固，狂妄拒绝。二十四日，清军包围雅克萨。翌日黎明，清军神威将军大炮突然猛烈轰城，俄军毙命百余人。俄督军托尔布津被迫出降。在其宣誓不再侵犯中国领土、不再重来雅克萨以后，清军主帅彭春

将700余名俄俘遣返回国,允许他们带走全部武器财产,之后焚毁雅克萨城,撤回千里以外的瑷珲。托尔布津则立即将誓约践踏脚下,率500人卷土重来。康熙于二十五年(1686)二月方知俄军又占雅克萨,当即部署第二次雅克萨之役。七月,清军再围雅克萨。再次先礼后兵,派俄俘带信入城作最后的劝降。俄军再次狂妄拒绝。时雅克萨城内有俄军800余人,新筑的城防工事比较坚固,弹药粮草比较充足。清军采取了长期围困策略。此间,双方多次激战。俄军被击毙百余名,托尔布津也送了命。九月,俄军仅余66人,弹尽粮绝,雅克萨城指日可下。二十五日,俄遣使到京,表示接受停战谈判。

康熙以战胜者身份迫使沙俄代表坐到了谈判桌前。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初八至二十四日,中俄使团在尼布楚(今涅尔琴斯克)正式举行边界谈判,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条约六款,划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俄国撤出雅克萨及所有它在中国境内的军队和据点;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是中国领土;规定了越界人员的处理、中俄贸易等。清朝出于战略考虑在领土方面做出了重大让步。其后,清朝加强了对东北边疆的有效防御、管理与建设,使此段边境在长达150年的时间内保持了相对安定。

历法之争

在剧烈变化的世界背景下,入侵中国的俄国人,觊觎中国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人,已不是历史上窜扰中原的游牧蛮夷。他们代表着一种危险的上升力量。

康熙十一岁时,亲眼目睹了中西文化围绕历法的激烈交锋。康熙之父顺治采用以西法修订的《时宪历》,任用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正,尊其为"法玛"(满语爷爷),赐"通玄教师"尊号,曾引起守旧派的不满和反对。顺

治死后，鳌拜集团执政，有杨光先上书，激烈反对西历，并强调指出：时宪历“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正朔，毁灭我国圣教，唯有天主教独尊”。

康熙三年(1664)十一月，鳌拜集团下令逮捕汤若望及其助手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同时将赞成西历的李祖白等5名中国官员下狱。出于巧合，恰在此时彗星现于空中，接着是一场席卷全城的沙暴，连刑部大院都满是沙尘，人们以之为不祥之兆。刑部欲速决此案，令南怀仁等(汤若望中风病瘫)在狱中从牢窗小孔计算日食时间。并令华人、回人以各自方法同时计算。实地观测的结果，是大统历和回回历的天算家被击败，惟有传教士依西历推算的日食时间正确，而且如传教士预告，发生的是日全食，其他学派均错误预告为日偏食。然而廷议仍将汤若望等拟判凌迟、斩首、流徙。又一次巧合出现了，天上出现彗星，地上发生地震。德国人恩斯特·斯托莫《揭开天文秘密的大师》描述道：“北京城和皇宫晃得像海上的一条船。监狱的墙被破坏了，卫兵们吓得惊慌万状，房屋在强震中像纸牌一样成片塌倒，向外逃散的人们木然地走在瓦砾之间。土地像伤口一样绽开大裂口，城墙多处毁坏，火灾四处蔓延。尤其可怕的是，一股飓风夹带着沙漠的黑云遮天盖地而来。”朝野上下人心恐慌，以为“狱讼不公，天象示警”。康熙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出面干涉，将辅政大臣原折掷于地下，以汤若望为先帝信任之臣，命速行释放。传教士幸免于死。李祖白等中国官吏却仍被斩决，新历仍被废除，复行大统历。由杨光先出任钦天监正。

中西历法之争一直延续到康熙亲政之后。其时杨光先主持的钦天监先后采用落后过时的大统历、回回历，错误百出，一片混乱。康熙七年(1668)大臣会议，请皇帝圣裁。

康熙则决定以实验的方法检验双方观点正谬。他谕令双方“勿怀夙仇”，允许双方“各执己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互相争竞”。宣布：“孰者为是，即当遵行，非者更改。务须实心，将天文历算详定，以成至善之法。”康熙命代表大统历的杨光先、代表回回历的吴明晅、代表西历的南怀仁，分别用

各自的算法推算正午日影所止之处。

三次实地测验，杨光先、吴明晅有误，南怀仁无误。康熙又令测立春、雨水二节气及月、火、木星之运行。杨光先、吴明晅“逐款不合”，南怀仁“逐款皆符”。杨光先痛心疾首道：“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今南怀仁，乃天主教之人。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奉天主教之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也！”“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康熙则平静谕令：“著南怀仁为钦天监正。”

康熙八年(1699)除鳌拜。南怀仁等立即发难，指杨光先、吴明晅是鳌拜党羽，请求将杨光先“即行处斩，妻子流徙宁古塔”，为已死之汤若望等平反昭雪。康熙准予昭雪南怀仁，却宽免了杨光先、吴明晅。吴明晅更“仍留原任”。康熙告诫他：“以后着更改前非，实心实意，与南怀仁商议，务求合于正理，以造历日”。康熙始终将中西历法之争限制在文化、学术的范围之内。

皇帝科学家

康熙作为传统意义上至高至尊的真命天子，能够将科学与政治分开已属难得。更难得的是，他能够从皇帝的宝座上走下来，突破中西文化的疆界，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自然科学。

每日清晨，上驷院所备马匹将传教士南怀仁、白晋、徐日升、张诚、闵明我等接入大内，直至黄昏方将其送回寓所。康熙处理繁忙政务之后，总要和他们一起度过两三个小时。传教士们用汉语或满语讲解主要天文仪器、数学仪器的用法，讲解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化学、医学、解剖学、地理学、药理学，乃至拉丁文、西方乐理乐器、欧洲哲学、西洋绘画等。康熙认真听讲，反复练习，亲手绘图。其热爱科学的强烈感情与勤奋专致的学习热忱，使传教士们惊叹不已。

康熙酷爱数学。他下令将已译成汉文的欧几里得《几何原理》译成满

文;将传教士进讲法国数学家巴蒂《理论与应用几何学》的满文讲义译成汉文,亲撰序文,审校、验证两书差别,发行全国。他打得一手好算盘,比西法运算还快。他能熟练地用对数运算习题,用对数表分析三角。还多次向学臣、后为著名数学家的陈厚耀等讲解开方法、定位法、虚拟法、借根法等西洋数学知识,并亲自将几何原理教给了一位他所钟爱的皇子。康熙三十一年(1692),他更在金銮殿为群臣用数学知识验算太极图等。又测算正午日影所到之处,命人取日晷表放于乾清门外。群臣候至正午,见日影与康熙所作标志互相吻合,顿时山呼万岁。

康熙注重应用科学。他掌握了比例规、大半圆仪、照准仪、象限仪、水平仪、罗盘仪、天文钟等测量、观测仪器的全部操作方法。命人将其搬进他的内室,安放在御座两旁,经常用它们在御花园内观测日蚀、月蚀和行星、星系。即便外出巡幸,也常令内廷人员背负着这些沉重的仪器跟随左右。六次南巡,他沿途亲自用水平仪测量湖河水位、山地距离,用坚实可靠的数据,正确指导治河工程,将用数学计算河水流量的方法教给河臣。平定准噶尔之战,他登高用望远镜观察地形,部署兵力,指挥军队争先占据军事要地,取得一个个胜利。他还谕令制作其他仪器,今北京古天象台八件巨大天文仪器中的六件,都是康熙时期吸收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结合中国古代传统科技制作的。他又谕令传教士在宫中用化学方法试制西药,特为之建立了配有全套白银实验用具的实验室;谕令用金银制成旅行药壶,巡行时将西药试剂赐给随驾人等。

康熙重视西方先进科技在中国的应用。平三藩时,他命南怀仁以西方"制炮妙法"督造适用于南方山地作战的轻便炮位。南怀仁造出了多种类型的火炮,在卢沟桥炮场演放,他屡次亲临视察。演放最长的一次达3个月,共发实弹21000余枚,有的炮位连发三四百枚完好无损。他邀请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白晋等协助,何国宗、明安图等中国学者参加,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西方经纬度测绘方法,测绘第一部详细的全国地图。经过十年的努力,包括用"太阳午正高弧定纬度法"实地勘测各省,用"梯形投影法"、

以1:140万比例尺精心绘制出中国地图绘制史上的空前巨作《皇舆全览图》。200年后，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称它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确”。

对于西方科技的学习和应用，开阔了康熙的眼界和思路，使他具有了自然科学家的眼光和头脑。康熙曾以行政命令强制推广种牛痘；曾用10年时间年年反复试验选种，亲自培育出色如丹砂、一岁两熟的“御稻种”；曾亲自组织大规模的气象研究工作，在北京设立若干气象站，要求各省逐日逐月作气象记录、按期上报，进行综合比较，有清一代积累下来浩瀚的气象资料，成为今天气象史研究的宝库。康熙6次南巡、3次西征、多次视察东北，均亲自调查研究沿途地形地貌农产作物，并作详细记录。记录中有他用仪器测量一些地区方位、高低、远近的情况；在瀚海沙漠发现“螺蚌甲”而推测该地曾经是海洋的经过；发现木化石和鱼化石的确切地点和对该化石的详细描述等。

康熙成了中国追求近代自然科学的先驱者，一位卓有成就的皇帝科学家。

滑走的机会

康熙在位的十七八世纪，世界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时势造英雄、也造就英雄的对手。在一向平乏庸碌的各国君主中，此时突然站立起一批伟岸之君，如英国查理二世、法国路易十四、俄国彼得大帝等。康熙的文韬武略远胜于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君主。即使在西方传教士心目中，康熙也是“帝王当中最圣明的君主”，是“连做梦也未曾见过的伟大人物”，连他幼年患天花留下的麻脸，也不影响他们对他的赞美及崇拜。他们这样描述康熙的容貌：“他威武雄壮，身材匀称而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两眼比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圆略带鹰钩状，虽然脸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迹，但并不影响他英俊的外表。”康熙大帝有可能认识中西文化碰撞的实质

和结局；有可能将对西方先进科学的炽烈追求从一身推及一国，带领古老的中国走一条振兴科学、发展实业的维新之路。若如此，中国的历史将会产生怎样的面貌呢？

康熙尽管集满汉文化于一身，却最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肩荷者。他走进了世界的无涯学海，涉猎了新鲜的自然科学，却用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古圣人垂世立教之心，在自己的治世思想中筑起了一道亦新亦旧的屏障。

康熙始终认为，学问中最有用的是记载"帝王道法，关切治理"的儒家经籍，是"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的中国史乘。

康熙八年(1669)四月，康熙亲莅国子监祀孔，恢复以八股文取士。擒鳌拜后，康熙立即着手举行"经筵日讲"，由儒学大师充任经筵讲官，进讲儒学经义。康熙五更即起诵读儒学。理事稍暇，即与讲官"讲论琢磨"；外出巡视也从不辍学，必令讲官随从，往往不顾一日鞍马劳顿，读书直到三更。同他父亲一样，诵读儒家经典竟至过劳吐血。

康熙九年(1670)，康熙向全国颁布了以儒学治国的"圣谕十六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息诬告，以全良善；训子弟，以禁非为；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免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康熙二十七年(1689)，康熙请传教士巴明多将法国人皮里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惟恐他宥于中国礼教，特谕"身体上虽任何微小部分，也必须详加翻译，不可有缺。朕所以不怕麻烦，命你等详译此书，因此书一出，必定大大造福于社会，人之生命或可挽救不少。"而这部历时五年译出的著作(后又用汉文译出两部)，康熙终于自己宥于中国礼教，没有将其出版，只是藏于深宫，供自己浏览研习。康熙下大气力宣传推广的是传统儒家的义理经学、宋明理学。他本人反复研究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捍格；他并亲自主编《性理精义》，重新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颁行全国。

康熙尽管主持过中西科技的公平竞赛，却最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宰

者。他将可能敞开的大门重又紧紧关上,构筑了亦新亦旧的屏障。

平定三藩后,康熙曾在云南实行鼓励开采铜矿的政策:“听民开采”,只抽矿税 20%;放本收铜,由官府每年预借铜本 100 万两给各铜厂,所采之铜由官府收购。铜产量大增,最高时年产 1000 多万斤。其他各地矿业也有较大发展。然而,矿徒“聚众几至十余万,强梁争竞,时时有之”,有官员上疏请以明末矿徒造反为鉴时,康熙从开矿转向禁矿,谕令:“嗣后有请开采者,俱着不准行。”接着,封闭了几个最大的民办矿厂,又陆续将湖南、广东、四川、河南的诸多矿厂“永行封闭”。矿业生产衰落。

平定台湾后,康熙曾在东南沿海实行开海政策,允许并以轻税政策鼓励人民载货出洋贸易,极大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沿海内外多造船只,飘洋贸易。捕采纷纷,往来难以计算。”然而,当“海寇”势力日益增长,有与海外力量联合的趋向时,康熙从开海转向了禁海,五十六年(1717)六月,正式下达严格管理商船、渔船有关人员;禁止中国商船赴南洋贸易;禁止向国外卖船、运米和留住国外;对外国商船严加防范的禁海规定。“土货滞积”,“滨海之民半失作业”。

亲政以后,务实的康熙曾信用传来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耶稣会士。康熙三十一年(1692)特发上谕,为天主教正名、传教士表功,命存留各处天主教堂,“凡进香供奉之人,仍需一照常行走,不必禁止。”此即著名的“康熙保教令”又称“宽容谕旨”。其后,天主教在中国迅速发展,教堂成倍增加,教徒遍布 15 省,发展到 30 万人,其中不乏皇亲国戚、八旗将领。康熙四十四年(1705),罗马教廷派使臣多罗来华,禁止中国教徒敬天祀祖、祭孔事君。康熙则坚持外国传教士来华必须遵守中国政令习俗,否则“必逐回去”。多罗返回途中,竟擅自在南京公布教皇禁令。康熙立即将其逮捕,押送澳门,后囚死狱中。五十九年(1720)罗马教廷再派特使嘉乐来华重申禁令。鉴于罗马教廷蛮横无礼的态度及诸多传教士在华结交权贵、刺探情报、高利盘剥等种种不法行为,康熙将嘉乐驱除出境;将不法传教士逮捕、严审、监禁、判刑,最后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流行。

两个世界军事上的冲突、文化上的碰撞，都因清朝尚处上升阶段而暂时冰释。康熙成功地在军事、政治、文化诸方面加固和新筑了一道道屏障，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尊严和传统，为古老的中国航船在世界变革的惊涛骇浪中保留了一处相对平静的港湾，赢得了驶向新的盛世的机会。

而另一个机会，有如指缝中的沙，轻轻滑走了。康熙没有抓住中西文化碰撞的实质，没有像与他同时代的彼得大帝等君主那样，具有不发展近代工业便面临灭顶之灾的痛切感觉，因而，没有将中国带上新的腾飞的起点。

起点不同，结局必然不同。康熙只是朦胧地感觉到了某种威胁。他曾说："海外如西洋诸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这句话不幸而言中，成为了历史的谶言。

三　晚年的忧虑

满汉文化交融，不再势同水火；两个世界对峙，暂无激烈碰撞。

康熙忧虑"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尽祸至，泰去否来，元首丛脞而股肱惰，至于万事隳坏而后必然招天灾人害杂然并至"；担心各级官吏"见朕血气精神渐不如前，因以为奸"，而使其在位五十余年的忧勤苦衷付于东流。

他的忧虑和担心，太快地成为了事实。

土地兼并与耗羡加派

康熙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与耗羡加派出现了迅速上升的趋势。

江苏"百年田地转三家"的俗语，变成了"十年之内，几易其主"。大官僚徐乾学仅在昆山一县便占田千余顷。大官僚高士奇在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安徽淮南江北出现了"坐拥一县之田，安然食租衣税"的大地主，土地"为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广东有"田数十百顷的大地主"。河南有所谓"田连四邑亩以万计，东西南北各十里"大地主。土

地兼并是中国传统社会周期性危机的第一个链环。紧接其后便是：自耕农破产，流民增加，佃农队伍受流民挤压，田主"铲佃增租"，佃农随之破产，国家税源枯竭，经济生活窒息，社会危机总爆发。

耗羡，是地方官以将散碎银两熔炼成统一宝银时造成损耗、运粮时雀食鼠啃造成损耗为名，在正额钱粮之外征收的附加税。清朝实行低俸禄制度，一二品的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岁俸银仅150两至180两。中下级官吏更低，一个七品县官一年只有45两俸银。区区官俸本不足以维持各级官员的家庭生活及庞大幕府的费用支出，经济繁荣更刺激了各级官员享受的欲望。于是州县官依惯例取一分为限的耗羡，意在养廉。然而，耗羡并不能养廉，耗羡的数量更不能限制。其时，江苏耗羡率占到了正额钱粮的5%～10%；湖南耗羡率占10%～30%；山西耗羡率占30%～40%；陕西耗羡率占20%～50%；山东河南耗羡率占80%。耗羡加派加大了政权与人民的距离，加剧了国家与地主的矛盾、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加重了整个社会的心理负担，成了爆发社会总危机的催化剂。

贪风日盛与吏治废弛

康熙中期以后，官吏贪污舞弊之风愈演愈烈。

上层集团中的明珠、索额图，一个是"簠簋不饬，货贿山积"，一个是"贪侈倾朝右"；徐乾学、高士奇，一个是"五方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一个是"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又有如户部尚书希福纳等贪污20余万两，其属下堂司官等贪污40余万两等。中下级官员亦不示弱，凤阳知府蒋国正勒索下属银1万余两，阌乡县令白澄贪赃6万余两，宜阳县令张育徽贪赃4000余两等。

康熙为政力求宽和，曾说"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若吹毛求疵，天下安得全无过失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夫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者"，"廉吏亦非一文不取"，一般"规礼"、"陋规"之类，"大可不必深究"，"银数无多，何

苦积害”。在这种优容宽纵政策之下，官吏贪剥愈加肆无忌惮，吏治亦逐渐废弛。

吏治废弛首先表现为行政效率低下，政务废堕。各级官员“时时只顾身家、刻刻只虑子孙”，遇事“彼此推诿”、“迟延累日”，“国家之安危、民生之休戚”，“毫不相关”。

其次表现为钱粮严重亏欠，财政状况恶化。由于政纪松弛，缺少监督，从直省到州县，官员挪移、侵欠钱粮习以为常。五十二年（1713）康熙述及赋税征收，指出只有浙江巡抚张鹏翮、山西巡抚马齐全完七年钱粮，其余各省均亏欠未完。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元年（1712—1723）江苏欠库银 881 万余两；山东 300 余万两，浙江 100 余万两，其他省份也均为十几万到几十万两。这些亏欠的钱粮，绝大多数是官欠，也就是被各级官员挪移、贪污了。

噶礼、张伯行互讦案

康熙五十年（1711），爆出江苏巡抚张伯行、两江总督噶礼两大臣互讦的天下奇闻。

事情起于九月的江南科场舞弊案。榜发时，人们发现文理不通的吴泌、程光奎及诸多不学无术的盐商富家子弟高中其上。愤怒的苏州生员以丁尔戬为首，在玄妙观前聚集了 1000 多人，声讨乡试中的贿卖舞弊行为。他们游行于市，将财神像抬入府学明伦堂内，纸糊“贡院”二字，代以“卖完”；大书“左丘明双眼无珠，赵子龙浑身是胆”，刺讽两主考左必蕃、赵晋；沿街散发张贴揭帖传单，中有“贿赂功名在此行”，“不须贡院诵高明”，“登山有竹书贪绩，观海无波洗恶名”，“一榜难为言皂白，圣门学者尽遭坑”等。

两江总督噶礼以诬告罪逮捕了丁尔戬等。江苏巡抚张伯行、主考左必蕃则分别奏报科场实有弊。康熙派吏部尚书张鹏翮会同噶礼、张伯行以及安徽巡抚梁世勋详审。审理过程中，吴泌、程光奎已供认了请托、贿买之情；官方也已得到了赃银 8000 两、贿金 15 锭的线索，噶礼却为之开脱。张伯行

以考前即风闻总督噶礼揽卖举人，现噶礼如此举动，又有噶礼欲索贿 50 万两保证结案的传言，而奏请将噶礼解任严审。噶礼坚决否认，反劾张伯行挟嫌诬陷、通贼徇私等七大罪。

江南都抚两大臣互讦，轰动天下。这其中又有满汉之争、朋党之争。康熙将二人一并解任。噶礼的支持者连续罢市，投书苏州织造衙门，要求题请噶礼留任，并关闭城门、将噶礼大门用砖石堵塞，不让他出门交还总督印信。张伯行的支持者则满街满城张贴歌谣、揭帖，歌颂张伯行的德行，并群赴各衙门投递呈文，强烈要求张伯行留任。

奉旨审理噶礼、张伯行互参案的吏部尚书张鹏翮、漕督赫寿，自认为他们明白康熙好恶与判断：能臣噶礼是真小人，是满人；庸臣张伯行是伪君子，是汉人，而偏袒噶礼，拟张伯行革职，噶礼免议。康熙另派户部尚书穆和伦、张廷枢再审。仍同前议。吏部议复。还是“拟张伯行革职，噶礼免议”。

康熙心如明镜一般。此次科场案前，即曾有近臣徐乾学从科举“招摇纳贿”，“游其门者无不得科第”。康熙本想亲自严审，但徐乾学派人向他称贺：“国初以美官授汉人，汉人且不肯受。今汉人营求科目，足见人心归附，可为有道之庆。”于是他宽容、保全了徐乾学，在人赃俱在的情况下，不作处理，只让徐乾学回籍省墓。又曾有三十八年(1699)科场案，时两主考李蟠、姜宸英，落第士子编造歌谣“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散发传单，以公开点名的方式，将科场丑行全面曝光，中有“中堂四五家，尽列前茅；部院数十人，悉居高位。大学士王熙、李天馥为子孙纳贿三千；工部尚书熊一潇、左都御史蒋宏道、湖抚年羹尧为其子纳贿上万”；史贻直、潘维震因其父分别为浙江主考和福建主考“遂交易而得售”；韩孝基、张三第因其父现居官礼部，恐复查试卷败露行藏而将二人全取……。他仍旧宽容、保全了他们，虽将李、姜革职，但在复试后仍得出中式者“俱能成文”，前案不过是落第者“怨谤”的结论。至于噶礼，这位清朝开国功臣何和礼之后、康熙乳母之子，更可称得上是跋扈弄权、贪赃枉法的典型。康熙三十八年(1699)授山西巡抚后，先已有御史刘若鼎弹劾他贪婪无厌，虐吏害民，计赃数十万两；后又有平遥民人郭

明奇等控告他通省钱粮每两勒索耗羡银二钱,除分补大同等地亏空外,40万两吞为己有,另有索贿分赃、受卖关节情形。康熙还是宽容、回护了他,将参劾者分别以诬告褫革降调,将他于四十八年(1709)擢为两江总督。康熙只是希望“静”,希望稳定。他多次训诫都抚大臣:安静为地方之福,凡贪污属吏当先训诫之,若始终不改,再行参劾。他宽弛,宽纵。对需索节礼的都抚,以“系年老大臣,著从宽免”。对侵欺库银9万余两的广西巡抚郝浴,以其“洁己奉公”、“清廉爱民”,“从宽悉免追取”。对户部以尚书希福纳为首侵银60余万两一案,他思忖了一夜,终于强压怒火,只将希福纳一人革职,其余同案176人,限期退赔,不予议处。

但是,事态已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熙明白降谕:“朕以张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断不可参,手批不准。谕旨现在噶礼处。吏部所议是非颠倒。”又谕九卿:“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江南地方必受其搜刮一半矣。”九卿再议却仍不肯单惩噶礼,而是各打五十大板,均拟“革职”。康熙终将张伯行留任,噶礼革职。

噶礼贪污巨大,仅房产就有75处,地100余顷,当铺13所。他的原下属太原知府赵凤诏亦得赃银17万余两。此时噶礼之母亦即康熙乳母,赴都察院控告噶礼欲毒杀她,请以忤逆不孝罪将噶礼凌迟焚尸。她究竟是为自己奶大的康熙帝着想,还是为自己身家着想,不得而知。康熙则几乎怀着感激的心情,立即以此赐噶礼自尽。江南科场舞弊案中行贿受贿的案犯分别受到了斩、绞重处。可叹的是,这班贪官至此仍在作弊。主犯、原副主考赵晋被判斩立决,翌日有报他自缢身亡。谁知不久张伯行即奏报:“尸体与赵晋状貌不符,赵晋生死难明。”又传说噶礼自尽时行贿买嘱,得以帛系未绝就装入了棺材。监绞官守候到半夜,忽然噶礼在棺材中开口道:我可以出来了吗?闻者大骇,劈开其棺,噶礼霍地坐起来。但因耳目皆无,不知所往。监绞官怕事泄,一斧将噶礼劈倒,连棺材一起烧了。

噶礼、张伯行互讦案集中反映出康熙晚年忧虑的种种弊端。短短几十年,康乾盛世刚刚开始,前朝前代几乎所有的痼疾就都重新发作了。康熙末

年,“各省钱粮亏空甚多”,“府帑亏绌,目不暇给”,“私派浮于国课,差徭倍于丁粮”,“生民乏食,物价腾贵”,终于引发了朱一贵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事。康熙背后,仿佛有一种带着巨大惯性而无法抗拒的神秘的力。在这种力的作用范围内,个人,即便是像康熙那样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碰撞中有杰出作为的皇帝,也难以在整体上挽住西坠的残阳、东逝的大江。

思考题:

如何评价满汉两种文化、中西两个世界碰撞中的康熙大帝及清政权的巩固。

参考书目:

1. 白新良主编:《康熙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 1994 年。
2. 〔法〕白晋:《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3. 孟昭信:《康熙的晚年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第三讲

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

清朝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统一

清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管辖

清朝独特的少数民族政策

一　清朝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统一

清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可以说，清朝政权在全国确立和巩固的过程，也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和继续发展的过程。

清初边疆少数民族格局

清初除东北部边疆以满族为主外，北部和西北部边疆主要是蒙古族居

住区。明末清初，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三大部分。

漠南蒙古居住在长城以北、大漠以南，又称内蒙古，清入关以前便已归附，清廷赐其各部首领显贵封爵，以盟旗制管理，世代与之通婚，使之成为清朝统一全国、向西北边疆发展的得力助手。

漠北蒙古游牧于漠南蒙古以北的戈壁之北，其主体为喀尔喀部族，故又称喀尔喀蒙古，清朝也称外蒙古（今蒙古国）。喀尔喀蒙古自东向西分为车臣汗部，居于克鲁伦河流域；土谢图汗部，居于色楞格河流域及以南地区；札萨克图汗部，居于杭爱山以西、阿尔泰山以东。三汗部互不相属，各自为政。遇有重大问题，会盟协商解决。清军入关前，喀尔喀三部首领即曾向清进献"九白之贡"（献白驼一、白马八），表示臣服。顺治三年（1646），清于其地设八个札萨克，分左右翼，三部联系比以前加强。

漠西蒙古聚牧于大漠以西、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又称厄鲁特蒙古（明代称瓦剌，清代有卫拉特、额鲁特等相近读音和不同写法），包括居于乌鲁木齐一带和硕特部，伊犁河流域的准噶尔部，额尔齐斯河一带的杜尔伯特部，塔尔巴哈台一带的土尔扈特部。后金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1628），土尔扈特部因与准噶尔部（清有称准部）发生矛盾，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崇德初年，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也因同样原因迁至青海一带。17 世纪中叶后，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统一厄鲁特蒙古，建立了准噶尔政权，征服和控制了天山南北及部分中亚地区。噶尔丹之后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达瓦齐等相继为汗，在近一个世纪中一直称雄西北，虎视天下。

清初西部天山南路地区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叶尔羌汗国（清朝又称回部，亦称回疆，其人则名回人）；青藏高原地区则有蒙藏联合政权。叶尔羌汗国由中亚蒙元东察合台汗国演变而来，基本属游牧型国家，社会组织兵民合一，完成了全民族的伊斯兰化。蒙藏联合政权始于 17 世纪初叶，实际是和硕特蒙古与藏传佛教黄教的联合政权。时西藏藏传佛教派系纷争，居于青海的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应黄教首领五世达赖与四世班禅之邀，入藏援

助黄教集团而建立之。其特点是:蒙藏联合,政教合一。蒙族和硕特顾实汗掌握政治、经济、司法、军事大权;藏族达赖、班禅及三大寺上层喇嘛控制全藏寺院僧侣和教务;日常政务由达赖与顾实汗共同委任第巴官管理。

上述少数民族政权历史均源远流长,具有独特又较为完备的政权机构。他们之间联系密切(蒙藏各部主要联系纽带是藏传佛教),又往往为了攫取权益而发生激烈争斗。

清初西南边疆云南、贵州、广西及四川、湖南、湖北等地,居住着苗、瑶、壮、彝、白、黎等众多少数民族。这些地区自元明以来至清初均实行土司制度。由中央委任各族酋长、头人为土司管辖部众。土司世袭,自定成文法及不成文法,对属民有生杀予夺之权,且自行征发赋役,仅向中央进献少量贡物。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只受该族头人统治,称为"土舍制"。

漠北喀尔喀蒙古的统一

康熙初年,漠北喀尔喀蒙古左右翼冲突不断,其西邻——居住在天山北路的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势力却迅速发展膨胀。

噶尔丹是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第六子,幼年被派赴西藏学佛,文武双全,深受五世达赖赏识,有呼图克图(高僧)的称号。康熙十年(1671),准噶尔部内乱,噶尔丹受达赖派遣,自西藏返回厄鲁特平乱,自立为汗。历史上对噶尔丹评价不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将噶尔丹视为投靠沙俄、分裂祖国的叛首。近年来一些专家指出,噶尔丹是厄鲁特蒙古民族英雄。在噶尔丹时代,准噶尔部一直抵御沙俄对蒙古牧地的蚕食,遏制其对我国西北边疆入侵的势头。然而,噶尔丹为扩张自己势力又幻想与沙俄建立军事联盟,结果被沙俄利用,成为清朝抗击沙俄入侵的牵制力量。

当时,噶尔丹不仅统一了厄鲁特蒙古四部,而且占领了天山南路各回城,势力达到青海、西藏地区。康熙二十六年(1687),噶尔丹兵分两路向喀尔喀蒙古发动突然进攻。喀尔喀蒙古战败,大喇嘛哲布尊丹巴断然否决往

投沙俄之议,率各部穿越瀚海内迁,归附清朝。史载喀尔喀蒙古"南徙者蔽地而来","遗弃牛马,死者相枕",境况极其惨烈。康熙帝得报,立即命令接纳,调拨存粮、牲畜、茶布予以赈恤,并划拨科尔沁牧地安置之,同时责令噶尔丹退兵,归还喀尔喀牧地。噶尔丹则变本加厉,康熙二十九年(1690)公然向漠南蒙古(内蒙古)大举进攻,前锋到达东部的乌珠穆沁部。清廷震动。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康熙首征准噶尔(因高烧未能亲行),清军在乌兰布通(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一举打败准噶尔部军队。准噶尔部仅剩几千人。翌年五月,康熙帝亲率八旗劲旅赴多伦诺尔(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草原,主持内外蒙古会盟,即历史上著名的"多伦会盟"。会盟中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军事演习。康熙身着甲胄,率内外蒙诸王台吉,乘马"遍阅队伍"。喀尔喀铁骑与八旗劲旅旗帜鲜明、器械森然,"各依次列阵,鸣角","大呼前进,声动山谷",人人振奋激动不已。多伦会盟后,喀尔喀蒙古分34旗,与内蒙古一样实行盟旗制度,结束了长期以来"并无法度,不能约束,以强凌弱,自相劫夺"的混乱局面,纳入中央直接管辖的范围。

此后,康熙帝又两次亲征准噶尔,取得昭莫多等战役大捷。噶尔丹众叛亲离,被迫溃逃,清军则穷追不舍。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噶尔丹只剩不到300人,靠射猎杀马而食,"欲北赴鄂(俄)罗斯",俄罗斯对其已失去兴趣,"拒不受",遂流窜青海,成为一股走投无路的残匪。四月十五日,噶尔丹属下丹济尔"携噶尔丹尸骸及噶尔丹之女钟齐海,共率三百户来归",报称噶尔丹大漠途穷,已于闰三月十三日仰药自尽(一说患病身亡)。喀尔喀各部回到漠北原居住地,清廷则以在内外蒙古实行的盟旗制度和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派驻的将军及参赞大臣,加强了对北部边疆的统治。

清代边疆民族史专家认为,历史上,大中国的范畴是明确的。边疆地区时或出现少数民族独立政权;相互征战甚或东进南下中原逐鹿,均不影响它们属于大中国的范畴。即便噶尔丹,亦曾说过:准噶尔"不自外于中华"。中国北部边疆贝加尔湖一带是蒙古游牧地,元朝对其施行国际公认的国家有效管辖。明朝未能征服北元势力而未能对其施行同样的国家有效管辖,但

只能说，明朝未能完成统一。清朝则继承元朝的统辖范围，在适当时机采取果断措施，完成了对北部边疆的统一，并施行和最终巩固了国家对其地的有效管辖。

天山南北准噶尔部及回部的统一

噶尔丹东侵之时，老巢伊犁被其侄策妄阿喇布坦占据。噶尔丹败亡之后，策妄阿拉布积极发展经济，准噶尔部逐渐复苏。康熙五十三年(1714)，策妄阿拉布坦出兵掳掠哈密等地，再度控制天山南北。五十六年(1717)攻入西藏，杀执掌西藏政权的和硕特拉藏汗，纵兵杀掠。康熙五十七年(1718)，清廷出兵进藏，五十九年(1720)进抵拉萨，在藏民支持下大败准噶尔军。准军残部逃回伊犁；清军则移驻河西走廊，对准噶尔部做出积极防御的姿态。

雍正五年(1727)，策妄阿喇布坦死，其长子噶尔丹策零即准噶尔部汗位，继续乃父的内外政策——发展经济，壮大实力，保持与清廷往来；抵御沙俄入侵，保卫西北边疆。但噶尔丹策凌始终不肯接受朝廷诏命，不交出制造青海动乱的罗布藏丹津，不放弃向东南扩张的企图，几次骚扰喀尔喀蒙古，影响漠北及青藏地区的安定，故此清廷决定主动进击以消除隐患。

七年(1729)，清军兵分两路出师西北。九年(1731)六月，清北路军主帅傅尔丹轻敌中计，于和通泊(今蒙古国科布多西 200 里)遇伏惨败。准噶尔部大小策零敦多布乘胜率兵 2.6 万人进犯喀尔喀，遭喀尔喀亲王丹津多尔济、赛因诺颜部郡王额驸策凌等沉重打击。十年(1732)，噶尔丹策零命小策零敦多布率骑兵 3 万出杭爱山，进军喀尔喀蒙古，于鄂尔浑河边的光显寺(即额尔德尼召)遭到清额驸策凌所率蒙古兵的沉重打击。光显寺地势陡峻，策凌据山扼险，一举击杀准噶尔军万余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准噶尔部元气大伤，被迫请求议和。自雍正十二年(1734)至乾隆四年(1739)，经过长达 5 年的反复交涉，双方划定了准噶尔部与喀尔喀蒙古的游牧区界限，准

噶尔部保证不越过阿尔泰山梁，清廷保证喀尔喀蒙古不越过扎卜堪地方。此后双方维持了近20年相安无事的局面。

乾隆十年(1745)，噶尔丹策凌去世，准噶尔部陷入连年争夺汗位的内讧。十八年(1753)，准噶尔部贵族达瓦齐夺得统治权，自立为准噶尔大台吉，随即又与支持其夺位的贵族阿睦尔撒纳相互厮杀。同年冬，原被准噶尔部控制的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三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和车凌孟克(史称杜尔伯特三车凌)不堪达瓦齐欺凌，率所部3000余户离开多年游牧的额尔齐斯河流域内附清朝。乾隆帝在承德万树园隆重接待三车凌，分别封他们为亲王、郡王、贝勒，妥善安排其部众牧地，赐予大批牲畜、粮食等。翌年，阿睦尔撒纳在与达瓦齐争斗失败后，亦带领部众兵丁2万余人投奔清朝。内讧与叛离，削弱了准噶尔部的实力；清廷则正值鼎盛时期，乾隆帝且从三车凌处了解到准噶尔政乱的内情，最终下定决心，出师西北，完成前辈未竟的统一之业。

乾隆二十年(1755)，清廷以班第、永常为将军，分领北、西两路大军，一路出乌里雅苏台，一路出巴里坤，以降附的阿睦尔撒纳、萨喇勒为副将军，分进合击，约期会师于伊犁东北之博罗塔拉。此时厄鲁特蒙古连年内乱，人心离散，清军所至，纷纷归降。不少“台吉、宰桑或数百户或千余户，携酮酪，献羊马，绎络道左。师行数千里，无一人抗颜行者”。达瓦齐自知不敌，率一万人逃至伊犁西南格登山结营固守。四月底，清军兵不血刃，进入伊犁，五月抵格登山。一日夜晚，英雄阿玉锡仅率二十余名哨探突如从天而降，奋勇杀入达瓦齐军营。达瓦齐军已成惊弓之鸟，崩营大溃。这就是著名的“格登山大捷”。达瓦齐率残众百骑向天山以南奔窜，在南疆回部乌什城被维族首领霍集斯计擒，解献清营。达瓦齐被押解到北京，乾隆帝午门受俘，后以宗女妻之，封以亲王，安置京城。

达瓦齐政权覆灭后，原穷蹙降清的阿睦尔撒纳显露出“专制西域”的野心，欲自立为汗，独霸厄鲁特蒙古四部。乾隆帝察觉了他的企图，命其赴避暑山庄朝觐，同时密谕对其严密监视。不料消息泄漏，阿睦尔撒纳中途逃

走，公然率军攻入伊犁，并煽动喇嘛叛乱，准噶尔又陷入纷乱之中。乾隆帝再次调兵平准。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军收复伊犁，阿睦尔撒纳败逃。不久，喀尔喀蒙古青衮杂卜叛乱，不少已降附的准噶尔贵族群起随叛。青衮杂卜叛乱被迅速平定，清廷重新部署军力，又一次进行平准战役。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军再克伊犁。阿睦尔撒纳同妻子、亲信数人仓皇逃入俄境。乾隆帝命理藩院再三照会俄国，援引《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不许收容对方逃人的条款，要求将阿睦尔撒纳引渡给中国。然直到同年八月阿睦尔撒纳染天花病死，沙皇政府才将尸体交还清廷。

延续康雍乾三朝的平准之役以阿睦尔撒纳逃死异域、清朝全胜而宣告结束。这一战争对实现国家统一、巩固西北边防意义极为重大。然清朝征服准噶尔部的手段十分残酷，超出了一般战争的范围。由于阿睦尔撒纳及一些准噶尔部贵族降而复叛，乾隆皇帝大为恼怒，严谕凡“遇背叛贼人，悉行剿灭”，“永绝根株”。不仅参与叛乱的头人被剿杀，而且其部属甚至已降清的无辜部属也被大量诛戮。曾经以独立政权强盛一时的准噶尔部基本被消灭殆尽。

平准战争临近结束时，乾隆帝明确指示西师不可中止，必须征讨天山南路的回部。

准噶尔统治时期，回部各部首领常被拘押伊犁。噶尔丹被击败后，清廷护送被拘押的维族白山派首领阿布都什特回南疆，令其管理回部事务。阿布什特死后，其子玛罕木特继为首领。准噶尔再次控制回部后，玛罕木特及其二子大和卓木布那敦、小和卓木霍集占又被拘押伊犁。达瓦齐被击败，清廷护送布那敦回叶尔羌，令其招抚回人、管理旧部；令霍集占留居伊犁，管理回部移民事务。大小和卓木布拉尼敦与霍集占兄弟成为天山南北维吾尔族新的统治者。然不久，霍集占协从阿睦尔撒纳叛乱。叛乱平定后，霍集占逃回南疆，又唆使其兄布那敦反叛。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和卓木杀死清使臣副都统阿敏道及本部拒绝从叛的头目，自号“巴图尔汗”，揭起了叛旗。翌年(1758)，清廷自吐鲁番出兵万余进攻库车，回人献城投降，霍集占出逃。

两和卓木先后溃逃至阿克苏、乌什两城，回人皆闭门不纳，遂被迫退守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城。后不敌清军合剿，又弃城西逃。至境外巴达克山，被其汗双双擒杀，尸首献于清廷。

天山南北平定后，清廷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伊犁将军，驻惠远城，总统南北疆事务。并在乌鲁木齐、吐鲁番、塔尔巴哈台、古城、巴里坤等处派军驻防，设都统，参赞大臣统率。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参赞大臣之下，于回部各城设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治理维族，使天山南北处于清中央强有力的直接统治之下。

大和卓木木布那敦之孙张格尔逃亡浩罕国，勾结英国殖民者和浩罕国统治者，以割让喀什噶尔、平分喀什噶尔四城人口财产等条件，换取他们的支持。嘉庆二十五年(1820)，张格尔在英国殖民者和浩罕国统治者的支持下潜入喀什噶尔，煽动维吾尔族上层分子发动了武装叛乱。道光六年(1826)，张格尔叛军占领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城，英国殖民者随之入侵。清廷派杨遇春等率军前往镇压，在各族人民特别是在维族人民的支持下，屡败叛军，收复了喀什噶尔等失地。七年(1827)十二月，清军俘获张格尔，镇压了叛乱，巩固了西部边防。

青藏高原和硕特部与藏族僧俗部众的统一

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早年为避准噶尔之祸，自乌鲁木齐徙牧于青海。他们与清廷的关系在顾实汗时较为密切，顾实汗死后渐致疏远，曾多次侵扰甘肃等地，康熙十六年(1677)，和硕特再次被准噶尔部征服；三藩之乱时又曾受到吴三桂的百般拉拢。鉴于青海重要的战略地位，清廷对和硕特部恩威并施，却十分明确和硕特统一的关键在首先须彻底解决噶尔丹问题。康熙三十六年(1697)四月十五日，传来噶尔丹已于闰三月败亡的消息。而恰于闰三月，康熙成功完成了对青海蒙古各部的招降，和硕特等部首领及塔尔寺等寺院掌教喇嘛均表示臣服清廷。十一月，和硕特首领觐见康熙帝，翌年

(1698)正月，受清廷之封。顾实汗幼子达什巴图尔被封为和硕亲王，其余授予贝勒、贝子、公等爵位。清廷“兵革未尝一试，而西陲之厄鲁特尽皆收服”。

康熙五十五年(1716)，达什巴图尔之子罗布藏丹津袭其父亲王爵位，五十九年(1719)，随清军入藏杀了和硕特拉藏汗的准噶尔部大策凌敦多布。罗卜藏丹津认为自己是顾实汗嫡孙，理应为青藏等处和硕特蒙古总首领；西藏事平后，理应依蒙藏联合政权惯例，由作为和硕特蒙古总首领的他来统治西藏。清廷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于是，雍正元年(1723)五月，和硕特首领罗布藏丹津发动武装叛乱。

罗布藏丹津自称达赖浑台吉，宣布以恢复蒙古霸业为己任，强令和硕特诸部首领放弃清朝封爵，恢复旧日蒙古称号，煽惑众多僧俗参与叛乱。察罕丹津亲王和额尔德尼郡王不从，罗布藏丹津即兵戈相加；清廷遣使劝谕罢兵，罗卜藏丹津则扣留使臣，纠集20余万人进攻西宁。雍正帝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四川提督岳钟琪统军平叛。罗布藏丹津不敌清军攻势，西向而逃，于柴达木地区的乌兰木和尔负隅顽抗。翌年初，清军先后镇压塔尔寺、郭隆寺等处反叛僧众，随即攻入青海腹地。岳钟琪率5千精兵出西宁疾行15日，突现罗布藏丹津大帐之前，发起猛烈攻击。叛军大溃。罗卜藏丹津改扮女装落荒而逃，只身投往准噶尔部。

此前，清廷对青海地区的管辖通过和硕特蒙古贵族间接进行。平叛之后，清廷设立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一切事务；改西宁卫为西宁府，下置三县一卫；于各处增设卫所军镇，派兵驻守，将青海地区完全置于中央的直接管辖之下。此外，清廷还大力整顿青海喇嘛教寺院；令该地蒙古族各部划定地界，编29旗，各设扎萨克管理旗事，下辖佐领，建立盟旗制；将藏民编户，设土官千百户，归附近道、厅及卫所管辖，进一步加强了对青海各少数民族的管理。

西藏与清廷的关系可追溯于清入关前。达赖、班禅曾派使者至盛京“贡方物、献丹书”，尊称清太宗皇太极为“曼殊师利大皇帝”。皇太极遣使随行回访，并修书分致达赖、班禅、顾实汗及众活佛，表示清廷尊崇佛法及与西藏

通好的愿望。清入关后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至京觐见顺治帝,清廷隆重接待,建西黄寺使居。达赖回藏时,清廷敕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怛喇达赖喇嘛”,授金册金印,此为“达赖喇嘛”之始。同时,顺治帝派大臣随行至西藏,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如此,西藏一直处于喇嘛教黄教最高教主达赖、班禅和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汗王的联合统治之下。

康熙年间,达赖势力有了较大发展。康熙十八年(1679),五世达赖在和硕特部汗王缺席的情况下,任命桑结嘉措(传说是五世达赖的私生子)为“第巴”。二十一年(1682)五世达赖逝世,第巴桑结为了与和硕特汗争夺对于西藏的统治权,密不发丧15年,佯称达赖入室修炼,“凡事传达赖命行之”。三十五年(1696),康熙得知达赖已故、第巴桑结匿丧之事,但他认为“达赖喇嘛,蒙古等尊之为佛。第巴者,即代达赖喇嘛理事之人”,大度地宽宥了第巴桑结,敕谕第巴应断绝与噶尔丹来往,益加恭顺朝廷,皇上对第巴嘉惠如初,既往不咎。此举增强了各族各部对清廷的向心力,成为西藏统一的基础。

康熙三十六年(1697),西藏发生了真假达赖喇嘛之争。第巴桑结在公布五世达赖之丧的同时,宣布迎请转世灵童仓央嘉措于布达拉宫坐床,称六世达赖。康熙派钦差入藏参与坐床仪式,授予印信封文。仓央嘉措是藏族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热爱生活,追求自由,倾心于以优美华章讴歌真挚的情爱、美丽的姑娘。他留传于世的情诗被后人誉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产生了非凡的艺术魅力”,是我国藏族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诗篇。仓央嘉措沉溺世俗情感,疏于佛事,为拉藏汗借以打击第巴桑结、实现独霸青藏的野心提供了契机。四十二年(1703)拉藏汗疏报康熙帝仓央嘉措非真达赖;第巴桑结遂欲捕杀拉藏汗。拉藏汗先下手为强,率蒙古大军分三路包围了拉萨。第巴桑结兵败被杀。清廷的态度是,只要西藏忠君护法,姑且承认其内政变化的既成事实。康熙帝敕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赐其金印,望其倾心内向。对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康熙帝则看到,虽然拉藏汗称其为假达赖,但蒙藏僧俗都倾心皈向,若为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迎请,则“西藏蒙古皆

向策妄阿拉布坦矣”。他决心迎请六世达赖到京供奉，一方面防止其被准噶尔部或其他部族控制利用，一方面借其在蒙藏各部的影响贯彻清廷意图，然为避免拉藏汗起疑而途中加害，谕令“执献达赖”，保证安全将其送到北京。四十五年(1706)，拉藏汗宣布废除仓央嘉措神职。五月十七日仓央嘉措离开拉萨前往北京，在青海失去了踪迹(有说被杀；有说病故；有说施展神通，“弃舍名位，决然遁去”)。翌年，拉藏汗立自己的一个非婚生子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西藏僧俗上层不满和硕特蒙古统治西藏，坚不承认，共同指认一个名为格桑嘉措的小童，奉为原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同样不满拉藏汗的青海蒙古各部也承认格桑嘉措为真达赖喇嘛。为缓和青、藏争执，康熙命格桑嘉措暂往西宁塔尔寺；以拉藏汗与青海蒙古各部不睦，不便独理西藏事务为由，派侍郎赫寿赴藏“协同拉藏办理事务”。此清廷设置驻藏大臣之始。五十二年(1713)，康熙“照封达赖喇嘛之例”，授五世班禅印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自此始)，提高了班禅的地位，使之与达赖分权共管西藏教务，稳定了局势。五十五年(1716)，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派兵攻入西藏。拉藏汗没有想到自己竟死于亲上做亲的姐夫之手。拉藏汗败亡，和硕特部汗廷在西藏70年的统治土崩瓦解。拉藏汗所立的六世达赖伊喜嘉措已坐床10年，仍被宣布为假达赖，遭到废黜和囚禁。

西藏政局的剧烈动荡，不能不引起康熙的重视。清廷先后两次用兵西藏，于康熙五十九年(1719)八月攻入拉萨。九月初，满汉官兵及青海蒙古兵奉旨将康熙已正式册封为达赖的格桑嘉措从所居西宁塔尔寺护送至拉萨，九月十五日，正式举行坐床大典。近40年的真假达赖之争至此平息。

清廷直接任命康济鼐为藏王，总理全藏事务兼理前藏；颇罗鼐分理后藏；其他人协助藏王处理藏务。不久，阿尔布巴、隆布鼐谋夺康济鼐之权，举兵杀康济鼐，阴谋投奔准噶尔部。后藏颇罗鼐统兵入拉萨，擒获阿尔布巴。清军入藏，平息叛乱。封颇罗鼐为藏王，管理前后藏事务，留兵驻守西藏，由驻藏大臣统辖，直接监督西藏地方政府，安定西藏政局，“藏地复安”。乾隆十二年(1747)，颇罗鼐逝世，其次子珠尔墨特袭爵，继续总管全藏事务。珠

尔墨特“潜结准噶尔为外援，藏中有异己者将尽逐之，势且延及达赖喇嘛”，又阴谋驱逐驻藏大臣。十五年（1750），驻藏大臣傅清、帮办大臣拉布敦设计杀了珠尔墨特，但二人亦为珠尔墨特党羽杀害。达赖七世令人逮捕了杀害驻藏大臣的凶手。当年十二月，清军再次入藏平叛。其后废除藏王制，将原统藏务之权归于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明确达赖喇嘛不仅是教主，而且是受命于中央的政务首领，其下分设噶隆（又名噶伦、噶布隆，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官之称谓）四员共同办事。其人选由驻藏大臣、达赖喇嘛共同商定，奏请中央补放，由中央颁给任命敕书，“遇有紧要事务，禀知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遵其指示而行”。从而加强了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统辖。

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廷更明确规定驻藏大臣地位与达赖、班禅相等，监督办理西藏事务。达赖、班禅和各地黄教活佛的灵童转世，均须在驻藏大臣监视下采取“金瓶掣签”的办法决定，奏请清廷加以认定。噶伦以下大小文武官员，一律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奏请清廷任命。所有西藏政教官员皆为驻藏大臣属员，事无大小，均禀驻藏大臣办理。官员升迁赏罚、地方处治罪犯、赋税收支、对外交涉，统归驻藏大臣全权处理。行政、军事、宗教、财政、司法，对外关系等方面管理体制的健全和完善，标志着清廷统治西藏地方的各项制度已臻于完备，西藏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从政治上、法律上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和肯定。西藏在中央有力而且有效的统辖治理之下，社会秩序安定，与内地联系进一步加强，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二　清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管辖

理藩院及边疆军府建置

清代中央设置管理边疆民族（包括处理周边部分藩属国家及对俄国、廓尔喀等国交涉、通商诸事务）的专门机构——理藩院。

理藩院直接听命于清帝，惟清帝意志办事。理藩院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均满员；额外侍郎一人，蒙古贵族贤能者充任。以下至司库，大小官员共166人，按规定，除7名汉军外，均为满员蒙员。理藩院管理边疆少数民族王公、土司的封袭、朝觐、联姻，疆域、军旅、驿递，户丁、赋役、商贸、耕垦、仓储、赈济，蒙、藏各地及在京喇嘛，立法修律、刑案审理，赴边办事人员派遣、更换等一切重要事务，并宏观领属、控制各边疆民族地区的行政机构和地方官员。理藩院设内馆、外馆，供内外札萨克来京朝觐人员居住；设蒙古官学、唐古特学、托忒学，培养通达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人才。清廷十分重视理藩院，规定"官制体统应与六部相同，理藩院尚书照六部尚书入议政列"。雍正以后用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

中央理藩院外，清廷在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军政机构——军府，统辖该地的军政事务。如于喀尔喀蒙古设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于内蒙古设绥远城将军、察哈尔都统和热河都统；于青海设置西宁办事大臣；于西藏设置驻藏大臣；于新疆设置伊犁将军及以下各参赞大臣领队大臣；于东北设置盛京、宁古塔、黑龙江三将军等。军府是清廷派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最高权力机构，军府首领作为最高军政长官，全权负责该地区的军政事务，具有监督、控制地方少数民族行政组织、保卫边疆、对外交涉等职权。

清代从中央理藩院到边疆军府组织严密，职掌分明，为历朝历代治边机构无法相比。理藩院正规的行政制度与边疆军府将军、都统、大臣相辅相成，确保并强化了清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辖，体现了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

地方少数民族行政体制

清代地方少数民族行政体制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沿袭前代的土司制。主要行之于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甘肃等省尚未实行改土归流的少

数民族地区，以及青海、西藏蒙古、藏族的少数部落。土司设土官管理部众，土官世袭，均由中央任命部族酋长充任，文职隶于吏部，武职隶于兵部，行政则受督抚或办事大臣等封疆大吏节制。第二种是改土归流后的流官制。设府、厅、州、县，由中央按官吏铨选制度任免官员，实行同汉族地区亦即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样的行政管理体制。第三种是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按照不同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制度，实行不同的行政体制。其中，第二种类型的关键步骤——改土归流，是清代地方少数民族行政体制建设的重大举措之一；而第三种类型是清代地方少数民族行政体制最为常见的形式，因此，以下分别做一简要介绍。

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及四川、湖南、湖北等地分布着苗、瑶、壮、彝、白、黎等众多少数民族，清初沿袭元、明以来的土司制度，委任各族酋长、头人为土司管辖。土司俨如土皇帝，作威作福、横征暴敛、肆意虐杀属民。土司之间为争夺地盘、人畜经常厮杀，并屡屡劫掠屠杀相邻汉民，与地方官冲突，使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深受其害。由于土司世袭，名义上由朝廷任命，实际是"自王其地"，严重妨碍国家的统一。雍正四年(1726)，雍正命鄂尔泰总督云南、贵州、广西三省，规划改土归流。鄂尔泰采取剿抚结合的策略，逆者剿，顺者授予官职，迫使土司主动接受改流。到九年(1731)底，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省广袤数千里内的众多土司被废除，代而设立府、厅、州、县，派遣定期任免的流官，增设绿营兵驻守，实行和汉族地区相同的制度。改土归流使清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对维护国家统一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应指出，清朝在改流过程中实行的武力镇压是残酷的，曾给一些少数民族带来了灾难。

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清代按照不同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制度，实行了多种行政体制。主要如下。

盟旗制，实行于蒙古民族聚居区及新疆地区的哈萨克等游牧部落。旗是基本军事、行政单位，同时也是清帝赐给蒙古王宫的世袭领地。旗的首领称札萨克，由清廷任命，以蒙古贵族中忠顺有功者为之，按照清廷所授予的

权限，处理旗内行政、司法、赋役、牧场等旗内事务。清朝将札萨克旗分为内札萨克和外札萨克。漠南蒙古49旗称内札萨克，内札萨克拥有统率兵丁之权。喀尔喀蒙古86旗、漠西卫拉特蒙古34旗、青海28旗与阿拉善、额济纳旗为外札萨克旗，无兵权，受当地将军、大臣及参赞大臣的节制。旗上设盟，盟的意义是会盟，清廷规定每盟之下的各旗定期会盟（乾隆十六年以前，清帝派使臣参加会盟），在会盟的蒙古王公中特简盟长、副盟长，负责召集盟会，监督检查清廷政策法令在各旗的执行情况，会议政治、军事、司法等重大事件。道光三年（1823）以前青海蒙古不设盟长，由西宁办事大臣主持盟会。西套二旗不设盟，直辖于理藩院。各地区蒙古事务，由理藩院统一管理。总体看，盟在初期权力有限，仅协助理藩院、军府办理事务，后来权力增大，由会盟逐渐演变为集军政一体的一级行政建置。盟旗制下的蒙古，除少部分成为清廷的直辖属民外，绝大多数蒙古贵族保持了其对牧民原有的领属关系，然他们接受清廷统一封爵，领取国家俸银，遵从清廷划定的游牧疆界，缴纳国家税捐，服从中央统一征调。

伯克制，实行于新疆区。伯克制是新疆维吾尔族和中亚地区一些操突厥语民族传统的行政制度。"伯克"为官吏泛称。清统一新疆以后，在维吾尔等族聚居的南疆地区继续实行伯克制。乾隆年间，新疆各地各类伯克共242员，他们在各驻扎大臣的监督下，管理行政、司法、赋税、治安等各项民政事务。与以往不同的是：清代伯克制废除了伯克世袭，伯克的任免、任期由参赞大臣呈报中央批准决定；伯克有清朝正式官员品级和养廉的规定，实行同样的回避制度；须按规定入觐。

政教合一制，实行于西藏藏族聚居区。西藏原行政体制为藏传佛教教主与和硕特部汗王蒙藏联合执政下的第巴官制。真假达赖之争后，清廷废除第巴，设置藏王——噶伦制。然五噶伦不断内讧，引起西藏社会动乱。清廷遂废除藏王总管西藏地方政务的噶伦制，将原统藏务之权归于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建立地方办事机构噶厦，并最终形成了噶厦内四噶伦中三俗一僧的"政教合一"制。四噶伦无专职分工，以合议方式秉承达赖喇嘛、驻藏大

臣之命综理地方事务。噶厦之下的地方行政机构为“宗”，官员称“宗堆”或“宗本”。宗本普遍设二员，一俗一僧，任期三年，负责所管地方的税收、行政、司法、军事等事务。

清代地方少数民族行政体制还有郡县制、土司制、乡姓制等，这些行政体制既不同于汉制，又不同于原少数民族旧制，全都经过了改造，变成了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效管辖的保证。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防卫体系

清廷出于稳定对边疆少数民族统治、加强国防的需要，先后在吉林、黑龙江、内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建立了一整套卡伦、驿站、军台系统及巡边、屯防制度。

卡伦即满语哨所，分常设卡伦、移设卡伦、添设卡伦几种，主要设于边界地区。清廷除安设卡伦外，又实行巡边制度，即定期派出官兵。按照规定的路线，巡逻各边界地段。黑龙江地区每年五六月间由瑷珲、齐齐哈尔、墨尔根三地驻军巡边。吉林地区巡边分别由三姓副都统和宁古塔副都统负责。喀尔喀蒙古、漠西蒙古、回部、卫藏地区，则分别由库伦大臣、伊犁将军、驻藏大臣派兵巡边，察视重要的边境卡伦。驿站又称台站、军塘、军台，额设兵丁马驼，负责传递军报谕旨文书，转运军事物资，押解发遣人犯，保证上通下达特别是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严密控制。

与此同时，清廷在西南地区和台湾实行屯防。屯设屯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屯军耕战合一，平时农耕，遇有战事，则应调作战。

对外防卫与对内镇压

清代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辖，除体现在体制、制度之上外，还体现在一旦边疆遭受侵犯、少数民族地区发生动乱，中央则派大军捍卫边

防、平定动乱。乾隆年间两次抗击廓尔喀、两次出兵大小金川即是典型事例。

廓尔喀于18世纪中叶统治尼泊尔,之后,不断向外扩张。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借衅生事,一举出兵侵占后藏的济咙、聂拉木、宗喀三宗并围攻胁噶尔。得到廓尔喀入侵西藏的消息,乾隆帝立即派四川提督成德及鄂辉、巴忠等率清军驰援。成德等到达前线时,大雪封山,廓尔喀军已先行撤胁噶尔之围。巴忠等瞒着乾隆帝同廓尔喀私下议定:以西藏许给廓尔喀300个元宝,换取其撤出西藏边界。第一次廓尔喀之役姑息了结。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再次侵藏,分兵数路,深入千里,偷袭后藏日喀则,班禅七世丹贝尼玛避居拉萨,所居扎什伦布寺遭到廓尔喀洗劫。乾隆帝急调两广总督福康安统兵入藏。福康安率八旗兵及蒙、藏兵万余从青海西宁出发,日夜兼程,克服高山瘴气,如期抵达西藏。翌年,在达赖喇嘛与藏族僧俗民众的大力配合下大举出击,全歼盘踞察木的廓尔喀军。随即翻越喜马拉雅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廓尔喀,追击廓尔喀军,进至距阳布(今尼泊尔加德满都)仅数十里之地。廓尔喀王乞和。福康安鉴于喜马拉雅山区已进入雪季,向乾隆帝建议允降撤兵。乾隆帝本无穷兵黩武、征服廓尔喀之意,允准福康安之请,与廓尔喀议和,仍以聂拉木、济咙为两国边界,设立鄂博,禁止私行偷越,廓尔喀方面送回抢掠扎什伦布寺物件。

大小金川是四川西北部的藏族居住区。雍正年间大金川莎罗奔与小金川首领泽旺即有矛盾。乾隆九年(1744),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和小金川土司泽旺矛盾激化。十一年(1746),莎罗奔劫持泽旺,企图吞并小金川,后又进攻其他土司。清廷为"宣示皇威,以全国体",派川陕总督张广泗领兵进讨大金川,支持小金川,又派大学士讷亲为经略前往督战。但金川地形陡峻复杂,土人骁勇善战,建碉固守。清军自十二年(1747)四月到十四年(1749)正月,老师糜饷,阻险不前,始终未能将大金川剿灭,其间乾隆帝怒杀张广泗,赐讷亲死,换大学士傅恒为经略,督同岳钟琪继续攻打,仍损失惨重,几次陷入进退不得的窘境。后莎罗奔有乞降受抚之意,乾隆帝也"深悔从前不知其

难，错误办理”，方正式降旨班师。清廷前后调兵7万，耗资1000万余两，历时两年，第一次平定金川。莎罗奔之后，大金川由索诺木（莎罗奔侄孙）主事，小金川由僧格桑（泽旺之子）主事，两金川释仇结盟，勾结起来大肆攻掠邻近土司。清廷先后以四川总督德福、理藩院尚书温福等人统兵，二次征讨大小金川。清军多次战败，统帅温福阵亡。乾隆帝再派定西将军阿桂领兵进击。阿桂先攻占小金川，杀死泽旺，继兵分三路进击大金川。在清兵进逼之下，索诺木杀死窜入大金川的僧格桑，献尸军前，乞请赦罪。阿桂进攻不止。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路清军会于大金川最后一个据点噶尔崖。索诺木走投无路，率兄弟、妻妾及头人番众，出寨投降。清廷前后调兵近10万，耗资7000万两，历时5年，第二次平定金川。两金川平定后，为加强中央权力，清廷废除大小金川两土司，在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小金川设美诺厅，归四川省管辖。不久，将阿尔古与美诺合并，改为懋功厅。

三　清朝独特的少数民族政策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清朝是继承中国历代王朝传统而建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汉族为主体民族。边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及其相互之间的历史文化传统均有较悬殊的差距。而清朝少数民族政策第一个独特之处，即是因俗而治，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也就是根据各民族习俗特点，制定适宜的边疆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各安其习”。

因俗而治的具体内容是：（1）为了维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清廷力求不改变各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衣冠制度。如蒙古仍旧是“顺水草便骑射为业”的游牧经济和游牧生活方式；西藏“生计风俗，自当听其相沿旧习，毋庸代为经理”。至于各族“衣服制度”，清帝大度地表示，“尔等习惯自然，一时岂能骤易？”“不妨仍其旧俗。”

“缠头环耳各随宜”;“不令汝等更改衣冠,照旧各安生业”。(2)如前述,按照不同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制度,分别实行多种行政体制。而基本原则是,将各少数民族行政体制纳入中央统一的政权体系之中。并在中央制定的少数民族行政法规——《理藩院则例》的基础上,依据各少数民族原有的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因地制宜、因族制宜制定不同的民族法,如《蒙古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回疆则例》、《西藏通制》、《钦定西藏章程》等,详尽规定各少数民族地区王公与宗教首领的选定、封袭、朝觐,官员的设置、职掌、俸禄、奖惩,领地划分、游牧管理,货币铸造、盟旗编组、户丁编审、赋役征发、灾荒赈济,兵丁佥征、驿站卡伦设置等。由中央制订如此系统的各少数民族法规是历朝历代从未有过的,表明清代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深入及主权行使的强化。(3)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领属形式;维持其宗教信仰及宗教领袖的地位权力,任用各该族官员具体施政,使之带有一定的“自治”色彩。中央管理边疆民族的专门机构理藩院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军政长官基本任用满族或蒙族亲信王公、额驸等。

清朝禁止其他民族人口流入边疆,强调保持边疆原住民族的分布格局、领地、习俗、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不变,其地方行政由原住民族的首领负责,通过他们贯彻统治民族、国家中央的意旨。需指出的是,不同地区分别实行的伯克制、盟旗制、噶厦制、乡姓制包括郡县制、土司制等都进行过改造,加强了清中央高度集权统治的直接管辖。

清朝“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收效甚大。但在强调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时,于一些地区禁止各民族交往、通商、杂居、通婚,影响了边疆的开发和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影响比较大的有在台湾实行的汉番隔离政策;在南疆实行的汉回隔离政策;在东北、蒙古等地区实行的封禁政策等。

成功的宗教政策

清代在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习惯的基础上,实行适宜的宗教政策,获得

了成功。其中突出体现清朝特色的是以各种手段扶植、推崇及利用藏传佛教喇嘛教。

首先树立与提高喇嘛教首领的尊崇地位。清帝分别册封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等四大活佛,使达赖喇嘛主前藏,班禅主后藏,哲布尊丹巴主喀尔喀蒙古,章嘉胡土克图主内蒙古,确立了其在蒙藏的僧俗领袖地位及必须经过清廷册封的制度。藏、蒙各地寺院的其他喇嘛教首领,清廷也都封其崇号。

其次,广为修建、扩建喇嘛教寺庙。规定喇嘛免除赋役兵差,各级喇嘛被授予各种名号,像官吏一样领取俸禄。驻京喇嘛还经常被清帝派往各少数民族地区行使某些使命。

再次,加强对藏传佛教喇嘛教的管理,创立金瓶掣签转世制度(又称金奔巴制度)。以往蒙藏贵族操纵活佛的灵童传世与世系封爵无异,既不利于中央对蒙藏政教的管辖,又易于地方割据势力发展。此项制度规定:各地呈报达赖、班禅及其他活佛的传世灵童(呼毕勒罕),须将其姓名及出生日期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牙签,放入清廷颁发的金奔巴瓶中,在驻藏大臣监督下,于宗喀巴佛像前当众抽签阄定。

清廷对藏蒙等民族宗教信仰的尊重和推崇,从信仰观念上密切了与藏蒙等民族的关系,增强了藏蒙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

与对藏传佛教喇嘛教的政策不同,清廷于新疆回部地区实行的是政教分离政策。15世纪后,伊斯兰教在新疆维吾尔等族聚居地迅速发展。维护教规的伊斯兰教首领阿浑(又称阿珲、阿訇),地位居于伯克之上。大小和卓木叛平,清廷统一新疆后,拥有神圣权力的阿浑常常制造事端,利用教徒聚会之际废杀伯克。清廷认为如果阿浑势力膨胀,将会利用伊斯兰教影响清中央对新疆的直接管辖,必须极早铲除。为此,乾隆特传谕"晓示各城回人,嗣后诸事,惟听阿奇木等伯克办理,阿浑不得干预"。清廷支持世俗的伯克,令其署理维吾尔地区各项民政事务,禁止伊斯兰教干预,实行了政教分离政策。此项政策抑制了伊斯兰教势力的发展,避免其掌握世俗政权,滋生事

端，对于维吾尔族社会安定及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喇嘛教政策一样收到了异曲同工之效。

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有效控制

清廷有效地控制了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充分利用他们熟悉本民族特点和在本民族中的凝聚力、统治力及政治号召力，统辖部众，贯彻中央意旨，化解矛盾，维护清廷的统治。

清廷对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控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分而治之"；一方面是拉拢抚绥，清廷对之概括为"恩威并济"。如乾隆帝所说："中国抚驭远人，全在恩威并用，令其感而知畏，方为良法。"

清廷通过"分而治之"，分化和削弱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权势。所谓"少其地而众建之，既以彰赏罚之典，又使力少不能为乱，庶可宁辑边陲"。如对蒙古，乾隆即明确指出："蒙古人欲各自为札萨克，不相统属。朕意伊等若各自管辖，愈善。昔太祖、太宗时，招徕蒙古，随即分旗佐领，分为札萨克，各自所统，是以至今安辑。"于是清廷将内蒙古由原来的 6 万户编为 6 盟 49 旗；喀尔喀蒙古由 7 鄂拓克编为 4 盟 86 旗。如在行政建置方面，清廷委任的少数民族各盟旗长、各级伯克、各部土司多之又多，均有负责处理该地该族民政事务的权力，均互不统属，大权——任免权、监督权、指挥权、处置权握于中央理藩院及边疆军府将军大臣手中。即对一向推崇的黄教，清廷也在西藏和内外蒙分封四大活佛及众多活佛，以削弱达赖喇嘛的传统的宗教权威和影响。

清廷笼络和抚绥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主要有以下措施：

1. 对归顺清朝的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般均保留和承认他们原来统治本民族本地区的特权，给以优厚俸禄，封以崇高爵位。

2. 与部分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联姻，尤其与蒙古王公贵族实行制度性联姻。清皇族与蒙古上层联姻，是清朝巩固满蒙上层政治联盟既定的重要国策。入关后清廷聘与蒙古贵族的皇女、宗女达 200 多名，乾隆朝王公之

女一半以上出嫁蒙古。道光二十年(1840)左右,仅漠南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及敖罕部、巴林部的"旗下公主子孙台吉、姻亲台吉"就有2700多人。他们与清廷血肉相连,是清廷维系对蒙古稳固统治的可靠保障。清廷又制定了"备选额驸"制度,将一些蒙古王公子弟自幼养育宫中,培养他们与清廷的情感,长大招为额驸,派回原盟旗中担任重要职务。这些忠于清廷的额驸,对该地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廷主动遣嫁、满蒙互相嫁娶的血缘纽带将中原与塞外联为一体,使蒙古王公感戴浩荡皇恩而产生效忠清廷的强烈向心力。汉代王昭君、唐代文成公主为人们所熟知,而大批不为人知、远嫁荒漠的清代公主、宗女,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 建立避暑山庄,举行"秋弥大典"

康熙四十二年(1703)以后,清廷将位于承德的热河行宫改建为规模宏大的避暑山庄,山庄内,是青砖素瓦北方民居式的便殿,金碧辉煌旌旗招展的蒙古包;山庄外,是俗称外八庙(实际11座)的一座座宏伟壮丽、各具少数民族特色的喇嘛寺庙。自康熙开始,清朝皇帝除了雍正,每年多用一半以上的时间在这里处理朝政,接受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朝觐,使之成为京师以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并由此形成了俗称"年班"、"围班"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朝觐制度和木兰随围制度。

"年班"是每年新年前夕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按排定班次赴京朝觐清帝的制度。清廷负责其往返食宿并发予廪给。元旦之日,清帝举行隆重典礼,年班来京朝觐的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与宗室王公、文武百官一起朝贺欢庆。年班来京的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值正月之时朝觐清帝,进献贡品,亦可随带货物,在京贸易。清廷则借此机会盛情款待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予以更为丰厚的回赐,并以种种名义名目大加赏赐、多行宴饮,优礼和笼络之。

"围班"也就是木兰随围,随同清帝与八旗一起在木兰围场围猎。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以后,康熙帝亲率满蒙骑兵踏勘了京城以北的广阔草原,建立了东西宽300里,南北长200余里的木兰围场。康熙、乾隆、嘉庆

几朝为演练八旗兵而在木兰围场举行射猎活动。鼎盛时几乎年年举行。围猎在秋天，围期一般20日左右，称为“秋弥大典”或“木兰秋弥”。清廷规定，蒙古各部王公须按年分班轮流带射手、杂役人员赴木兰随围。由于“年班”朝觐在冬春之交北京流行痘疫之时举行，清廷又规定，凡未曾出痘的蒙古王公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不必来京朝觐，可按年赴承德“随围瞻觐”——到避暑山庄觐见清帝，扈从围猎。围班班次、内容、待遇、赏赐与年班基本相同。围猎期间，清帝在避暑山庄各处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欢宴，并为他们安排诸如摔跤、较射、赛马、火戏等富有民族风情的游戏乐舞活动。围猎结束，清廷再对扈从随围的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及随从人员、蒙古官兵等予以优厚的赏赐。

如上，清廷规定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均须按期朝觐清帝，已出痘的参加年班，未出痘的参加围班。无论年班朝觐还是木兰随围，每年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都有一两个月与清帝相处，与宗室王公、文武百官直接交往，并受到清廷的优待与礼遇，这些都加强了各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

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向心性

清朝对边疆地区实施了国际公认的有效管辖，对各少数民族实行了较之以往历朝历代都要成功的政策。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空前增强，最典型的事例，可举出乾隆年间的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回归与六世班禅来朝。

土尔扈特回归

明末，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为避准噶尔部之害，被迫西迁，离乡背井，游牧于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受到沙皇俄国的控制、歧视与压迫。但土尔扈特部始终不忘故土，顺治、康熙年间，不断派人奉表入贡，与清廷保持联系，盼望回归祖国。

噶尔丹败死后，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派人“入贡庆捷”，受到康熙帝优

赏。后贡道被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梗塞,阿玉奇汗又遣使假道俄境向清朝入贡和联系。康熙帝嘉其怀念故土深情,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特派图理琛等人为使,远行万里前往探望。阿玉奇汗隆重接待了图理琛使团,深切表达了对故国的思念之情。图理琛等往返三年,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回京复命,并撰成《异域录》一书,冠以舆图,详述所经各地地理、社会、民俗、物产、政治、经济等,为清廷和国内了解土尔扈特远牧的处境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后,土尔扈特部更密切了与清廷的联系。

18世纪中期,土尔扈特不堪沙俄的压迫和奴役,特别是不堪沙俄屡屡强征土尔扈特人作为与邻国交战的炮灰,发动反抗沙俄的起义,遭到了沙皇军队的血腥镇压。恰逢此时,国内准噶尔部被最后平定。这些,都成为土尔扈特重返家园的动因。

乾隆三十六年(1771)一月,26岁的土尔扈特汗渥巴锡(阿玉奇之孙)毅然率全族3万多户16.9万余人踏上了回归故国之途。沙俄派兵追击,哈萨克出兵拦截,土尔扈特人且战且走,长途跋涉,饮牛马血过大漠无人区,伤亡惨重。然最终克服重重困难,余下不到二分之一的部众到达伊犁。

清廷立即为历尽千难万险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人拨予大批生活物资并安置驻牧之地。渥巴锡等奉诏至承德避暑山庄朝觐,乾隆帝隆重赐宴款待,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其他首领分别授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遂将土尔扈特编为四路、十旗,安置到天山以北伊犁以东准噶尔盆地一带进行驻牧,由伊犁将军管辖。与渥巴锡同来的舍棱一支编为二旗,驻牧阿尔泰山布尔干河流域,由科布多大臣兼管。

六世班禅来朝

班禅,是西藏藏传佛教亦即喇嘛教黄教的大教主,被尊为无量寿佛化身。历史上定例与达赖互为师徒。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首次敕封班禅为班禅额尔得尼(额尔得尼,满、蒙文皆意为"宝"),赐金册金印,确定其在藏传佛教的崇高地位。从此,这一尊号固定下来,主持扎什伦布寺、统辖后藏的班禅,也提高到与达赖喇嘛并列的地位。

除五世达赖曾进京朝觐过顺治帝以外，历代达赖、班禅均未走出雪域、朝觐清帝。乾隆盛世，西藏安宁。六世班禅巴丹益喜早就有赴内地朝觐乾隆帝的意愿，乾隆帝也早想会见班禅，只是由于西藏与内地山高路远，班禅又未出过天花，“不便令其远涉”。

乾隆四十五年(1780)是乾隆帝的七十岁寿辰。其前一年，全国上下便开始准备乾隆帝“古稀”之年的万寿节盛典。借此时机，六世班禅通过国师章嘉活佛转奏乾隆，要求前来祝寿。乾隆欣然允准，计划将其觐见祝寿活动安排在避暑山庄，这样可以让他避开内地的炎热与痘疫的感染，直赴热河参加盛典。届时“外藩毕集”，有班禅大师领班诵经，会见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是昭示盛世气象、进一步加强各民族向心力的千载良机。为此，乾隆帝十分重视，传谕“于热河度地建庙，备其居住”。乾隆帝为六世班禅来朝所建之庙名须弥福寿庙，共计3.79万平方米，总体仿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庙而筑，雄伟壮观、富丽堂皇，仅两殿宝顶镀金就用1.5万多两头等金叶。乾隆帝亲谕驻藏大臣又发6道谕旨要求对六世班禅来朝事宜作精心安排，并开始学习藏语，准备迎接六世班禅。

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在2000多藏族僧俗扈从及驻藏大臣所率官兵陪护下启程东行，克服艰难险阻，于四十五年(1780)七月二十一日抵达热河，行程万余里，历时一年零一月余。乾隆帝密切关怀和关照班禅之行，多次派人(包括皇子)前往迎接，带去丰厚的颁赐物品。各地成千上万的蒙藏僧俗前来迎接六世班禅，顶礼膜拜，多伦诺尔法会参加者竟达十万余众；六世班禅则一路不避劳顿，弘扬佛法，传经授戒，摩顶赐福，起到了“一人来朝，万众归心”的作用。

乾隆帝在避暑山庄隆重欢迎和接待了六世班禅，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为之在蒙藏风情的万树园举行了4次盛大的野宴，席间穿插满、蒙民族特色的布库、杂技、赛马、什榜(民族音乐舞蹈)等节目，两次燃放烟花火戏，还在清音阁大戏台连续演戏十日，大加赏赐。乾隆帝并请六世班禅主持须祢福寿庙的开光唪经仪式；举行隆重的熬茶佛事；并三次亲临须祢福寿庙聆听班禅

讲经,敕封班禅玉册玉宝,为班禅举行盛大法会。班禅则为乾隆帝唪长寿经、吉祥辞、祈愿辞。称颂乾隆帝"抚育汉藏胡三方之众属民,庞炳大业,盖绝古今,无与伦比",表示西藏雪域上自达赖下至僧俗百姓"所希所靠者惟大皇帝一身,别无他哉"。八月十三日,万寿庆典。六世班禅与乾隆携手同登宝座,代表八世达赖向乾隆进献寿礼,又率30名高僧在内堂为乾隆唱赞无量寿经。喇嘛诵经声中,殿外乐亭奏起中和韶乐,各族首领及外国使节纷纷前来祝寿,气氛达于极盛。

万寿盛典后,六世班禅应乾隆之邀为京城佛寺作开光善住,于九月初二入京,居顺治帝为五世达赖敕建的西黄寺,十月二十四日不幸感染天花,十一月初二病逝,时年42岁。乾隆瞻见班禅遗容,泪流满面,恸呼"朕之喇嘛啊!"昏厥过去。乾隆为六世班禅举行隆重的丧事,用赤金7000两造金塔一座,上嵌珍珠,将班禅肉身迎入塔中,在黄寺诵经百日后,派重臣扶灵归藏,供养于扎什伦布寺则加大殿之上,并于西黄寺建六世班禅衣冠石塔——清静化城塔,亲撰汉满蒙藏四体碑文以记。

与前相比,清朝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统治巩固,各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显著加强,奠定了强盛清帝国的大一统版图。这一局面形成于康雍乾盛世时期,也是盛世时期国家强盛的重要体现。

思考题:

康熙曾说"昔秦兴土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蒙古),使之防御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你如何看待他的认识。

参考书目:

1. 马汝珩,成崇德主编:《清代边疆开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2. 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论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3. 成崇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边疆民族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

第四讲

雍正帝死因评析

"暴病"说、"雍正夺嫡"与秘密建储制的发端

"金石"说、"年隆之案"与军机处的创立

"被刺"说、吕四娘真假与雍正功过

雍正帝(1687—1735),姓爱新觉罗,名胤禛,是康熙之子、乾隆之父,他是康乾盛世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在位十三年,年号雍正,死后庙号世宗。人们同样习惯以年号、庙号代之,称他为雍正帝或清世宗。

雍正帝或许是清朝12帝中最神秘的一个皇帝。提起他,总使人联想到阴谋、暴力、血滴子、杀人惨剧。的确,雍正帝一生都与一个个历史疑案相连,就是最后的死,也留下了至今未解的谜团。一种观点认为雍正是因病猝死;一种观点认为雍正是炼食金丹暴亡;一种观点认为雍正是被他的仇人兼侠客砍去了头颅。

本讲拟通过对雍正死因的评析,探讨清代独特的皇位传承制度——秘密建储制的发端;清代中央集权制的高度发展;雍正功过与雍正朝政治得失以及历史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

一 “暴病”说、“雍正夺嫡”与秘密建储制的发端

雍正的病根

雍正因疾病突发猝死，应该说不无根据。雍正早已患病。雍正八年(1730)，雍正曾面谕诸王文武大臣：“朕自去冬即稍觉违和，疏忽未曾留心调治，今年三月以来，间时发寒热，往来饮食不似平常，夜间不能熟寝，如此者两月有余矣。”其病状据雍正自己说，是“似疟非疟，或彻夜不成寐，或一二日不思饮食，寒热往来，阴阳相驳”。也就是忽冷忽热，惊悸不安，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他曾向鄂尔泰透露：“朕今岁违和，实遇大怪诞事而得者。”究竟遇到了什么“大怪诞事”，雍正没有说，只说待明后年鄂尔泰来京陛见时，再当面详细说之。后人没有查到有关雍正这一段病状的医疗档案。然从雍正接着延请道士诵经念咒、驱邪治病的情况看，他不愿说出口的病根，是白昼见“鬼”，出现了令他无端恐惧的幻听幻视。雍正病状曾一度减轻。究其原因，竟是他最亲密、也是最知情的兄弟怡亲王允祥(即影视剧中的十三爷)的去世。雍正自述：“怡亲王事出，朕亲临其丧，发抒哀痛之情。次日留心试察，觉体内从前不适之状一一解退，今日渐次如常矣。”然毕竟病根未除，不过数日，又突转凶险之象。六月，雍正竟至危殆，留下了遗嘱。据他的儿子乾隆帝后来回忆道：“八年六月，圣躬违和，特召臣及庄亲王、果亲王、和亲王、大学士、内大臣数人入见，面谕遗诏大意。”俗话说，“病自心生”，雍正为什么陷入不可自拔的极度恐惧、得了这种心慌心悸、以至于要命的重病呢？

雍正六年(1728)九月，清朝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出闹剧——曾静、张熙投书案，可视为雍正患病的直接诱因。

当时有一名叫张倬的书生，在西安拦川陕总督岳钟琪车驾投书策反。策反书大致分四部分。一以“华夷之辨”，反对清朝统治；二指斥雍正夺嫡及

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好谄任佞等十大罪状；三称雍正朝连年灾荒，民不聊生，反清起义已势在必行；四劝岳钟琪继承其祖先岳飞抗金之志，反清复汉，为宋明复仇。此事干系重大。岳钟琪一面密报雍正，一面严加审讯。投书人坚不吐实。岳钟琪遂遵雍正旨意，假意与之盟誓反清，套出了实情。原来张倬真名张熙，是湖南一个偏僻乡村塾师曾静的学生。而曾静就是撰写策反信之人。为准备科举考试，曾静读过吕留良的《时文评选》，派学生张熙等去浙江访回吕留良很多诗文。吕留良有关"华夷之辨"的论述，引起曾静强烈的反清共鸣。此时雍正新立，政局动荡。曾静等认为时机已到，探明岳钟琪是岳飞之后，遂修书策反，声称六省人马已集，"在我一呼可定"。雍正接到岳钟琪密报，立刻派人赴湖南拿获人犯。前后数十人锒铛入狱，100余人受到牵连。曾静为张熙投书壮行时曾慷慨高吟："但有虹贯日，竟无轲入秦！"并在身着长衫上大书："曾静死于此！"对簿公堂时，却匍匐在地，摇尾乞怜。雍正更独出新裁，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使之跟随清朝官员遍走各地，现身说法，宣讲雍正亲自编撰的《大义觉迷录》。由此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则以大逆谋反罪结案。已死的吕留良、其子吕葆中、其学生严鸿逵戮尸枭示；另一子吕毅中、严鸿逵学生沈在宽斩立决；"刊刻逆书"、往来密切的车鼎丰等人斩监候；吕、严两家众多孙辈及其他从犯流配、杖责、给功臣家为奴。

此闹剧之中，雍正的情绪与作为均有耐人寻味的反常之处。当获悉曾静致岳钟琪的反书时，雍正反常地"惊讶堕泪"，说："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雍正对社会上关于他的种种非议，应该有思想准备，他清楚："从来仇敌之人，造为诽谤，以泄其忿者往往有之。"但是，其时已是雍正六年(1728)九月。这个时候，非但允禟、允祀、允禵、允禨等异己势力已先后铲除，即连年羹尧、隆科多等知情，又有可能影响皇权的前功臣也已先后伏法。而像曾静、张熙这样僻处穷乡之人，却了解或自以为了解宫廷斗争错综复杂的细节，仍在指斥雍正夺嫡篡位。雍正"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不料有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对于岳钟琪与

张熙假意盟誓的举动,雍正反常地感激涕零。他在岳钟琪密折上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朕唯朝夕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对于张熙、曾静投书案的处理,雍正小题大做,故作大度得反常。雍正亲自主持编纂了四卷本的《大义觉迷录》,其中包括10道上谕、审讯词、曾静47篇口供、张熙两篇口供、曾静1篇《归仁说》等,逐条驳斥了加给他的十条失德之罪。并将此书刊刻颁发至府、州、县学,大张旗鼓地组织宣传。同时,雍正力排众议,释放了曾静、张熙。将张熙、曾静投书案与由之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连起来看,可以发现,雍正辩解的重点在前者,惩处的重点在后者。雍正实际是制造了一个吕留良政治谋反案,将人们的视线从雍正个人有没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具体问题,转移到"华夷之辨"、清朝统治中国的合理合法性之上,从而从大的角度证明自己继统的无可非议。雍正用心可谓良苦。

但是,事情的结局却不像雍正设想的那样。的确,雍正本没有必要在大清国已巩固统治数十年、他本人已经当了七年皇帝的情况下,因为几个空喊造反的穷酸秀才而喋喋不休地表白、辩护,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一段本来多数人闻所未闻的"秘史"变成家喻户晓的谈资,朝野上下、全国城乡全都知道了原来还有雍正篡位及种种无行的说法。而雍正漏洞百出的辩解,又使更多的人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雍正由此陷入一种"身败名裂"的郁闷之中,"稍觉"不适。翌年二月,病重。

人们没有理由不加以联想:雍正是否谋父篡位做了亏心事?这是否就是雍正心中的病根呢?

关于"雍正夺嫡"

雍正继位是否合法的问题,被冠以"雍正夺嫡",成为同"太后下嫁"、"顺治出家"、"乾隆身世"并列的清初四大疑案之一。

关于雍正继位,《清圣祖实录》的记载与雍正本人在《大义觉迷录》中的

陈述相似: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初九,康熙偶染风寒,在畅春园静养。命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赴斋所,准备代行十五日南郊冬至祀典。十三日丑刻(凌晨2~3点钟),康熙病危,急召在斋所的雍正(时为雍亲王)入见。寅刻(凌晨4~5点钟),雍正尚未赶到,康熙又召皇三子允祉、皇七子允祐、皇八子允祀、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䄉、皇十二子允裪、皇十三子允祥及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时除恒亲王允祺因冬至奉旨往孝东陵行礼不在京师外,皇十五子允禑、皇十六子允禄、皇十七子允礼、皇二十子允祎等都在康熙寝宫外等候。巳刻(上午10~11点)雍正赶到,急入寝宫问安。父子谈说病状。这天,雍正又曾三次进见请安。当晚戌刻(19~21点)康熙驾崩。隆科多宣布康熙遗诏,着胤禛承继大统。雍正"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雍正叩首,劝其节哀,雍正"始强起办理大事"。康熙遗体被连夜运回大内。先此一步,雍正已在隆科多的护佑下提前驰回紫禁城,哭临大行皇帝梓宫。接着,皇城九门紧闭,隆科多亲守朝阙,非有旨令即亲王也不许入内。二十日,胤禛即位,免百官朝贺,诏告天下以明年为雍正元年。

而各种指斥雍正以阴谋手段矫诏夺嫡、谋父篡位的谣言,几乎同时便沸沸扬扬地传布开来,甚至远播海外。康熙六十一年(1722)朝鲜使臣回国报告康熙之死雍正即位的情况时说:"或称秘不发丧,或称矫诏袭位。内间事秘,莫测端倪。而至于矫诏,则似是实状。"

上述有关雍正即位的官方记载,确有不能解释的很多疑点。

首先是"八人同受遗诏"。"八人同受遗诏"最早的版本是雍正七年(1729)九月成书的《大义觉迷录》。在这以前,从没有过相同的说法和记载。雍正元年(1723)八月,雍正一篇上谕曾说康熙命他继位是在病危之时仓促间"一言而定大计",并没有一字提及"八人同受遗诏"。五年(1727)十月,雍正才在另一篇上谕中说到诸皇子同受遗诏的情节。但并没有具体指明是几人,哪些皇子。即便八人同受遗诏的说法出台之时,雍正仍一方面说允祀、

允禟久蓄邪谋、希图争位，若非亲受传位遗诏，如何肯“俯首臣服于朕”？一方面又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允禟）突至朕前，箕踞而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阿其那（允祀）并不哀戚，乃于院外依柱，独立凝思，派办事物，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这显然反映出他们对雍正继位全无思想准备，如已受遗诏，又如何会有此种表现？其次，康熙病危时十万火急召雍正进见，雍正从天坛至畅春园为什么竟用了五个时辰，他是否先去做了什么布置？假如雍正进见康熙之前已有八人同受遗诏，为什么他进见之后十个小时，包括一日三次请安之时，康熙仅和他谈论病情，并无一字提及传位大事，八人之中也并无一人向他透露传位遗诏之事，使他在康熙死后得知命他继位时，竟至“惊恸昏仆于地”？再次，为什么宣布传位遗诏时，除皇子外，只有康熙并不欣赏也并非惟一皇亲国戚及重臣的隆科多一人在场？为什么雍正一即位，即迫不及待地杀掉康熙晚年经常传达康熙旨令的近侍赵昌（据当时在京的传教士马国贤言）？并且下令收回康熙所有的朱批谕旨，声言“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现断不宽恕，定从重治罪”呢？这些似乎都隐示着雍正即位的不合法性，隐示着雍正的即位是一个阴谋。

如果雍正背叛其父康熙的意志阴谋篡位、做了亏心事，便似乎埋下了他日后犯发心病的病根。一世要强的雍正不会将内心深处的“病根”告诉任何人。持有雍正篡位观点的人是从一些反常事件中强烈感到了这一铮铮铁汉内心中无可名状的虚弱和恐怖。康熙生前居住的畅春园，是规模最大、最为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雍正即位后弃而不居，另拨巨款营建圆明园，作为自己经常居住的行宫。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是北京以外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自康熙开始，几乎所有的清帝，每年均约有一半时间在那儿处理朝政，接受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朝觐。雍正为皇子时也经常陪侍康熙前往热河。然他即位后直至去世的 13 年间，却再也没有去过一次避暑山庄。京东马兰峪，是清入关后帝陵陵区所在，雍正祖、父——顺治帝、康熙帝均葬于此。雍正则一反常规，不入祖坟，将自己的陵寝建在了数百里以外的京西易

县。这给他的子孙出了个难题——死后归葬何处？最后乾隆帝立了隔代间葬两陵的规矩，才有了后来清东陵、清西陵之分。雍正远远避开了他的父亲康熙，因为他相信世上有鬼。他曾说："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朕于天人感应之间，信之甚笃，知之甚明。"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按照"雍正夺嫡"的观点，他正是作了亏心事，心中有鬼，方才不敢也不能面对父亲的亡魂。

与之对立的一种观点则认为雍正并非"夺嫡"篡位，而是正常承继大统。他们很轻易地批驳了以下数种雍正"夺嫡"篡位的说法。

一是改诏说。关于雍正即位，民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康熙传位遗诏上原来写的是"传位十四子"，雍正与隆科多勾结，将'十'字，改为'于'字，成为"传位于四子"。高阳先生的小说《乾隆韵事》便采用了这种说法。经考证，此说属明显讹传。清朝诏书向来用满汉两种文本。康熙辞世，事起仓促，遗诏用一种文本亦可理解，但这一文本恰恰是满文。为此，宣读遗诏的鸿胪寺官员还受过御史汤保等人参劾。满文无法以上述说法进行更改。就算有汉文遗诏，改诏也不容易。清制，称诸皇子时，一定要有一个"皇"字，如"皇长子"、"皇十四子"，不能称为"长子"、"十四子"。若将"十四子"的"十"，改为"于"，则成为"传位皇于四子"，于理不通。况且清代"于"、"於"并不通用，"传位于四子"当时应为"传位於四子"。以"十"字为基础，难以改成"於"字。后来末代清帝溥仪之弟溥杰也曾说过："从当时情形看来，康熙即便有遗诏，也是用满文写的，不可能用汉文书写。因此，所谓雍正把'十'字改成'于'字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一是矫诏说。关于雍正即位，民间又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康熙临终之时招哪一位皇子前来，便意味将传位于他。康熙本降旨招十四阿哥允禵前来——当时允禵正以大将军王的身份在西部领军进行平定准噶尔之战，但这道圣旨被隆科多隐藏起来，没有发往西线。隆科多另拟了一道圣旨，即所谓"矫诏"，将四阿哥雍亲王胤禛召到了康熙御榻之前。生米做成熟饭，再召十四阿哥已来不及，康熙无奈只得将皇位传给了雍正。经考证，此说法也

属明显讹传。清帝下旨有一套固定程序。康熙若想召皇十四子前来,应由内阁承办,撰写诏书,再由兵部经驿站发送至西线。隆科多既不是内阁学士又不是兵部尚书,没有可能隐旨矫诏,召雍正前来。

一是下毒说。关于雍正即位,民间还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雍正毒杀了其父康熙。康熙本来已经痊愈,雍正进了一碗参汤,康熙喝完就死了。经考证,此说法仍属明显讹传。康熙从不喝参汤,也从不赞成喝参汤。康熙偶感风寒,当日即发了透汗,病情确属不重。然这并不能说明他一定死于非命。六十九岁高龄、久病之身,完全有可能因感冒引起其他病症,突然诸疾并发,不治而亡。

持雍正正常即位观点的人们认为,康熙病危,事起突然。即使他本来想传位十四阿哥,但十四阿哥远在数千里之外,传诏、来京需 28 日。国不可一日无君。况诸皇子激烈纷争,势同水火,若康熙已逝而新君不至,天下岂不要大乱!以康熙的圣明,没有可能在此时传位十四子。于是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更有一种说法得到了较多人的赞同,这就是:康熙因钟爱孙儿乾隆而传位其父雍正。乾隆帝自己对此深以为然。晚年后多次说,他小时候皇祖特殊眷爱,"已隐有托付之意"。朝鲜《李朝实录》亦有记载:康熙去世后,赴朝颁发讣告的清使"译舌"说:康熙帝在畅春园病剧,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按:乾隆即弘历为雍正第五子。因雍正前三子早逝。故以乾隆为雍正第二子。)这种观点以为,无论雍正还是允禵,都不是康熙心目中"坚固可托"的理想人选,直到临终前,还在他二人之中举棋不定。或许弥留之际,爱孙弘历使他终下决心传位雍正,而条件是以其子弘历(乾隆)为皇太子。这一选择即便是对争储失败的诸皇子也算有了公平的交代。这一重大决策不见于官书记载,当事人雍正及大学士马齐也只字未见透露的原因,若从雍正颜面着想,应该不难理解。

一位清史专家绝妙地评论:"康熙晚年诸皇子争储棋局可能将具有永久的魅力,它荟萃了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精华。而其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戏剧

性的，竟是以一枚过河小卒的出现，了此残局。"棋需要人来下。小卒过河，是雍正经过处心积虑的计算与铺垫，在关键时刻下出的决胜一手。康熙六十一年(1722)三月，康熙因诸子争位、骨肉离间而终日心灰意冷、悲愤难当之际，雍正请老父临幸他的圆明园观赏牡丹。在袭人的牡丹花香中，为老父引见了已 11 岁、至纯至诚、雍容聪慧的弘历。仿佛不经意间，弘历在百余皇孙中脱颖而出，被康熙带回宫中抚养，成为康熙在孤寂晚年得到惟一温馨慰藉的掌上明珠。乾隆帝晚年透露，"皇考"雍正在一年前即有心安排了这一幕，此时从容"奏皇祖"，令他"随侍学习"。

但是，这些均还属于皇位继承已成定局后的推测，特别是有利于既成事实的推测。上述诸如"八人同受遗诏"之类的疑点、雍正远避其父的恐怖心理等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且有的清史专家认为：钟爱幼年子孙是老人的常情，康熙晚年身边经常有子孙陪侍，弘历只是其中的一个，且陪侍时间较短，只有半年。有的子孙同样得宠且陪侍时间更长。如子辈中，幼子允祕、允禧均素为康熙"所钟爱"。孙辈中，康熙最为钟爱的应是废太子允礽的第二子弘皙。时弘皙已成人，作为皇长孙地位与众不同，且人品才能，远近称赞。据朝鲜国使臣说："皇长孙颇贤，难于废立。或云太子之子甚贤，故不忍立他子。"弘皙必与康熙有更为亲密的关系，且贤名闻于异国。如果储君考虑第三代的话，成年的弘皙应胜过童稚的弘历。

况且，在继位问题上也有可能发生非常事件。康熙的确从来不喝参汤，但有一种情况除外——非常事件发生、被逼强灌的时候。所谓非常事件，便是宫廷政变。宫廷政变并非没有可能。康熙朝原有皇太子，康熙两立两废皇太子，储位虚悬，给诸皇子造成了机会。机会本不属于雍正，雍正之母乌雅氏在雍正出生时还没有正式封号，翌年方被册为"德嫔"。传说她并非康熙宫人，而是卫氏之妾，康熙偶见幸之，才有了雍正。虽然雍正出生后即为贵妃佟佳氏领养，但他自幼就笼罩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阴影。这阴影使他的欲望比任何人都更加膨胀，使他习惯于隐忍。他表现出绝无雄心和力量参加争位角逐，而把全副精力放在孝悌之上。在诸皇子丑恶的争位活动

中，康熙开始对雍正另眼相看，称赞雍正“诚孝”。常令雍正代替自己祭祀、处理政务和宫中事务。据载，雍正曾代表康熙参与大祭22次，为其他皇子所无。康熙晚年经常临幸雍正花园，由雍正陪同散心解闷，并特别钟爱其子弘历(后来的乾隆帝)。然雍正仍难说是有了机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雍正从未得到过康熙军事上的重用。康熙似乎更中意皇十四子允禵，康熙五十七年(1718)，破格任命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用正黄旗纛，称大将军王，率师西征，出师典礼极其隆重，并亲谕青海蒙古各部：“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与我当面训示无异。”更重要的是，康熙六十年(1721)十月允禵“轻装赴京，恭请训旨”，在京停留5个月之久。尽管《清圣祖实录》已看不到这5个月关于允禵的只字记载，但康熙对西线问题做出了重大决策——开始试探和平解决的途径。西线战事将于翌年十月末结束，允禵将功成名就返回京师。人们推测，接下来，便将是册立皇太子的大典。坐顺风车的机会已与雍正无缘，雍正有可能转而找寻另外一种机会。康熙偶感风寒，在畅春园斋戒静养5天；远在西线的允禵将返未返；负责畅春园警卫的是早已成为雍正亲信的步军统领隆科多。这是不是可能成为天授雍正之机呢？

关于雍正“逼母”、“屠弟”

围绕雍正继位合法性的问题，又有雍正是否“逼母”、“屠弟”的问题。

雍正生母乌雅氏生了四阿哥、六阿哥、十四阿哥三位皇子。其中六阿哥早殇，所余四阿哥胤禛(即雍正)、十四阿哥允禵这一奶同胞的两兄弟，正是“夺嫡”疑案的主角。有学者考证，十四阿哥初名胤禵，后改名胤祯，出师西北任大将军王时，便是胤祯之名。雍正即位以后，又改回允禵(雍正即位后，诸皇子为避其名讳，将胤改为允)。胤禛与胤祯读音相同，有人，包括当时的朝鲜人、后来民国时的小说家等，都以为胤禛就是胤祯，而将雍正的名字写作胤祯。四阿哥、十四阿哥又都是个“四”字，这便给人们为雍正改诏矫诏留

下了充分想像的空间。雍正即位后尊乌雅氏为皇太后。乌雅氏的作为却十分反常，她不愿接受，悲痛欲绝，不饮不食，欲殉康熙而去。雍正登基前依例向皇太后行礼时，又遭她拒绝，使登基大典几乎无法开场。此二事均有皇太后懿旨为证。其后不到半年，乌雅氏突然崩逝。人们揣测，乌雅氏偏爱小儿子，小儿子的皇位却让大儿子夺了去，本来皇太后名分堂堂正正，一下变成篡位贼子所封伪太后，如何不令她气恼？关于其猝死，人们传言：皇上将允禵囚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即于铁柱上撞死。对此，雍正进行了激烈辩驳，说允禵"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历来不受皇考待见，只因西陲用兵，皇考欲以皇子虚名坐镇，允禵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针对"逼母"流言，雍正剖白自己 40 年来备尽孝心，深得母爱，宫中诸母妃均羡慕"母后有此孝顺之子"，他曾奏请太后召见允禵，太后不允，说：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子，"允禵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太后"素有痰疾"，皇考大事"悲痛不释于怀"，致使旧疾复发而正常死亡。

那么，雍正与允禵在风云突变的当时，其内心深处各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宣布传位遗诏的第二天，雍正传诏允禵来京奔丧。如果雍正将允禵拒之京城之外，甚至命人杀了他，人们肯定会加深对雍正即位合法性的怀疑。但雍正以手足亲情急迫召还允禵。那就不仅证明雍正光明磊落，而且可赢得人们对其宽宏大量、顾全大局的敬佩与尊敬。允禵则不能控制凄愤的心情，行至城下，命"行文礼部，询问进见仪注"。皇帝已是雍正而不是他，却还挑战式地询问以什么礼仪相见，"举朝无不骇异"。雍正则传谕允禵拜谒大行皇帝梓宫。面对父亲的灵柩，还能怎样？拜谒中，雍正侍卫拉锡忿不过允禵的冷淡，想把他拽到雍正面前。允禵借题发作，咆哮不已。雍正则比任何时候都自信——意气用事的允禵不配承继大统，也不配作自己的对手。然而雍正很快发现，允禵成了一面旗帜，一个中心。围绕着他，是无穷无尽恶毒的谣言、怨恨，是对雍正皇位的极大威胁。于是，雍正以守陵之名将允禵囚禁在遵化景陵。同时罗织允禵罪名，翦除允禵羽翼。人们的心收紧了。

收得最紧的，是雍正与允禵的生母仁寿皇太后乌雅氏。一个身世微贱的女人在深宫中苦熬，儿子是惟一的希望。幸而她有了这样两个儿子。但不幸也因她有这样两个儿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的变故已使乌雅氏遭受了惨重打击，大儿子与小儿子的手足倾轧，更使她肝肠寸断。允禵被囚景陵后的一个多月她做了些什么？官书没有记载。她可能一反柔弱顺从的姿态，以母亲的愤怒严厉斥责雍正。她可能声泪俱下，哀求雍正放过允禵，甚至要求只见允禵一面。不管哪种可能，她都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官书记载：雍正元年(1723)五月二十三日，仁寿皇太后乌雅氏逝世。终年六十四岁。允禵奉诏来京奔丧。皇太后的灵柩之前，雍正以"惟欲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诏封允禵为郡王。允禵已牢牢掌握在他手中。雍正本已遣使召允禵来京。然看守允禵的副将李如柏以部文无印信，将来使拘留请旨。待使臣再至，李如柏才放允禵赴京。而皇太后已去世多时了。为此李如柏得了千两白银的赏赐，升为总兵官。一个被囚在皇陵的活死人，封号又有什么意义？雍正以此告慰母亲，也告慰自己。

"屠弟"的"弟"，不只允禵一个。人们关注后来被改名为阿其那(满语为哄赶狗)之意、塞思黑(满文猪狗、令人可恨之意)，被逐出皇族的允祀、允禟的命运。

雍正伊始，即封允祀为和硕廉亲王，与允祥、马齐、隆科多一同总理事务。允祀本能地认定这是陷阱，其福晋亦道："恐今日封王，明日不能保首领耳。"雍正又因允禵回京，派允禟到西宁军前。允禟本能地认定这是发配、报复。平心而论，雍正封任允祀、允禟不一定即是阴谋。雍正需要支持。特别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手足的支持。然而积怨、嫉恨、偏见，使允祀集团不可能支持雍正。他们玩忽职守，索取民财，重利贿买，内外交结，成了反对新皇帝朋党的中心。一时间"二七(意为"十四")变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八月内有八千猛虎进京，不信者即染瘟疫吐血而死"等政治谣言纷起，人心汹惧、政局动荡。雍正不一定要将过去的敌人赶尽杀绝，却一定不放过现在的敌人。雍正元年

(1723)二月十日,雍正谕曰:朕即位以来,施政受阻。外间匪类捏造谣言,妄生议论;朝内佞臣朋比为奸,扰乱国是。朕发遣一人,即谓朕报复旧怨;擢用一人,又谓朕恩出于私。惩治一二奸恶太监,又谓朕凌逼弟辈,悖乱极矣!朕对诸弟兄及大臣等无不宽宥,但众人并不知感。百日之内,扰乱朕心者百端!尔等谓朕宽仁、不嗜杀人,是否希图逼朕开启杀人之端呢?四年(1726)正月初五,雍正命将允祀等交诸王大臣廷讯,削籍除爵,监禁高墙。三月,敕令允祀、允禟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五月,雍正发布长篇谕旨,历数允祀、允禟及党羽罪状。将一批允祀党人诛杀、革爵、监禁。八月,允禟病故。现存李绂密折详述了允禟患病、瘐死狱中的经过。允禟死时,允祀已患呕病,雍正表示不忍,旨令"用心调养"。九月初五允祀病重,十日身亡。允祀、允禟似非雍正所杀。然李绂将允禟囚于小屋之内,三条"铁索在身,手足拘挛","屋小墙高,暑气酷烈",几中暑晕死,用冷水喷渍始苏。允祀的处境想必也相差无几。病与杀,并无区别。问题在于雍正有无"屠弟"的本意。雍正曾说:允祀在拘所十分嚣张。叫嚷他向来每餐只吃一碗,如今加吃两大碗,要杀就杀,断断不愿全尸以殁!他们只想激怒朕心,务令朕将他们诛杀而后已,以玷污朕之名誉于万一,而泄其忿。雍正似乎不想、也不能杀他的弟弟。这不是从亲情考虑,而是从他自己考虑。

秘密建储制度的发端

在紧张凶险的政治环境中,雍正没有忘记总结经验教训,解决事关重大的皇位传承问题。

皇位传承是中国传统社会专制主义皇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皇统世袭,表现了皇权的独占性与排他性。长期以来,中原汉族地区为保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经济基础与政治传承,经济上实行诸子平分的平等继承制;政治上实行预立储君的嫡长子继承制,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边疆满蒙等族则相反,经济上实行单子继承制(蒙族是幼子继承制,幼子称为额真),政

治上实行汗位推举制。中原汉族地区嫡长子继承的皇位传承制与汉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理论上，因严格排除不具备嫡长身份的其他皇子的争位资格而起到平息或减少宫廷动乱、于皇位传承的关键时刻稳定政局的重要作用。这一制度虽体现皇权，是皇权的补充和延续，又从根本上与皇权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储君既立，储权随之产生。皇太子是皇帝的法定继承人，既分担着目前的部分皇权——平时辅政，战时监军监国，又代表着将来的全部皇权。这一特殊地位，使朝中各种利益集团趋赴于太子周围，形成欲以改变现实和长远权力分配格局的第二个权力中心。这就必然为独占性的皇权所不容。统治阶层内部皇权、储权以及围绕储权的激烈斗争，往往引发大的政治动荡，甚至成为王朝衰败的滥觞。

康熙最初采取汉文化的嫡长子皇位传承制。而不久，嫡长子皇位传承制的弊病便暴露无遗。康熙一生有皇后4位、妃嫔51位，子、孙、曾孙150余人。除11个儿子早殇外，长大成人的共22子。22个儿子都精通四书五经、经世之学、满语汉语、诗文书画，又有骑射、游泳、火器等严格训练和随驾出巡、行围、统兵、办事等实际演练的机会，几乎全部成为英武全才。康熙十四年(1675)十二月十三日，康熙立孝诚皇后所生、不满两岁的嫡长子(皇二子)允礽为皇太子。复设顺治时裁撤的詹事府辅佐太子；亲择理学名臣汤斌等老成硕儒朝夕纳诲；在繁忙政务中抽身手把手地传授治国之道："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精详指示。"亲征之时还往往命太子留京，代理政务，以资历练。而群臣以索额图为首，为希图将来的荣利，自然而然地趋赴太子门下，结党营私，形成了第二个权力中心。皇太子则日益骄横，抢班夺权的急迫心情时有表露，他曾口出怨言："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天子乎？"储权与皇权的矛盾日益尖锐。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拘囚太子党首领索额图。四十七年(1708)康熙出巡时，皇太子及党羽窥视康熙起居，使康熙敏锐察觉一场弑君流血的政变就在眼前，立即起程回銮。途中将太子党羽索额图的两个儿子等六人"立行正法"，其余人等充发盛京。并不及回到京师诏告天地祖宗，便迫不及待地

宣布废掉皇太子。废太子后储位虚悬，诸皇子更加疯狂结党，互相排陷，把储位之争推向了新的高潮。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初九，康熙出人意料地宣布复立允礽为皇太子。翌日又册封诸子。意欲平息储位之争。但太子周围很快又聚集起一批党羽和亲贵大臣，政出多门，为非所歹。诸皇子更加加紧倒太子的活动。康熙忍无可忍，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再废太子。储位问题成了康熙胸中无法消除的块垒，他多方猜忌、反复无常。大小臣僚无所适从，发出“两处总是一死”的怨言。康熙不再提立太子之事，或者不再向任何人透露立储的意向。诸臣有请立储即被严惩，如翰林院编修朱天保被康熙九条锁链锁拿处斩，大学士王掞侥幸没有送命，被康熙发往军前效力(王掞年已77岁，其子代往)。无人知道康熙心中真正的打算，直到他于畅春园逝世。

雍正元年(1723)八月，雍正召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于乾清宫西暖阁，面谕立储之事，告知：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宫中最高之处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为确保日后不发生意外争议，雍正又另书密旨一件，随带左右。十三年(1735)，雍正于圆明园去世。张廷玉、鄂尔泰使总管太监找出雍正随带传位弘历的黄封密函，返回大内又命内侍从“正大光明”匾后取出所藏黄封密函，当众开启，与前函核对无误，从而和平完成了皇位传承。乾隆年间，秘密建储最终确立为清代独特的皇位传承制度。

制度性的秘密建储，解决了困扰中国传统社会最高统治集团两千年之久的皇位传承问题，确立了皇权与储权新的分配模式，即一切大权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取消储权，择优立储。这种皇位传承制度是满汉两种文化或者说是各民族多种文化相互冲击融合的结果，更是皇权高度集中、强化达于极致的表现。秘密建储，储权也就不复存在，既成功解决了“国本”问题，又杜绝了皇、储激烈矛盾及围绕第二个政治中心的储位之争。而不以嫡长为序，择优秘密建储，则使诸皇子努力向上，没有与之拼死相争的明确敌手。雍正以后，乾隆、嘉庆、道光代代踵行秘密建储制度，再没有因储位问题发生过大

规模骨肉相残的宫廷政变。后因咸丰仅一子；同治、光绪无子；溥仪 3 岁即位，6 岁清朝灭亡，而无从实施秘密建储制，加之辛酉政变后慈禧专权，皇位传承转为懿旨确立嗣君，反映了末世皇权衰落的势态。此是后话。

雍正急迫实行秘密建储，是在十分恐怖、紧张的特殊政治背景之下，出于对自己人身安全的担心"以备无虞"。雍正本人在骨肉相残的储位之争中硬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机关算尽、心力交瘁。当他将对手一个一个消灭完，自认为的知情人也一个一个离开人世时，长时期紧绷的心弦猛然松垮，却又突然发现对手的影响根本是消除不了的，精神与心脏都有可能再也承受不住。因而，雍正八年(1730)的那场病是一个信号。十三年(1735)，雍正死于心脏病或脑溢血突发，可以视为合乎逻辑的结果。

二 "金石"说、"年隆之案"与军机处的创立

说雍正因炼服金石而亡，也应该说是不无根据的。

乾隆新立，百端待举，他却在乃父死去的第二天，首先驱逐了宫中炼丹的道士，并不问自答地下了一道谕旨，强调雍正没有服过丹药。说：雍正于日理万机之暇，闻听外省有祛病延寿的炼丹之术，明知其非，却抱着游戏消闲的想法，聊且让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于西苑空闲之地竖炉炼丹。雍正不过将其当做排遣取乐的优伶小丑，多次向乾隆等说过，他们是市井无赖，最好造谣生事，他本人未曾听其一言，用其一药。所以，乾隆将这些人逐回本籍。此举反倒成了人们推测雍正死于金石中毒的缘由。

炼服金石，牵涉到雍正的信仰和观念。雍正对佛道鬼神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当皇子时，精研此道；当皇帝后，"十年不言佛事"；最后三年，重新推崇佛道，以致亲自"开堂授徒"。

神秘的“透三关”

康熙末年储位之争时，诸皇子均虔诚而利欲熏心地默祷、希冀于天，频频请人算命看相推八字，以“上膺天命”为争位活动罩上神圣光环。雍正与之相同。与之不同的是，雍正通过参禅活动坚信“炉中若无真种子，总遇神仙也枉然”。他曾于太子二度废立、争储斗争达到白热化时，抛开一切，礼佛参禅。收到的成效是：在皇父与诸皇子眼中，他冰清玉洁，无意逐鹿；在他自己心灵深处，则完成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神秘的思想觉悟过程——透三关。

雍正晚年描述了这一亲历的修炼过程。五十一年(1712)春正月二十、二十一日，雍正延请禅僧迦陵音陪同他打坐参禅。敛神入定中，他恍然顿悟：“七尺之躯，不过地水火风，自然彻底清净。”自己并不比谁低，称帝成佛全在自心。他以此叩问国师章嘉呼土克图喇嘛。章嘉道：“此乃初步破参。如王所见，好比针破纸窗，从针孔窥天。虽云见天，然天体广大，针孔中所见，可谓偏见乎？佛法无边，王当勉之！”二月十四日夜，雍正参禅入定中点燃思想火炬，看清了诸皇子乃至皇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一切，顿悟：“山者山，河者河，大地者大地，十方虚空者十方虚空……尽是本分，皆是菩提。”他再次问证章嘉。章嘉微笑道：“此是王爷于大死大活之中参破二关了。可喜可贺。知万物之所异，而后知万物之所同。既无一物是我己，亦无一物非我身。是则名为透重关。王今见处，虽进一步，比如出在庭院中观天矣……佛法无量，王当更加勇猛精进。”翌年(1713)正月二十一日，雍正于堂中静坐，“无意之中，忽踏最后一关。”他胸中全盘计划已经成熟，兴奋异常，直赴国师章嘉处礼谢。章嘉望见雍正即道：“王得大自在矣！”雍正进而问道：“还会有事吗？”章嘉笑容满面，伸展两手道：“还会有什么事呢？”接着，他将手从外向身内挥道：“就是有些小麻烦，也不在话下了。”雍正以章嘉为证明恩师，自信已直透三关，得成正果。透三关的觉悟过程实际是雍正对自己、对对手、对形势进行透彻认识、分析，以达到知己知彼，形成通盘计划的过程。这一过

程罩上神秘色彩,使雍正真正立了大志向、下了大决心、有了大计划,怀着对上天也是对自己的神圣使命感,成竹在胸地去做应做的每一件事。

雍正为雍亲王时,其王府邻近柏林寺,常与僧人和尚往来,还建造大觉寺,招揽佛徒。他自号圆明居士、破尘居士,钻研讲论性宗之学,造诣高深。当然,参禅论道、机锋对答之中或者有弦外之音,僧房秘室、帷幄佛堂之内或者有机要密谋,均非常人所知。

年隆之案

雍正即位后十年不言佛事。雍正的思路是,他已参悟了正果,证实了自身,验明了结果。佛就是他,他就是佛,还用谈什么佛事呢？雍正曾写过一首诗:“谁道空门最上乘,漫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曾说:“朕亦即释主。”他自认是不着僧服为众生谋福的野僧,是比空门更上乘的佛爷皇帝。

作为佛爷皇帝,关键是执掌天杀。其中,最可说明问题的是年隆之案。雍正三年、四年(1725、1726),雍正突然以铁血手段先后除掉了他即位之初的功臣或宠臣隆科多与年羹尧。

有人认为年隆之案出于雍正“灭口”。这是基于“雍正夺嫡”的观点。储位相争时,隆科多、年羹尧似乎同雍正——当时的雍亲王都没有过深的关系。隆科多始为皇长子党主要人物,后随大阿哥一起加入胤祀之党。为此屡受康熙斥责。隆科多是诸皇子之舅,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以他的权位,无论哪位皇子登基,都必为重臣。似没有必要像民间流传的那样,不顾身家性命,以阴谋手段帮助雍正非法夺位。年羹尧虽为雍正妻舅亦为其属下,但出任四川巡抚后,渐远渐疏。雍正公开斥其“视本门之主已为陌路人矣”。而关键时刻,却正是隆科多成了受遗诏八人中皇子之外的惟一大臣和雍正正式即位之前关闭九门、拱卫京师的关键人物;也正是年羹尧,箝制了胤禵,接管了西部重军大权,使反对力量不可能从外部率军颠覆新朝。事后

反思，隆科多、年羹尧成为雍正帮手，并非横驰黑马。大阿哥、八阿哥遭康熙唾弃，隆科多只能在胤禵、雍正之间选择，康熙病发之时胤禵远在数千里之外，国不可一日无君，隆科多必辅雍正。年羹尧则有可能是雍正埋伏的一着杀手之棋。与雍正疏远等均为作戏给人看。若雍正确系“夺嫡”，对于夺位功臣和知情人首先会采取安抚政策，而后必出杀手。这里“狡兔死，走狗烹”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他不能长期忍受走狗的居功自傲和他自己内心猜疑、恐惧与被讹诈感的煎熬。有人认为，年隆之案出于雍正“集权”。雍正在疑雾重重、反对势力十分猖獗之中即位，渴望辅佐良才，股肱之臣。年隆二人一内一外正是恰当人选。雍正对二人示以殊宠。屡加封爵赏赐。肉麻笼络隆科多道：“舅舅隆科多……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世大臣也。”笼络年羹尧道：“我二人作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朕实实心畅神怡，感天地神明赐佑之至。”不料，年隆二人极力发展自己的势力，朝野内外遍植党羽，由他们引荐任命的官吏称作“年选”、“佟选”，与吴三桂之“西选”合称“三选”，并索贿纳贿，违法乱纪，无所不用其极。朝野内外传言大政皆出于隆科多年羹尧，雍正只是言听计从的傀儡。特别是雍正派出监视年羹尧的御前缇骑侍卫，竟成了为其摆队坠蹬、前引后随的随从。雍正不能不采取决断措施。他抓住借口，撤了年羹尧抚远大将军，调任杭州，随之锁拿至京，令其自裁。翌年(1726)，刑部议隆科多挟势婪赃，罪拟斩决。雍正令其往阿尔泰料理边防事务。后押解回京，永行监禁。雍正六年(1728)六月，隆科多死于囚所。

人们关注年隆案发的缘由，却忽略了一点：雍正不顾前后偌大反差，横下杀手，是因为他从天子、释主的地位出发，坚信自己有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行使“天杀”之权。杀年羹尧之前京城出了一件怪事。一只不知从何而来的野虎，从东便门上城，跑到前门下马道，窜入年羹尧家后花园。九门提督率兵追上用枪扎死。相传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为此，雍正兴奋激动之极，道：年羹尧究竟杀不杀，朕意实未决。然竟出了这样的奇事！上天如此明彰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奇！从古罕闻之事也！

雍正再次参悟了正果，证实了自身，他果然是代天行事的佛爷皇帝。

奏折制度的推广与军机处的创立

雍正常对大小官员说：“为人只要清晨出门时抬头望天，至晚归寝时以手扪心，自得为人之道矣。”天，即是雍正，雍正极具威慑力地要求大小官员每一件事，都要抬头看天，扪心自问，是不是忠于雍正。

雍正朝皇权的集中与加强达到了极致，除了创立秘密建储制、铲除储权外，雍正还推广了奏折制度，创立了军机处制度，彻底解决了相权问题。

奏折，又称密折，是臣下直接达于皇帝的秘密奏章，不通过内阁所属通政司转呈，皇帝对奏折的批示亦不与内阁大臣商讨。雍正完善并推广了奏折制度，他赋予督抚、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及学政官员密折权，甚至特许一些“品级卑微”如道府同知副将之类的小臣密折之权，要求他们随时随事奏闻一切地方之事。这使内阁及封疆大吏的权力同时削弱。地方事务稍大一点，都要上奏折请示，秉承皇帝旨意办理。奏折制度取消中间环节，提高行政效率，成为雍正推行革新大政的有力工具。奏折制度令各级官员彼此监督、互相告密，成为雍正控制官员的有效手段。

军机处，始设于雍正七年(1729)平定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之役中，原名“军机房”。军机处设职掌机要，军机大臣(正式称呼是“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军机处大臣上学习行走”)，军机章京，无定员，由雍正特旨选任。军机处只有值房，没有正式衙门。因此人说军机处“无公署，无专官”。军机大臣常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咨询；参与军国大政的议论；面聆并按皇帝旨意，撰拟机要文书。军机处撰拟的上谕涉及核心机要的军国大事，不经由内阁，由朝廷直接寄出，又称“廷寄”，交由兵部驿站递相传送，极其迅速、机密。军机处是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雍正独裁军国要务，且通过军机处，提高了行政效率，使空前强化的皇权能够真正充分落到实处。

独裁的另一面是勤政。雍正"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天下政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他亲笔撰写的朱批谕旨动辄万言,收于保和殿东西庑中,堆如山积。其中十分之三四刊印出来,即有 360 卷,奏臣 223 人。长期的劳累、压力,吞噬着雍正的健康。权力高度集中,政敌先后消灭,但雍正轻松不下来,他似乎对自己过去的作为"愀然不乐,意颇悔之";似乎患了重病,在幻听幻视中煎熬;似乎自信、奔波了一生,到最后又不自信了,又一切皆空,需要用来世彼岸来安慰自己了。

雍正七年(1729)起,雍正密令臣下访寻江湖术士、游仙野道。人们推测,因病求仙只可能是两种病。一是心病,疑神见鬼。一是阳衰,荒淫过度。朝鲜《承政院日记》记载朝鲜使臣向其主报告说:"雍正沉淫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雍正生活放纵的可能性不大。他曾自云:"朕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较有可能的是"心病"与"阳衰"结合。雍正患心病,疑神见鬼而阴盛阳衰。雍正精于佛、道理论,又以章嘉呼土克图喇嘛作为自己的证道恩师,想必明了道教的"玉女喜神术"、密宗喇嘛教的"大喜乐禅",欲以房中术采阴补阳,祛病延年。然谈何容易,旧病未除又添新病,形成了恶性循环。雍正一定经历了一个矛盾、痛苦、复杂的思想过程。最终他为自己神不守舍、求助江湖术士而羞愧自责——他是天子,释主。十一年(1733)以后,雍正连发谕旨,论及佛道。亲自撰著、编纂、刊刻多种佛学著作,同时大行佛事,并以释主、禅门宗师的身份开堂授徒,为王公大臣说法。他说的是破三关的理论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及体验;行的是以佛治心,以儒治世之道。既如此,雍正以道治身,应该顺理成章。不过,雍正不会再求他人,而是竖起了自己的丹炉。雍正御制诗云:"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幡。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鸾。"雍正热衷于一个人在青烟红焰的丹灶旁、在肃穆清雅的音乐和抑扬顿挫的祝诵中端拱而坐,在梦幻般的神秘意境中忘记一切,让自己的精神、灵魂随青烟、雅乐、梦境飘然而去,这成了他的一种寄托或解脱。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番:雍正十三年(1735)

八月二十二日，雍正视朝时略感不适。退朝后，他像往常一样摈退从人，在丹灶前端坐修炼。没有人知道他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入夜时分，丹成。他几乎不加思索地服了下去。也许他自信是真丹。也许他并不在乎真丹假丹，只想快些离开这迷雾缭绕的世界，飞到彼岸。子夜时分，金石燥烈，鼎湖龙升。

三 "被刺"说、吕四娘真假与雍正功过

雍正被刺身亡，同样应该说不无根据。其最重要的根据，在于当时有太多的人将雍正视为不共戴天之敌，将向雍正报仇、讨还谋国篡位、杀父杀母、灭门灭族的血债作为存留人世的理由和目标。

吕四娘真假

"吕留良案"是雍正朝一件极其惨烈的政治大案。由于它既涉及雍正本人即位的合法性、品行、施政评价，又涉及华夷之辨、清朝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同时沉重打击和伤害了皇族反对派与广大汉族反对派，而使方方面面的人对雍正切齿侧目。于是，野史广为流传，是一位叫吕四娘的女侠行刺了雍正。吕四娘有说是吕留良的女儿，有说是吕留良的孙女，吕留良惨案发生之时，年方13岁，因住安徽乳母家而幸免于难。传说吕四娘血书"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四字，不辞而别。四年后练就绝世武功，施轻功潜入京师圆明园，用闷香将宫女熏倒，换上宫女服装，混入宫中，手刃雍正，神不知鬼不觉提头隐身而去。宫中报雍正病危，鄂尔泰等入宫见驾，见到了一具无头尸首。后清廷加以金头葬入皇陵。

吕四娘之事是真是假，首先要看吕氏有没有孤儿。雍正九年(1731)二月，山西发现匿名揭帖："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看彻世事浑如许，头发冲冠剑欲鸣。"诗后有："曾静可杀不杀，吕晚村无罪作罪，真古今一

大恨事也。为此感愤，倾吐血性，倘好义君子与我同心，请将此诗传布宇内，俾当途闻之转奏天阙，庶朝廷知所悔改，而枭曾之首，存吕之孤，则刑罚中而人心皆服矣。”其中要求“存吕之孤”。而前一年即出现了关于吕氏孤儿的传言。雍正对此十分重视，特谕浙江巡抚李卫：“外边传有吕氏孤儿之说，当密加访察根究，倘或吕留良子孙有隐匿以致漏网者，在卿干系非轻。”李卫则密折复禀：吕氏一门不分男女老幼俱皆严禁，连吕氏坟地也派人监视。李卫以擅长侦缉得宠于雍正，吕氏孤儿漏网的可能性极小。其次要了解吕氏孤儿能否混入宫中。清朝确有15岁以下女子因没官为奴而入宫之例，但重犯眷属均发往宁古塔等边远之地给披甲人为奴。即吕四娘确有其人也绝无可能以“没官为奴”的方式混入宫中。而圆明园虽为御园，却是雍正主要驻跸之地，警戒森严，并非可轻易往来出入之处。因此一般情况下，吕四娘事件的发生是不可能的。

雍正树敌

雍正被刺广为流传，反映了人们对雍正王朝和雍正的印象：一个充满阴谋暴力、杀人惨剧的黑暗王朝；一个主宰黑暗王朝，制造所有阴谋暴力、杀人惨剧的元凶。人们宁肯希望事实就是雍正被人砍去了头颅，才合情合理、大快人心。造成这种印象的缘由，除了雍正即位前后阴森血腥的传闻及雍正政敌负面的渲染和诅咒外，主要是雍正的高度集权和严酷治国造成的。

雍正拿不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无法彻底消除朝野上下对其统治的反感与反抗，只有采取高压、严猛的做法，“忠我则臣，背我则敌”，对那些“不笃诚敬，如禽兽者”，不可以宽仁感化，“惟有治之以法而已”。这种做法，不仅用于与雍正夺位争权的对手，而且推及到雍正王朝的各个方面。

首先，以秘密立储、推广奏折制度、创建军机处来高度集权。第二，整顿吏治，查补亏空。雍正态度十分强硬，若因贪污而亏空者“即行正法”。凡有

亏空，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否则抄家、从重治罪。各级官员因之被严惩、抄家的比比皆是。雍正并“赶尽杀绝”，抄家不只在犯官官衙而且在其原籍老家同时抄；不但抄家而且罢官；宗亲戚友连带抄家；亏空钱粮不准当地官民代赔，犯官若死，着落其宗亲戚友赔补。遇有新的贪赃，更严惩不贷。大小贪官（清朝几乎无官不贪）都朝不保夕。第三，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继而清理各项陋规，归于公款。此举影响到内外官员的切身利益，多数官员、至少在他们尚未理解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与雍正深结其怨。第四，实行士民一体当差，加强对士绅的控制和治理。雍正下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禁止生监包揽、拖欠、规避钱粮。生监五人互保，无抗粮包讼等情、完纳赋粮以后，方准应试。声称“不欠钱粮不成好汉”的山东进士举人监生被褫革达 1497 人。雍正二年（1724）封邱生员罢考，抗议与民一例完粮当差。雍正将为首者分别斩决、绞监候，将镇压不力的官员革职，谕令：今后凡有邀约罢考者永停考试，全县罢试全县永停，“决不姑容”！而雍正对摊丁入地的推行，使“士民一体当差”最终实现，给不法士绅更沉重的打击，他们与各级官僚一起对雍正蕴积怨恨。雍正并将所谓“贱籍”“小户”，“开豁为良”，更加重了这种怨恨。

除上述外，自曾静吕留良案后，雍正更加重视思想的严密控制。接踵发生的大狱，从政见蔓延到文字，如徐乾学之子徐骏，因一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诗，被说成“思念明代不念本朝”，照大不敬律斩决。同时，雍正大刀阔斧改革八旗旗务，削弱旗主权力，取消下五旗的私属关系，将权力进一步集中到自己手中；处心积虑打击汉员所谓的“科甲朋党”；在城乡基层社会推行保甲、宗族、乡约月讲制度。另一方面，则更加加强了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控制和治理。西北两路用兵，经营青海西藏；东南“改土归流”，废除了数百年的土司制度。

雍正的所作所为，使他在中央、地方、满汉、边疆、官僚、士绅……中均树立起不共戴天、恨不能取其性命寝皮饮血的仇敌。

雍正功过

然而，雍正勤政。雍正的所作所为，从方方面面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

耗羡归公及养廉银政策的推行，扭转了康熙后期地方官狂征滥派的状况，不同程度地降低了耗羡率，减轻了人民负担，减少了贪污，改善了吏治。地方行政上收支基本平衡，具有了近代财政预决算的色彩。摊丁入地将人丁、地亩双重征税标准，变为以土地作为单一征税标准，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税收，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减少了户口隐漏，促进了生产发展。同时，农民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大量剩余劳力可以流动，从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活跃。实行奏折制度、设置军机处，打击朋党、整顿旗务，对西北用兵和对西南的改土归流，提高了行政效率，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整顿吏治、查补钱粮、士民一体当差，打击了贪官污吏、不法士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雍正年间国家财政岁入增加一倍；雍正本人躬行节俭、量入为出；更重要的是他以严治国，整肃吏治，致使国库丰盈，西北用兵动支大半，乾隆初仍有二三千万两。

雍正王朝的确充斥着阴谋、暴力和杀人惨剧。但雍正冒天下之大不韪，事事开创，勉力成就着前无古人的大事业。

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政敌尽削，政局大定，朝野思想趋于统一，国家民族走向昌盛。雍正王朝在政治、经济、民族、外交各方面的措施取得绝大成效；雍正的功绩昭如日月，他一代英明君主的形象已经树立。但性格坚韧的雍正却暴亡于子夜。

如若发生非常事件，如若雍正死于他的上述仇人之手，或者在他上述仇人营造的恐怖仇恨气氛中死于其他什么人之手，都可以说是悲壮地殉了他的事业。

反言之，如若雍正并非被刺，顶着如此之大的内外压力和拼死拼活日理

万机却得不到丝毫慰藉的委屈，以他心高气傲、急躁刚烈的个性，紧绷的心弦势必有崩断的一天。暴病中风、丹药中毒，不是没有可能。

那么，雍正是不是反对者刺杀的，雍正的棺椁里究竟有没有头呢？那要等发掘之后才能得知分晓。

思考题：

谈一谈你对雍正帝的认识和评价。

参考书目：

1. 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2. 梁希哲：《雍正帝》，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年。

3. 郭成康：《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政治卷》，辽海出版社 1999 年。

第五讲

清朝前中期国家政权的运行体制

国家政权结构及其运行

基层社会组织结构

双重统治格局与地方精英

清朝国家政权的运行体制,体现为清廷在全国的行政体系、运行制度和统治方式。清朝前中期,清廷行政体系、运行制度和统治方式基本沿袭明朝,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统治体制的主要方面。清廷适应中央集权发展的需要,对其加以增减、改革和创设,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统治体制的最高水平。本讲拟通过介绍清朝前中期国家政权的运行体制,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特色。

一 国家政权结构及其运行

中央机构

清代中央机构大致可分为中枢机构、执行机构、监察机构、特殊机构四部分。

中枢机构辅助皇帝处理军国大政,包括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和军机处。

议政王大臣会议始于入关前努尔哈赤首创的八王共议国政制,由满族宗室王公及八旗高级官员组成。入关前是商议与处理军国要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入关之初不仅作为中枢机构继续存在于清中央,而且有所扩充,成员多时达数十人,有时并采取议政王、贝勒、议政大臣与满汉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官合议的形式。议处政务包括:军事作战对策的筹划,重大案件的审断或复审,高级官员的选任与罢黜,律例典章行政制度的订立与完善,圈地、投充、逃人法的实施,汉藩王的安置及有关事宜的处理,八旗重要事务的商议等几乎所有重要政务,表明其仍是当时实际议处国家大政的最高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对建立并巩固以满族为主体、满汉联合统治的统一多民族政权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构成、所起作用和性质、地位都发生了变化。入关前各旗旗主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当然成员,对汗权皇权不无掣肘。顺治时,议政王大臣会议参议人员已由皇帝任命或罢免。康熙元年(1662),更裁撤了原各旗平均定员的议政大臣,标志八旗作为相对独立政治单位参预议政的结束。此后康熙任命的议政成员主要是宗室王公、旗人要员、各部尚书(有由大学士兼者)、理藩院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满蒙都统及内大臣等。议政王大臣会议所议"俱系国家重大机密事务",参议人员本应精简、干练。但这一机构人员庞杂,参议的不少宗室贵族、八旗要员不谙政务、能力低下,与其职掌的机要性与机

密性相矛盾。康熙曾减少冗员、任用地位较低而有能力的旗员参预议政，但未能从根本上铲除这一陈旧祖制的弊端。雍正则釜底抽薪，设立了军机处，"议政之弊始革"。军机处设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并未撤销。乾隆初，乾隆出于对其父严猛政治的缓和，为笼络满族贵族，对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一些职掌有所恢复，但所议政务以琐碎事务居多，议政大臣的职衔也已带有荣誉兼衔的色彩。乾隆五十六年(1791)，议政王大臣会议终告取消。

内阁与军机处最终成为清朝常设的中枢机构。其中，雍正首创、体现高度中央集权的军机处，最具清朝特色。军机处的构成、成员、职掌、特色等，本书第四讲已做介绍。总体上，军机处分割了内阁处理机要政务的职权，而具皇帝秘书班子的色彩，使其无法形成指挥百官的独立权力，这就决定了军机大臣虽任宰相之职，但无宰相之权，只能是皇帝得心应手的工具。内阁本是明朝朱元璋铲除相权后的产物，大学士"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但其形式上仍是处理全国政务的中枢。清代沿明制，以内阁为中枢机关，然不设首辅，权力分散。加之入关之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雍正以后奏折制度的推广和军机处的设立，均分割了内阁的权力。尽管如此，内阁并未被取代和取消，大量繁杂的例行公事仍由内阁办理。经过内阁的题本量相当大，一年"多至六七千道"。正因为如此，雍正后才增设协办大学士，以保证内阁人手，发挥其应尽的职能。清乾隆年间定内阁满汉大学士各2员，协办大学士1至2员，各级官员200多名，处理具体政务的下属机构有典籍厅、汉本房、满本房、汉票签处、满票签处、批本处、诰敕房等。清朝皇帝的极端专权，使"内外臣工纤悉不敢自专，必以上请也"。据说乾隆帝通常晚膳后审阅内阁本章，偶尔有误，有关大学士必遭严斥，谁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内阁与军机处分担政务，协助皇帝处理头绪纷繁、专业性极强的大量日常庶务；皇帝则借助军机处重点专断国家机要，如一位清史专家所说，雍正时最后定型的中枢机构及其运行机制提供了"以皇帝个人之力独揽国家一切繁剧军政事务"的条件，"达到了机构精简、迅捷高效、机密严谨、运转和谐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境界，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到这时候才可

以说达到完备程度”。另应说明,清代内阁是法定的国家最高政府机关;清代内阁大学士的品秩,大大高于明代内阁大学士的正五品,而为正一品,位列百官之上。影视剧中的“中堂”,是清人对大学士的通常称谓。

与中枢机构相关的部门有通政司,负责接收各省官员上奏题本校阅后转送内阁;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负责稽察督促中央各部院及八旗奉旨特办之事;中书科,负责缮写册文、诰敕等事;负责呈递奏折、传宣御旨的奏事处。其中奏事处由御前大臣兼管,其下分内奏事处、外奏事处,亦简称“内奏事”、“外奏事”。内奏事处涉及到内务府,设奏事太监,外奏事处设奏事官。除呈递奏折、传宣御旨外,每日要排出八旗、侍卫处、各部院在朝值日班次,代递“膳牌”(宗室王公用红头牌,其他各官用绿头牌,上写姓名职衔,在皇帝用膳前呈递)预备皇帝召见,代递如意及贡物等。

执行机构即分工办理各类事务的六部、理藩院、翰林院等。

其中吏部掌管全国文职官员的任免、考核及升降调补。户部掌管全国疆土、田亩、户口钱谷之政令、财政收支及铸钱、京通仓储等。礼部掌管礼仪及接待藩属国使臣、学校、科举等。兵部掌管武职官员任免、考核、武科举、全国绿营兵籍及驿站等。刑部掌管刑法、死刑案件,与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工部掌管土木建筑、水利兴修、器械制造、部分铸钱及关税征收事务。理藩院掌管少数民族、藩部事务和对外交涉等。翰林院掌管撰拟祝祭册诰文、编修书籍、经筵日讲及部分科举考试事务等。六部、理藩院尚书、侍郎等各部院正副长官、包括监察机构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统称“堂官”。部院之下设清吏司,分掌事务。如吏部文选清吏司,掌文职官员的品级及选补升调;户部贵州清吏司,掌贵州奏销的钱粮收支、及全国关税;礼部仪制清吏司,掌嘉礼(如三大节朝贺等)军礼(出师、献俘等);兵部武选清吏司,掌武职官员的品级及选补升调;刑部河南清吏司,掌查核河南本省的刑名案件,兼掌热审案件。各司主要官员是郎中、员外郎、主事,统称“司官”。

负责某项事务、较低一级的机构又有:乐部,掌重大典礼之演乐及审定乐律;太常寺,掌坛庙祭祀礼制;光禄寺,掌重大典礼之备办筵席;鸿胪寺,掌

朝会、庆典、宴会之仪式；钦天监，掌观测天文，编制历书等。

执行机构就是执行皇帝的意旨。如六部之首的吏部，本是管理人事的机关，但用人行政之权均操之皇帝，地方中下级官员的任免之权，操于督抚等封疆大吏，吏部只办理任免手续备案而已。

监察机构监督百官、查核政务、会审重大案件，为都察院。

都察院是清朝沿袭明朝制度而设，正副长官为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都察院下设 15 道（清末增为 22 道），每道各设监察御史，分别监察地方各省政务及刑名案件，并冠以地名，如京畿道、江南道、浙江道、山西道等，同时分别监察中央一二个部门的政务，如河南道同时负责监察吏部、浙江道同时负责监察礼部、都察院等。清初沿袭明朝制度而设的监察机构还有六科给事中。各官员题本经皇帝审批由内阁下发时，须经六科给事中抄写、分别交由吏户礼工刑兵各部执行，称“科抄”。在这一过程中，若发现皇帝有处理不妥、不便执行者，准该科给事中“封还”；若发现题本、批本、内阁所拟意见有误，准该科给事中“驳正”，二者合称“封驳”。雍正时皇权高度集中，实行所谓“台省合一”，取消给事中封驳之权，将六科给事中合并到了都察院。给事中与监察御史合称“科道”官。都察院设满汉科道官数十人。主要职掌是：参预九卿会议（左都御史属九卿之一）、九卿翰詹科道会议朝议大政；建言兴革之事，参劾不法官员；监督各衙门行政，如监督吏部考核官员的“京察”、“大计”，刑部行刑等；受理百姓（赴都察院）鸣冤，并与刑部、大理寺组成“三法司”复审重大案件；奉旨巡查某项政务或某机构某具体事件，或以钦差身份或带某种职衔如巡盐御史、巡漕御史等。

清朝行政中，监察机构发挥了某些职能和作用，也出了一些为政清廉直言敢谏的监察官员，甚有因之殉职者。如乾隆年间以“直言”著称的御史仲永檀发奸揭恶，使收受贿赂的步军统领满人鄂善被处以绞刑，他本人则擢升左都御史。后来，仲永檀因弹劾尚书张照，竟被张派人用毒酒毒死。然清朝监察机构本质上属于皇帝附庸。清朝绝无明朝数十科道官联名指摘皇帝者。清朝科道官一言不合皇帝之意，即被斥为沽名钓誉、结党攻讦，获罪遭

贬;清朝一些大案,如康熙明珠案、雍正年隆案等,往往是皇帝指使或示意科道官员发端的。

特殊机构是独立于政府行政机构之外,自成系统,管理皇室、皇族一应事务的机构。包括负责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和掌管皇族事务的宗人府。

内务府是宫廷事务亦即皇帝衣食住行的总管机构。内务府长官为总管大臣,无定员、由宗室王公、旗员充任或兼任。下属机构数十个,官员3000多人,较重要的是七司三院,即广储司(掌府藏及出纳总汇,犹如户部。初名御用监,下设六库七作二房三织造等)、都虞司(掌所属武官选任及打猎捕鱼之事,下设三旗包衣等)、掌仪司(掌内庭礼乐,犹如礼部,并考核太监品级)、会计司(掌内府出纳及庄园地亩并选宫女太监)、庆丰司(掌牛羊畜牧)、慎刑司(掌审拟上三旗刑狱案件)、营造司(掌宫廷缮修工程)及上驷院(初名御马监,掌御用马匹)、武备院(掌制造和收储各项器物)、奉宸苑(掌管理各园林)。另设敬事房,专管太监。内务府人员主要是上三旗包衣(满语"奴仆"音译),又称内务府三旗包衣,敬事房太监也编入包衣组织内管领下,均为皇帝奴仆。

以往历朝的宫廷事务主要由宦官担任,清代内务府则由皇帝奴仆组成,使宦官不但品级降低、权力削减、数量减少,且处于内务府严格管辖之下,无法专权干政。而内务府官员属流官,定期更换,也难以祸乱宫廷。另外,内务府各政与国家各政并不截然分开。除上述奏事处之例外,如内务府财政收入,不仅来源于皇庄等皇帝私产,也来源于国家财政收入;内务府财政支出,不仅用于宫廷费用,也用于军费、赈济等。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专制王朝"家天下"的特征。

宗人府是皇族管理机构,长官宗正,由皇帝特简;下设左右宗令、宗人共四名,由宗室王公充任。主要职掌为:管理皇族户口,负责皇族赡养、教育、婚姻、祖宗祭祀、玉牒(皇族家谱)纂修,整肃皇族家法,负责王公分封、管制与惩处等。

地方机构

清代地方行政机构,以治理方式大致分为四种:直省行政机构(按:"直省"是直隶与其他各省的合称);东北(所谓"龙兴之地")行政机构;边疆少数民族行政机构、八旗行政机构。以下主要介绍直省行政机构。

清承明制,以省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下设府(直隶州、直隶厅)、县(州、厅)两级。

清代共18省,分别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原与江苏合为江南省,后析出)、江西、湖北、湖南(原与湖北合为湖广省,后析出)、浙江、福建、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光绪十年(1884)后,新疆、台湾、奉天、吉林、黑龙江相继建省,合原18省为23省。截至宣统年间,各省之下共设219府、79直隶州、64直隶厅。较为特殊的府,是京师称为"京府"的顺天府和东北盛京的奉天府,地位高于一般府。府下共设1355县、141州、83厅。

清代省级最高长官为总督、巡抚。一般总督辖1~3省,巡抚辖1省。总督品级稍高于巡抚,二者同是封疆大吏,互不统属,大致军事归总督,民事归巡抚。督抚编制及辖区至乾隆中期定制,全国共设总督8人,计有:直隶总督,辖直隶;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闽浙总督,辖福建、浙江(后增台湾);湖广总督,辖湖南、湖北;陕甘总督,辖陕西、甘肃(后增新疆);四川总督,辖四川;两广总督,辖广东、广西;云贵总督,辖云南、贵州。另设漕运总督,驻江苏淮安府,管理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漕政;河道总督负责治河。设巡抚18人: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后由陕甘总督兼理)、新疆、台湾巡抚,其中山东、山西、河南只设巡抚,无总督之辖。督抚除总理辖区内军政、民政、财政和下属官员外,总督例兼兵部右侍郎(或加兵部尚书衔,清末全为兵部尚书衔)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其所发文告称

“本部堂”,即因有尚书衔,为兵部堂官之意),有节制辖区内提督、总兵的军事大权,并辖有名为“督标”的3~5营直属军队,同时,负有监察地方之权责。漕运总督统辖七营绿营军,名“漕标”,节制八省卫所官兵领运漕粮。河道总督统辖八营绿营军,名“河标”,掌河工守汛防险。巡抚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多兼兵部侍郎衔,后多兼提督衔加兼理粮饷衔,并辖有名为“抚标”的2营直属军队,节制本省各镇总兵。

省级行政机构设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简称布、按二司,长官分别为布政使、按察使。布政使又称藩司(藩,藩镇之意)、藩台、方伯,品级同巡抚,主管民政、财赋。按察使,又称臬司(臬,司法之意)、臬台、廉访,地位略低于布政使,掌理刑事,兼办该省驿递,乡试充监试官,大计(地方官考核)充考察官。清前中期,布政使、按察使不是督抚属员,受中央对口部院及督抚的双重节制,有直接对皇帝的奏折权。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之下设道员衙门。道,不是一级行政区划,道员俗称道台,有分守道、分巡道之别,分守道是布政使佐贰官、分巡道是按察使佐贰官,或分辖三四府,分别辅佐布、按二司办理地方政务,或统辖全省,办理专项事务,如粮道、河道、盐法道等。

府的长官为知府,俗称太守。总理该府所辖州县事务,下设佐贰官同知、通判,分掌赋税、治安、刑名、水利诸事。县的长官是知县,俗称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民、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下设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然县丞、主簿因事而设,原则上事繁之县设数人,事简之县或不设,且因时增减。实际上清朝1500左右州县,共设县丞、主簿各345人,多数县不设。如不设县丞、主簿,其职责则由掌管监察狱囚等事、“不入流”的典史兼任。除外又设驿丞、儒学、医学、阴阳学及管理僧道各官。另有的县于关津要冲之地设巡检司(从九品,类似于现在的公安派出所),掌缉捕盗贼、盘诘奸伪之责,数量也很有限,一般平均每县1~2个。

清代地方行政机构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是总督、巡抚这一级封疆大吏的设置。总督、巡抚是所谓“疆帅之重,几埒宰辅”,皇帝选任督抚,以朱批

奏折形式与之建立直接的统辖关系,亲自节制、监督省级各类行政事务,体现皇权对地方控制的加强。第二,清代省级地方事权既归于督抚,省级地方官又互不统属,甚至布、按二司也有直接对皇帝的奏折权,这使得督抚难以形成地方分权势力。第三,县是国家正规地方行政机构的最低一层。县一级官员较之明代又大有削减,一般情况下只设知县等二三名官员,多数县只有一名七品知县和一名不入流的典史在治理县事。这与其所辖广袤的地域、众多的人口(一县人口少则十数万多则数百万人)无论如何不相适应。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跨两邑或数邑的经济重镇、水旱码头,多有府县佐官如同知、通判、县丞、主簿等驻镇,有分防同知署、分防通判署、县丞厅等建置。第五,大量胥吏、幕僚实际办理各衙门繁巨琐碎的日常政务。胥吏有额设编制、管理规制和极低的薪水,但不属行政机构的官方成员,只属贱役。分书吏、胥役两类。如县衙的"三班"(皂班、壮班、快班)"六房"(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前者为胥役,后者为书吏(又称房书)。胥吏多为本地人,精通当地政务和实用知识与技能,规定考试录用,5 年任期。作为一个群体,胥吏在地方行政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他们常常与官员相勾结,擅权舞弊,蠹政害民。幕僚又称幕友、西宾,俗称师爷,是官员私聘的行政助手,与官员是平等的主宾关系,酬金较重,由幕主私人给付;地位较高,政务活动只对幕主负责。为数不少的干练幕僚的佐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少事繁的矛盾。

军队系统

清朝军队有八旗、绿营两个体系。

八旗军兵员极其有限,主力驻守京师,称"京师八旗",其他分别驻防畿辅、东三省、新疆、藩部(蒙古、青海、西藏)和各直省,称"驻防八旗"。其中所谓驻防各直省,实际只有江南江宁、陕西西安、宁夏、山西太原、山东德州、青州、浙江杭州、京口、乍浦、福建福州、广东广州、湖广荆州、四川成都、河南开

封、甘肃凉州、庄浪等地驻有八旗，其他地方并无驻防。八旗早已腐败，不堪征战重任。

清朝绿营建置，京师以外分"标"、"协"、"营"、"汛"四级。

"标"，有总督统辖的"督标"、漕运总督统辖的"漕标"、巡抚统辖的"抚标"、提督统辖的"提标"、总兵官统辖的"镇标"等。其中提督为各省绿营最高长官，与督抚共称封疆大吏，级同总督，然听总督节制，所辖提标多为五营，兵额5000至1万余人，下辖各镇总兵。总兵官管辖本镇官兵(每省设2~5镇)，除镇标外，并管辖本镇所属各地驻营，受提督、总督双重指挥。

"标"下为"协"，由副将统辖。"协"下为"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统辖。"营"下为"汛"，"汛"有"分防大汛"(在城为"城守汛")由千总、把总、外委统辖，并下辖各"小汛"("墩")。其中营、汛是绿营军的基层单位。

清代凡关津险要、交通枢纽、繁华市镇、沿边沿江沿海、大道通衢，按段设立墩堡塘汛，城守分防各营均派驻兵弁，各守汛地，称为汛弁驻防或防汛。其作用是缉捕匪类、维护治安、守卫要地、镇压地方。全部绿营军约有三分之一的兵力用于汛弁驻防。千总、把总、外委，均驻于重要的大小市镇；县(州)城守汛，州县以下分防大汛、小汛，墩、堡、塘的设置非常密集，驻防汛弁的人数接近绿营军总数的二分之一，而每一汛的兵力均较为分散和薄弱。县(州)城守汛一般为二三十人，县以下驻集镇的小汛兵力更少，一般仅十几名，最基层的小汛一般只有1~6人。侦逻稽查、守卫治安本应是地方政权的职责，汛弁驻防属于"军政不分"，与"差操不分"一样，成为绿营军两大弊病之一。

官员铨选制度

清朝因袭前代，以科举制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称"正途"。科举考试有以下程序。

初级考试称为"童试"，除奴仆、娼、优、皂、隶及蛋户等贱籍外，出具家世

清白文书，有一名绅士为之担保的男性平民均可报考。报考之人称为“俊秀”。“童试”分三场。第一场为“州县试”，知县（或知州）主考，考生来自本州县，考中的称“童生”。童生可参加第二场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主持的府试。通过者进而参加第三场由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院试通过，方取得最低一级俗称秀才的生员功名。各地录取生员有国家规定的固定名额（称“学额”），考中者只占考生的百分之一二。

考中生员意味入了官学（故又称“进学”），须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岁考和科考。岁、科二考成绩决定生员等级的升降乃至黜革。其中成绩一等为官学中固定名额的廪生，每年官贴廪饩银四两；二等为固定名额的增生（即增广生员，如同扩招的自费生），不享受廪饩，但可优先抵补廪生之缺；三四等及新进学尚未参加岁、科二考者为生员最下一等的附生（即补遗生员，如同旁听生、试读生）。

每年府州县学送廪生经过考试进入国子监学习称“岁贡”；每三年府州县学于廪、增生中推荐、学政会同督抚考核选拔进入国子监学习称“优贡”；每十二年学政主考，于全体生员中选拔品学兼优者进入国子监学习称“拔贡”；遇国家庆典、皇帝额外赏予选拔机会经过考试进入国子监学习称“恩贡”，加上“副榜”（每有五名中举者，可增加一名副榜。副榜无资格参加再上一等考试，故称“半个举人”），是为“正途五贡”。就学国子监内外班（在监或非在监学习）的学生则称“监生”。

生员、贡生和监生可以参加中级考试——乡试。乡试每隔三年于同一日期（另有因皇帝特赐、不定期举行的“恩科”）在省会举行，由朝廷钦差考官主考。生员在原籍参试；贡生和监生可在原籍也可选择进京赶考、参加顺天府举行的乡试。而顺天乡试在常额之外另增加贡生与监生的中举名额。清朝规定，贡生、监生可由捐纳而得，称例贡生、例监生，相对考试而得的“正途”为“异途”。举人以上功名则不得捐纳，无“异途”。有的平民通过捐纳得到例贡生、例监生的功名；有的童生通过捐纳例贡生、例监生取得乡试资格，再考举人成为“正途”；有的生员通过捐纳得到以监生身份（以其原来的身份分别称

“廪监”、“增监”、“附监”等)参与顺天乡试、增加中举机会的优惠条件。

考生通过乡试,便取得“举人”功名,可继续参加同样三年一次于固定日期在京城举行的高级考试。高级考试分会试、殿试二场。会试取中者称贡士。一个半月后举行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取中者称进士,分三甲。一甲为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称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称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称同进士出身。统称“科甲出身”。

一般讲,取得功名,便得到了入仕机会。功名越高,机会越多,官职越大。一甲进士多任命为地位显耀的翰林院编修、修撰、庶吉士等,翰林院是聚集才学极高学者的最高学术机构,于其中进一步深造后,可派为各省学政,或于中央、地方担任要职。其他进士有的直接成为中央各部属员或地方知县。参加会试未能登科的举人,可参加吏部举行的“大挑”,一等者以知县任用;二等者以教职(学政、教谕等)铨补。即“五贡”,也可经过各种考试(如优贡通过朝考等),得到七品京官、知县、教谕等职位。而有功名者——即使仅为生员,均有资格捐纳官职,均有机会被地方或其他官员保举任官。

科举考试之外,还有捐纳、吏员考职、举荐、世爵世职为官等各种方式。捐纳、吏员考职等,相对科举考试的“正途”,称为“异途”。捐纳就是买官,分“现行常例”和“暂行事例”。现行常例可捐生员、举人等出身及职衔(虚衔)、封赠等;暂行事例在战时、灾荒、河工筹款时开捐,事过停止,直接捐官。京官可捐五品郎中以下;地方官可捐四品道员、知府以下;武职可捐三品以下。

清朝简任官员,依据独特的“官缺制”。“官缺制”解决已入仕途的官员如何任用,任官权、官职额数如何控制等。清代官缺有如下划分形式。1.按民族、身份固定数额的官缺,如宗室缺、汉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内务府包衣缺等。清朝中央各部院除理藩院外,堂官满汉缺同额,司官满洲缺居多约占60%。特殊机构、八旗及边疆少数民族军府各将军大臣转设旗人缺,主要是满洲缺。地方府州县以汉缺为主,六品、佐贰以下官不授满洲缺、蒙古缺。2.将全国各省府州县的官缺(即官职)分别以所辖地区属“冲”(地理要冲)、“繁”(政务繁杂)、“疲”(赋税多逋欠,疲玩)、“难”(命盗案多,难

治）为标准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其中“最要缺”，“冲、繁、疲、难”四字俱备；“要缺”占三字；“中缺”占两字；“简缺”占一字。而后因地授官，因才授职。3. 按品级高低、重要程度、职务性质划分为“请旨缺”：四品以上较高级官员“请旨补放”，或皇帝直接“特旨补放”。留授、拣授、调授、题授、考授缺：四品以下官员由各部院堂官、地方督抚挑选，由于有各种详细规定，其选用下属之权实际受到很大限制。选授缺：留授、拣授、调授、题授、考授之外的中下级官缺由吏部经办。从备案的各种“选班”中选受。“选班”有新中进士、举人等应授官者的“除班”；应晋升者的“升班”；因复职、病愈等候补者的“补班”等。吏部单月或双月截取每班一定数额，与都察院官一起抽签决定某人得某官，再经王大臣核实验看，并引见皇帝面验，合格者发给任官凭证。武职官员铨选由兵部主持，与文职类似。官员简任中，正途与异途有别。异途出身的汉人汉军旗，未经保举、考试，不授京官、正印官。礼部、翰詹科道不用异途。官员简任时实行回避制度，本籍、亲族、师生等均须回避。

清朝文官每三年考核一次，京官及地方督抚称“京察”；地方督抚以下官员称“大计”。武官五年考核一次，称“军政”。“京察”三品以上京官包括地方督抚由皇帝亲自鉴定；四五品京堂由王、大臣数人考核，别等次、定去留，奏报并引见，由皇帝最后裁定；各部院司官由本部堂考核，按“四格”，即“守”（操守）、“政”（为政）、“才”（才能）、“年”（年龄）四格；“六法”，即“疲软无为”、“不谨”、“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六种不适职情况（乾隆二十四年以前又有“贪”、“酷”两法，合为“八法”；后因“贪”、“酷”须随时参革，不列入三年一次的考核）填写考语，密送吏部、都察院核实、过堂验看，拟定处理意见上报皇帝，皇帝审批后张榜公布。入“四格”者照旧供职（有授高一级官缺时，列一等者优先）；入六法者或革职、或降级调用、或勒令退休。“大计”也按“四格”、“六法”。布政使、按察使由该地督抚考核、出具考语；道府州县各官分别由各上司考核、出具考语，层层上报、会核，最后皇帝审批。处理办法同“京察”。“军政”由兵部主持，内容形式与文官考核基本相同，惟“四

格”，八旗为操守、才能、骑射、年龄；绿营为才技、驭兵、年力、给饷。

清朝官员的铨选制度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专制王朝任官制度的成熟。皇帝牢牢把握高级官员的任免、考核大权，吏部及其他部院、地方督抚对中下级官员虽有一定的选官权，却权力分散，互相牵制，最终仍集权于皇帝，对于防止中央权臣结党乱政或封疆大吏拥众割据发挥了一定作用。官缺制因缺授职，杜绝了冗官现象，且既以旗缺保证了满族的主体统治，又以满汉复职缺的制度化，有效实行了满汉联合统治。此外，官员考核制、回避制等亦较前代更为完备细密。弊端是，大量“材具庸下”甚至“目不识丁”的旗人（如嘉庆大学士禄康）凭特权居高位；各部院一职两官，相互推诿，影响了行政效能。同时，大开捐纳、出卖官职，并在实际上将官缺按捞取陋规的多少分为肥缺和瘠缺，将绝大部分肥缺授给旗人和皇帝亲信，对官场腐败起了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

二 基层社会组织结构

清代地方州县是上层政权机构或正规官僚行政机构的最低一级，州县官因之称为“亲民之官”。县以下为基层社会。

清代基层社会主要的构成要素有三大系列社会组织。一是官方出面组织、作为上层统治伸向基层统治触角的里社保甲坊厢系列；二是聚族而居、自然形成的家族宗族乡族系列；三是同样自然形成、互动共生的经济型乡族组织及行业组织系列。这三大系列社会组织或平行，或重叠，或交错，其所处位置及相互关联的方式，反映了清朝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及发展态势。

里社保甲坊厢系列

清代县以下的行政区划，分城市与乡村。

城市行政区划有坊、厢（关）、铺、街、巷（胡同）等。各城城周有按各级规

制、不同长宽厚度的城墙，城开四至八门，门各有名，城外有郭有壕。城内一般自城中十字街分为东西南北四城（或称"隅"、"坊"）。近城之地以东西南北四门为界为四关厢（或单称"关"，单称"厢"），城下近城仍按保甲编组，只是与乡下名称不同：所谓"城中曰坊，近城曰厢，在乡曰里"。坊厢之下是牌、铺、甲，小的城市坊厢之下直接为甲，或村庄、街巷、胡同。从城中的情况看，是"以坊为纲"（"坊"或称"城"、或称"隅"）。坊下有街、有胡同。而组成街道胡同的则是城居的铺户、行户。乡村行政区划，是官方在县以下设置的乡、都、保、庄四级行政区；或乡、都、庄三级行政区；或乡、庄两级行政区，或直达乡、里、村、社的一级行政区。不但级各有差，名称也不相同。处于最基层的"庄"，不一定是自然村，不少是领有诸多自然村的大庄。

城乡行政组织，是由官方出面下令编组的里社保甲坊厢系列。

清代里社"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管摄一里之事……凡十年一周，先后则各以丁粮多寡为次。每里编为一册，册之首总为一图。其里中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带管于百一十户之外，而列图后，名曰畸零"。里长甲首负责调查田粮丁数、编造赋役册籍、催办钱粮。

清代保甲"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若村庄人少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各村保甲筑围栅、建窝铺、出乡兵、巡守稽查、互相救应，近城保甲更有拱卫城市之责，如北京"西山百余村轮守矿洞，大路数十村轮巡窝铺"，"有巡山者，有巡路者"。城中编甲，则"按各街巷之横直长短，单面街挨编，双面街对编"，"自第一家到十一家内以一家择为十家长，以统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保"，每户悬挂门牌。每晚按户出夫，每街市拨派五人为快壮，各带梆锣器械，往来巡逻（城上由营兵负责。起更后，快壮不得上城，营兵不得下城）。各大街小巷都设栅门，定更后，落锁，实行宵禁，有病人等急事，须凭夜行牌（每十家长，官发一面夜行牌）出入。保长甲首负责本保本甲户口、治安、词讼、乡约月讲等。

总之，里社保甲坊厢是官方以人民居住地为基础，令其按一定规则组织起来的自己管理自己基层社会组织，里社的主要职责是编审应役；保甲的主要职责是治安教化。里长保长甲首实际是国家最低级的半官职人员，称为“在官人役”，虽一般由士民公举，但要报官验充，由官方给予“执照”、“委牌”，有的地区加发戳记一颗，以明确其“在官”的身份地位，使其在地方代替官方立言行事。增设里长、甲长，“拟罪与滥设官吏同”。

清初里社保甲并行，互为补充。由于里社是编审应役组织，负有调查田粮丁数、编造赋役册籍、催办钱粮等重要经济职责，因此官方注重里社。自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摊丁入地以后，由于实行只按土地纳税的单一征税标准，人丁编审不再受到国家重视。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朝正式下令停止编审，加之田赋(即地丁钱粮)总额基本固定，里社遂逐渐废弛(一些地区仍保留里甲图甲，主要辅助官府征收地丁、供应差徭。一些地区里社的某些职能、某些具体办事人员逐渐并入了保甲，或归保甲统辖)。而由于赋役制度变化引起人丁户口失控带来的社会动荡，使清官方提高了对负有巡守稽查治安教化等政治军事职责的保甲的重视。他们以强化保甲、推广保甲的做法，重新加强其在基层社会的统治，造成了“唯保甲是赖”的局面。

家族宗族乡族系列

清代同一男性祖先的后裔聚族而居，在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乡村社会极其普遍，从南方江苏、江西、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福建、安徽等地以至于北方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几乎无一例外。一族一姓，上自始迁祖，下至绵远子孙，经数十世，历千百年，不轻去其乡。“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皆傍祖宗坟墓，栉居鳞处。有的是一姓一个村子，有的是一姓几个村子。“一族所居，动辄数百或数十里。即在城中者亦各占一区，无异姓杂处。”这从村名地名往往冠之姓氏，如张家村、李家屯之类，也可说明。一村之中若有杂姓，多不过数个。而且一般往往有亲属关

系，其始迁祖多是姻亲或表亲。清代城镇虽然表面上百业聚集、五方杂处，但在基层却仍是“聚族而居”。很多城镇原来是农村集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升格，有的土著大族成了城镇的基本居民。他们往往本就是“开市者”而拥有集市资产铺屋，或自营工商，或赁铺取租。租赁商铺的主要是外姓或外地人，这些人又聚族而居。如江苏马陆镇有歌谣形容行业的家族色彩：“贸易财源赖布商，铺街老圃业成行。朱家茶食陈家酒，沈氏花行韩氏粮。”聚族而居的人们具有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观念意识（文化、风俗、归属感等）和血缘联系的纽带，成为基层社会家族宗族乡族系列组织的基础。

家族宗族乡族系列中的家族，是以家统族的社会群体组织。或为数世同居共灶的大家庭，或以一个同居共灶大家庭统辖成为附户的族人。家族由家长统理全家族事务。对外，是家族的代表，家族有事，官府惟家长是问；对内，是人格化的家族。家长如君主一样，家族中事无巨细，均由家长主之。家长实际上独占名义归家族共有的全部土地财产，对之具有绝对支配权。家长并有权包办族人的婚姻；有权随意惩戒族人，从杖责、苦役、出族、直到处死，不必族议，全由家长个人说了算。族众则严禁蓄私财，严禁分割、变卖、典当家族土地财产。从起居，到生产、生活，均须依严格的家规。家族在清代社会中所占比例不大。据载，乾隆年间四川万县五世同居的大家族仅为32家。光绪年间湖南五世同居的大家族平均每县仅十余家。社会上仍以小家庭为主体。然很多地区存在、或不断形成着介于家族与宗族组织之间的“核心”式家族。“核心”式家族是家与族的结合，以一个有财有势的乡绅家庭或家族为核心，在其周围形成虽有血缘关系却各家各灶的松散联合。

家族宗族乡族系列中的宗族，是以宗统族的社会群体组织。在聚族而居、各家各灶“家”的基础上，通过“立宗收族”的手段组成。一种是官僚地主或有势力的素封地主自立为宗，向上追附共同的始祖，向下以自己的宗统收族，建立新的宗族组织；一种是在原有血缘宗统的基础上，按照宋以后新的宗族组织原则，通过择立族长等手段，进行宗族组织的新的整合。宗族比家族人口众多，血缘关系复杂。于是便形成“族—房”；“族—支—房”；“始族—

分族—支—房”等组织构成。也有的宗族并非按血统、而是按官职、财势分为房系:“立宗之定法”,为“祖有功,宗有德”。不论辈分嫡庶,有官职、财势即可分房立宗,否则并不分立。不管哪种分法,大宗、长房、长子一系的地位要高些。宗族组织中设有以宗子、族长为首的管理机构。清代宗子、族长一般由“合族公举”。推举的标准是辈分、德能与官爵、财禄相结合。其中后者又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所谓“夫使宗子(族长)无禄,何以收族人,不得爵于朝,何以为族人主?”寒族小姓则只能按辈分、德能综合择举。宗子、族长是族权的代表,首先有主持祖宗祭祀之权。这就使其取得了以祖宗继身名义代祖宗立言行事的权威及重位。对犯有“忤逆奸盗”之罪的族人,得“以祖法加挞罚”,直至随意处死,“无有敢违其言者”。其次,有族内行政、教化、裁判之权。清代各个宗族组织都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族众生子、嫁娶、立嗣、进主,一应涉及宗族户籍的事务,均由宗子、族长主持。往往“索重金而进祠堂”。族人分家及财产继承、买卖、过户,亦由宗子、族长主持、裁决和监督,以防宗族产业流失外姓。宗子、族长并主持乡约月讲义塾等族内教化,定期对族人考核,进行劝惩。凡“孝友节义诸行结积,久日彰著者”,“称祖以旌之,给花红令族人观感”。有“怙恶不悛,显然可摘”者,则“声罪于祠”,停罚义米,“痛责于祠”,直至“削籍出族”。族内发生户婚及田土纠纷,不得径自报官,须先由宗子、族长在祠堂召集族尊当众调解评判,“族中如有不安本分、流入败类者,其父兄不能管束,应邀同族长押入公祠斥责,总以家法处治,冀其自新”。第三,有族内财政大权。各个宗族均有族田等族产,其收入作为祭祀、颁祚、族内救济、义塾、迎神赛会等用,从而成了维系族人的经济基础。族长掌握族产的经营权、分配权,进而获得实际上的所有权。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生存环境较为闭塞的地区,宗族宗子、族长的位权与家族家长等同——独掌财、政大权,公然为政于家,“正不啻南面王也”。凡族人家务巨细,必先关白,令行禁止,有“喝水断流”之喻。宗子、族长之下,有两套管理机构,一套是依宗族构成产生的房长、户长系统;一套是直属宗子、族长的宗族管理系统。他们各司其职,在族长指挥下,司掌族中公共事务。如清代

浙江舟山吴氏、清溪徐氏等都由宗长一人、宗孙一人、房长四人组成领导机构。其下由负责德行教化的四名宗正、判断族内是非曲直的四名宗直、专管催办的四名宗使、掌管田产的八名宗理、负责礼仪的八名宗礼、掌握书记账目的四名掌书组成具体办事的职能机构。宗族组织建有祠堂。有了祠堂，祖宗神灵有所凭依，"宗法、谱法与夫冠婚丧祭之礼行之有地"，因此，祠堂成为"成家世守之本"、宗族组织与族权的象征。祠堂非一族一座，有始祖祠、分支祖祠、大宗祠、小宗祠等。有的宗族祠堂数量达数十座之多。如湖南醴陵清代三千人以上的93个宗族共建祠堂603个，其中丁氏一族即建有祠堂77座。宗族组织有在国家法律之外的宗族法——族规，又称家法、族范等；用以规范族人的思想行为、调整族人的相互关系。所谓"宗之有规，犹国之有法也"。其基本内容是维护纲常伦理和宗族统治，特别突出强调族人要遵纪守法，作忠臣顺民、孝子贤孙。宗族组织有族田等族产。清代族田数量之大，使当时文人留下了族田义庄"几遍天下"、"几遍宇内"的记载。族田来源有立宗者建置、留传；族人捐置；集资买置，分家时家长抽留"口香田"等。族田原则上禁止典卖，并避免与族人发生租佃关系。族田租税是宗族公共活动的物质基础。祭祀、饮福等宗族活动的所需费用主要来自族田租税。此外，部分族田租税用于族中救济和族内教育、文化活动。族田收入从经济上将族众维系在宗族周围。

家族宗族乡族系列中的乡族，是各家族宗族为实现共同利益和目的（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而形成的联合组织。如政治军事类乡族有乡约、堡团等组织。精神文化类乡族有各地星罗棋布的书院、义学、文会、祀孔会、关帝会、香会等组织。经济类乡族以下单述。乡族组织的组成方式有联族、联姓、联姻、联村、联籍等。联族，一般是通过续族谱，将分处地方的同姓族支联合起来。如地处长江两岸湖南湖北交界处的一个个郑氏宗族，虽仅相距数十里，却400多年没有往来，直到康熙六十年（1721）方"捧谱合一"，以各自始迁祖为兄弟而联合起来，成为拥有三祠六关、具有相当势力的乡族组织。这里，是否均有血缘关系值得怀疑，因旧谱中"断档"的情况很多，各

郑姓“自能指明为旧谱某人之后”，并非难事，然以联族方式组成乡族组织，对地处商业通衢的他们来说，其意义和作用可想而知。联姓，主要指异姓联合，即异姓通过“合谱”，建立类似血缘宗族的关系。首先是承祧。宗族为了维护血缘的纯洁性，一般严禁异姓乱宗，对于外姓过继承祧往往予以严禁。但由于生存环境限制，社会上存在着大量无子女家庭(婴儿存活率低或晚婚未育)和无力娶妇之人，另外还有生女未生男的家庭。为了家族延续，实际上收养过继关系极其普遍。特别是入清以后，“抱养者比比也”，“鬻义子得以入祠”，“族中人也不以乱宗为嫌”。很多家族(尤其是广东福建等地)为了壮大各自的势力，并不以养子为忌，甚至在族规中明确了养子在家族中继承财产的权利和地位。承祧收养继承关系的存在和被认可，使异姓合谱多了一条途径及理由。一些异姓上述祖先的这种关系而合谱合族，也不被认为是非礼非法。如《杨王氏宗谱》中记载，因杨氏始祖幼年出祧王氏，两姓联为一族。其次是入赘。一般约定初生之男从母族，在生之男从父族；或生时从母姓，死后从父姓等。这样，因入赘两姓、数姓合为一宗的十分普遍。如漳州萧氏祖先入赘诏安叶氏，生三子，而其岳父原入赘钟氏，于是以三子承祧萧、叶、钟三姓。后三姓联为一族。第三是改姓联宗。历史上有因避难而令子弟隐名埋姓迁徙他方，后世又联宗合谱之事。希图以这种缘由联谱的各姓宗族往往说其祖上有类似的传奇故事。然上溯多过于遥远，如姜太公、神农氏等，这就使人怀疑是人为比附。第四合姓联宗。出于功利目的异姓合为一姓。如康熙年间福建屯田归县，漳州诏安军户共尊关帝为始祖，立户名“关世贤”，东山县军户合立一户“关永茂”，并于神前拈阄，分为7房，“小事则归房料理，大事则会众均担”。联姻，是各个族姓通过联姻形成的乡族联合体。小说《红楼梦》中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家娶了“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的史家的贾母；贾政、贾琏娶了“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的王家的王夫人及王熙凤；王夫人之妹嫁与了“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薛宝钗后又与贾宝玉成婚。“四家皆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成为地方上左右官府、横行乡里的强大势力。

联村(乡),属地域性联合,有联本村的,有联数村的(当然构成联合组织的各个子组织,仍是各姓各族)。一般以“会”、“约”的形式出现。“会”、“约”的核心事务是各村各族共同的祭祀,多由参加在内的各村各族出田出钱,轮流值年,同时取得该联合组织中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共同祭祀之外,这些组织兼而负责各村庄治安联防、协调各宗族利益冲突、维持当地教化风俗等,由于其在治安、司法、教育方面的作用,实质上成为村落联合自治组织。村落联合的乡族组织有的十分庞大,具有强大的社会控制力。以最为普遍的祭祀组织为例。如浙江奉化西坞镇供奉圣姑庙的“上灯会”,由72村组成,依次轮流负责办会祭祀,18~30年轮一次,领袖是有5000户3万人以上的西坞邬氏宗族。日本学者田仲一成指出这种构成“是一种社会制度”,应该说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联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地缘性的同乡组织,多称会馆。会馆一般由各省募捐在各地公立,包括馆舍、租地(有的有铺面)、义冢等设施。为侨寓该地本省同乡的官绅提供聚会栖止之地,为旅居该地本省同乡的应试士子及候选官吏等提供帮助和方便(临时寓所等)。另一种是在较大的范围内,为着一定的功利目的,以地域为区分的联合。如广东、福建土籍客籍大械斗中土籍、客籍的分别联合等。

经济类乡族组织和行业组织系列

经济类乡族组织和行业组织系列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是清朝经济发达、形成两类(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三层市场(基层、地区、全国)网络的结果。经济型乡族组织中社会救济性质的乡族有共同经营的社仓、义田。社仓清代虽由官方出面组织,却主要是由各姓共同经营。义田则往往是以一大姓为首、各姓参加、共同经营的形式。救济性质的乡族组织有各种善会善堂,包括普济堂、养济院、育婴堂、栖留所、恤嫠局、义冢、救生局、义渡会等组织。这些组织民办的不用说,即官办之中,实际上也多是官倡民办,各姓族绅集资,共推首事,共同管理。联合经营性质的乡族有共营水利、共营墟市码头、

共营贸易等组织。

经济类乡族组织有虚拟血缘联合、数族联合控制等不同形式。

虚拟血缘联合在手工业市镇佛山十分典型。佛山实际是各个宗族控制着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巨族控制主要行业铁冶业；寒族控制次要行业铁冶、陶冶的某一工序、某一关键技术。为了协调矛盾，也为了组织共同的防御、生产活动、交易活动及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各个宗族以玄武大帝作为共同的祖先，以灵应祠作为共同的大宗祠，称为“祖庙”。建立了凌驾各宗族组织之上的乡族组织。祖庙常设议事、决策机构为“大魁堂”，成员由各族族绅、耆老及工商大贾组成，负责“劝诱德业，纠绳愆过，风励流俗，维持世教”，祖庙拥有尝产、义仓、铺舍、武装（忠义营），领导地方政治、经济和公益事业。所谓“事由斯会议决，地方公益其款亦从是拨出”。除了灵应祠“祖庙”外，佛山有八图28铺80甲，乾隆时各族各姓又特别另建了八图祖庙——“赞翼堂”。

一族或数族联合控制在社会救济、共同经营的乡族组织中都较常见。如鄱阳湖最大的圩堤之一古山圩，长3200丈，围田6030亩，由胡、陈、张、段四姓共修共管；如方泰镇由“气象兴隆、树叶蕃衍”的陈严两姓创市，此两姓“以猗顿之术起家，为一镇领袖，一镇化之”；江西吴城码头、河口码头分别为八大姓所垄断等。这类组织最终综合发挥治安教化、维持市场秩序、协调物价及各宗族利益冲突等作用，成为地方自治组织。

行业组织则由各行、各业聚居的本地及侨寓工商者组成，有各种名称，如会馆、公所、公会、公墅、书院、堂、宫、殿、庙、行、帮等。其中最为普遍的名称是会馆和公所。

行业组织包括地缘性的同业组织、业缘性的同业组织、地缘性的多行业组织等。地缘性的同业组织为同乡同业工商业者组织，早期主要为同乡同业商帮所建，即所谓“货行会馆”，又称“行馆”，为同乡商人聚会议事、统一价格行规、居住存货的所在，兼为同乡同业之人提供帮助。业缘性的同业组织为同行业工商业者组织，主要是本地同行业组织。也有不拘地域的同行业组织。但其内部也还是分为各地帮，如上海弹棉业公所向有本帮与客帮之

分;汉口木作公所有文帮(汉阳籍)、武帮(武昌籍);茶业六帮公所有广东、山西、湖南、湖北、江西、江南六帮等。值得注意的是,同业组织中出现了工匠组织,最早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苏州踹匠王德建立的踹匠公所。乾隆年间丝织业有机匠组织西家行同东家行对立;佛山帽绫业也有西家会馆与东家会馆之分。地缘性的多行业组织是各行业同乡商人都参加的组织。如上海的浙绍公所,是乾隆初年在上海贸易、立有铺户的绍兴商绅所建,其中包括钱庄、银店、炭栈、碗店、豆行等商。又如北京的临汾会馆、金华会馆,汉口的徽州会馆、福建会馆、江浙会馆、山陕西会馆等。这些组织不涉及具体的行业事务,早期只是同乡会性质,后期则向商会性质发展。行业组织有共同信仰的行业神,有众商集资(或募捐或合资)兴办的公所、馆舍以祭祀、聚会、集议、存货、借寓,集资购买土地以供经费或作义冢,有共同遵守的行规,有从上层首事(又称董事)、值年、值月、司事、司役到下层行长、帮头的独立的组织系统,有维护同业利益、促进和控制同业经营(包括齐行定员、定酬;产销定点、定价等)、解决同业纠纷、实施同业互助互济、进行与其他社会组织及官府的交涉等功能。

三　双重统治格局与地方精英

双重统治格局

在中国这样拥有广大国土的地方,君主制中央集权行政的实际状态只能极为粗放。与"国有"、"私有"双重土地所有制相适应,中国传统社会自古便存在着家国网络的特点,存在着国与家的双重统治结构。唐宋以后,地主经济在较为彻底的意义上成为传统社会经济总合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领主经济则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传统社会原本是在"家"与"国"的相互依赖、相互斗争及利益调整下波浪式前进。至此,"国",逐渐放弃了与"家"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转而依靠"家"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统治,从以法家

"治理模式"为主,到以儒家"控制模式"为主。其标志至少可以举出:经济上均田制与大地主庄园制的终结及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地的实施;政治上,九品中正制的废止及科举制的实行。经过宋元明清数百年的发展,到19世纪最终形成了三大系列基层社会组织纵横依赖、士绅官僚上下流动的双重统治秩序和政治格局。

在这种双重统治秩序和格局中,国家政权统治、行政机构仅止于县。县以下基层社会,由具有强烈自治色彩的家族、宗族、乡族等组织系列(里社保甲与行会等亦均以家族、宗族等实体组成)在行政司法、经济活动、精神生活等方面,成为国家末端政权的补充,起到所谓"结构—功能替代物"的作用。在这里,"公"与"私"、"国"与"家"、"专制"与"自治"相互连接,基层社会实体组织不是国家直接统治的"非自立的存在",也不是独立于国家之外、如同欧洲"市民社会"、"公共领域"那样与国家对立的自治的"秩序空间",而是同国家上层政权以"共同社会性"与"利益社会性"持有共同秩序观念、对立统一的一个整体。费正清曾说:"中华帝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进而他解释:"政府统治的活动可以区别为两类:一类是往下只到地方县一级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活动,另一类是由各地缙绅之家进行领导和施加影响的非正规的网状系统的活动。""地方长官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该地惟一代表。这种表面地位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长官只有在与当地士绅头面人物的密切合作下,才能做他的工作。"

清代国家行政最低一级的县只设知县等二三名官员,多数县只有一名七品知县和一名不入流的典史在治理县事。这与其所辖广袤的地域、众多的人口(一县人口少则十数万多则数百万人)无论如何不相适应。驻军也少而分散,县城守汛通常只有二三十名绿营兵弁,还要分防县以下津关险要市镇码头遍设的汛塘。分防后,小汛只有1~6人,守城兵少的不到10人。如安徽颍上县,城守汛额兵共30名。城墙3857丈,约7714个垛口,平均每兵要守约257个垛口或约129丈城墙。而这30名兵中,还要经常分出26名马战守兵驻防八里垛汛等4汛塘。这与其所管辖基层社会广袤的地域、众多

的人口，无论如何不相适应。只能倚赖基层社会各组织。

基层社会各组织纵横交错，将民众牢牢控制在里社、保甲、家族、宗族、乡族、行业组织之中。人之善恶虽谬巧，未有能“遁其宗族”、遁其生活生产的社会组织。基层社会组织管理民众，是以父兄治子弟、以邻里、同业相纠察，故“用力简，核实精，而收效速”。在尊礼守法、完粮纳赋，安民缉盗、防卫治安的地方两件大事上，基层社会组织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维护了国家统治和社会基础的稳定。基层社会各实体组织除了平时守望相助，战时结寨自保外，实际担负着保卫地方甚至守御城池的职责。国家规定城守责任者主要不是经制正规军，绿营军兵力部署与行政机构设置一样极其薄弱粗疏，城守的责任者是负责民政的守土官。而守土官只有地方统治的“表面地位”，于城守御“贼”无能为力，只能是与各族族绅共议守城，借助乡兵的力量退敌，否则便只有“缒城而出”。正所谓“战阵属兵，守城属百姓”。守土官所依靠的城守力量是以士绅为长副、从保甲中编派的丁壮，当时称为“勇”。守城需有粮饷支持。战时的兵员给养，以人岁食米3石5斗计，千军至少需3500石，这些粮饷均摊派于民。非但如此，即国家正规军的军饷也要靠基层社会的捐输。如司法诉讼，民众不准直接告官，须先通过宗族、乡族仲裁；地方上一应事务，从文教仓储、水利赈济到道路津梁、社会保障，几乎全部是代表各基层社会组织的族绅、邑绅主持，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上层政权统治对基层社会各实体组织次级统治的依赖。

而基层社会各组织也须依赖共同服从的上层政权。他们信奉、推崇朱熹“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理论，将天下国家视为一“局”：“天子以天下为局，诸侯以一国为局，士大夫以一乡一邑为局。散之为千万局者，合之则一局也”，无不主动向上寻求官府的管辖和认可：家规、族规乡约、行规等均需呈官批准、钤印勒石方为有效，各种公产等均需报官存案、立户领契、交纳赋税方为合法。如嘉庆年间桐城祝氏宗族以“国有律法，所以整饬朝纲；家有规条，所以约束户众”订立家规，呈县请批。县批文有“祝姓户族人等知悉，尔等务须入孝出弟、崇俭斥华、修读朴耕，安分守业，听从户尊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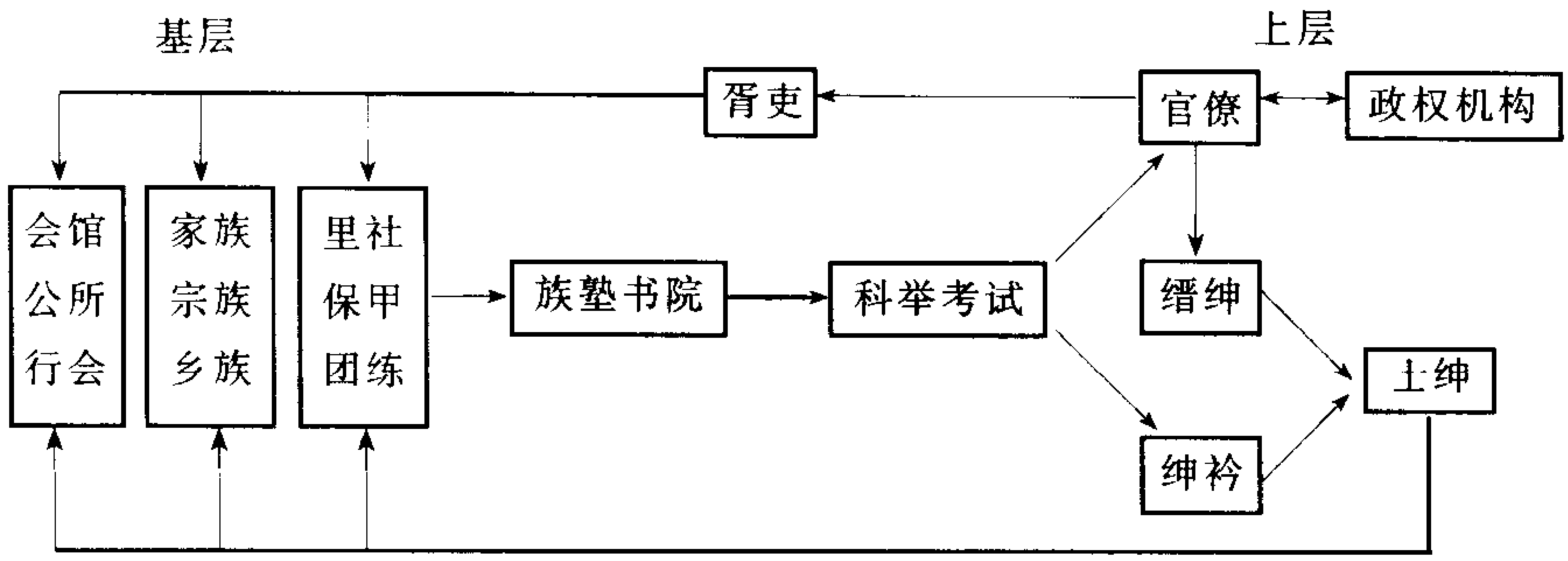
等开列规条,共相遵守。如有不遵约束者许该户长据实指名赴县具禀,以凭惩治",赋予祝氏家规以法律效力——如不服从家规,便是犯罪,便要受到官府惩治。祝氏家规也就正式成为国家政权和司法的补充,可合法地按家规"以刑威"惩治族人了。乡族组织由各族各姓组成,其地方行事,似乎更需得到上层政权统治机构承认的合法地位。明代官方确立的城隍祭祀制度比照现世同级衙门,最下一层为县城隍,称为"某县城隍之神"。而各地除"有府城隍会,有县城隍会",还有镇、铺城隍会等祭祀性乡族组织。这一方面反映出基层社会乡族组织控制下市镇发展和自治的倾向,一方面也反映出基层社会乡族组织将自己置于省、府、州、县各级行政序列下层的愿望和认识。

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阶层

地方精英是基层社会各组织领袖,或地方上具有崇高威望、惟其马首是瞻的人物。有学者以为,"晚清以来,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沟通领域或交涉领域中,原来稳定的、控制局面的、平衡国家与社会的同质的绅士阶层让位于相互冲突的、缺乏共同信念的、破坏国家与社会原有关系的异质的'地方精英'"。这里的"地方精英",特指包括传统绅士、绅商、商人、军事家、教育家和土匪首领等在内的各种所谓"职能性精英(functionalelite)"。而"地方精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清朝,特别是19世纪中晚期的"地方精英"可能不仅仅属于士绅阶层;但士绅阶层的人却一定是"地方精英"。

士绅阶层由缙绅与绅衿两部分人组成。缙绅,指在职、非在职(包括乞假、病休、丁忧、终养、致仕等)官员,缙绅的"缙",即为代表官员身份的绶带;绅衿,指有功名而未仕之人,绅衿的"衿",则是士子专用袍服的圆领。清代士绅阶层在双重统治结构中的走向如下图:

由于儒学化的考试内容和取士标准,执著于科考做官漫长旅途的知识分子,其思想信仰从根本上与国家保持高度的统一,终被培育成进则为官、退则为绅,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在统一思想信仰指导下发挥



作用的士绅阶层。这样的一个阶层，在基层社会成为各系列组织的领袖，保证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统治的实现，保证了基层社会在尊礼守法、完粮纳赋，安民缉盗、防卫治安，文教学校、民俗教化，水利仓储、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按照国家要求正常运行运转。可以看到，在上层政权与基层社会对立统一体现为双重统治的中国传统社会，科举制、官僚流转制培育出来、具有双重身份的士绅阶层发挥着上下连接的作用。

然而，上层政权与基层社会组织的"对立统一"，不单包括"统一"，还包括"对立"。起上下连接的作用的士绅阶层具有双重身份。在基层社会民众眼中，作为在职非在职官员、作为有功名和有特殊身份的人，士绅阶层代表的是国家（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上层政权统治者眼中，作为家族宗族乡族组织的领袖、作为自保自治、公益事业倡导者和兴办者、至少作为因普及儒学教育或识文断字而在基层享有威望的地方精英，士绅阶层代表的是地方。事实上，在清朝特别是清朝中期以后的双重统治秩序和政治格局中，"国"的力量正在逐渐消退，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家族、宗族、乡族的力量正在逐渐加强，士绅的作用更加受到普遍关注。当然，这些现象，还存在于整体上尚"稳定"、"均衡"的框架之中。

思考题：

试述清朝前中期国家政权的运行体制。

参考书目：

1. 杨树藩：《清代中央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 年。

2. 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 2001 年。

3. 张研：《清代社会的慢变量——从清代基层社会组织看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演变趋势》，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第六讲

关于清朝人口与经济问题的思考

清朝人口问题的提出

清朝经济的发展

人口对策与政策

对清代人口与经济问题的几点思考性归纳

一　清朝人口问题的提出

清朝人口的迅速膨胀

清朝经济经过清初的恢复发展，迅速飙升，在康乾之世臻于鼎盛。清朝人口则随之迅速膨胀。

康熙晚年在西征南巡对民间的实地考察和朝野关于米价上涨的持久争议中，愈来愈感受到了人口问题的压力，陷入了对人口问题的忧虑，曾多次

说：本朝自统一以来，于今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为了缓和人口压力，也为了彻底摸清人口数量，康熙甚至下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说：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查明，另造清册题报。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统治者提出人口问题的第一人。他的子孙雍正、乾隆也将人口问题当做一块心病，时时提挂于口，萦绕于怀。雍正常说：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增，何以为业？乾隆曾谕：现今海宇户口繁滋，难以数计，如各省粮价，有增无减，即可为滋生繁庶之征，况人数既多，自地无遗利，安得复有未辟之旷土，广为耕种升科？

事实上，清朝人口数字也确实惊人。18世纪末，乾隆帝曾通谕全国，说他阅读康熙实录，得知康熙四十九年(1710)民数为23312300余丁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3亿多口。3亿余比2300余万，增加了15倍多。晚清薛福成由此得出结论：清代户口蕃衍"实中国数千年来所未有"。的确，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数字。这一数字较之前历史最高水平明末清初的1.5～2亿人，增加了0.5～1倍。然而，明末清初的数字是"丁"非"口"，社会史、人口史学家按1丁比4口、比5口、比6口等比例推算得来，又由于"人丁"数不仅不是人口数，而且也不是承担赋税的成年男子数，只不过是"赋税单位"，因此这种推算很难说确凿有据。那么，是否便可由此怀疑清朝人口的迅速膨胀呢？否。清乾隆六年(1741)首次以保甲门牌统计全国人口；三十七年(1772)永停编审，实现了由编丁到计口的变化。保甲计口应该说接近于实际人口数。既如此，便可从乾隆六年(1741)起算。乾隆六年(1741)，全国大小男妇人口1.43亿；二十七年(1762)为2.04亿；五十五年(1790)突破3亿，50年人口翻番1倍半，到道光十四年(1834)，全国大小男妇人口已达4亿多。而回溯前朝，从西汉末的5900余万到明末的1.5亿，人口同样翻番1

倍半，却经历了1650年的漫长历程。可见，用“人口大爆炸”，诠释人们看到这一旷古奇观时的惊诧错愕感觉，是无论如何也不过分的。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

但是，人口的绝对数字与人口增长速度本身，并不构成人口问题。人口成为问题，是人口与人赖以生存的资源之间出现了失衡，人口数量超过了社会经济承载力，超过了特定时间特定地区由一定资源条件支持的人口容量，也就是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人口过剩”。从这一意义上说，康熙及其子孙所提出而忧虑的人口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早在战国时期，韩非子便曾指出人口与资源失衡的严重问题。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妇女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人民少而财有余……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改革家们则尝试具体解决人口与资源失衡的问题。商鞅按良田约占土地4/10估算，方圆百里之地适配食作人口五万；管仲实行四民分业定居及书社制(按社登记户口)，强调城乡人口、军民人口的比例，认为“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如比例失调，则“国贫民饥”。其后的千数百年，提出并清醒认识这一问题的思想家大有人在。唐朝白居易提出“生业相固，食力相济”的命题，认为人口与土地应该保持均衡；王梵志则一反“多子多孙多福寿”的传统，以“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省得分田宅，无人横煎蹙”的大实话，表达了对人口与资源问题的朴素认识。北宋苏轼认为是人口分布不均破坏了人口与资源的平衡，他说：地无变迁而民有聚散。聚则争于不足之中；散则弃于有余之外。因而应该“去狭就广”，“分闽广以实荆楚”，均衡人口分布。元末明初刘基认为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造成了人口与资源相对的不平衡。他说：“古人盗天地，利源不可穷”，“今人盗农夫，岁暮山泽空”！明中后期，人们愈益感觉到人口与资源失衡造成的压力。宋应星疾呼：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

池中之鱼耳。冯梦龙感叹: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徐光启以明朝皇族人口为例算了一笔细账:洪武年间皇族人口58人,30年后的永乐年间增加到127人;隆庆年间皇族人口已达2.8万人,30年后的万历年间更增加到6.2万人。而后忧心忡忡地指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戈而不得减"(18世纪时洪亮吉、19世纪时汪士铎也都有过人口30年增1倍的说法)。这比马尔萨斯25年增1倍的观点早了170年。

而清以前千数百年中人口时涨时落、螺旋式上升的轨迹,则明明白白展现出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人口发展与人口过剩、人口衰减交互出现的历史事实。

中国古代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全国性人口统计数字,是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2)的记录,为5900余万人。经过长达10年的绿林赤眉起义及两汉王朝鼎革,到东汉初人口锐减一半以上,为2100余万人。东汉后期桓帝永寿三年(157),人口恢复到5600余万人。接下来的120多年间爆发了黄巾起义,同时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到西晋初人口骤降五分之四,为1600余万人。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全国人口再度回升到4600余万人。然隋末瓦岗寨、河北窦建德、江南杜德威农民起义后,唐初人口再度骤减四分之三,为1000万人。唐玄宗天宝四年(755),全国人口达5200余万人。不久安史之乱,人口又降五分之四,为1600余万人。北宋经过经济恢复,到徽宗大观四年(1110),仅男丁即达4600万人。然靖康之耻(1127)后,南宋高宗检视户口,只剩下1600万人。南宋经济迅速繁荣,光宗绍熙四年(1193),全国人口攀升到7600余万人。其后经过元朝,明朝册籍人口保持在五六千万。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明清王朝鼎革。到清初顺治十二年(1655),册籍人口再次降到了1400余万。如前所述,由于户口统计的目的、方法、对象和实质,官方册籍人口特别是所谓"人丁户口",并不能代表实在的人口。社会史人口史专家多以为十二三世纪宋元之时中国人口已超过了1亿,以后在17世纪前半叶的明末清初又出现了一个人口高峰期,按推测最低数字接近

1 亿，最高数字达到 2 亿，适中的推测是 1.5 亿。

以上所举人口增减的大波动，表面上均为王朝鼎革、兴衰隆替所至。尤其人口锐减，无一不在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的“大兵”，水旱灾荒的“大灾”、“大饥”之后。然究其深层原因，则是人口与资源、人口总量与社会经济承载力的严重失衡。失衡的直接后果，则是出现了大量无以为生、无力与灾害抗衡、最终往往被逼上梁山、铤而走险的“过剩人口”。“大兵”、“大灾”、王朝鼎革发生前后，史籍关于此类人间惨剧的记载比比皆是、触目惊心。如，西汉末年“百姓财竭力尽……饿死于道，以百万数”。东汉末年“冀州人相食，豫州饥饿而死者十有四五”，“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隋朝末年，“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掬为茂草”，百姓诸物食尽，“乃自相食”。明朝末年“人相食，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

人口与资源、人口总量与社会经济承载力的平衡，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为人口总量及人口增长的速度；一为社会资源、财富的多寡及社会资源、财富的分配。当资源、经济相对稳定时，人口增长的速度越快，人口总量越多，消费量越大，特定时间特定地区由一定资源条件支持的人口容量越小，社会经济承载力就越低。一旦人口总量超出人口容量，便出现了人口过剩。反之，则人口容量大，社会经济承载力高。当人口、经济相对稳定时，社会财富、资源分配越合理，特定时间特定地区由一定资源条件支持的人口容量越大，社会经济承载力越高。反之，则人口容量小，社会经济承载力低，而形成相对的人口过剩。而事实上，二者是在负面上齐头并进、推波助澜的。经济稳定发展时，人口增长的速度肯定越来越快，人口总量、消费量肯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官僚地主肯定要剥削、要兼并，社会财富、资源分配肯定越来越不合理，于是，不管是人口过剩还是相对的人口过剩，几乎注定会周期性地出现人口与资源、人口总量与社会经济承载力失衡的“人口问题”。

从人口与资源之间出现失衡构成人口问题的角度出发，康熙帝及其子孙耿耿于怀的“人口问题”，在当初几乎还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他们对矛

盾的两个方面——人口及以土地为主的资源，均没有真正做到心中有数。

清代赋役性质的人口统计与土地统计

康熙帝及其子孙并没有搞清人口与资源这样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代人口统计与土地统计的赋役性质，使得官方册籍上的人口土地数字与实在的人口土地数字完全成了两码事。

清代官方册籍载有“户”、“丁”(前期多不记口)，然此处的“户”、“丁”与自然状态下实际的户口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清代官方册籍的“户”，是官方赖以实现赋税征收的一个环节；是人民通过在其中定粮纳赋、获得官方承认的合法社会地位与合法土地所有权的一个阶梯，类似于合法营业的执照、户头。“户”不是“家”，有的“户”因田而立，可以一田一户，分别立户纳粮；可以多田一户，将多田合立一户纳粮；也可以一田多户，将一田分装各户纳粮。有的“户”，因丁而立，“以丁抵户”，有多少丁就有多少户。有的“户”是综合丁银田赋的纳税单位。于是“户”名往往不是真实的户主姓名。有的户名甚至从明万历年间到清末一直不变。分家不分户，一户实际是一族。清代官方册籍的“丁”，也不是实在的人丁。有的地区清朝丁额与明朝丁额完全相同，上百年不变。有的地区虽有增丁却奇少，平均每年仅增一丁、零点几丁，而且趋势是越来越少。编丁的方法则有按人编丁即“丁随丁派”，按每个人的财产决定负担的丁银，财产多的可能一人编三丁，财产少的可能数人编一丁；按田计丁即“丁随地派”，规定多少地亩派一丁的丁银，有多少地编多少丁；按粮计丁即“丁从米起”。其方法与按田计丁类似，只是丁银载体由土地变为田赋——以一定数量的田赋折算为“丁”。如此，清代乾隆保甲计口以前的“人丁编审”并不是户口统计，也并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式的查户计口，确切地说，只是丁银的编派。其步骤：首先确立明万历年间赋税额为“原额”，然后依照“原额”编订“赋税全书”，再对照“赋税全书”，编户籍“黄册”，以上述不同的方法将丁银编派下去，实现赋税的征收。于是“人丁户

口”数字之后常有余数，如××丁零半丁；××丁零×石×斗×升；××丁零×两×钱×分；××丁零×亩×分×厘。这样的丁数口数显然不是实在的人口数字。

清代官方册籍中的“土地”称为“税亩”、“额田”、“粮田”、“册田”、“田税”等，与“户”、“丁”的情况类似，同样不是实在的田亩。出于赋役征收的目的，清代“税亩”的统计与编丁一样，步骤是：先确立“原额”，然后编订“赋税全书”，再编土地“鱼鳞图册”，将田赋编派下去，实现赋税的征收。具体方法并非是依据全面的“履亩清丈”，而是以原额老册为准，按图索骥，以册对田，间或有不清者或无原册者，方才举行清丈。清丈的原则是既不能超出原额，也不能少于原额，因为前者伤农，后者亏税。而从赋役的角度出发，又出现了“折亩”的问题。由于土地高下肥瘠不一，产量相差极其悬殊，为均平赋役、划一起征，一般要对瘠地进行“折亩”。或扩大丈量的弓口、增加弓步；或者以数亩地折算一标准亩。而对那些肥腴富庶、原额本高、税亩额往往超过实在亩额的传统重赋区，由于人多地少、地占有细碎复杂，转换频繁，且移丘换段、诡寄飞洒等弊病历代相沿，因此一般缩小弓口，使实在亩额符合税亩亩额，一方面保证赋役征收，一方面便于管理和均平赋役。“折亩”又有“以无折有”、“以多折少”。“以无折有”是将有水面庄稼的“塘”折为地亩；“以多折少”是以三六九等的多田则折为少田则；以地、山、荡（塘）等多地种统折为田等一则起科。这些都增加了税亩数字的复杂性。清代土地数字本有以下理由应该大于明代。1. 清代实行有效管理的版图（包括东北、西北、西南等广大区域）远远超过明代。2. 清代雍正摊丁入地，实行以地亩为单一纳税标准的赋役制度，较之以人丁、地亩为双重纳税标准赋役制度的明代，应对土地数字给予更多的重视。3. 清代奖励垦荒的政策优厚且长期。明代垦荒三年起科，清代垦荒六年、七年乃至十年起科，且以垦荒制定了任官和官吏的考成制度。而清代长期大规模的开荒垦荒运动，特别是所谓“湖广填四川”，“四方填湖广”，“出口闯关东”等超省际移民垦荒以及东北、西北、西南辽阔边疆的开发，其规模和数量不仅远胜于明代，即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

绝无仅有。4. 清中期以后需要土地资源养活的人口有了史无前例的增长。然而，清代各朝册载土地总数，除了雍正二年(1724)890万顷(仅实录所载，其他官书均少于此数)和光绪十三年(1887)910～920万顷之外，全都没有超过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850万顷和万历三十年(1602)的1160万顷。有清一代除了康熙一朝土地数字增长较快，雍正二年(1724)到同治十二年(1873)近150年间，土地总数一直在750～790万顷之间徘徊。而光绪十三年(1887)910～920万顷，较之同治十二年(1873)779万顷，仅仅14年便增加了150万余顷，则更说明了清朝册载土地数字失之过低。

应该说，康熙、乾隆都曾下大决心和大气力想要搞清人口与资源这样一个矛盾两个方面的问题。为摸清人口实情，康熙实行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实行了永停编审、以保甲计口。但他们仍然未能对人口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康熙乃至乾隆过早断言天下已"无不耕之田"，"无不毛之地"，没有看到当时清代传统生存方式中的主要资源——土地，尚有余地养活、包容更多的人口，而这正是清代人口增长持续攀高、经久不衰的基本条件。前述通谕全国、薛福成也曾征引过乾隆有关人口增长的谕旨，更混淆了康熙年间的"丁"与乾隆永停编审后的"口"的概念，以"口"比"丁"，形成了对当时人口的错误估计。之所以如此，除了传统的惯性、因循的弊病继续影响人口统计的准确性，使包括乾隆帝在内的人们的头脑转不过弯以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康熙、雍正、乾隆等未能透彻认识世界正在发展变化的经济格局及中国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未能透彻认识清朝也在发展变化的经济格局，以老眼光看新问题，以传统思路认识和处理新的经济问题。

二　清朝经济的发展

对于物价持续上涨的困惑

康熙等是从物价问题感受到人口压力的。

清代物价的上涨始于康熙晚年。天下最富庶的苏南一带，米价自康熙四十六年(1707)大旱从每升七文涨至二十四文之后，虽仍随丰歉涨落，但不再复归原价。雍正时期及乾隆初年，每升常价在十余文左右。乾隆二十年(1755)苏南虫荒，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的米价长到了三十五六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年丰收，价渐复旧，然每升常价也只恢复到十四五文。五十年(1785)苏南大旱，每升长到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无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这是身历乾、嘉、道三朝的江苏金匮(今无锡市)人钱泳所记，他看到一百年中苏南米价上涨了大约3倍有余。比钱泳年纪稍长且同为苏南人的洪亮吉做了印证，在乾隆末年回忆道，50年前其祖、父之时，每升米不过六七钱，每丈布不过三四十钱，如今每升米须三四十钱，每丈布须一二百钱。江西米价上涨的比例大致相同，“康熙年间稻谷登场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四五钱”，乾隆年间“则必需五六钱”。四川米价原本亦极贱，“雍正八九年间，每石尚止四五钱”，乾隆时则动辄即达一两以上，最贱亦八九钱。贵州的情况类似，雍正四年(1726)，“京斗米一石不过四钱五分及五钱有零”，乾隆以后“丰收之年亦须七八九钱一石，岁歉即至一两一二钱至二两不等”。除米价上涨外，乾隆时湖南巡抚杨锡绂奏称田价“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二十余两”；山东巡抚阿里衮奏称“凡布帛丝棉之属靡不加昂”；两江总督尹继善奏称“年来百物腾涌”，“无不价增”。乾隆末年浙江人汪辉祖亦提到“往年专贵在米，今则鱼虾蔬果无一不贵”。可知清代米价上涨，并不如以往的“丰则贱，歉则贵”，而是持续上涨，居高不下；清代物价问题，并不限于米谷，而是百物腾贵，无不价增，这被当时人们视为千古罕见的奇观。

康熙五十二年(1713)风调雨顺，不仅“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是丰收的大好年成，然米价仍居高不下，康熙无从解释，最终把物价非常规上涨的原因归诸人口加增——“皆由人多地少故耳”。

雍正也注意到米价的非常规上涨，雍正五年(1727)有谕：近年以来，各处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过数处州县，米价却仍觉渐贵，闽广之间颇有

不敷之虞。他在探究米价上涨缘由时，顺着乃父康熙的思路，同样将之归诸人口加增，认为“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价昂，此亦理之必然者也”。

乾隆年间，米价腾贵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命各省督抚陈奏米贵原因和对策。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在反复斟酌和思考：商贩贱买贵卖，价格可能暂时上涨，“何至连岁递增，有长无落”？若谓囤积居奇，应是造成米价腾贵的原因，然此属地方官力所能禁，“何至全不奉行，任其垄断累民，而督抚漫无觉察，竟无一实力严禁、著有成效者”？若谓户口繁滋，则自康熙年间以来休养生息，米价从那时便该逐渐加增，“何独至今日而一时顿长”？若谓水旱偏灾，则过去也都有，“何以从来未闻如此之贵，且亦当歉者贵而丰者贱，又何至到处皆然，丰歉无别”？若谓康熙年间仓储有银无米，雍正年间虽经整饬尚未详备，今则处处积贮、年年采买，民间所出，半入仓庾，未免致妨民食，“此说似乎切近”。在他看来，“商贩流通”、“囤户居奇”、“户口繁滋”、“水旱偏灾”等理由都不足以解释米价何以连岁递增、有涨无落，即使“仓谷采买”较为“切近”，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最后只能无可奈何地表示：“朕反覆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处之方”。

清史专家郭成康先生说，乾隆帝已开始把米贵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现象加以考虑。他的思索、他对当时关于米贵种种说法的辩诘，对于深入探究物价持续上涨的尚未被人认识的奥秘极富启发意义。遗憾的是，这次持续一年多的官方高层有关“米贵”的论议，并没有提出新鲜的见解，大多数督抚在覆奏时仍把米价持续上涨归因于“生齿日繁”以及官方采买过多、风俗日奢、米谷出洋等方面。乾隆帝的困惑未能解决，只好认可其父祖对米贵之由的解释。他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写了一首题为“民数谷数”的诗：“谷数较于初践祚，增才十分一倍就。民数增乃二十倍，固幸太平滋生富。以二十倍食一倍，谷价踊贵理非谬。谷贵因之诸物贵，何怪近利居奇售。”

应该说，康熙、雍正、乾隆对物价持续上涨原因的思考过于简单。他们没有脱出“天下无不食米之人，米价既长，凡物价夫工之类，莫不准此递加”

的思维定式，没有洞察到世界经济格局和中国经济格局发生的变化，忽略了白银内流等金融货币方面更为重要的因素，从而在尚未成为问题的人口之上，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与困惑。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人口增长并不是物价持续上涨的惟一原因。换言之，物价持续上涨并不一定说明人口成为了问题。18世纪末来华的英国人斯当东当时即明确指出：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的原因是"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认为："乾隆时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是美洲的低价白银流入中国。"他反对将人口增长与物价上涨机械相连，以康熙年间为例说："康熙乃清代的盛朝，政简费轻，人口的增加率应当是很大的，而米价却很平稳，可见人口增加对于白银购买力的影响不大。"

如果将经济全球化看做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那么，早在产业革命的风暴到来之前，便存在着多边贸易关系及世界范围内从供求出发而自然分工的全球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以发达的经济（包括西方无法望之项背的总产值与人均产值、人均消费水平、内外贸易）、一流的商品（包括西方无法与之竞争的品种、质量、数量及低廉的生产成本）处于这一世界经济格局的中心，发挥着主导作用。航海大发现以后，欧洲人获得了美洲的白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世界经济格局的道路，但如贡德·弗兰克所云："在1500年以后的三个世纪里，他们一直是一个小角色，而且不得不适应——而不是制定！——亚洲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亚洲人在世界经济中仍然是成功的竞争者。"即便从科学、技术上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与当时欧洲相比，也往往是"技高一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长期处于有利的出超地位，数以亿计的美洲白银外国银元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以至许多历史学家"把中国描写成吸引全世界白银的唧筒"。

清朝实行白银、制钱二品法定货币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与钱相

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官方规定的银钱比价为白银一两兑钱千文。白银大量内流,银多钱少,势必引起银钱比价的变化。为平抑钱价,官方大幅度增加了制钱的投放量。直属中央户工两部的宝泉宝源两京局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铸钱3.4亿~4.6亿文,18世纪中叶以后每年铸钱约14亿文,较前增加了2~3倍。各省局铸钱增长更快,从前期“旋开旋停”、较少开铸,到18世纪中叶以后每年共约铸钱17~19亿文。京省各局年铸钱共保持在30亿文以上。按官方规定的银钱比价,其价值恰与同一时期进口的白银相抵。清朝决策者尽管不了解物价与货币的关系,在探讨物价居高不下时往往简单地用人口繁滋等非货币因素加以解释。但并不妨碍他们运用货币手段去调控物价,事实上,正是由于他们有意识地在白银内流的同时不断增加制钱的投放量,方维持了银钱比价的基本稳定,保证了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运行。而官方干预银钱比价的结果竟使银钱数量攀比上升、银钱俱贱、粮食百物俱贵,则是清朝决策者始料不及的。

设想如若没有包括白银和制钱在内的货币的足够支持,物价虽不会出现持续上涨的局面,所付出的代价却很可能是“康乾盛世”的黯然失色;康熙初期银钱俱紧,物价极贱而经济萧条即为明证。从这一意义上讲,物价持续上涨,正是乾隆盛世经济繁荣的重要表征之一。换言之,支持康乾盛世经济繁荣的充足资金,造成康雍乾时期物价持续上涨的原因,均与经济全球化的当时的现状、进程和发展有关。

经济全国化的形成

物价问题在康乾之际成了困扰统治者、使朝野上下为之瞩目的重大问题,这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可知,从当时物价问题应该感受到的,并不仅仅是人口的压力。

首先,物价,特别是米价成为全国性的严重问题,说明有更多的人口同市场特别是粮食市场发生了关系。

其时手工业生产飞速发展。以丝织织机为例，乾隆中期苏州达 1 万余张，方圆 25 里的盛泽达 8 千余张，杭州达 3 千余张，湖州达 4 千余张等。

经济发展先进地区工商业的繁荣使非农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游食之民日以辐辏，若士宦，若工商……至数千万”，“小民不以地著为安”，“生之者十三，食之者十七”。大批非农业人口家无隔宿之粮，“仰籴而食”。甚有粮船数日不到，路有饿殍。如杭州，“仰籴而食者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如汉口，“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消米谷不下数千(石)”。

粮食生产的收益较种植经济作物和经营手工业的收益要低，这使得更多的农民从粮食生产转向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种植和相关的手工业生产。从而粮食严重缺乏，特别是专业化的经济作物种植区，粮食不能自给，相当部分依靠市场供应。如松江府种稻之地只占 1/3，“每年口粮全赖客商贩运”，商品粮需求量空前增长，上海县康熙年间每年从关外运进大豆小麦达 1000 余万石。苏州府“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浙江杭州每年所需客米三四千万石。“福建之米取给于台湾、浙江；广东之米取给广西、江西、湖广；而江浙之米取给于江西、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重庆、湘潭、衡阳、汉口等地均成了著名的粮食集散地，还出现了大规模运售粮食乃至军粮的巨商。

与此同时，随着清代赋税内容与赋税制度发生的变化，原国家征调的物资进入市场，布帛及地方特产基本停征或改征折色银。原作为实物税征收的粮食进入市场，雍正“摊丁入地”后，除数百万运往京师的漕粮外，基本实现了赋税的货币化。其后，漕米改征折色，大致完成了赋税货币化的过程。而清代赋税非但征收货币，还规定一两以上必须交纳银两。乾隆年间又曾一度将银两起征点降到一钱。将粮食货币(铜钱)化，再将铜钱银两化的过程，只能是进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换的过程。

其次，“钱贵谷贱百物贵”、“钱贱谷贵百物贱”的传统观点被“银钱数量攀比上升、银钱俱贱、粮食百物俱贵”的现实所取代，说明以粮食为中介自产

自销的简单商品交换,已经在某些地区、某种程度上由商人在各级市场网络中操作的商品流通所取代;粮食不再具有通货的性质,在商品流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只有作为法定货币的白银与铜钱。

第三,形成了两类(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三层(全国性、区域性、农村集市性)市场和全国性的市场网络。其标志是:1. 跨地区乃至全国性的商品流通。金陵绸缎销售“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降,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趋淮泗、道汝洛”;松江棉布有冀北、陇东西、海关内外“挟资千亿”的巨商“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专程前来购销;绵竹竹纸遍销本省“五道百五十余县”,并远销“云、贵、陕、甘、湖广”等,举不胜举。商品粮也加入了远程运销的行列。吴承明先生曾归纳了 9 条主要的商品粮运销商路,他认为,清代长途运销的粮食占商品粮总数的 21.6%。2. 全国性商业交通网的发达。清代凡能用于商业交通的内河水道基本上都得到了开发利用。据估计,清代内河航程达 5 万公里,海运航程达 1 万公里。以北京为中心,勾连全国商业交通网,形成了 6 条主要水陆联运线。西南、西北、塞北、东北等许多过去不通舟车的地方都密布着商人的足迹。3. 中心价格的形成。清代主要商品的价格趋于一致。如乾隆时常年粮价,江苏地区平价米谷每石 1.1~1.2 两、中价 1.5~1.6 两、贵价 2 两以上;湖广地区米每石 1.4~2 两;江西地区米每仓石 1.5~2.3 两;山西地区(平阳、汾州、蒲州、太原、潞安、泽州等府)米麦每石 1.5~2 两;山东地区(兖州、泰安)粟米每仓石 1.4~1.8两;甘肃地区上色(粟米小麦豌豆)每石 2 两,下色(青稞大豆)每石 1.2 两等。各地间隔成百上千里,粮价却相差不多,除了官府以平粜等手段进行的政策调节外,主要是市场调节的作用——“谷贱则商籴至,则其价必增”,“谷贵则商贩至,则其价必减”。

在这样的前提下,清代形成了整体上粗略自然分工的全国化经济。

如安徽。经过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进入康乾盛世以后,安徽同各地一样被纳入了两类三层全国性的市场网络。即便是人们印象中经济最为

落后的皖北，其商业实际发达的程度也不让皖中皖南。皖北沿淮河及其支流的水陆商道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繁荣的市镇，捻军发祥地雉河集即是襟带二州一县、水运发达的商业中心，集上有晋商的字号和会馆，也有本地大姓开的买卖，所谓“南王北马势力大，大桥头上数郑家”。而清朝在皖北凤阳、皖南芜湖两处设立榷关(税关)，分别征收淮河、长江商运航道上的货物通行税，两关征收的关税均较明代开关之初增加了几倍，凤阳户关实际征收关税更在芜湖户关以上。皖北，其与皖中、皖南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均不相同，却与皖中、皖南一样，都曾有过传统意义上农工商并举的局面。皖北丝织等手工业生产发达，亳州等地丝织品列唐朝一等。然而，在康乾盛世由全国市场网络形成而带动的经济全国化背景下，三个地区最终打破了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完成了粗略的整体分工。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文化传承上代表北方的皖北依平原优势，成为单一的传统农业区，民人“不知纺织”，“妇女常牵犊荷锄，与男子杂作”，衣用等物绝大多数仰赖市场；代表南方的皖南，棚民滥种玉米等高产作物，未能解决民食问题，反而破坏了生态环境，终被驱逐，仍是传统商业及商业拉动的经济作物种植、手工业生产发挥经济主导作用；代表亦南亦北中间地区的皖中，既有稻麦兼作的巢湖平原、沿江平原，又有开发为梯田的丘陵山地，既有经济作物又有手工业矿业，则属多样化经营。三个地区的经济格局并非一成不变、各自孤立、互不相干，其人力与资源在反反复复的配置中，互相渗透、交换，各种经济共存互补，形成了有机联系的共同体。

安徽的情况具有代表性。早期近代化产业亦称“飞地经济”集中的沿江沿海地区，不单单是本地区内形成了一些原料成品生产分工细化、环环紧扣、彼此横向依赖有机联系的专业区，而且与其他农工兼有地区、传统农业为主地区、农牧兼有地区即所谓经济发展呈梯形状的各个地区，均存在互补相依的有机关系。换言之，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不管是传统经济为主还是近代经济为主，均在两类三层市场网络中联成了一体。

从物价问题应该感受到的上述三点，均不能说明当时人口的增长已成

为了问题。相反，在中国处于世界经济的大格局中，在清代经济深刻的发展变化中，表现出来的是人口与资源的反复配置，是人口发展逆反传统的积极走向与新的活力；是昭示着资源包容与吸纳大量人口的条条生路。

三　人口对策与政策

人口运动的共性

然而，清代人口终于成为了问题。原因仍然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口的膨胀。清代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辽阔疆域，中央集权政治空前强化；康雍乾百余年间国泰民安，社会长期稳定，既没有发生大规模内战，也永远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及“摊丁入地”政策，减少了人丁的隐匿，助长了人口的繁衍；官方推行的垦荒政策收到实效，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特别是传统农业区之外的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区的土地大量辟为良田；美洲高产作物玉米、番薯等在内地广泛引种；手工业、矿冶业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和地区产业分工的扩大，使商品经济达到新的水平；加之 17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世界气温回升适宜农业平稳发展，诸种因素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清代人口的增长。可以说，清代人口增长与诸因素的关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如风助火势、火壮风威。然在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绝大多数地区仍以传统生存方式为主的清代，经济发展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不能保持与人口增长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承载力，人口增长势必突破社会经济承载力的临界点。一方面是资源的有限。人们赖以生存、以土地为中心的资源毕竟有限，而传统社会固有的弊病——土地兼并、吏治败坏、贪赃枉法等造成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更使有限的资源相对于大多数人口匮乏到了极点。于是人口过剩的问题，一次又一次，以诸如绵延十数载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期间大兵、大灾的人间惨剧形式表现出来，膨胀的人口，也被强行从 3 亿、4 亿调节到 2 亿。

在中国人口盈缩增减的同时，世界人口也在盈缩增减。将中国放在世界的大背景中考察，人们不能不惊叹，中国人口与整个世界人口发展的节奏竟大致相同。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将此称为人口运动的“共时性”，他以猜测的口吻说：“似乎整个人类都服从同一宇宙的命运。”

如何看待人口的发展呢？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曾形象地说：“上帝给人一张口，也给人一双手。”手能干活，口需吃饭。一方面是生产，一方面是消费。人口的增长，使得中国与世界具有更多的生产能力；人口的增长，使得中国与世界的消费需求随之增长。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在一定范围内刺激着生产的发展、土地的垦辟、技术的革新。于是，中国历史上国以人口众多为富，家以人丁兴旺为福；西方则流传着一句古老而热情洋溢的箴言：生殖吧！繁衍吧！让人口充满大地！然而，如若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可以得到的资源，则即成为足可引起社会恐慌、造成社会动荡的严重问题。事实上，人口与资源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历史上，中国与世界都曾面临过严重的人口问题，都须对空前的人口压力作出反应。布罗代尔指出：“从十五到十八世纪，一切都随人口的增加或减少而变化。如果人口增长了，生产和交换就会增加；在荒地、树林、沼泽或高山的边缘地带的种植业就会发展；手工工场就会兴旺；村庄和城市——特别是城市——的规模就会变大；流动人口会增多。人口增长的压力越大，人们作出的建设性反应也越多，这是无声的命令。”随着人口的空前增长，“人们同占有的地域、拥有的资源的关系也发生变化”；“过重的人口负荷往往会——在过去始终会——超过社会的食物供应能力”；人口在增长过程中要跨过几个“临界域”，“每跨过一次，它的全部结构都势必改组”，而结构重组，使人口与资源、劳动力与就业机会达到新的平衡，其传统的途径无非是：1. 开垦更多的土地；2. 高产作物的推广，土地丰力的提高；3. 经济作物的种植，手工业的发展；4. 向外扩张、开拓疆土；5. 移民和殖民等。最后，在上述均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则借暴乱、战争、饥荒和瘟疫之手，消灭过剩人口，强行调节。于是幸存者有大片荒地可供支配，“树木和野兽侵入过去欣欣向荣的乡村”。但是，“人很快又

大量繁衍，夺回被野兽、荒草侵占的家园，清除耕地中的石块，铲除大小树木。人口增长又成为负担，再次制造出贫困……”单调的历史重新开始，计时器的沙漏倒转过来。“人只是在片刻间得到幸福，等他刚刚醒悟过来，已经为时太晚了。”这些，布罗代尔称之为“在十八世纪以前纯属老生常谈的道理”。

中国历史上人口发展的轨迹，正是循着这些“老生常谈的道理”。而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的轨迹，则还要周期性地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关系，从这一侧面解决相对的人口过剩问题。每一王朝之始大兵大灾之后，昔日摩肩接踵的城镇、人烟稠密的乡村，被残垣断壁、人迹罕见、满目榛莽的凄凉景象所取代。而国家掌握了可供支配的大片荒地，招民垦荒、吸纳人口、发展自耕农经济、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人民获得了可滋生存的以土地为中心的资源，人口发展获得了可重新起步的余地和空间。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人口很快大量繁衍，人口的增长又成为社会问题。同时地主兼并土地，大批自耕农破产。国家掌握的人口土地锐减而税源枯竭，于是浮收增赋，恶性循环，进一步推动更多的自耕农破产。破产的自耕农挤压了佃农，地主得以“铲佃增租”，佃农也随之破产。破产的农民涌入城镇，使原已人满为患、原已失衡的非农业人口与有限资源的关系更加恶化；涌入山林，形成了无以为生、名副其实作为“过剩人口”的流民大军。如明朝中叶，土地兼并、农民破产、财政枯竭、赋役加重恶性循环已十分严重，天顺、成化年间，扶老携幼、露宿荒野、辗转千百里的流民大军达一二百万户。社会经济从窒息发展到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统治者无法控制人口的增长，然此时总会出现改革家，企图以调整社会财富分配关系的办法，解决或缓和“过剩人口”的问题。王莽、王安石、张居正……莫不如是。然而他们不可能成功也无一成功。因为首先，社会体制及统治集团的利益决定了他们调整不动社会财富的分配关系；其次，到此时再调整为时已晚。暴乱、战争、饥荒、瘟疫……计时器的沙漏倒转。人口锐减、人口发展、人口过剩交互出现的历史重新开始。

人口对策与政策

人口对策与人口政策应该有所区别。这一点从字面上也可看出。对策，是较为被动较为传统、“水来土掩”式的对应之策。“政策”则较为主动，体现了站在事物发展的潮流之前，起宏观导引作用的政治眼光和政治行为。

从人口史的角度看，各个王朝伊始的招民垦荒、休养生息、均田均役、重农桑兴水利等发展保护自耕农经济的政策，以及中后期的改革改良、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的尝试（如王莽的“王田”、“五均六莞”；王安石的“方田均税”、“代役”、“青苗”；张居正的“清丈土地”、“一条鞭法”等）均可归为人口对策。

清代，由于康熙大帝的敏感和错觉，在人口尚不能说已成为问题的时候，便出台了一系列解决人口问题的措施，不自觉地站在了事物发展的潮流之前。那么这些措施是对策还是政策呢？

18世纪，清朝最终形成了以垦荒为中心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

这一思路的核心，在于“但垦不问”，“藏富于民”。康熙帝以“今天下户口甚繁，地无弃土……安得有如许未垦之田?”反对地方官报垦。对已垦荒田，则以“朕意国用已足”为由，“不事加征”。乾隆帝降谕禁止虚报开垦，并载入《大清律例》：“各省丈量田亩及抑勒首报垦田之事，永行禁止，违者以违制论。”法律明文禁止清丈，意味着默认以往隐漏的地亩；明文禁止抑勒报垦，则势必对新垦田土升科起税取宽容态度。也就是说，在大体能够维持“田地正赋既有定额”的前提下，清统治者并非欲借垦荒增益国赋，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以现有土地养活日益繁衍的人民之上。如乾隆帝所言：“现今海宇户口繁滋，难以数计，如各省粮价，有增无减，即可为滋生繁庶之征，况人数既多，自地无遗利，安得复有未辟之旷土，广为耕种升科？若求可垦之地，则惟新疆乌鲁木齐等处，地土沃衍，尚可召徕屯垦，至于内地开垦一说，则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即或濒河沿海之区间有东坍西涨，其数甚微，只须地方官查明照例妥办”。在这种情况下，内地各省均

无将“未辟之旷土,广为耕种升科”之例。即使偶有内地省份奏报大面积垦荒,乾隆帝亦往往以种种理由搁置不问。至于内地及边省新垦零星田土,官方更明令概免升科。乾隆五年(1740)七月谕称:“则壤成赋,固有常经,但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亦当筹画变通之计”,“嗣后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悉听本地民夷垦种,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各督抚遵旨定议具奏本省具体实施细则,经户部覆准实施。这一思路的基础在于,一方面民间大量隐匿土地的历史传统,为消化剩余人口留下了余地;一方面黄河、长江中上游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区及广袤的边疆地区有待于农业开发。

这一思路的实施,影响深远。一方面更为充分地开辟了自然资源。内地和边省的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区以及沙坦洲荡、山头地角等零星弃土得以大量辟为耕地,与人口向边远地区的大规模流移,玉米、番薯等美洲高产作物的广泛引种这两股潮流相汇合,对于缓解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从国家与人民的角度调整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制约了官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全国实际耕地亩数与官方册籍上的纳税亩数之间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尽管实际耕地亩数与人口增长的进程同步,但在官方据以征课田赋的“田土”数字上却得不到反映。康、乾二帝“令小民于正供之外,留一分赢余”的“藏富于民”的初衷大体成为事实。当然,由此而导致占全国岁入六七成以上的田赋长期徘徊在2900万两上下,负面影响亦不可低估,这则属另一个话题了。

清代人口对策评价

围绕以垦荒为中心即从传统农业生存方式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清廷还曾实行或议论过“井田”、“限田”、“禁奢”、“禁酒曲”等措施。雍正初为解决“八旗生计”,曾在直隶固安、霸州等县试行“井田”,每旗户给田125亩,其中12.5亩为公田,12.5亩为庐舍场圃,100亩为私田,公田尽收尽报。这种

企图回复三代“井田制”的试验很快便以失败告终。井田制既行不通，乾隆初又有“限田”之议。乾隆二年(1737)、七年(1742)、八年(1743)均有大吏奏请限制富者田产，引起上层激烈争论。秦汉以后井田、均田、限田史不绝书。清朝为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缓解人口压力而出台的井田试验和限田争议，显然打着传统的烙印。乾隆帝明确指出，若“拘执古制，均其田亩，限其服制，必致贫者未富而富者先贫，扰累纷纷，适以酿乱”，“断不可行，断不能行！”表明他认为井田、限田的传统做法不能解决现实人口问题的鲜明态度。“崇俭去奢”是农业社会的传统思想。清朝发生了变化。当时有人把道理讲得很透彻：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江苏巡抚陈宏谋禁妇女入寺烧香，结果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只得弛禁。苏州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不如听之。有诗云，“人言荡子销金窟，我道贫民觅食乡”，真仁者之言也。所谓：“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朴，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乾隆帝晚年明确反对用行政法律手段遏制由俭入奢的自然之势。他认为，与其徒劳无功地倡导崇俭去奢，不如听任富人侈肆消费，或许反对贫民生计有所裨益。解决人口压力，一方面要开源，一方面要节流。清代饮酒普遍，烧酒耗粮，每岁耗谷达千数百万石，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康熙、雍正两帝均有禁酒举措，但效果甚微。至乾隆二年(1737)始有严禁北五省烧锅之令。然烧锅之禁在清统治上层引起了旷日之久的激烈争论。反对一方从现实情况出发，将烧锅视为“开源”、视为民众新的生业，认为利大于弊而反对严禁。实质上反映了新的经济思想。乾隆帝虽认为严禁一方“言之成理而行之了无实际”，但也没有支持全面弛禁，而采取了折中的办法：由地方官方发给烧锅户牙帖，将烧酒业置于官府控制之下。除此之外，清朝缓解人口压力的做法还有“开禁南洋”、“解除矿禁”等。可看出清官府在人口压力最重之地进行疏导的各种尝试。总之，康熙晚年人口问题初现端倪，但几乎整个18世纪并未构成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乾隆君臣积极探索缓解人口压力的各

种方案，对传统社会经济思想予以重新审视，表现出有所突破的新的征象。然而具体的实施，仍未突破传统的以垦荒为中心解决人口问题的框架。

康熙帝乃至雍正帝、乾隆帝虽然站在了事物发展的潮流之前，但却是由于对当时世界与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缺乏足够的认识、循着传统思路产生了错觉、不自觉地站在了事物发展的潮流之前。他们解决人口压力的措施仍是传统的，并没有那种站在历史发展潮流之前起宏观导引作用的政治眼光和政治行为，因而仍只能算是对策。

这种对策，与18世纪世界各国面临人口压力所作出的反应并无二致。18世纪整个人类似均处于人口猛增的阶段。面对人口压力，世界各国（包括工业革命摇篮英法等国在内）仿佛循着惯性，均拿出了几乎相同的传统的人口对策。以垦荒为例。18世纪成为全球性的土地开发时期。欧洲、美洲、亚洲各国都进行了国土开发，“向空闲的或一半空闲的地带移民”。显然，清朝以垦荒为中心的人口对策同世界各国面临人口压力作出的反应具有共性。然而，18世纪的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国人口的发展终归展现出各自的特性。随着产业革命的深入，欧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从根本上影响着需求方式、生存方式改变，也影响到新的人口政策的出台。产业革命使发展比较早、比较快、规模比较大的西欧城市成为吸纳人口渊薮，“增加的出生人数”“始终不能满足增长着的对劳动力的需要”。这样，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便在生存需求和国家法令（这里实际是宏观引导性的人口政策）驱使下，被城市吸纳为劳动力。18世纪末，英国的劳动力增加到580万，超过总人口的一半，19世纪最初十年，又猛增到1835万人以上，英国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比例也从1800年的5.8%上升为1910年的9.2%。同一时期，法国的劳动力从1300万人增加到2070万人；意大利的劳动力从870万人增加到1640万人；比利时的劳动力从145万人增加到323万人。这些庞大的新劳动力刺激了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的发展，同时引起的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又推动了农业革命，直接提高了产量，使农业生产也得到极大的发展。于是，西欧摆脱了所谓“旧生态体系的束缚”，

走出了人口周期性膨胀→衰减→膨胀→衰减的怪圈，自1750年以后，人口直线上升，“不再有倒退”。

面对人口问题，清朝从中国国情出发，适时地制定并实施了以垦荒为中心、诸如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劝农力田、推广高产作物以及放宽人口流移等促进经济增长、缓解人口压力的对策。其基点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土地资源的潜力，从而养活前所未有的庞大的人口。其结果使成倍增长的人口与大幅度增加的垦田相结合，把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提到了空前的高度。由此而推动了全国性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中国经济地理格局更趋完善，其影响至为深远。这种人口对策与持续百余年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央和地方行政效能的加强，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观念等有利于人口繁衍的诸多因素相互结合、彼此促进，使清朝人口更加迅速膨胀，成为中国数千年所仅见，并超过了世界人口增长率。然而，相对西欧人口1750年以后“不再有倒退”，清朝人口在18世纪末，便出现了第一次下滑，随后，则是一次又一次“计时器的漏斗倒转”。总之，以垦荒为中心的人口对策在取得巨大成就之时，已埋下了清朝人口增长陷于困境的隐患。

四　对清代人口与经济问题的几点思考性归纳

知己知彼

纵观中国历史与清朝历史，人口发展的历程——人口锐减、人口发展、人口过剩交互出现，说到底是人口与资源的关系问题。如前述，人口与资源、人口总量与社会经济承载力的平衡，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为人口总量及人口增长的速度；一为社会资源、财富的多寡及其分配。当资源、经济相对稳定时，人口增长的速度越快、人口总量越多消费量越大，特定时间特定地区由一定资源条件支持的人口容量越小，社会经济承载力越低。一旦人口总量超出人口容量，便出现了人口过剩。反之，则人口容量大，社会经济

承载力高。当人口、经济相对稳定时，社会财富、资源分配越合理，特定时间特定地区由一定资源条件支持的人口容量越大，社会经济承载力越高。反之，则人口容量小，社会经济承载力低，而形成相对的人口过剩。

人口与资源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关键要把握人口增长突破社会经济承载力的"度"，也就是所谓"临界域"。而把握这一"度"、这一"临界域"的前提，则是需要知己知彼，分别透彻地认识人口与资源。

中国历史上赋役性质的编审制度，使人口、土地数字成了两本糊涂账，一直糊涂了数千年。清朝自康熙帝起便认为"地无弃土"，到乾隆帝更以为"无不耕之土"、"无不毛之地"，孰知其间却包容了二三亿人口的出生，若不知主要是大量非在册的实际地亩预留了人口增长的余地，定会错误地估计有限资源的人口容量，对人口膨胀掉以轻心，其结果何等凶险。

而即便取消了赋役性质的编审制度，对人口与资源透彻认识、达到知己知彼，也非易事。人口随时处于变动之中；资源亦并非静止——经济发展、生产率提高，使其人口容量扩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使其人口容量缩小。因此，必须明确目的，保持清醒的头脑，方能了然于心。

增长与发展

谋求人口与资源的平衡时，立足点应主要站在资源一方，又主要以"发展"，以新的经济、新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为人口发展开辟新的活路。而不应主要站在人口一方，于事无补地忧虑烦恼、叹息牢骚，束手无策地将希望寄托在借暴乱、战争、饥荒和瘟疫之手消灭过剩人口之上。资源一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优于所谓的"增长"。仅仅"增长"，没有出路，几千年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均未突破周期性膨胀→衰减→膨胀→衰减的怪圈。要想计时器的沙漏不再倒转，只有"发展"。

这一点，旧时代代表新经济的思想家看得很清楚：在发展的前提下，人口增长有益无害。法国重商主义代表人物波丁(1530—1586)告诫："永远不

要忧惧人民数目的过多。”早期资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配第(1623—1687)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母。”由于有分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稠密地区的经济发展快于人口稀少地区”;“有800万人口的国家比面积相同而只有400万人口的国家,其富裕程度不止一倍。”

有了“发展”的眼光,方能制定和实施适宜的人口政策。人口跟着“发展”走。“发展”有阶段性,任何阶段的“发展”都有一定限度,于是人口只能以“有限发展”的尺度适度增长;“发展”有全新的思想及科技含量,于是人口必须适应“发展”的要求,优生优育,提高自身的素质。

世界及中国人口思想史上有三位影响了几代人的大师,都姓马,人们戏称为“三匹马”。他们是18世纪德国的马克思、英国的马尔萨斯和当代中国的马寅初。马寅初在中国人口从5亿多增长到6亿多的时候,于1957年发表了《新人口论》,提出了“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的理论。他认为:“人口多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多、资金少”这一矛盾。主张通过国家政策干预实行计划生育,将人口纳入政府计划。马寅初的观点遭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当时大多数人的批判,被斥为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气魄恢宏又具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从发展的角度对中国人口持乐观态度——中国有的是人和资源。他兴致勃勃、极富鼓动性地说:“除了党的领导以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不到50年的功夫,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已达12亿余。用传统眼光看,人多,是富裕繁荣经济发达的标志,中国历史上多数时期如此;用现代眼光看,建国后,中国没有出现计时器沙漏的倒转,中国在“发展”。中国的“发展”吸纳、养活并将继续吸纳、养活成亿多出来的人口。毛泽东错批马寅初的问题在于,他没有看到“发展”的阶段性和有限性,没有认识到人口应在“发展有限”的制约下适度增长,一不小心使人口基数增大了数亿,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沉重负担。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使很多国家望尘莫及,但人均指标却与之相差甚远。“发展”的钟摆很可能将带不动越来越

重的人口负担，而由慢到停。这种前景不容乐观。马尔萨斯对人口发展持绝对悲观的态度。他提出了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两种“抑制”和三个“命题”。他认为“食”与“性”的欲望是人类存在的两个“公理”，必然促使更多的人口出生；人口增长按2、4、8……的几何级数，食物增长则因“土地肥力递减律”按1、2、3……的算术级数，人口的增长永远大于食物的增长。要恢复人与食物的平衡须采取“积极”和“预防”两种“抑制”。“积极抑制”是以幼儿营养不良、疾病、灾荒、战争、饥饿等手段提高死亡率，消灭过剩人口；“预防抑制”则为避孕及晚婚晚育。之后，他提出了三个结论性的“命题”：一、人口必然受生活资料的限制；二、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随着生活资料的增长而增长；三、各种抑制保持同一水平，均可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由此得出贫困和罪恶等社会问题是由人口增加超过了生活资料增加的结果，进而认为穷人不应生育子女。除了避孕及晚婚晚育给人以启发，马尔萨斯的问题在于：首先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社会资源、财富分配对人口与资源比例的影响，成为剥削阶级的辩护士和吹鼓手；其次他解决人口与资源矛盾问题的立足点主要是站在人口一方，从根本上是被动、消极的态度；再次，他考虑的是传统的“增长”而不是“发展”，因而最终成为历史的反动。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两类。物质资料生产通过劳动来完成，人口生产通过生育来完成。但两种生产必须相互适应。生产方式对人口发展起决定作用。人口过剩和工人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人口要有计划地发展。人口问题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正是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努力发展经济、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在解决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的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历史包袱是沉重的，瞻望前途，任重道远。对清朝人口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可鉴古知今，更为自觉地正视、对待和解决当前的人口问题。

总之，“经济增长”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数量叠加式的提高；“经济发展”则意味着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涉及生活水平、科技教育、社会保

障、社会秩序等各个方面整体性、结构性、质的变化。应该明确,“增长”与“发展”并非泾渭分明。“增长”之中有“发展”,“发展”之中有“增长”。“增长”与“发展”不可能截然分开。在出现不可再生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日趋恶化、贫困益深益广等社会现象为特征的“无发展增长”之前,即便本质上属于“增长”的经济增长中,也应该包含涉及生活水平、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社会秩序等方面整体优化的“发展”因素。清代物价实际反映了清代经济中的积极走向与新的活力;反映了“增长”与“发展”不是对立的因素,而是紧密相连、对立统一的因素,“增长”中存在着“发展”和社会进步。清统治者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将之完全归结为人口问题,未能采取“政策”而采取了传统的对策,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边际效益递减”与“资源配置劣化”辨析

社会经济前进还是衰退,最终取决于人口与资源配置的优劣。不少人接受或敬畏如下说法: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有效性表明其边际效益率大致相等,一方面因不能从再配置中得到好处而没有重新配置资源的动力;一方面因劳动边际产品降为零,再增加劳动投入不再增产而边际效益递减。这应该是对清代人口与经济认识的一个误区。

“边际效益”是引进经济学的一个术语。一些人津津乐道或人云亦云以之阐释和论证清代传统社会经济的衰落时,甚至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概念的实际内容。

“边际”学说早在1862—1873年由三位经济学界新人:英国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法国瓦尔拉斯分别提出,于20世纪逐渐发展成为“边际主义”。“边际效用”、“边际产量”、“边际成本”、“边际效益”、“边际报酬”、“边际替代率”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所谓“边际”概念,以及由此而发生的“边际分析”,也即成为经济学中最为常见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边际”学说和“边际”分析方法被陆续活用到与经济发展相

关的各个领域,包括近数十年的清代经济史研究领域。

那么,什么是"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呢?所谓"边际",即是边缘。在一个连续增加的量中,最后新增加的量就是"边际"量。边际学派的理论基础是反劳动价值论的主观价值论,亦即所谓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他们认为,商品价值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表示人对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主观感觉。比如吃饺子,吃30个为最大食量。吃到的最后一个——第30个饺子便是边际量。边际量可以理解为最后一个单位变量所带来的新的因变量的变化,对吃饺子来说,就是所吃的最后一个饺子所带来的感觉上的变化。一个饥饿的人出钱买饺子吃,每多买多吃一个饺子,便给他带来更为愉悦的欲望上的满足。但超过了第30个饺子,带来感觉的便非愉悦的了。如果第35个饺子是他吃掉的最后一个,作为边际量的第35个饺子给他带来的感觉,则是自第30个饺子以后愉悦程度递减的感觉。这便是"边际效益递减"。在消费领域,在生产领域,边际学说认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当把一种可变的生产要素投入到一种或几种不变的生产要素中时,最初这种生产要素的增加会使产量增加,但当它的增加超过一定限度时,增加的产量将要递减,最终还会使产量绝对减少。换言之,在财力与物力资源固定不变的前提下,连续增加的人力资源的投入所带来的新的效益,在初始阶段不断上升,但是当达到一定值之后,效益不但不会上升,反而呈现递减的规律。如盖房子,10个人盖一座房子用20天,20个人盖一座相同的房子用10天,30个人可能用7天。但若说100个人盖一座相同的房子用1天,1万个人盖一座相同的房子用1分钟,则属谬说。

以"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阐释18、19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从人口暴涨、人力资源投入过剩出发,貌似有理,实际存在很大的问题。"边际效益递减"理论的前提,是一个假设、虚拟的空间。生产在假设不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函数虚拟黑箱企业中进行,假设、虚拟的黑箱企业使用被称为资本和劳动的"生产要素"制造产品,并按计算出来的对总产品所增加的贡献(即边际产品)向每一要素付酬。如果一切正常进行,企业所付出的酬金

总数则刚好等于企业实际获得的净收入。在这一过程中,资本获得利润,劳动获得工资,两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由它们的边际生产力即它们的有用性和稀缺性所决定,也可以说由它们的供需比例所决定。如果把资源(在传统社会以土地为主)视为资本,把人口视为劳动,那么,判断人力资源(劳动)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效益是增加还是减少,有一个重要条件,便是其他生产要素不变。"边际效益递减",是在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和投入结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投入达到一定界限时才会发生的现象。然而,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包括十八九世纪的清代历史,没有这样的条件。清代官方册籍土地、人口数字的赋役性质,使之并非等于实际的土地、人口。以官方册籍土地数字除以官方册籍人口数字得出人均占有土地的做法不合乎清史乃至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实际。同样,将官方册籍土地数字将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设为不变,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合乎清史乃至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实际。人口(劳动)投入超过一定界限引起"边际效益递减"的条件,除假设其他生产要素(以土地为主)投入的数量不变以外,还假设投入结构不变。持"边际效益递减"观的人们以为: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有效性表明其边际效益率大致相等,传统农民因不能从再配置中得到好处而没有重新配置资源的动力。这种假设仍然不符合清史乃至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事实。在中国传统社会,农家既为生产单位也为消费单位,其生活通常在糊口、温饱乃至小康之间摆动,谋求消费优化便成为资源再配置的动力。受生产关系(特别是赋役和租佃关系)、市场、多种作物和多种副业的影响,农民往往改变决策,从而导致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再配置。加之清代康乾盛世之时,清统治者实行以垦荒为中心的人口对策,鼓励垦荒和超省际的移民垦荒;推广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和棉桑茶竹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推动了全国性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从沿江沿海地区到广袤的边疆地区,从平原到长江中上游丘陵地带、山区和半山区,人们都以不同方式调整和优化资源的利用,使之趋于合理。其结果是成倍增长的人口与大幅度增加的垦田(包括民间大量的隐匿田地)相结合,以出人意料的程度开发了传统农

业的潜力，将国民生产总值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科技教育、社会秩序等各个方面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优化。前述康乾盛世白银继续大量内流，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最终赋役货币化，专业化生产区繁荣扩大，形成了两类三级全国性市场网络的进程，更是资金和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进程；这一进程的结果，势必继续引起资金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在全国性市场网络连接成为一体经济格局中，形成了中国式的二元经济。一元是沿江沿海形成专业生产区的早期近代化经济；一元是其他各类地区包括传统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服务等在内的“十分发达”的传统经济体系，二者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认定的那种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对立；传统经济体系也并非处于被动和无所作为的地位，相反，二者是共生互补的关系。其中作为买方与卖方、此地区与彼地区、此行业与彼行业“横向依赖与联系”中间环节的商人，终从明中后期到清乾嘉之际形成了商帮，在康乾盛世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格局中，在人力与资源的反复配置中，扮演了上下纵横沟通连接“传统”与“近代”、“增长”与“发展”，使之成为对立统一经济共同体的重要历史角色。

总之，总生产曲线越过峰点变成水平线，再增加劳动投入“边际效益”即呈现负数，亦即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衡的状况，在中国传统社会是经过一个长的发展周期出现的相对的阶段性现象，多数时期——如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在人口剧增的清前期，人口缓慢增长的近代百年，或人口速增的新中国，农业生产都能满足需要”。吴承明先生认为：“理论上讲，劳动边际产品降为零的时候，也是总产量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个最高峰，迄今也未达到。”[1] 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和投入结构保持不变”的前提不能确定。作为主要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其数量统计同人口统计一样，属于赋税意义上的统计，官方册籍登载的土地数字从来不是实际数字。且资源生产要素投入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土

〔1〕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

地资源要素的投入并非惟一),使边际劳动生产率、农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均有弹性,因而整体上看,"边际效益递减","零边际生产率"等并不符合清代社会乃至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

思考题:

如何认识清代的人口问题。

参考书目:

1. 张研:《清代经济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2.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3. 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第七讲

清朝集大成的文化

清朝文学艺术繁荣兴盛

清朝学术步入高峰

清朝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清理与总结

一　清朝文学艺术繁荣兴盛

小　说

小说，是清朝最具成就的文学形式。清朝一些传世小说如《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均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攀上了中国小说史辉煌的顶峰。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1715？—1763？），本名曹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先祖是辽东（一说丰润）汉人，入关前即加入旗籍，做了内务府

"包衣"(奴才)。曹雪芹曾祖、祖父都是康熙亲信,世任江宁织造,康熙六次南巡,四次驻跸曹家,显赫之极。曹雪芹生于曹家衰落前夕,亲身经历了家族先隆后衰的曲折过程和世态炎凉。由于曹家与康熙、雍正帝及清朝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由于曹雪芹个人的坎坷境遇及渊博家学的深刻影响,其创作的《红楼梦》以宏大的场面、复杂的构思、精妙的语言,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成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巨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红楼梦》放射出批判现实主义的夺目光彩。这比欧洲最早的现实主义大师法国的司汤达、福楼拜、巴尔扎克、俄国果戈里、列夫·托尔斯泰等均早出一个世纪左右,在世界现实主义小说史上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其次,《红楼梦》既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又是理想主义的。宝黛对爱情至死不渝的追求和对美好自由生活的渴望,深刻反映了清人对未来世界的理想。再次,《红楼梦》塑造了700多个文学人物,称得上典型的有几十人。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晴雯、袭人、史湘云、妙玉、贾母、刘姥姥等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这些人物形神兼备、个性鲜明,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众生像。最后,《红楼梦》融各种传统文化、文艺形式如诗词、戏剧、绘画、园林、建筑、医药、饮食、茶道、服饰、年节、礼俗、佛道、巫术等为一炉,鲜明体现出集传统文化之大成的"融通"特色,被誉为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

《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1576—1646)字留仙,山东淄川人,考取秀才后便屡试不中,以塾师终其一生。所著《聊斋志异》虽是一部狐仙鬼怪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却也具备了《红楼梦》的上述特点。在批判现实主义方面,借说鬼谈狐,鞭笞贪暴的官吏和腐败的科场、政治,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憎恶和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如众所周知的《席方平》、《促织》等。理想主义方面,《聊斋志异》大量刻画形形色色的动物植物,反复颂扬人与自然、与万物生灵相互依存依恋的不解之缘,以开阔的心灵视野展示了平等豁达的自然观和人物情结,塑造了一个和谐美好的理想世界。那些可爱的狐狸精、牡丹花精等无一不体现了对美好生活、美好情感的追求与渴望;常被世人轻视畏惧的

狐、虎、狮、蟒、蛇、猪婆龙等也纷纷成为有情有智令人感动深思的艺术形象。这既是对当时社会淡漠人情的讽喻，也是对理想社会健康和谐人际关系的一种探求。艺术手法上《聊斋志异》构思奇妙，情节曲折，人物活脱，同时融各种传统文化文艺形式为一炉，体现出集大成的“融通”特色。《聊斋志异》的语言几臻化境，“或探源左、国，或脱胎韩、柳，奄有众长，不名一格”，且随处可见《诗经》、《楚辞》、诸子、汉赋、唐宋诗文、古代小说、戏曲、野史杂著之影响。郭沫若先生说它“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出身豪门，却“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家产荡尽，仅中一秀才，卖文度日。其所著《儒林外史》被誉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一座“难以逾越的山峰”。它以现实主义作为底色，成为展现清代真实社会生活的画卷；以“婉而多讽”的艺术手法，生动地描写了清朝读书人扭曲的精神世界，批判了科举制度对其道德和人格的腐蚀。人们所熟悉的“范进中举”可谓其中最典型的篇章。《儒林外史》同时将创作的千钧之力放在对人性的深度解剖和对生命意趣的探索追求上，塑造了理想主义的人物。“作者自况”的杜少卿即是典型。他也像现实中的吴敬梓一样，批评程朱理学“固陋”，务要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自己的话，力主摆脱科举做官羁绊“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冲破“泥定”朱学的文化专制主义，通过独立的学术，培育独立的人格。反映了对人格独立、精神解放的追求和渴望。艺术手法上，《儒林外史》除语言准确、洗练、形象（常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如描写一个乡下总甲：“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等）之外，结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没有连贯全书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以一种意识流的独特形式围绕各类读书人的思想行为，“事与其来俱起，事与其去俱迄”，运用自如地安排各类人物和故事，达到和谐自然地广泛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儒林外史》集成与发扬了自《诗经》“美刺”

思想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化讽刺艺术的最高水平，奠定了我国讽刺小说的基石，对后来文学影响巨大而深远。

乾隆嘉庆乃至清末，小说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名篇续作，续《红楼梦》、续《水浒》等；一是描写王孙公子狎妓生活的狭邪小说；一是侠义公案小说，如《施公案》等。与显现出衰势的国运相仿佛，此时的小说，除李汝珍《镜花缘》外，普遍格调不高，思想性与艺术性远不如《红楼梦》等。戊戌变法后，小说进入空前繁盛期，多为暴露与指斥现实社会的作品，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等，文学史称之为“谴责小说”。一些具有改良和革命思想的小说作者则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有意识地以小说唤醒民众，使他们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政治性。

诗　词

清代诗歌集历朝历代诗歌之大成，学古而非复古，打开了超越元明，抗衡唐宋的新局面。其主要特点是：

1. 诗人众多，作品数量远远超过历朝历代。近代徐世昌所编《晚晴簃诗汇》收清代诗人6100余家，远不完备，即已超过《全唐诗》收录的诗家近三倍。《全唐诗》共收诗作48000多首，而清朝乾隆皇帝一人就有诗43000多首(其中有部分为词臣代作)。晚清诗人樊增祥、易顺鼎所作诗歌也都超过万首。结集付梓的清人诗文集则浩如烟海，难以数计。而每一诗集，动辄皆数十百千首。

2. 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后人可“以诗证史”。清初诗坛主流是“遗民诗”。时当明清鼎革，社会剧烈动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极其尖锐，数以千计由明入清的遗民诗人，怀着亡国之恨，呕心沥血、长歌当哭，写出了不少具有现实意义的诗作，表现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与不屈不挠的反清意志。如顾炎武、归庄、钱秉镫、吴嘉纪、王夫之、屈大均等人。其中顾炎武是杰出代表。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学贯经史、天文、地理、金石、音韵等,治学特点是学用结合。顾炎武早年曾参加过复社,清兵南下时,曾参加江南抗清斗争,失败后流亡各地,考察山川形势,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及《顾亭林诗文集》。他主张经世致用,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诗歌创作则主张"言志",抒发性情,不务奇巧,推崇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因而其诗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和强烈的时代感,风格特色沉郁悲壮、雄浑厚重。被称为诗坛领袖的钱谦益、吴伟业虽因降清身价削减,其作品却仍不失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钱谦益降清后又反清,大量诗作激越苍凉,抒发了强烈的民族情感。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末进士,著有《梅村家藏稿》。早年参加复社。明亡后与友约宁死不仕清朝。然不堪清廷逼迫,一度入京任国子监祭酒。他因违初愿,遭人非议,内心十分悔恨,曾写诗《自叹》:"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思想感情极为哀痛消沉,"或歌或哭,欲死欲生",诗风清丽流畅而又华艳苍凉。吴伟业自创梅村体,有"圆圆曲"等以明末清初历史为题材的名篇传世,另有不少诗作寄寓了他的身世之感,真实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生活,有"诗史"之称。康熙、乾隆、嘉庆等皇帝数量巨大的御制诗,艺术成就高低姑且不论,重要特色在于珍贵的史料价值。上述皇帝均喜以诗记事、言志,而其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关系国事与国运,特别是乾隆皇帝的诗,方方面面的国事家事,事无巨细均有涉及,且具有持续一生的不间断性,因而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咸丰同治年间,有嘉庆举人张应昌(1790—1869)(字仲甫,号寄庵)编选了《清诗铎》(原名《国朝诗铎》)。收入清初(包括明遗民)至同治年间诗人 911 家,诗 2000 余首。分岁时、财赋、漕船、流民、关征、海塘、田家、蚕桑、木棉、丈量、催科、税敛、力役、科派、扰累、刑狱、灾荒、吏胥、差役、贪黩、谄媚、谀颂、骄倨、奢侈、妇女、岛夷、将帅、忠臣等 152 类,集中反映了清朝诗歌所具有的史料价值的鲜明特色。

3. 流派纷呈。清初诗歌理论家有钱谦益、黄宗羲、王夫之等,他们大力扫荡墨守唐诗的明朝诗风,提倡宋诗,为清朝诗风的转变做出了贡献。康乾

盛世时，诗坛不再有清初的战斗锋芒，艺术风格流派则形成了以王士禛为首的神韵派，袁枚为首的性灵派，翁方纲为首的肌理派，沈德潜为首的格调派等。乾隆时肌理派翁方纲主张以学问为诗；格调派沈德潜主张"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一归于中正平和"，成为符合儒家诗教的正统派。

主盟康熙诗坛的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论诗标举"神韵"，强调清新自然、神妙之语，追求超乎语言之外的一种冲和淡远、含蓄隽永的韵味和意境，一反宋以来好发议论、空疏浅露的诗风。清朝诗风亦自王士禛始，由清初的重现实向重艺术转变。与王士禛齐名的有朱彝尊，号称"南朱北王"。

乾隆时袁枚、赵翼等论诗反对拟古和形式主义，重视创新，提倡个性，主张抒写诗人自己的"真性情"，超脱于尊唐和宗宋两派之上。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进士，有《小仓山房诗文集》和《随园诗话》等，赵翼（1727—1814）有诗云："李杜文章天下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道光以后，开创新局面的诗人推龚自珍。他的名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标志着一个适应新时代的新流派的诞生。

此外，清代的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词称"宋词"，南宋臻于极盛，元明两代散曲兴起，词渐趋衰落。清代词家词作则多有所出，被称为词的中兴时期。清中叶以前，重要的词派有风格豪放的阳羡派，以陈维崧为代表；工丽精巧的浙西派，以朱彝尊、厉鹗为代表；强调比兴、重视社会意义的常州派，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最值得一书的是满族词人纳兰性德。纳兰性德（1655—1685），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明珠长子，进士，做过康熙侍卫，有《饮水词》（一名《纳兰词》），词作以小令见长，风格凄清婉丽，接近南唐李后主；手法多用白描，真挚而不虚假，自然而不造作，达到了极高境界，所谓"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桐城派散文

桐城文派，又称桐城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均系安徽桐城人而得名。桐城派秉承程、朱道统，宗崇秦汉及唐宋八家散文，别立门户，自成体系。它崛起于清康熙年间，衰亡于民国初年，前后绵延200余年，先后麇集散文名家1200余人，创立了系统、丰富的散文理论，留下了2000余种传世之作。

清康熙、乾隆年间是桐城派散文创始时期。桐城学术自明中叶兴起，时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康熙以后，清廷为巩固其统治，改变民族高压政策，采取了笼络汉族士人的文化政策，极力推崇程朱理学，宣扬"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统治之所系也"，为立足道统的文学带来了发展良机，于是桐城派散文应运而生。桐城派早期代表人物戴名世以时文、古文创作名重于世，他针对明末故作艰深的虚矫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应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成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另一代表人物方苞哲学思想上宗奉程朱理学，文学创作上推崇韩欧古文，提倡文以载道、言之有物，简洁明快、洗练淡雅，其名篇《狱中杂记》即可为其范文。

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是桐城派散文鼎盛时期，集大成的代表人物为姚鼐。姚鼐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式打出了桐城派旗号，时人称：天下文章出于桐城。姚鼐曾充《四库全书》馆编修官，中年称疾归里，先后主讲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40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姚鼐为文修洁雅醇，恣肆谨严，涉猎汉、宋诸学，兼及考据、训诂。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所编《古文辞类纂》，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桐城派散文至姚鼐，影响遍及全国，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南北诸省皆有桐城派传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古文流派。

鸦片战争后，清代社会性质逐渐发生变化。"文章与世变相同"，遵循儒

家道统、文统的桐城派开始动摇。曾国藩网罗一批桐城派文人，将古文运动继续推向前进，于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强调“经济致用”，文体为之一变，以刚毅雄辩见长，虽号为“桐城派中兴”，然已实为桐城派变体，世称“湘乡派”。

绘画与书法

清代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集大成时期。清前中期的绘画，特别是山水画和花鸟画，攀上了北宋以后的又一个高峰。

清前期以继承为主的正宗画派有清初六大家，即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和吴历、恽格。他们运用传统绘画技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代表作如恽格的《锦石秋花图轴》等。以“领异标新”为主的创新画派有石涛、八大山人、“扬州八怪”（郑板桥、金农、高翔、黄慎、李方膺、罗聘、汪士慎、李鳝）等。他们破除摹古之风，有自觉的创新意识，即使对自己崇敬的艺术大师也只是“学一半，撇一半，未尝全学”，所谓“学者当自树其帜”，“十分学七要抛三，各有灵苗各自探”，而在题材、技法、题印艺术等方面全面创新。

如“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1693—1765，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扬州兴化人），被誉为诗书画三绝。作品中体现了孤傲豪放、不畏权贵的鲜明个性。他画的竹千姿百态，题诗也变化多端。如画丛竹，题诗为：“画竹插天盖地来，翻风覆雨笔头栽，我今不肯从人法，写出龙须凤尾排”；如画晴竹，题诗为：“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如画风竹，题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等。后人评说，郑板桥三绝之中有三真，即真气、真意、真趣。

此外清代乾隆御用西洋画师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等，将西洋注重焦点透视的画法引入了清代宫廷画，深深影响了一代画风。代表作有中西合璧的八骏图等。清代民间版画最著名的则属天津杨柳青和苏州桃花坞年画，这些年画色彩鲜艳，构图丰满，乡土生活气息浓厚、吉利喜庆气氛热烈，深受

百姓喜爱。

传统书法艺术发展到清代达到极致，只有另辟蹊径方能有新的突破。于是相对于唐以后近千年崇尚临帖的“帖学”，清代崇尚临碑的“碑学”异军突起。临帖之字圆润柔美；临碑之字刚劲豪放，二者在清代都臻于化境。“帖学”领军人物是乾隆朝大臣刘墉，即民间传说中的“宰相刘罗锅”，其书法精气内敛，外圆内方，然却安然静之，全无一丝火燥之气。“碑学”代表之一又有郑板桥。隶书本称为八分书，郑板桥则以隶书为主干，揉以楷书的骨架、行书的意趣、草书的神髓、兰竹的绘法，创造了他自称为“六分半书”的板桥体，影响极大。人们熟悉的“难得糊涂”，即是代表作品之一。清代被誉为集大成的著名书法理论专著，有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及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

二　清朝学术步入高峰

清初三大家与经世致用的进步思潮

清初三大家指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世称梨洲先生，所著有《明夷待访录》等。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世称船山先生，所著有《噩梦》、《黄书》等。顾炎武，前已有所介绍。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三大家都有明末脱颖士林、明清之际举兵抗清、清初隐居周游、绝仕著述的类似经历。

明朝末年，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弊病集中发作；一方面随着新经济因素的发展，知识界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当时士大夫中的很多人已开始问鼎长期主宰思想界、空谈性理、无裨治世的理学，提出了一系列新鲜思考和主张，形成了进步的思潮。入清以后，这种思潮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加之唐甄、傅山、陈确等著名学者的推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三大思想家的思想有以下共同的内容：

首先，从政治上对专制皇权进行批判。明王朝的灭亡给黄宗羲等人以巨大刺激，使之在深刻反思基础上，对君主专制政权体制进行了猛烈而系统的抨击。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皇帝未得天下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已得天下后，“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因而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唐甄《潜书·室语》则直称“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人者众手，天子实为之大手”。他们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天下重于君主，君主误国即应更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具有某些民主意识的思想命题。黄宗羲认为，“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职分有别，目的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在极度尊崇君主的年代，如此大胆激烈地抨击专制皇权，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其次，是学问上对经世致用实学的提倡。针对明末空言心性、“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之一说”、无裨治世的理学，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以明道救世”作为治学宗旨，将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他强调“博学于文”，以广博的学识写出有裨实用的著述；“行己有耻”，以礼义廉耻、民族气节约束自己的行为，反对盲从，提倡实事求是。他本人则身体力行，往来南北，“一年之中半宿旅店”，详细考察山川地理、各种制度沿革及疾苦利病，“如指诸掌”，完成了内容浩瀚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在当时思想界激起很大的波澜。稍后一些的颜元，其治学不仅强调实用且注重实践，提出了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的具体主张，使经世之学涉及到更广泛的社会方面。而黄宗羲、唐甄以“工商皆本”取代传统“工商为末农为本”的认识，主张对有益民用和国富的工商业同农业一样视为本业，加以保护、提倡、发展，也是在变化了的形势下，运用经世实学的实例。

第三，是哲学上对朴素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王夫之继承东汉王充、北宋张载等人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宋明以来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提高了一步。在宇宙观方面，他认为宇宙万物由物质性的“气”构成，并以自然科学知识论证了“气不生灭”的物质不灭论。在物质与精神方面，他提出“理在气中”的命题，批判了程朱“理先于气”、超于气之上的客观唯心主义。在矛盾发展变化方面，他论证了“气”在运动中不断发展变化，“气”的发展变化在于内部的矛盾性等。在认识论方面，他指出“行”是“知”的基础。强调“知不离行”，批判了朱熹“知先行后”及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唯心主义说法，总体上，王夫之主张从历史进化论的观点看待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过程，指出“世愈降，物益备”，人类“生生不息，变化日新”，一代胜过一代。

第四，是伦理学上对“存天理、去人欲”的批判。清初思想家激烈反对理学家冷酷而虚伪的“存天理、去人欲”，充分肯定情欲私利的合理性。如王夫之所说：“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黄宗羲所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唐甄颜元所说：“生我者欲也，长我者欲也……舍欲求道，势必不能”，“岂人为万物之灵而独无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黄宗羲等所设想的理想政治，也建立在承认私欲的基础上。如黄宗羲认为是专制君主以一人之私欲侵害了天下人之私欲，而主张“人各其私”等。

上述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三大家为代表的观点，如同驰电惊雷，震动着处于黎明前黑暗的思想界。遗憾的是，随着清朝皇权不断强化，思想控制愈益严酷，这一黑暗时段过长了一些，上述思潮被无情地截断了。

考据学风的兴起

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首开清朝考据学先河。他们对理学的批判，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倡“经世致用”，一是以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治学。顾炎

武、黄宗羲之后，踵行者就此分为两途。一以“经世致用”学风为重；一以考据学风为重。

以“经世致用”学风为重的代表为颜李学派。颜李学派首倡于颜元，形成于李塨。颜元（1635—1704）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以恢复“周礼正学”为己任，讲求经世致用，指出：学术是人才之本；人才是政事之本；政事是民命之本。“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而要使学术起到经世济难的作用，要培养出匡时济世的人才，则必须反对空谈心性的理学，重视实事实功。颜元去世后，弟子李塨（1659—1735，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继承衣钵。康熙中叶，清廷已基本确立了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编纂《性理精义》、《朱子全书》，以理学作为科考取士的重要内容和标准，重新将理学规定为正统的统治思想，以强化三纲五常，维护君主专制及其统治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颜李学派独树一帜，继承发扬清初进步思想家的“经世致用”学风和战斗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后来李塨受时势影响，亦将主要精力放在遍注群经之上。颜学特征稍变，标示清初经世学风业已终结。

以考据学风为重的学者可举出阎若璩、胡渭与毛奇龄。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号潜丘，祖籍山西太原。他的最大贡献，是从各种史料记载中，运用科学的考据方法证实了《古文尚书》是梅赜伪造的一部书，而被尊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宗师。胡渭（1633—1714）原名渭生，字朏明，晚号东樵，浙江德清人。他系统批判了宋《易》先天的图书象数，在提倡疑古精神和辨别古书真伪上做出了贡献。毛奇龄（1623—1713）一名甡，字大可，世以郡望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人。他崇尚考证，以“汉去古未远，其据词解断，犹得古遗法”而表彰汉学，全面批判既往的经学学说，为后来学者开拓了学术研究的诸多路径。然同样是治经学，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着眼于通经致用，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则从“经世”转向“避世”，着眼于由经籍考辨入手的纯学术考证。

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代表了当时学术发展的主流倾向，说明从经籍

考辨入手对古代学术进行全面总结和整理的时代已经到来。

乾嘉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18世纪,清朝统治臻于极盛。在镇压与笼络两手文化政策的交替作用下,考据学风最终主宰了清朝学术界。乾隆、嘉庆两朝,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金石考古学、天文历算学、舆地诗文等各个学术分野,几乎全部笼罩在汉代经师所倡导的朴实考据学风之下。历史上将清代学术主干经学中朴实考据的汉学称为乾嘉学派,又称朴学。

清代汉学——乾嘉学派的形成,也可说与清初批判理学思潮有所渊源。如前述,批判理学思潮之经世宗旨继响乏人,考据法古则张大其风。阎若璩、胡渭等考据大师奠基之后,惠栋(1687—1785,字定宇,号松崖)首先打出了与宋明理学风格迥异的汉学大旗。宋明理学旨在阐发儒家经典所蕴涵的义理;汉学则讲求对儒家经典章句的训诂考据。以朴实考据的汉学取代空言心性的理学,标志着清朝乃至中国古代的传统学术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得到了当时学者的一致推崇,也得到了统治者的优容提倡。乾隆肯定汉学"有所发明,有裨实用",借编纂四库全书机会,延揽大批汉学人才整理研究古代典籍。于是,汉学迅速取代理学,占据经学主导地位,成为清代官方学术。

乾嘉学派中惠栋、戴震齐名,因惠栋是江苏吴县人,戴震是安徽休宁人,又有吴、皖二派之分。除外,还有以阮元、焦循、汪中为代表的扬州派,以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派等。这些派别,尤其主要的吴派与皖派,均非对立的学派,而是互为师友,前后相承,表现为汉学发展不同阶段各具特色和贡献的学术群体。

有汉学开创之功的吴派,惠栋以下,著名学者有江声(字叔沄,号艮庭,江苏吴县人);王鸣盛(字凤喈,一字礼堂,自号西庄,晚号西沚,江苏嘉定人);钱大昕(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晚号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人)等。吴

派的整体缺陷是嗜博、泥古、佞汉,如梁启超评价“凡古皆真,凡汉皆好”。甚如江声,“平生不作楷书”,与人往来信件写的都是古篆字,使“见者讶以为天书符箓”。吴派中成就最高的钱大昕是一个例外,他强调“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若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

皖派将汉学发展到了高峰。皖派领袖戴震是清朝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戴震(1724—1777)字东原,早年家境贫寒,曾随父为商贩。后师从江永。与惠栋相识后,深受影响。戴震大力推阐汉学治学宗旨,强调训诂、考据与义理相结合,且身体力行开创了通过训诂以明义理的新学风。在文字音韵学方面,戴震集古代音韵学之大成,变前人“即形求义”为“因音求义”,注重从声音上探求字义,对清代考据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天文、算法方面,戴震将“古代天文理论与古籍中的有关资料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探讨,用古天文理论以解经史,借经史材料以讲天算,从而既解决了古代天算著作中的疑难,又具体说明了古籍中涉及到的天算问题”。在古地理方面,戴震以考据之法,基本恢复了《水经注》本来面貌。戴震以其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成为一代学术发展高峰的标志。时人对其高度评价说:顾炎武、胡渭、梅文鼎、阎若璩、惠栋皆各有“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震)出而集其成焉”。皖派其他学者多是戴震的学友和弟子,有的虽非皖籍,但因亲受其业或学术宗旨、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与之十分接近,也被归入皖派。其中著名的有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皖派学者纠正了吴派学者泥古佞汉的倾向。而强调训诂、考据与义理相结合,也使他们在学术各个分野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所以梁启超以为,吴派只能算是“汉学”,皖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清朝学术。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江苏扬州人)、焦循(1763—1820,字里堂,一字理堂,江苏甘泉人)、汪中(1744—1794,字庸夫,又字容甫,江苏江都人)为代表的扬州派,稍晚于皖派,是直接渊源于吴派、皖派,尤与皖派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学派。其治经方法更为严密,经学成就更为突出。但多放弃戴学探求义理的思想,专注于文字音韵之学的研究。故后人认为,扬州学

派既是清代汉学高峰的延续,又是清代汉学从高峰走向衰落的标志,同时也是传统学术向近代跨越的转折点。

经世思潮的再度崛起

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社会处于大变动前夜的重要时期,时值文化专制高压政策之下、汉学趋于极盛之时,一些知识分子面对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进行了多方思考和探索。新的经世思潮在酝酿,其中包括今文经学的复兴,边疆史地学的发轫,以及诸多学者经世务实治世主张的提出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始于西汉。所谓今文经是秦始皇焚书后,一些老人根据记忆口授儒家经书,由从习者以今文即当时通行的隶书笔录而成。古文经据说是从曲阜等地夹墙中发现的残存的儒家经书,书写文字自然是古文,即秦以前的六国文字。今文经学派注重阐述和发挥经文中的“微言大义”,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以天人感应、三纲五常提倡大一统,尊君抑臣、正名分论证君主专制的合理性而受到统治者支持,争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位。古文经学派后出,注重文字训诂及实学。随着学术风气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东汉至唐,基本上是古文经学占优势。宋理学一反古文经学之重训诂,强调阐发经书义理,成为官方学术,却由于走向反面,空疏无用,终被清前中期的乾嘉学派取代。乾嘉学派正是清代的古文经学派。换言之,古文经学随着乾嘉学派的出现而达到鼎盛。嘉道年间,今文经学重新崛起,魏源、龚自珍及康有为等人主张变法,极力提倡今文经学,直到清王朝覆灭。两大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有今文经学,中国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得以发展;因有古文经学,中国文字学、考古学得以建立。两大学派之争的长过程,无论对今文经学还是对古文经学来说,都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古文经学的经典模式是“我注六经”,今文经学的经典模式是“我释六经”。不同时代,模式相同,然内容和性质则有变化,此之古文经学或今文经学,已非彼之古文经学或今文经学了。

在乾嘉学派亦即古文经学极盛之时，却在酝酿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前有庄存与，后有刘逢禄。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晚号养恬，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乾隆十年（1745）榜眼，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其间曾入值南书房，多次担任正副考官、提督学政等。庄存与治学亦从汉学入手，学贯群经，并接受了宋学一些观点。然他不囿于汉宋之别，认为汉学为术浅近；宋学不审是非，做学问不应为汉宋二学做注脚，而要“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本着“研经求实用”的治学宗旨，阐释圣人微言大义和经世之志。刘逢禄（1776—1829）是庄存与外孙，字申受，一字申甫，号思误居士，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嘉庆进士，官礼部主事。他继承家学，精研《春秋公羊传》，发现了董仲舒、何休对公羊学的总结，使湮没千年的《春秋》大义重彰于世，同时，将春秋公羊学注重现实政治的传统推于当时的社会现实，面对清统治渐衰、西方列强进逼的危境，借《春秋》微言大义，阐发经世变革思想，要求清统治者由上至下，整饬朝纲。刘逢禄使今文经学异军突起，成为后来先进知识分子经世变革的有力武器之一。

边疆史地学的发轫，与清朝康雍乾三朝用100多年时间、终于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实行了对边疆民族的有效管辖密切相关，包括边疆纪闻与边疆史地研究论著两个部分。边疆纪闻多为派驻及谪戍边疆的官员和文人所著，其特点是1. 详记所见所闻的边疆地理、物产、风土、人情、自然景象；2. 反映了国势强盛、疆域一统、边疆与内地联系加强之下的豪迈雍容之情，即被谪戍亦少哀伤忧怨之词。如纪晓岚咏乌鲁木齐诗：“到处歌楼到处花，塞垣此处擅繁华，军邮岁岁飞官牒，只为游人不忆家”；洪亮吉咏伊犁诗：“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等。边疆史地研究最早有乾隆官修祁韵士主纂的《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这是系统研究西北边疆民族世系源流及事迹的第一部著作。其后西藏有松筠《卫藏通志》等；新疆有松筠《新疆识略》、祁韵士《西陲要略》等。这些论著标志边疆史地学作为一个学科分野已经形成，不仅成为当时经世思潮的组成部分，而且为19世纪边疆危机以后蓬勃发展的边疆史地研究奠定了基础。

康乾盛世的背后隐藏着危机。乾隆中期以后以至于嘉庆道光，各种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由隐而显。一些忧国忧民的文人学者，相继提出了经世的观点和主张。其中值得着重介绍的是洪亮吉、包世臣、魏源、龚自珍。

洪亮吉(1746—1809)字稚存，一字君直，号北江，晚号更生。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等。洪亮吉最有价值的学术成就是对中国古代人口学说做出的贡献。他揭示了人口繁衍速度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矛盾，分析了盛世人口膨胀可能导致的社会危机，指出在几十年到一百多年中，人口将会增加五倍、十倍、二十倍，田地与房屋仅将增加一倍、三倍、五倍，这比马尔萨斯《人口论》中提出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资源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观点早了整整五年。洪亮吉并对社会人口的构成状况进行了具体考察，提出了人口应对方案，虽未超出传统范畴而显苍白和陈旧，但他对人口问题的思考却仍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

包世臣(1755—1855) 字慎伯，号倦翁，安徽泾县人。泾县曾分置安吴，故人们又称其为“安吴先生”或“包安吴”。包世臣自幼家贫勤学，工词章，有经济大略，喜谈兵。嘉庆十三年(1808)中举，曾以大挑做过一年多县令，因被弹劾免职。后曾先后为陶澍、裕谦等人幕宾。他毕生留心经世之学，勤于实际考察，对漕运、水利、盐务、农业、民俗、刑法、军事等，都提出过有价值的见解。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皆向他咨询，以此名满江淮。包世臣思想、学术与乾嘉以来一般学人迥异，提倡“言事之文”“记事之文”，代表了文章与经世相结合的潮流，成为开启嘉庆、道光年间新兴经世文派的领军人物。所著《安吴四种》“皆经世之言，有关国计民生，不为空疏无用之学”。魏源(1794—1857)是包世臣较为年轻的朋友，他提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于道光六年(1826)编成《皇朝经世文编》，所收入者均为言学、言治等经世之文。所著《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也均针对抵抗列强侵略而发。魏源文风略如包世臣，朴实晓畅，犀利严整，影响巨大。龚自珍治学近于魏源，他进而认为文章应与政治统一，而撰

写政论、寓言、杂文,"语含酸辣"地批判时政和社会。龚自珍文风独特,所谓"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陈,瑰丽中有古奥"。包世臣、龚自珍、魏源的新兴经世文派,发出改革清王朝腐朽内政、抵抗列强侵略的政治呼声。此时,传统的各种文派以及包世臣、龚自珍、魏源等文化意义上所属的文派,均已处于次要地位。

三 清朝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清理与总结

《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

清代文化集大成式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对古代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清理与总结的自觉意识与行动。其中,最典型的是康熙朝对《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与乾隆朝对《四库全书》的编纂。

《古今图书集成》由清廷主持自康熙四十五年至雍正元年(1706—1722)用16年时间修成出版,共5020册、1万卷、1.7亿字,是中国历史上保存至今最为完整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仅保留了3%)。所谓"类书",是对文献资料分类摘编的图书。《古今图书集成》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编下分典,典下分部,分类摘编先秦至康熙朝的大量文献,是中国古代存留至今的最大的百科全书。

《四库全书》由清廷自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三年(1773—1787)用15年时间修成抄出,共近8万卷、8亿字,分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先秦至乾隆朝的各类图书共计3503种,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所谓"丛书",是汇集多种整部(也有著作节选部分)著作的图书。《四库全书》第一次全面整理和抄录了中国古代各种典籍,内容浩瀚,包罗万象,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献总汇。

作为对古代传统文化的全面清理与总结,《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只是清代官修类书与丛书的典型代表,其他官修私修的类书与丛书还有

很多,有大有小,有较为全面进行总结的,也有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进行总结的,可以说是形成了风气。

如类书,仅《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收入的目录就有146种。官修中较著名的如乾隆时大全性的农书《授时通考》,按天时、土宜、谷种等8门分类系统地辑录古今农业资料。私修中较著名的有:陆耀《切问斋文钞》、魏源《皇朝经世文编》等。后者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8类,类下再分80目,分类目收入经世奏议文论2200多篇。清末又出现相同体例的《皇朝经世文编续编》、《皇朝经世文续编》、《皇朝经世文三编》、《皇朝经世文四编》、《皇朝经世文五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皇朝经世新编续编》、《皇朝经世文统编》、《皇朝经世文新编时务续编》、《皇朝畜艾文编》等十余种经世文编。如丛书,较为大型全面的如《学海类编》、《昭代丛书》、《知不足斋丛书》、《抱经堂丛书》、《粤雅堂丛书》等;某一学术领域的如经学领域纳兰性德辑《通志堂经解》、阮元等辑《皇清经解》、王先谦辑《皇清经解续编》等;历史地理学领域王锡琪辑《小方壶斋舆地丛抄》、《补编》、《再补编》,共收入有关著作1366种等。

盛世修史

清朝继承了我国古代盛世修史的传统,纂修了大量史书,成为历史上史书出版最多的朝代。史学的兴盛,最直接地说明了清代文化总结意识的强化。

首先是对前代历史的纂修与研究。清初遵照隔代修史的传统,特开明史馆,官修明史。组织众多著名学者,历康雍乾三朝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较高质量的二十四史中的明朝正史。私人撰著数量更多,内容更丰富。如谈迁的《国榷》、夏燮的《明通纪》、查继佐的《罪惟录》、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等以及吴伟业《绥寇纪略》、计六奇《明季北略》等明清易代历史十余种。明代以前史则有康熙时徐乾学、万斯同、阎若璩等编《资治通鉴》后编、乾隆时毕沅主修《续资治通鉴》、辽夏金元专史、各种纪事本末等。典章制度方面

则接续《通志》、《通典》、《文献通考》，编纂了《续通志》、《续通典》、《续文献通考》，进而编纂了《清通志》、《清通典》、《清文献通考》。除纂修外，清代又对前人所著史籍进行了广泛的增补辑佚与考订。成就最大的学者推万斯同、钱大昕等。前代史学研究方面的清代著名论著，有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及赵翼的《廿二史劄记》等。

其次是对本朝历史的纂修。官修本朝历史内容广泛、数量庞大。其中第一类是皇帝的起居注、实录、圣训、谕旨，有专门机构、专门人员和相应制度作为保证；第二类是各种政书，包括记载国家各政务机构行政规章、实行事例的会典；记载各政务机关行政细则的则例（如户部则例、理藩院则例等上百种）；记载各类政务机构政策制度的志书（如《赋役全书》、《户部漕运全书》、《两淮盐法志》、《大清律例》）等；记载重大战事的方略等；第三类是按正规纪传体体例纂修的本朝史，设国史馆，为已故皇帝修本纪；为已故大臣修传及年表等。并开八旗通志馆，为八旗修专史。清人私修本朝史十分兴盛，著名的有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阮元《畴人传》、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唐鉴《国朝学案小识》、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钱仪吉《碑传集》、魏源《圣武记》、王之春《国朝柔远记》、蒋良琪、王先谦、潘颐福《东华录》、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等。

第三，方志纂修的兴盛与边疆史地学、世界史地学的发展。方志是综合记载地方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民俗、人物、文化、大事等内容的著作。清代是纂修方志的鼎盛时期。《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一书，收现存民国以前所修方志 8200 余种，清人所修有 5680 多种，占 70%。清修方志种类繁多，有全国性的“大清一统志”、一省的“通志”，以及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还有记载山川、寺庙、名胜等内容的山志等。边疆史地学除前面介绍的以外，道光咸丰年间又有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这两部边疆史地学名著针对巩固边防、抗击列强侵略，详细考述了东北、北部、西北边陲疆域、山川；少数民族与清中央关系；中俄边界争端、战争、定约、相互往来等。类似的边防史地书籍还有：卢坤等《广东海防汇览》、

俞昌会的《防海辑要》、姚文栋的《东北边防》等。同时，世界史地学兴起。清前中期已出现了一些研究外国史地的著作，如《异域录》、《安南杂记》、《缅事述略》、《海录》、《英吉利记》、《英吉利夷情纪略》等。清后期，经世学派撰写了一批影响极大的世界史地著作，向国人详尽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风土民情、政治经济及科技文化状况。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是其中代表作。同治以后，随着清王朝外交的扩大，西文资料大量翻译出版，世界史地著述不断增多，其中有王韬《法国志略》、黄遵宪《日本国志》、沈敦和《英法俄德四国志略》等国别史，有曾纪泽《出使英法日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日记》，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傅云龙《游历美利加图经》、《游历日本图经》等外交官出使随笔或游记，以及《各国政艺通考》、《万国近政考略》等综合性介绍世界各大国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方面情况的史地文献汇编。

第四，史学理论的成就。史学理论是史学发展的重要方面，清代出现了两位史学理论大家，一是乾嘉时期的章学诚，一是清末的梁启超。章学诚(1738—17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主要著作辑成《章氏遗书》50卷。他的治学路径与当时考据学风略有不同，因而其史学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晚清方昭显于世。章学诚对治史的独到见解主要有:1. 以史学救正汉学考据的积弊;2. 力图纠正重经轻史的偏向，提出“六经皆史”，学以经世。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和思想是对传统史学的开创性总结，起到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梁启超的重要贡献在于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建立起了开创作用。梁启超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十八年(1902)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文，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要使中国强大，就要像西方那样提倡民族主义。而要提倡民族主义，使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则“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都应当如饥似渴地研学“本国史学”，“一刻不容缓者也”！为此，他提出“史学革命”的口号，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为帝王“做家谱”、为“尊者”讳、“以死人为本位”的落后性及“史外无学”、泥沙俱

下、春秋笔法、空疏无用、晦涩难懂等弊端，进而奠定了新史学的整体框架，包括宗旨、内容、学科分野、研究与纂修方法、读者对象等。梁启超以为，当时的中国处在“蚕变蛾蛇蜕壳”的阶段，他说：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但是，只要“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他从中国自身社会历史分析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前途，所形成的新的史学理论和思想，所构造的新的史学框架，在发生沧海桑田巨变的20世纪，整整影响了一代治史学人。

其他具有总结性的重要书籍

与此同时，除类书、丛书、史书以外，清代还大量编纂了其他具有总结性的重要书籍。

文学艺术方面，如：《古文渊鉴》64卷、《御定全唐诗》900卷、《御定全金诗》74卷、《御定四朝诗》312卷、《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485卷、《历代题画诗》120卷、《佩文斋书画谱》、《三希堂法帖》、《律吕正义》、《律吕续编》、《律吕后编》等。

工具书方面，如：《康熙字典》（收47035字，是辛亥革命前收历代文字最多、也是世界上最早、收文字最多的字典）、《五体清文鉴》、《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词谱》、《曲谱》等。

药学植物学方面，如《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对已是集大全的药学著作《本草纲目》又有大量的补充和发展。又有《广群芳谱》100卷等。

历象数理学方面，如《历象考成》、《数理精蕴》、《月令辑要》等。

那么，如何评价清朝集大成的文化呢？我们把它留给读者们思考。这里仅综合郭成康等《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年7月版）、黄爱平《18世纪的中国与社会·思想文化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6月版）及其他学者论著的有关内容，做《四库全书》与法国《百科全书》对照表，以为参考。

清代乾隆《四库全书》与法国《百科全书》对照表

类别	清代乾隆《四库全书》	法国《百科全书》
何人编纂	官修。正总裁16人,副总裁10人,由皇子永瑢等亲王、郡王以及大学士、六部尚书担任。总纂官纪昀等3人。汇集了戴震、刘墉、姚鼐、王念孙、翁方纲等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前后动用4000余人。	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主编,参与撰写者为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等后被称为《百科全书》派的184位著名启蒙思想家、科学家。
编纂时间	1773年始纂,1781年完成第1部,1787年又抄成7部。加底本共8部。分藏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底本藏翰林院。	1751年始编,1772年正式出版,1780年出版补编和索引。
形式	类书。	辞典。
规模	3503种图书。共计79337卷,36304册,近8亿字。	共计35大册。
背景	时值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国力强盛,疆域统一,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但仍在相对封闭的原有轨道上缓行。在专制思想的文化高压政策下,文人只重考据,不问政治。	时值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夕,资产阶级已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为推翻封建统治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
宗旨	服务于君主专制国家的"文治"。如乾隆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反对君主专制,鼓吹民主、自由、天赋人权,是启蒙运动的号角。
着眼点	古代文献	现实问题
内容与分类	内容:包括经史子集4部及以下44类66属。 经部计有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大类,其中礼又分周礼、仪礼、礼记等6属,小学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史部计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杂史、别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15大类,其中诏令奏议又分2属,传记又分圣贤、名人等5属,地理又分都会、郡县、边防、山川、游记等	内容:综合古今人、事、物、理,包括"人类的全部知识"——来源于记忆的历史;来源于理性的神学和哲学;来源于想象的诗。 历史:分圣贤史、民众史、自然史。 哲学: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其中人文科学分道德、教育、政治、法律;自

续表

类别	清代乾隆《四库全书》	法国《百科全书》
内容与分类	10属，职官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又分通制、军政、法令、考工等6属，目录又分经籍、金石2属。 子部计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又分2属，术数又分数学、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等7属，艺术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又分杂学、杂考等6属，小说家又分杂事、异闻等3属。 集部计有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大类，其中词曲又分词集、词选等5属。 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人物的著作。	然科学分为数学、理学、化学、医学。 诗：包括诗歌、音乐、绘画、建筑、雕刻、戏剧等。
分类方法	为经、史、子、集传统书籍分类法。 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知识结构的特点。	近代知识分类法。试图以分类阐明各门知识的顺序和联系，以及有关科学、艺术、工艺的一般规则。
编纂方法	对古代文献收集、考据、保存，落足于“汇编”。 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均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名学家之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主要是拾遗补阙，辨伪订讹，“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从现实问题出发全面总结过去知识，但不重考据，致力于思想阐发的“撰写”。且大量反映现实。被称为“18世纪法国的一面镜子”。

续表

类别	清代乾隆《四库全书》	法国《百科全书》
侧重学科	重经史、伦理、政治。忽视自然科学、生产技术、商业、民间文艺等。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对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虽有收录，但遗漏甚多，如总结农业手工业技术成就的名著《天工开物》、研究珠算的名著《算法统宗》均未著录(后者仅存目)。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所收图书正文按儒家标准有删节或挖补。	重历史，同样重视科学技术。定书名为《百科全书——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撰写者不少是著名科学家和工艺师。这部书里可以找到“从别针的制作方法直到铸造大炮和瞄准射击的方法，从无限小到无限大”的所有东西。
标准	按照正统儒学标准，“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纂修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	对词条的收录和评论，按照人性和理性的标准。
社会影响	首先，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全面总结，对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可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与世界文明历史最博大最宏伟的宝藏之一。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传统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所有新兴学科都能从中找到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	熔铸了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取得的全部文化成果，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批判了封建社会从政治制度、法律机构、宗教信仰到文学艺术等全部意识形态，宣扬政治平等、思想自由等启蒙思想，提倡科学技术，直接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思想准备。

思考题：

清朝文化何以称为“集大成”，如何评价清朝集大成的文化？

参考书目：

1. 段启明、汪龙麟主编：《清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

2.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0 年。
3.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

第八讲

清人生活

等级化的衣食住行
生计来源
人生礼俗
岁时习俗
娱乐活动

一　等级化的衣食住行

服　饰

清朝前中期服饰的特点是鲜明的等级差别与民族特色。

满民族有着与汉民族不同的服饰习俗。清入关后，强令全国人民剃发改衣冠，使服饰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乾隆中期，最终形成了既有满族民族特色，又有汉族传统等级标准、系统完备的服饰制度。

清朝男子服装改明朝汉族传统服装的圆领大袖为"窄袖圆襟"、"圆领露颈",袖头源于满族在关外苦寒之地行猎时的护手,半圆狭窄,上长下短,成马蹄状,平时上翻,行礼前放下以示尊敬,称为"箭袖"或"马蹄袖"。清朝男子常服为长衫、长袍。袍服有左右开契的两开契袍、前后左右开契的四开契袍。袍服外罩对襟褂,长的叫大褂,短的叫马褂。马褂"较外褂为短,仅及脐",亦源于满族兵丁便于骑射的服装。长袍马褂成为清代典型装束。袍服外罩除了马褂还有马甲,又叫"背心"、"坎肩"。马甲无袖,短小及脐,四周、襟领镶跳色边,也有对襟、大襟、缺襟、琵琶襟等各种样式。其中前襟横作一字形的称"一字襟马甲",又称"军机坎"、"巴图鲁坎肩"。清前期各部司员拜谒堂官时穿马甲,后在社会流行,成为男子的普遍装束。

清初为缓和民族矛盾,在服饰规定上有"十不从"之说,即"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倡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也就是说女子、儿童、隶役、释道、优伶演戏时、女子结婚或死后装敛时均可着明代服饰。清代汉族女服遂仍为明代汉式。内着袄(衫),外罩褂,下身束裙。如《红楼梦》对凤姐着装的描写:"身上穿着镂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裉(掐腰)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发型流行"钵盂头"(型扁圆,像倒扣的盂)、"牡丹头"等。头饰用花、金银玉制的簪以及簪端垂金珠的凤形饰物,名"步摇"。汉族女多缠足,鞋以窄小为贵,金线绣花,装饰珠翠,有平底高跟各种样式。满族女服为旗袍,圆领大襟,两边开契,袖口平直,腰身宽大,长及脚面。发型有"二把头"等。满族妇女天足,鞋为木质高底鞋。鞋底中间镶一块 2 寸至 3.5 寸的高底,有马蹄底、花盆底两种。底以细白布包裹,刺绣穿珠以为装饰,面为绸缎,上绣花样并装饰珠宝。

清前期服饰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差别。自皇帝到庶民,服饰共分 48 品级。如明黄色、五爪龙,是帝后的专用服色和纹样,其他人不容僭越;服装用料帝后百无禁忌,以下则按官品级别规定。如外褂前胸和背后的绣花补子,亲王、郡王为金龙行龙,贝勒、贝子为正蟒行蟒,文一品为鹤(左都御史为獬

豸），武一品为麒麟等。又如顶戴，一品官用红宝石顶，二品用红珊瑚顶；亲王郡王贝勒等不戴花翎，贝子、固伦额驸戴三眼花翎，以下依次戴双眼花翎、单眼花翎、无眼蓝翎等。各级官员之父之子，除公服外，同官员服色。命妇之服绣补从夫，满为圆形，汉为方形。此外有功名未仕的举人生员着青绸袍，镶蓝边。至于庶民，一律不得用蟒缎、妆缎、金花缎、貂皮、狐皮、猞猁狲等。

饮 食

清朝百姓与其他朝代百姓的饮食习惯、饮食内容基本一样。冬季每日两餐，夏季每日三餐；农闲食稀，农忙食干。南方主食稻米，北方主食黍麦。有菜季节食菜，无菜季节食咸菜、咸辣椒面；青黄不接时吃野菜；灾荒饥馑时食谷糠、草根、观音土，甚或人食人。清代不同于其他朝代的是，番薯、玉米等美洲高产作物在全国推广，加入了主食行列。番薯、玉米等属粗粮，在"救饥"、"济世"，解决清前期人口爆长带来粮荒问题的同时，也降低了清人的生活水平。清朝百姓虽然也不乏"煎饼"（小米面）、红煮饼（高粱面）、贴饼子（玉米面）、凉皮（玉米面）、轧饸饹（荞麦面）、榆钱糕等粗粮细作的花样，但主要是求糊口存活，长年累月饮食单调粗粝，吃不起好的，只在节令及婚丧嫁娶之时，方可依俗打打牙祭。清前期节令的应时食品主要有除夕元旦的饺子（南方为年夜饭），灯节的元宵，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九月节的重阳糕，腊月的八宝粥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年的饺子，老百姓一年就盼这一回，再穷再苦，杂面素馅，也要包上一顿。

与农民老百姓相对，皇帝、贵族、官僚、地主、商人饮食生活则极为丰富。

御膳，即皇帝膳食。管理皇帝膳食的机构有内务府下属的御膳房、御茶房、内饽饽房、酒醋房、菜库等。其中仅御膳房就有正副尚膳、正副庖长以下370余人及太监数十人。宫中膳食有"份例"规定。皇帝每日"份例"为：盘肉22斤，菜肉15斤，猪油1斤，羊两只，鸡5只，鸭3只，时令蔬菜19斤，各

种萝卜60个,苤蓝、干闭瓮菜各5个,葱6斤。调料玉泉酒4两,酱及清酱各3斤、醋2斤。8盘240个各种饽饽用白面32斤、香油8斤、白糖核桃仁黑枣各6斤,芝麻、沙澄若干。皇后及皇贵妃以下妃嫔、皇子等依等次递减。如无特殊情况,严格按“份例”供应,不得擅自增减。宫中正餐为早膳(早6时至7时)和晚膳(午12时至下午2时)。晚上6时另有一次晚点。其他时间可随意加餐。由于清朝有递膳牌奏事的制度,皇帝实际用餐主要是加餐。正餐菜点皇帝大多作为克食(又作克什,满语“恩赐”之意)赏赐后妃、皇子、公主及军机、内务府、御前等大臣。召见奏事高官各赐饽饽两盘。御膳膳单需由御膳房在皇帝用膳数日前开出,交由内务府主管大臣审批,而后照单准备。皇帝独自用膳。用膳时由御前侍卫向御膳房传膳,御膳房将膳食放在膳盒里或膳桌上,侍卫抬送至用膳地点。太监按规定布好菜点,经过验膳(插银板)、尝膳等程序后,皇帝始用。用膳时,皇帝坐北朝南,面前为一长方形上下两层大膳桌,桌上布满精美餐具和菜肴,太监报菜名,皇帝有中意者,太监便盛入皇帝碗碟中。清朝常例国宴主要有皇帝登基改元的定鼎宴;元旦、冬至、万寿节(皇帝生日)三大节的朝贺宴;皇太后、皇后生日的圣寿宴、千秋宴以及外番宴等。其中内廷筵宴由内务府承办,外廷筵宴由光禄寺承办内务府协办。各宴举行的时间、地点、规模、程序以至餐具、菜点等都有严格规定。外朝筵宴一般用满席,其他用汉席。宫廷菜品是集中了天下最高水平的名厨制出的名吃名菜,如北京的烤鸭、苏州的苏造肘方、满族传统菜肴扒羊肉等。另有大量由御厨挖空心思、花样翻新的宫廷自创名肴,积累起来成为中国烹饪史上一个特殊的传统菜系——宫廷御膳菜。

宴饮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际手段,在官僚、商贾和平民百姓中既时兴又很讲究。而随着清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宴饮也愈见豪奢。缙绅之家一宴菜肴数十种,士庶中人之家一宴菜肴十数种至二三十种。一道猪脯要杀十几头猪,一味羊唇要宰数百只羊。与之相适应的是餐饮业的发达。清朝最终形成了苏鲁川粤四大菜系。其余如淮扬、苏松、湘鄂等菜系也十分讲究。连满族传统风味原属中低档的全羊席,也发展成了具有120种菜肴及12种点

心的大筵,分 4 道上完。至于所谓满汉全席就更加铺张,囊括了南北名吃山珍海味,据说要三天才能上完。

清代小吃是正餐以外的零食。清人管吃小吃叫"点心",或"打小尖"。清代北京串胡同叫卖的小吃品种很多,最普遍的有硬面饽饽、棋子馒头、帘子棍、芸豆卷、烫面饺、黄粉饺、糖酥火烧、切糕、扒糕、炸糕、炸回头、驴打滚、艾窝窝、灌肠、豌豆黄等。带汤汁的有馄饨、茶汤、杂碎汤、卤煮火烧、素丸子汤、炒肝、煮小肠、老豆腐、炸豆腐、豆腐脑、豆汁、面茶、大麦粥、杏仁茶、元宵、干碗酪、醪糟、杂烩菜、荞面饸饹、羊霜肠、爆肚等。荤味熟食有白水羊头、爆羊肉、烧羊肉、涮羊肉、干牛头肉、烂驴肉、薰鱼等。小食品有:山楂糕、蜜饯、糖瓜、糖葫芦、吹糖人、爆米花、铁蚕豆、糖炒栗子、半空儿、酸枣面、糖梨膏、果子干、雪花酪等。小菜有臭豆腐、酱豆腐、腌白糖蒜、卤虾小菜、韭菜花等。清前期著名的特色小吃可举出:奶酪,又称醍醐,蒙族食品。用牛奶加白糖煮开、过滤、加江米酒,文火加热发酵,置碗中成半凝固状而成。萨其马,满族食品。"以冰糖、奶油合白面为之",甜腻可食。北京饽饽,原为清官祭品,有细馅饽饽、片儿饽饽、大小八件等。豆汁,用发酵的绿豆浆滤去作粉丝的淀粉,将余剩的酸渣液烧开即成。吃时就咸菜、焦圈。

宅　居

清代宅居独一无二的特例是皇帝居住的北京紫禁城皇宫。整个紫禁城占地 72 万余平方米,有房屋近 9000 间,红墙黄瓦,壮丽辉煌。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南北中轴,东西辅以文华、武英两殿,是皇帝举行大典和朝见群臣的场所。内庭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辅以养心殿、御花园及东六宫、西六宫等,是皇帝与后妃日常起居之处。清前期曾对大内进行过多次修缮扩建。在居住方面,按满族习惯改床为炕,并在地下修筑了纵横交错的火道,改善了冬季取暖条件。

京师王公贵族、官僚大员的住宅从三进到九进不等。大门或三间或一

间，巍峨华焕；二门以内有回廊，经三门，始至内眷所居上房，“其巨者略如宫殿”。中等阶层住四合院或三合院。四合院分内外院，北房正房三间长辈居住，东西两侧耳房未婚子女居住，东西厢房子媳居住，外院仆人居住。大门多设在东南角，门前有影壁。庭中多有鱼缸，植石榴树，搭天棚。三合院南面开门。一般贫民住大杂院，数户数十户同住，院中房屋低矮破烂拥挤无规制。清前期无论何种住宅，大门二门、门钉数量、室基门基、台阶高度、屋脊装饰、釉漆彩绘等，均依房主身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一般官员住宅门柱禁涂朱色，庶民住宅禁用琉璃、彩绘、朱红门及梁上贴金等。

其他各地区各民族都有不同风格的宅居。如藏式宅居为石墙平顶碉楼，蒙式宅居为轻骨架毡包，维吾尔式宅居为平顶木架土坯房，朝鲜式宅居为席地而坐的地炕式宅居，西南少数民族宅居为干栏式竹楼木楼。另有黄土高原的窑洞，闽南的土楼，云南的“一颗印”以及东北的满族老屋等。东北民居南北西三面围炕，西炕供神供祖，南炕睡长辈、北炕睡晚辈。穷人有两家合住一屋，分住南北大炕的。

清前期园林式建筑进入了鼎盛时期。皇家园林集中了所有建筑的精华。最有名的是京师“三山五园”，即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畅春园、圆明园等。其中圆明园四十景更集中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大全，还有西式建筑群及喷泉，被誉为“天宝地灵之区”、“万园之园”。除北京外，清廷在承德建筑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集中、融合了南北园林的特点，体现了多民族的建筑风格，成为规模最大的皇家离宫和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官僚、富商，特别是乾隆下江南时的南方，也竞造园林，争奇斗胜，以期得到乾隆的宠幸。

交　通

清人出行，有陆路水路；交通工具，有骡马驴车船轿。

清前期制定了体现等级区分的乘舆制度。皇帝规格最高，辇（人力大

车)舆(轿),有28人抬的金辇,16人抬的礼舆。日常乘用楠木制16人抬的步舆、轻步舆。后妃舆车有凤舆、凤车、仪车、翟舆等。皇后凤辇色用明黄,饰金凤,贵妃色用金黄,饰翟(野鸡)。满官除亲王、郡王、大学士、尚书乘舆,贝勒、贝子、公、都统年老者可乘舆外,其他文武均乘马,不许乘舆。乘舆者也有规定:亲王以下、贝勒以上准乘8人抬明轿,贝子以下准乘4人抬明轿、暖轿等,以顶盖及帷幔颜色区分等级高低。汉官三品以上,轿顶用银,盖帷用皂,在京4人抬,出京8人抬;督抚、钦差8人抬等。武职均乘马,年过70岁不能乘马者,需请旨特批方可乘轿。王公勋戚、三品以上大员可乘坐"大鞍车"(又称轿车,带棚畜力车),其他官员有乘驴车、骡车的,马车一般为太监乘坐。官员出行仪仗前呼后拥几十人。州县官鸣锣7下,督抚仪仗长达半里,鸣锣11下、13下,闻声即可知其品级。

庶民用车规定为黑油、平顶、齐头、皂幔,不得雕饰。有一种"小鞍车",没有乘坐上的严格规定,庶民人等均可乘坐,随时可雇,称为"买卖车"。又有敞车,木轮、畜力,有单套、双套、三套之分。冬季另有冰车,木制长方形车架,上铺毡褥垫,下有两铁条,在冰上拉行。庶民平轿有富户、商家的私轿,以蓝布为轿身,较宽大。另有小一些、以青布做轿身的民轿及办红白喜事的花轿、素轿等。在江河湖海水域,舟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船桅如麻"、"舟楫塞港"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

庶民能够自备车船轿的毕竟是少数,多数庶民需用上述交通工具时,要向"车厂"、"轿埠"、"船埠"租赁。京城内外都有车厂,车夫将"买卖车"停放车厂或胡同口,等客来雇。受雇出车跑短途叫做"跑海";跑长途叫"包赶程",日夜兼程,数日即达于城之外。轿埠也很普遍,杭州有72大轿埠,小轿埠不计其数。轿夫多为世袭,缴钱入埠,将名签放人竹筒,有雇轿者,抽签决定出轿之人。收入交轿埠一成,有少交者,罚戏一夜,并为轿埠所有轿夫各作草鞋一双。滨江滨湖又有船埠,船埠的船叫埠船,定时开船,定点靠岸。

二　生计来源

农　民

清代多数地区以农业为主业，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就是说，"生产以家庭为本位"或曰"生产家庭化"。以家庭为本位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户，又有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佃仆、雇农之分。

清代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自耕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耕农是国家的直接纳税者，所负担的税额与地主相同，而地主上缴国家的赋税是佃农所交地租的分割物，这样，自耕农交纳给国家的赋税，就总是低于佃农交纳给地主的私租。自耕农身兼劳动者与小土地私有者，有生产经营的独立自主性，能够参加、支配和完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个过程（地主经济和佃农经济都不能单独完成生产的全过程，只能是缺乏生产资料的佃农同脱离劳动的地主土地相结合，两种经济互为补充地参加到生产的整个过程中去），为了避免沦为佃农而向地主发展，自耕农必然利用有利的经济条件，将发展生产的强烈愿望落到实处。多数自耕农除了从事农业生产，还从事小手工业生产，植桑植棉养蚕纺花，以织补耕。清初同其他王朝开国之始一样实行了发展保护自耕农经济的政策。正因为如此，尽管其时不可能"轻徭薄赋"，社会经济却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然自耕农经济十分脆弱，随着人口增多或遇天灾人祸，其发展趋势是逐渐被地主吞噬，沦为佃农或流民。

佃农因要向地主交租，其经营的土地面积通常要大于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南方人稠地狭之处佃农不可能过多扩大土地经营面积以补偿收入不足，只能在精耕细作，提高单位产量上下功夫。精耕细作，投入就大，这就涉及到租佃年限和工本问题。清代永佃制十分普遍，永佃制下，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开，有"田皮"、"田骨"，"田面"、"田底"等不同名称。佃农拥有土地

使用权，称为“佃业”，可以继承世袭、转租转顶、典押出卖；地主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无权随意起佃，若发生土地买卖，也只涉及土地所有权，与佃业无关，所谓“换主不换佃”。不管佃期长短，纳租方式、地租形态、租额租率是最为核心、重要的问题，因其直接涉及土地收益的分配、关系佃农家庭的生计。清代纳租方式、地租形态有力租、分租、额租等不同形式。额租即定额租，又称“包租”、“定租”。即事先规定租额，不论丰歉，按租额交租。力租是到地主家做工抵算地租。分租是分成租。业佃按一定比例租。收获之日田主到田里巡视，谓之“看边”。而后，就在田里过秤分粮。过去人们往往以为，纳租形式上分成租较定额租落后，“活租”“议租”较“死租”“板租”落后，地租形态上实物租较货币租落后。事实上，采取何种纳租形式和地租形态，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而且与社会自然环境等因素有关，与佃农能否接受有关，是社会、经济、自然环境及主佃双方利益要求的综合反映。地租率一般在每亩正产物的30%～50%。所谓“正产物”，南方指稻，不包括被称为“春花”的一季麦豆；北方指麦，不包括套作间种的豆、黍等杂粮，如包括在内，通常要作特别说明。附加租有信鸡、租鸭、三节礼、送年礼等。收租过程中的额外剥削还有踢斛淋尖、大斗收租等，另要佃户备车请酒。从根本上，佃农发展再生产的条件、能力和热情与自耕农不能同日而语，佃农经济负担大大重于自耕农，这样，佃农家庭便更易、更深地沦入高利贷的深渊。清代高利贷名目繁多，有：“老驴滚”，春借一石，秋还二石；“四撞十”，春借四石，秋还十石，还不上第二年按“老驴滚”；“麦青子、稻青子”又称“卖站稻”、“放青苗”，等于将未成熟的庄稼比实际低一半价钱先卖了；“出门利”，先打七八折，如借十石，只能拿到七八石等。如此，佃农家庭处于贫困不足为奇。讨论佃农家庭的生计，不能不提到较为特殊的佃仆。佃仆又称地仆、世仆、伴当、附丁、细民、小户等，是世代隶属于大姓（主要是大姓宗族）的贱民阶层。佃仆居主屋，种主田，葬主山，与地主在尊卑长幼、贵贱等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主家对佃仆有人身支配权、扑责权，可将佃仆随田转卖。佃仆不得与平民通婚，不得读书仕进、捐纳功名，甚至不许穿红着绿。

佃仆除向主家交纳以实物为主的地租外，须对主家负担诸如吹婚啼丧、抬轿看坟、看家护院、挑挖营造等贱役，不能私自外出佣工、随意迁徙，婚姻听主家指配，生育后代亦为佃仆、受主家唤使应役等。佃仆身份很难改变。有的“世仆”已变殷富，“终不得列于大姓”。

地　主

清代地主有各种不同类型，有特色的是商人地主、经营地主、宗族地主。

清朝传统的“农本商末”观念有了变化。一些地区重农贱商变成了“农人贱而商贾重”。然而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处于萌芽阶段，商人手中的货币不能有效投入工商业，土地仍是最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商人一般都将经商所得的大量资金投入到土地之上。最有名的商人地主主要集中在山东、山西、安徽等十大商帮所在地，另外盐商等官商也拥有大量土地。如康熙山西平阳盐商亢时鼎（亢百万）拥有大量田产，民谣称“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等。

所谓经营地主与传统的纯租佃地主不同，他们均亲自参加生产经营。经营地主又分两类。一类是雇工自营或部分出租、部分自营的中小地主。这类地主因财力所限参加生产经营，生产规模小、雇工数量少，仍基本属于传统范畴。另一类是体现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营地主。其特点是1. 生产目的主要为了出售和利润； 2. 亲自经营，大量雇工； 3. 财力雄厚，生产资金投入大； 4. 土地集中使用，生产规模大； 5. 以农为主多种经营，兼及工商； 6. 精于管理，注重地力水利及技术改造，不断扩大再生产。此类地主明中后期即有不少例子，清代比明代有了更大发展。如雇工规模，山东益都一王姓地主雇工数百名；四川内江种植甘蔗的地主家有雇工数十百人等。

清代宗族地主有了显著发展。江浙闽粤等经济发达地区，有诸子平分遗产的习惯，使地主土地从集中趋向分散。分散的地主经济在激烈的生存

竞争中难于立足，特别是难于适应大面积经济作物种植和农工商综合体制的要求，于是纷纷发展宗族经济，将地主土地的私人占有转换为地主土地的集体占有。一方面使土地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使子孙族姓免于“失所”；一方面以宗族实力经营农工商业，参加经济竞技场的角逐。特别是闽粤等地不少宗族将大面积的族田租给“沙头”、“总佃”、“揽头”，由他们转租或雇工经营。这些“沙头”、“总佃”、“揽头”往往是其他宗族组织或巨商大贾。这就使宗族组织之间、宗族组织与工商资本之间发生了横向联系。晚清，集体经营的宗族地主中出现了积极投资近代工商业和社会事业的现象，也有不少作为族尊的乡绅开始向近代工商业者转化。

除此之外，地主一端是皇族、亲贵、官僚等身份地主、大地主，一端是庶族乡居中小地主。前者与历朝历代同，后者面对清朝地方的浮收加派（如安徽，乾隆中期以后浮收超过正额数倍乃至十数倍）、连年灾荒和佃农的普遍抗租，生活并不宽裕。新安朱氏有诗云：“治家如治国，出入计升斗。全家食若衣，负郭五十亩。岁岁水潦灾，仅免饥寒受。九族涧监河，一瓜分某某。”“此缩因彼赢，捉襟乃见肘”。

手工业者

清前期手工业者主要从事丝织、棉织、治瓷、冶铁、农副产品加工业、盐业、采矿业、运输业等社会劳动。同以织补耕的小农不同，他们掌握手工业技艺，以“工”为主业，或自己成为小作坊主；或受雇在他人作坊中作“客师”即帮工师傅；或在劳动力市场上等待别人出资雇佣。各手工业都有着高超的技术，细密的分工。如丝织业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妻络夫织”，自产自销；一种是雇工生产，集中经营；一种是包买商人（称“账房”、“纱缎庄”等）将“经纬”（丝斤原料）和“货具”（工具）提供给机户，使其“揽织”，“织成送缎”，而后计工授值。由于分工细密，少量工匠难以完成。这样，后两种形式就有了很大发展。而即便第三种形式，机户从“账房”揽织后，也“多雇人工织”，“机户

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客师与机户实行“常主制”,“工价按件而计,视货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为增减”,另有规定时日发放的固定酒资。临时需要短雇各种工匠,可到劳动力市场“叫找”。每日黎明,各种织工均在固定地点等待主顾。如苏州,花缎工群聚花桥,纱缎工群聚广化寺桥,素缎工群聚白蚬桥,锦缎工群聚狮子桥,摇丝车匠立濂溪坊等,“名曰立桥,以便延唤,谓之叫找”。其他行业手工业者的生计与之大致相同。

商　　人

商人有大商人、小商人。以两淮盐商为代表的大商人家庭生计生活,在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其中富者拥资千万,次者也达数百万,共“蓄资以七八千万计”。其资本之雄厚,仅从向朝廷“报效”、“捐输”的数目便可见一斑。乾隆年间“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各盐商所捐通计不下三千万。其中两淮盐商洪箴远、程俭德两家短短十几年便向朝廷“捐输”了1150万两白银。一方面富可敌国,一方面地位卑下。一些暴富的大商人往往挥金如土,企图以奢侈弥补这种剧烈的反差和内心的失衡。京师米商祝氏“富逾王侯,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瑰丽,游十日未竟”。两淮盐商“竟尚奢华,凡宫室饮食衣服舆马之所费,辄数十万金”,“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有家中养良马数百匹,“日费数十金”,有家中遍置兰花,“一盆或至数十金”,有家中铜制溺器,高五六尺,有的想一下花掉万金,门下客则以万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沿草树之间,不可收复。然富商“千百中不一二焉”。绝大多数商人“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宇内。近者岁一视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矣”。舟车有费,关市迭征,经商所得一半输之道路,归慰待哺,所剩无几。在市场列肆开店的坐商似比行商轻松些,但百货俱榷税,税额日重而利润日微,兼地当孔道,地方供应时时倚办,奉公之钱几逾半数,

且胥隶上下而渔猎之，生计也十分困难。

下层士

下层士，包括拥有低级功名的绅衿和屡试不售的读书人。多数绅衿继续读书应考或作幕僚，向仕途上努力。另有一些绅衿成为地方保甲、宗族、乡族的头面人物，利用权势包揽钱粮，左右地方事务；还有一些绅衿参与经营农工商业。但这都不能算是下层士普遍所操之的生计。下层士最普遍的生计是做塾师或到富人家中课子弟，生活十分清苦。嘉庆时著名文人包世臣出身下层士家庭。其父曾带他到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地方做塾师，所得仅供父子两人口食，“无可寄赡家者”。其母在老家带着三个幼童艰难度日，两昼夜成男鞋一双，卖钱买一点米，掺和蕨根磨的粉粕煮粥供一家糊口。郑板桥有一首《教馆诗》道：“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渡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三 人生礼俗

育 俗

生育在传宗接代、家族兴旺方面具有重要位置，因而其礼俗十分隆重繁复。

首先祈子。祈子方式五花八门，最普遍的是乞神赐子。北方以碧霞元君（俗称泰山奶奶）为送子娘娘，其庙称“娘娘庙”，遍布城乡，香火极盛；南方一些地区以金花夫人为送子娘娘，附祀与生育婚娶有关的“保生娘娘”、“乳母娘娘”、“斑疹娘娘”等。送子娘娘香案前放有很多泥娃娃，称“百子童”，祈子之妇抱一个交喜钱一百文，若得子，要买十个或百个泥娃娃披红挂彩，送回庙中还愿。

其次诞育。孕妇产期将至，娘家于当月朔日将婴儿襁褓彩衣、花生、红枣、栗子、桂圆(有的还要 10 双红漆筷子)及 120 枚彩蛋装在彩盆中，覆以五男二女的簇花剪纸，送至男家，以谐音表示早生贵子，快生快养。送者带一具笙，吹着进门，表示催生。婴儿降生后，男家携喜蛋(生男单数女双数)、酒菜到女家报喜，女家加倍回以喜蛋。男家将喜蛋分送亲友，亲友回送火腿、细米、红糖、桂圆等，称为"添汤盆儿"，另赠碎布、十文百文铜钱，缝"百家衣"、购"百家锁"，为婴儿穿戴，以防病避灾。

再次三朝。婴儿出生三天，举行"三朝礼"，为之洗澡，俗称"洗三儿"。收洗姥姥烧香祝拜后，把熬好的蒲艾水倒入洗盆，抱起婴儿，请诸亲友添盆。添凉水，她说："聪明伶俐长流水。"添干果，她说："枣儿栗子，连生贵子。枝元桂元，连中三元。"添金银，她说："金满箱银满箱，来年中个状元郎。"随之用棒槌搅水，一边道："一搅二搅连三搅，哥哥带着弟弟跑。"搅到水温合适，即将婴儿放入盆，撩水上身。孩子必哭，名为"响盆"，是好兆。姥姥口说手洗："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刷刷牙漱漱口，跟人说话免丢丑；三梳子，两拢子，长大戴个红顶子。"洗完用艾球炙脑顶囟门，在脐带处敷上烧过的明矾末，包裹在襁褓中，拿葱打三下："一打聪明，二打伶俐，三打邪魔。"然后将葱扔上房顶，送走床神，洗三完成。

再次满月。婴儿满月要请满月酒，叫做"作满月"。这一天给婴儿剃头，剃下的胎发装入小盒，用红绿丝线挂在堂屋高处，预示婴儿长大有胆识，或挂入婴儿帐中避邪。剃头后，要给婴儿穿红着绿，由舅舅抱着、姑夫打伞遮着，到街上兜一个"喜圈儿"，还必要过一小桥，以示婴儿将来健康勇敢。

再次周岁。周岁是婴儿第一个生日，一般都大事庆祝，祭神祀祖，请客送礼。清人继承了历代"抓周"的礼俗，没有大的变化。

清朝宫中生育礼俗，也有诸如洗三、添盆、抓周等程序。只是妃嫔"有喜"后，在生活上享有更高的待遇，其母可被允许入宫照顾。后妃所育子女不亲自喂养，而由乳母、保姆带到他处哺育，一个皇子便要使用 40 人，有 8

名乳母、8名保姆等。

婚 俗

清前期婚俗程序依次是:1."说媒"。媒人(又叫"冰人")向男女双方提亲。提亲时介绍对方家庭情况、人品、生辰八字和属相。2."通草帖",又叫"发草八字"。女方初步认可,通过媒人用粗纸将生辰八字写给男方,男方也通过媒人以草帖回复女方。3."合婚",又称"合八字"。男方将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送之问卜,得吉,则通知女方。4."换帖",又称"过年庚帖"。男女双方择吉日交换定帖。帖为龙凤红纸,故也称"传红"。帖上写有门第、姓名、生辰八字等。男方随帖赠给女方24块银元和10样礼物,取十全十美之意。5.相亲(有的地方先相亲后换帖)。男方相中便赠女方金钗,叫做"放小定",相不中,送彩缎两匹,叫做"压惊"。6."纳采"又称"下定"、"放大定",即订婚。男方赠女方首饰如意。女方设宴招待男方,叫做"吃成饭",并赠送男方文房四宝、面娃娃、糕塔、面石榴(象征多子多福,女婿先吃一个,其余切片送给邻居,表示婚事已定)、麸盐(洒在公婆妯娌头上,谐音有"福"有"缘")。订婚后双方不得反悔,否则可上告官府。7."送日子",又叫"报日子"。男方择定迎娶日期,写在龙凤帖上送往女方,并随帖送食盒。8."送彩礼",又叫"送聘"、"过大礼"。富家必备三金:金钏、金镯、金披坠。一般送6至8身绸缎衣服,一套首饰。9."过嫁妆",又称"夸嫁妆"、"铺房"。娶亲前一日,女方向男方发送妆奁。嫁妆多少厚薄,象征女家财势,决定新娘到男家后的地位,因此"一物不备,女不登车"。女方也尽其所有为女儿置办嫁妆,不少大户陪送房产地产,有"良田千亩,十里红妆"之说;一些小户置办的嫁妆超过自己实际的经济实力,所谓"痴人变产以应"。嫁妆中,箱笼器具、桌椅被褥应有尽有。北方嫁妆论"抬",京师中等人家嫁妆即可达24抬、32抬之多。嫁妆中塞着核桃、枣、花生、麸包,祈祝新娘早生子,早得福。10."娶亲"。这是婚礼最为隆重热闹的核心部分。各地具体程序不一,大致是:

新郎身着长袍马褂、披红插花，率迎亲队伍迎新娘。迎亲队伍中有一负责迎娶的"全福"女傧（俗称"全乎人"，即上有公婆父母、下有子女、旁有兄弟姐妹的人）作为"娶亲太太"。又有两名至八名男傧相辅。后面是伞扇旗镜、吹鼓手组成的仪仗及一乘或三乘接新娘的喜轿，加上尾随看热闹的，浩浩荡荡数十百人。迎亲队伍到女家门口，鸣放炮竹，并给"开门封"，女家方打开门，迎接新郎。新郎到女家祠堂祭祖，叩拜女方父、亲友、邻里；然后吃"腰食"（饺子）。与此同时，男方持红柬奉出嫁所用的冠、披、花、粉等物催请新娘上妆登轿。女方也以"全福"女傧为"送亲太太"，为新娘梳妆打扮盖盖头，吹吹打打送至花轿前。新郎新娘在轿前拜过轿神，同吃合婚饼后，两名伴娘搀扶新娘上轿（有的地方由兄弟、舅父抱上轿），鸣炮鸣锣，女方两名男傧（通常是小舅）监押起轿。途中新娘须号哭不止，所谓"不哭不发"。到了男家，大门许久不开，叫做"劝性子"。开门落轿，新娘怀抱瓷瓶、铜镜等镇邪之物，脚不着地，踩着事先铺好的红毡或米袋子，跨马鞍、跳火盆，缓缓而行，两侧有男方二人向新娘头上抛撒五谷杂粮，行至中堂，举行拜堂仪式。一拜天地，二拜祖宗，三拜父母，最后夫妻对拜。新郎将"同心结"放入新娘手中，将其牵进洞房，坐在喜帐之下，用秤杆挑下盖头，男傧女相将喜果抛撒满帐，称"撒帐"，新娘新郎喝交杯酒，仪式结束。新郎出洞房设宴待客，新娘换红绸便装，抱瓷瓶、秤、算盘（象征和平、公正、会算计、守口如瓶）等盘膝坐在炕角，不言不动，从几小时到一天不等，叫做"坐帐"，祈求婚后大福大贵。11."闹洞房"。从新婚之夜开始一直持续三夜，无论老少亲友都可到新房调笑嬉戏，捉弄新娘新郎，令其相互亲昵。闹房过程中，更有进行性教育的内容。有以亲友扮作"堂官"，项挂算盘珠子朝珠，头戴红萝卜顶戴，脑后插大蒜"花翎"，命扮作差役的亲友将公婆抓来跪下，令教房中术，新人重复，否则鞭斥等。12."回门"。娶亲翌日新婚夫妇先行家礼。完后新娘乘花轿回娘家，天黑前赶回。

丧　　俗

清代“丧俗”步骤如下：1. 送终。死者弥留之时，全家大小齐集床前。一断气即为之更衣、铺盖、含“口钱”。更衣，称“易衣”、“易簀”。有官职者用礼服，一般换为明朝服饰。富人穿12件绸衣，穷人即布衣也须穿7件。铺盖讲究铺金盖银（铺黄盖白），三铺三盖至九铺九盖。“含口钱”，将两枚铜钱放入死者手心，一枚铜钱放入死者口中。其后将死者移至支在堂上的门板上（称“落地”），在死者脸上覆一张黄纸，旁边点一盏油灯（引魂灯），烧香上供。同时请和尚道士念“往生咒”，烧死者衣物（称“烧包”）、纸扎轿马、纸锞纸钱，为亡灵赴阴间乘轿骑马、花费使用。2. 报丧。丧主请阴阳先生卜定葬礼时辰，称“批殃榜”，随即书写“报条”（“报丧帖”），派人到亲友家报丧。有的地方，丧主要亲报三党亲族，与死者关系最密切的公亲当众问明病源死因，允准后方可收殓，否则大闹不休，甚至讼官。3. 入殓。天热时当天晚上即将尸体移入棺材，全家人及亲友持香相送，但不钉棺盖，称“小殓”，又称“落材”。而后按阴阳先生所批日期时辰“大殓”，又称“封材”。“大殓”时，全体亲友围棺边转边哭，将殉葬物及黄土石灰、雄黄、脚炭等一一放入，盖棺钉死，按亲疏换穿孝服举哀。孝服制度很严格，死者之妻及子女服最重之孝，称为“斩衰”，用最粗的麻布做成，不缝边，服制3年；死者之夫、亲兄弟、未嫁亲姐妹、孙子女等服次重之孝，称为“齐衰”，用粗麻布做成，缝边，服制1年；死者堂兄弟、未嫁堂姐妹、已嫁亲姐妹、重孙子女等服再次重之孝，称为“大功”或“布衰”，用熟麻布做成，服制9个月；死者三从兄弟、未嫁三从姐妹、已嫁堂姐妹、曾孙子女、外孙子女、外甥等服又次重之孝，称为“小功”，用较细熟麻布做成，服制5个月；死者四从兄弟、女婿等服最轻之孝，称为“缌麻”，又称“麻衰”，用更细熟麻布或兼用丝麻做成，服制1个月。四从兄弟以外的族人无服，但参加吊唁时，无服族人、朋友等均服“缌麻”。4. 开吊。“封材”后将棺材横放内堂，外挂一白布幔，叫做“立灵堂”。富人停灵七七四十九

天，穷人停灵三五天。此期间丧主烧香哭跪，通宵不眠，为死者守灵。前来吊唁的亲友赠丧仪银两、挽联挽幛，素席香烛以助丧，孝子伏地叩首答谢并备饭招待。5. 做七。人死后7日为“一七”，49日为“七七”。各地丧俗均有“做七”仪式。有做“三七”、“五七”、“七七”的，也有逢“七”一祭，请僧道念经、烧香烛化纸钱，穷人无钱则上坟烧纸，谓之“烧七”。6. 出殡，又名“发引”。是丧礼中最隆重热闹的仪式。早五鼓开灵，孝子用新箕帚扫棺材，行辞灵礼，灵柩出堂，孝子执纸幡在前，诸亲友在后，号哭不止。灵柩到门外上小杠、到大街上大杠，孝子跪摔瓦盆，起杠。送葬队伍有大有小，视死者财势而定。穷人以两面锣开道，富人以边行边演的戏班子开道，后面是和尚、道士、尼姑、旗牌执事、吹鼓手，纸扎的金山银山、童男童女、车轿亭马、神人五兽等。灵柩抬到墓地，丧家祭奠致哀。富家更诵经、放焰口，同时焚伞焚船焚轿焚冥宅，而后下葬。送殡归来举行“点主”仪式。由地方有名之士用朱笔将死者牌位上原写好的“王”字点一点，成“主”字，然后用红布包裹送进祠堂，称“进主”。丧礼主要部分至此基本结束。7. 圆坟（又称“暖墓”，南方称“复山”）。葬后三日，丧主全家需到坟上添土、祭奠。以后三七、五七、七七、六十日，均到墓祭奠。在丧葬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择吉壤”即选择“风水宝地”。这不仅表明对死者的孝敬，更关系子孙后代的运势和家族的兴旺。因此，择不到“吉壤”，宁可不葬。这就出现了停灵不葬、先殡后葬、起尸改葬的怪现象，江西“竟有停棺至数十年之久，一家之中积有数口之多而不葬”的事。寺庙等处都有集中停放灵柩之处，还有人腾出闲房出租，供人停柩，待找到“吉壤”后再举行葬礼安葬。另有一些地方，如江西、广东，葬后二三年，要起尸验看，尸为红或黄，确定其地为“吉”，原样埋好；尸为白或黑，“不吉”，迁坟另葬，称为“洗筋”、“检筋”。一年后再验，不厌其烦。

四 岁时习俗

岁时节日

清代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全年作息节奏、生活习惯,均如历代一样,充分尊重农耕生活作息。是以清廷每年郑重颁布正朔(年历),必以农业生产生活为标准。通行全国的时令书,在头年冬至之日颁布,民间可以自由翻印售卖,名为大历。一年分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一日分为十二时辰,分别以十二地支为名。其与24小时制的换算大致是:子时相当23~1时,丑时相当1~3时,寅时相当3~5时,卯时相当5~7时,辰时相当7~9时,巳时相当9~11时,午时相当11~13时,未时相当13~15时,申时相当15~17时,酉时相当17~19时,戌时相当19~21时,亥时相当21~23时等。农民家庭起居不依据漏刻钟表,更多依据日影及各种习惯。较常见的有:夜半(23~24时)、鸡鸣(1~2时)、平旦(3~4时)、日出(5~6时)、食时(7~8时)、隅中(9~10时)、日中(11~12时)、日昳(13~14时)、晡时(15~16时)、日入(17~18时)、黄昏(19~20时)、人定(21~22时)。

中国自古以来,随岁时节气变化,农事忙碌清闲,在生产生活活动时段上,形成了标示性的节日庆典,清代岁时节日因袭前代,主要有元旦、立春、上元、花朝、清明、浴佛、端午、乞巧、中元、中秋、重阳、冬至、腊八、祭灶等。

冬 季

冬季岁时习俗围绕年节进行。年节从腊月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正月十八。腊八即腊月初八,家家半夜熬煮果粥,称为“腊八粥”。三更煮熟,用其祭神祀祖,饲喂猫狗鸡鸭,涂抹墙壁树木,然后全家聚食,并在午前馈送亲友。熬煮腊八粥,原出自佛教施粥舍衣习惯,诸大寺有于此日熬“七宝五

味粥”送与门徒食用的传统,同时开粥厂施舍贫民。京师雍和宫天王殿喇嘛于此日熬五大锅“腊八粥”,每个铜锅直径1丈2尺,用米12石、干果杂粮100斤、干柴万斤。朝廷派出“监粥大臣”、“供粥大臣”,将粥供给宫中及王大臣文武百官,并装罐封寄各省督抚,另有部分散发京师百姓。北方腊月二十三、南方腊月二十四祭灶。又称“过小年”、“糖瓜粘”。届时用酒糟涂抹灶门,以麦芽糖做的糖瓜、糖饼、黑豆、寸草供灶王爷。酒糟、麦芽糖为了糊住灶王爷的嘴,使之“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黑豆、寸草是给灶王爷上天所骑之马食用。家家欢聚,烛火辉煌,花炮之声达于四巷。小年过后,腊月二十四“掸尘”,又称“扫房”、“扫年”。内外彻底大扫除,粉刷一新,糊墙纸、糊窗户、清洗被褥衣物、请神主、贴窗花、贴春联等,“千门万户,焕然一新”。十九到二十二日“封印”,大小衙门封存印信,停止办公;各戏班、戏馆择吉“封台”,停演十数天,待元旦再首演“天官赐福”开台戏;各塾“放年学”,准备过年。除夕向尊亲师友行礼辞岁,亲朋互相馈送青鱼年糕果品猪蹄,叫做“送年盘”。回到家中净手洗脸,而后祭神,供设天地纸马(木版纸印的天官地官神像),果品三牲。到亥时子时相交之时,鞭炮齐鸣,焚香诵祝,焚烧天地纸马,迎接众神下界。全家团拜,喝分岁酒,吃团圆饭。北方吃荤素水饺,南方吃年夜饭。年节活动从辞岁转入迎新。有民谣概括了前面的活动:“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买猪肉;二十七,杀了公鸡杀母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首,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元旦,又名“元日”、“三元日”(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家中拜贺完毕,男人便向吉方出门给亲友拜年,互送拜年帖,叫做“贺正”。不少地区还有招财进宝的习俗,初一一早在门口悬挂用五色纸剪成的钱串,或由花子扮作财神,敲锣打鼓到各家贺年讨赏,以示送财送宝。初五称“破五”,一般商店开始营业。“破五”以后女眷纷纷出门、归宁、逛庙会。初八是顺星日,诸星下界,人们多燃灯为祭,并往寺庙施舍香火钱。乾隆时北京各寺喇嘛跳布扎驱魔打鬼,场面极其古怪热闹,前往观看者人山人海。上元。正月十五“上元节”,又称“元宵节”、“灯节”。街市百戏杂陈,社火香会热闹非凡。人

们白天看戏，晚上观灯，“狭路肩摩人似蚁，交衢毂击马如龙”，直到十八收灯。以后三日钦天监择吉开印，各衙办公。年节活动结束。

春 季

春季的岁时节日习俗以“清明”为中心。一年之季在于春。清明前后，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是农作、也是春游的好季节。清明之前，有二月二“龙抬头”，为祈佑农事丰祥。这天乡里醵钱演戏，称“春台戏”；以隔年油煎年糕，给土地爷过生日。同时家家取灶灰，在场院、屋外撒成圆圈，蜿蜒布入屋室灶房，围水缸转一大圈，叫做“引龙回”；食龙须（面条）、龙鳞（饼）等，用饭勺敲打锅沿，驱赶惊蛰的“五毒”。这天又是年节以来妇女第三个归宁日，俗谓“二月二，接闺女”；“二月二，龙抬头，家家待活猴”。清明是祭祖的最重大节日。除祠祭外，还必有墓祭，俗称“上坟”。巨族富户“祭每从丰，而莫重于清明之墓祭”。其时“会集族众，按门分源，猪羊每至百余只，旗伞执事，鲜妍拥道”，“有功名者皆冠带舆马，族大丁繁者动以千数”。祭过本家祖先，还要祭邻坟、祭山神、祭城隍、分胙肉聚餐等。一般百姓扫墓后，在坟头压纸钱，折柳编圈戴之而归。清前期清明祭扫实际已和踏青、春游合而为一。清明时节无论贫富，倾家而出踏青遨游；各种庙会、赛会、花会，鼓乐喧天、旌旗招展，百戏竞陈，斗妍争奇，引得人山人海，观者如堵。宫中除了谒陵祭祖外，也在坤宁宫和东西十二宫院设秋千，供后妃荡耍，在城郊御园踏青娱乐。清明过后以三月二十八东岳大帝诞辰打头，紧接着是四月初八释迦牟尼生日“浴佛节”、四月初一到十八的娘娘庙等庙庙会、放生会、四月十四的吕洞宾生日、二十八的药王菩萨生日等一系列的佛事活动，好像众神佛都愿集中此时一齐出生，以便给予人们游赏暮春初夏景色的机会。

夏　　季

夏季重要的岁时节日习俗围绕“端午”进行。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是传统节目。此外，俗以五月为“恶五月”、“毒五月”，家家供天师、钟馗像，以时新果品及粽子五毒饼祭神供祖；在中门贴毒符、插菖蒲艾草、撒雄黄酒、悬五彩丝线缠的挂件等用以避邪驱毒。五月初五端午节前后举行城隍庙会，盛大的城隍出巡队伍、各路进香队伍前后相随。八抬的城隍神像、炉亭旗伞、信徒装扮的小鬼判官、牛头马面、红衣罪囚以及喧天的腰鼓、秧歌、高跷、舞狮子、跑旱船等，热闹非常。宫中与民间略同，只不过更为讲究。端午节时，清宫例在圆明园福海举行内侍“龙舟竞渡”活动，皇帝与内臣王公于“蓬岛瑶池”观看，并将大量粽子、荷包等节令物品赏赐臣下等。

秋　　季

秋季的岁时节日习俗很多，主要围绕“七夕”、“中元”、“中秋”、“重阳”各节进行。“七夕”（七月初七）是传统节日，相传此日牛郎织女踏鹊桥相会。“七夕”又是乞巧节，妇女于是夕祈福乞巧。宫中也过此节，搭彩棚，奉牛郎织女牌位。后妃祭祀乞巧，虔祝农桑繁茂。“中元”（七月十五）又称“鬼节”，僧道设盂兰盆会或作道场超度孤魂野鬼。其时街巷设鬼王棚座，万人空巷出观城隍出巡、祭厉鬼等赛会。晚间临水焚化纸糊法船、众鬼，点燃河灯，叫做“慈航普渡”。一些地区家家关门接祖，焚香上供礼拜，然后再送祖“回天”。清宫于十三至十五日放河灯，“使小内监持荷叶燃烛其中，罗列两岸，以数千计，又用琉璃做荷花灯数千盏，随波上下。中流驾龙舟，奏梵乐，作禅诵”。八月十五“中秋”节，又称团圆节，也是传统节日。家家吃月饼，团圆赏月；设香堂，妇女拜月。另有不少地区在中秋举行神仙出游的赛会。宫中则由皇后主持祭月。九九重阳节，又称登高节，“一年游兴尽于秋”，家家出外

秋游登高，饮酒赏菊放风筝。冬十一月有“冬至”，节前之夕各家饮宴称“节酒”，互送食品称“冬至盘”，并祭祖祭灶祭喜神，全家换新衣拜贺长辈，而后互拜。清帝于此日在天坛圜丘举行南郊祀天大典，回宫后举行与元旦大朝贺规模仪式类似的“冬至大朝贺”。冬至过后，就又要进入腊月的“年节”了。

五 娱乐活动

戏 曲

清代地方戏曲大发展。称为“花部”的京腔、四平腔、秦腔、梆子腔、罗罗腔、乱弹腔等绚烂多彩，与处于正统地位、称为“雅部”的昆山腔与弋阳腔（合称昆弋二腔），形成了花雅之争。康熙中叶，花部占据了主导地位。据统计，我国古代至清末的剧种共239种，清代即达202种。如今天家喻户晓的东北二人转，就是清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后，三庆、四喜、合春、春台四大徽班相继进京，在京师长期演出中，不断吸收其他地方戏曲声腔，丰富提高自己，最终于道光年间形成以徽调二黄、汉调西皮为基础的京剧，将中国戏曲文化推向了巅峰。

戏剧演出，农村多是临时戏台，北方常在阔地搭台演出。南方或在祠堂或在水中船上演出。城市或在茶楼、会馆或官宦富贵之家的厅堂演出（称“堂会”），后来永久性、专业性的戏园、戏庄、戏馆、戏楼越来越多，成了都市一景。戏园也称“茶园”，大多“午后开场，至酉而散”。园中建戏台，戏台前有平地叫做戏池，戏池中是平民百姓看戏坐的散座。戏台三面环楼，楼上是“衣冠之士”看戏的包厢、“官座”。票价各不相同。剧目有《水浒》、《三国》、《说唐》、《杨家将》等历史剧；八仙、西游等神怪剧及反映爱情、家庭的生活剧等，各戏宣扬传统的忠孝节义。听戏是清宫主要娱乐活动。紫禁城有10余座大小戏台，西苑（中南海及北海）以及西郊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等园林均有戏台。最大的是宁寿宫大戏台，共三层，设绳索机关，演出人在台中、神

从天降、鬼自地涌的奇妙景象。为增强音响效果，一层台板下设有五个地井，与后台地下的一口水井相通。最小的是漱芳斋的室内戏台，宽不及丈，高刚过人，供皇帝后妃等少数人冬季观戏之用。宫中演的戏均为宫中自编自演，据说，自康熙至宣统这些剧目达数千种。此外还经常召外班进宫供奉演出。清帝多为戏迷，对戏剧有很深的造诣。

百　戏

百戏是对杂技、曲艺、乐舞等娱乐形式的泛称。

清前期杂技包括：杂戏，有“立竿”、“吞剑”、“吞火”、“刀山”、“走索”、“坛技”、“扇技”、“舞盘”、“舞叉”、“舞中幡”、“壁上取火”、“席上反灯”、“弄刀舞盘”、“飞水顶烛”、“打球铅弹”、“攒梯飞刀”、“弄缸弄瓮”等。据载有一年八十余老艺人，能以长四五丈的大竹竿竖起，独立竹竿头上。变戏法，有“大变金钱”、“空中取酒”、“鬼搬运”等。口技，又称“隔壁戏”、“百鸟相声”。北京名艺人有画眉杨、百鸟张等。清代《竹枝词》形容道：“围设青绫好隐身，象声一一妙于真。谁知众口空嘈杂，绝技曾无第二人。”马戏，有“蓄猴唱戏”、“抽牌算命”驯鸟、“麻雀衔旗”、“跳大虫”（驯虎）、“马衔鞭”、“弄鼠钻圈”、“虾蟆教学”、“蚂蚁斗阵”、“舞蛇”等。时人说：“愈出愈奇，皆古所无也。”可见清代杂技艺术水平远远超乎前代。

清代曲艺，有南方的弹词（以琵琶、三弦、扬琴伴奏，一人或几人合演，或唱或说）、北方的大鼓（又称大鼓书。以小鼓、三弦伴奏，一人或二人唱书）、打盏儿（以筷子敲击碗盏，唱小曲，同丝竹伴奏相和）、十不闲（原凤阳花鼓）、评话（又称评书。一人讲演。清代有不同地方特色的扬州评话、苏州评话等）、莲花落（又称落子、四块玉。用四块竹板击节歌唱）。

清代乐舞，民间舞有“狮子滚绣球”、“龙灯斗”、“跑旱船”、“扎高脚”（踩高跷）、“地秧歌”、“打花鼓”、“霸王鞭”等。乐有“十番乐鼓”、“八音联弹”等器乐合奏。除上述外，又有头带面具跳大头和尚、跳钟馗、跳芒神、倒骑牛背

跳春官、赛龙神跳五鬼等。这些节目往往以民间花会的形式在迎神赛会之时举行盛大演出。有的花会应召进宫演出或在皇帝出巡时演出受到封赏而成为“皇会”,如京东“金铃祖狮”,远近闻名,技艺高超,有挠痒、掸毛、打滚、跳跃、直立、走梅花桩、攀绳等;又如“小红门红寺村子弟秧歌圣会”的地秧歌有 64 套之多的舞蹈动作。

清代百戏中最有特色的是保留了满族传统的清宫乐舞。清宫乐舞以“庆隆舞”为基础。“庆隆舞”初名“蟒式舞”,乾隆八年(1743)改称。该舞第一部分名“扬烈”,40 人出演,其中 32 人头戴面具、身穿黄布或黑羊皮衣,扮作怪兽,先行上场。其余 8 人着甲胄、持弓矢、骑竹马、象征八旗武士,从两侧上场。武士向北行一叩礼,而一与怪兽追逐舞蹈,最后杀伏怪兽,象征武功告成。第二部分名“喜起”,22 人出演,着朝服,佩仪刀,扮作大臣,上场后向北行三叩礼,而后两人一组轮番起舞上寿,舞毕三叩首而退。整个舞蹈中有歌者 13 人、伴奏 22 人,载歌载舞,亦文亦武,气势宏大,场面热烈。

体 育

首先是传统的武术。清前期武术有 62 项之多,各立门派。仅拳术即有少林拳、太极拳、通臂拳、大红拳等 20 余种。其中太极拳又形成了陈氏、杨氏、武氏、吴氏等各个支派。大师大侠,灿若星辰,民间习武,比比皆是。其中摔跤、角斗、拉架子是最普遍的体育娱乐活动。由于清朝以骑射为基本国策,射箭活动盛行。有射鼓、射鹄、射圃、射香火、射花篮、射绸、射天球等,约期为会。

打秋千、放风筝(山东潍坊风筝在乾嘉年间发展到鼎盛。扎、糊、绘、放风筝四艺,也进入精美绝伦的境界)、踢毽等都是普遍的体育项目。北方兴冰上踢球(多为铁球,也有石球,以一球置于七八丈远,用另一球踢,每人踢两次,踢中为赢)、坐冰床(于木架下镶铁条为“冰床”,又称“拖床”,人坐于上,往来滑动)、走冰鞋(滑冰)。速滑如“星驰电掣”,花样滑如“蜻蜓点水、紫

燕穿波”。南方兴赛龙舟，所谓“锣挟鸣涛鼓迅雷，红旗斜插剪波来，锦标夺到轩腾处，风卷龙髯雪作堆”。

清代宫廷中有特色的体育活动首推“布库”，即满族传统的摔跤、善扑，被视为“国技”。康熙曾以布库之计除鳌拜。清代特设有400余名摔跤手建制的“善扑营”，常在接见蒙古、番邦等时令其演练。又有盛大的“跳驼比赛”，以一高8尺以上骆驼牵至场中，跳者加助跑，做各种高难动作跃过驼背，以落地后直立不动为优胜。此外清宫中有多种多样的“冰嬉”活动，每年冬天在西苑北海举行。由八旗兵丁鞋底绑一铁条表演，乾隆时参加表演的人数达1600人。主要有“抢等”（比赛速滑）、“抢球”（裁判在冰上踢出一球，众人追抢，抢到再踢再抢，以抢到次数多者为胜）、“传龙射球”（这是同射箭结合的冰上运动。设旌门，上下各悬一球，为“天球”、“地球”。八队如游龙在冰上盘旋滑行，通过旌门时队中一人射“天球”、一人射“地球”，射中者有赏）、打滑挞（冰滑梯）等。

游　乐

棋类仍主要有围棋和象棋。牌类从明中叶出现的“马吊”，发展出“纸牌”（又称叶子。打纸牌叫做“斗混江”、“挤矮”等）、“骨牌”（打骨牌叫做“斗牌”、“抹牌”等）、麻将牌等品种。斗禽虫主要有斗鸡、斗蟋蟀、斗鹌鹑。另有“掷骰（音投）子”，又称“掷色子”：掷之于盒，以点数大小决胜负，又有掷羊秙、掷升官图揽胜图、掷状元筹等玩法；压宝（又称押宝）：旋转铜钱，俟定，以有宝字的一面为胜。这些游乐项目几乎全成了赌博的手段。更有设会（花会）、设局、设厂赌博者。用数十个人名，或用千字文内80字，或取考试士子若干姓作为赌标，任人猜买投押，赌厂开局或科考张榜，赌徒押中，主方即以其所押钱数加数十倍赔之，不中，注钱即输与主方。清代赌风极盛，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全国城乡各个角落均“以赌博为消闲之具，日夜不休”；社会各个阶层“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清

代赌博"役不能拿，人不敢问，输赢动辄千百，丰裕生涯瞬为消乏，田屋厚产荡然一空。富室变为穷汉，良善子弟流入无赖匪徒"。

思考题：

你对清朝社会生活有什么感受？

参考书目：

1. 冯尔康：《清人生活漫步》，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年。
2. 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
3. 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

第九讲

乾隆的"十全"梦

"十全老人"乾隆

"盛世"背阴之处

面对剧烈变化的世界

乾隆(1711—1799)姓爱新觉罗，名弘历。是雍正之子、嘉庆之父。他在位60年，年号乾隆，死后庙号高宗。人们习惯以年号、庙号代之，称他为乾隆帝或清高宗。

乾隆统治时期，清朝国力达到鼎盛。中国传统社会中给皇权造成严重威胁的相权、储权、外戚、宦官、朋党、强藩等或被铲削殆尽或被削弱到最低程度，国家统一，四海升平，经济繁荣，国库充裕，边疆巩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周礼》有云"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中国自古以来，"十全"代表了顶端的完美。因之，乾隆晚年自号十全老人、又自诩为千古第一完人。然月满则亏，在高度的繁荣昌盛中，清朝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外国资本主义叩关而至，严重的危机正在日益临近。"十全"，最终成为了乾隆的梦想。

一 “十全老人”乾隆

乾隆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寿命最长、掌权时间最长的皇帝(传位嘉庆帝后,又当了三年多独揽大权的太上皇)。乾隆89岁高龄,五世同堂,七代亲见。但他一生算不上十全十美。俗说人生最凄苦之事莫过于早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乾隆帝早年身世扑朔迷离,生母难以确定;中年痛失爱妻,续弦反目成仇,38岁以后即过着没有爱情的生活;晚年17个儿子只剩下5个,10个女儿只剩下和孝公主。

身世之谜

《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帝是雍正第四子,生母为四品典仪官凌柱的女儿钮祜禄氏,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子时降生于雍王府。目前史学界一般采用此说。但乾隆身世,包括他的出生地、生母、民族等,实际没有确切的结论,属历史上的不解之谜。

关于乾隆帝身世的说法和传闻最主要有两个。一是乾隆降生于避暑山庄(雍正与热河行宫宫女李金桂所生);一是乾隆为海宁陈家之子。

第一种说法不胫而走、引起天下大哗,是由于乾隆之子嘉庆帝的遗诏。嘉庆帝猝死避暑山庄,遗诏为军机处几位大臣所拟,为说明嘉庆帝死于避暑山庄不为非常事件,他们举出乾隆帝即降生避暑山庄。回銮以后,道光突责遗诏之误,说他跪读高宗实录,得知乾隆诞生地并非避暑山庄,而是雍和宫邸。拟诏大臣不敢言之无据,指出嘉庆两首御制诗诗注中明白写有乾隆降生避暑山庄。道光则指称是拟注臣工误解了嘉庆意思。可以看出,至少人们,包括道光在内,在当时普遍认为乾隆生于避暑山庄。但乾隆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有两点难以解释的疑问。一是乾隆降生日期。乾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按怀胎十月倒推,若有热河宫女李金桂,那么她怀孕

不可能早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月十三日。史载雍正(当时是雍亲王)四十九年确实随扈康熙到过避暑山庄,而且前后停留了五个多月。但回銮日期是九月初三日。即使回銮那天怀孕,到翌年八月十三日也已怀胎十一二个月,于理不合。有无可能大期而生?作家高阳即是这种说法,但没有医学根据。有无可能雍正中间潜出京城,留下一个龙种,又秘密回来?同样不可能。那么,有无可能是官书记载的乾隆生母钮祜禄氏于山庄生的乾隆?五十年(1711)五月,康熙确又去了山庄,但雍正未去,七月才去请安。钮祜禄氏临产在即,没有、也不可能同行。另一疑点是玉牒的记载。玉牒是皇族家谱,皇子出生,有详细记载,管理十分严格。若乾隆降生避暑山庄,玉牒记载却是雍和官邸,又如何解释呢?乾隆对自己的出生地似乎也搞不明白。他每年必去雍和宫瞻礼,反复言之凿凿:"余实康熙辛卯年生于是宫也。"但为什么其父雍正在山庄狮子园保留三间草房,他一直疑惑,留下了数十首表达此种心情的御制诗。归政前乾隆已80岁,所作"草房"诗中还有:"怆然对朴室,问礼向何方?"

第二种说法出自清末,说海宁陈氏世代簪缨,位极人臣,是由于雍正即位前与陈家交好,恰逢两家诞子岁月日时皆同,雍正大喜,命抱来相看,送归时,陈氏之子竟被易男为女。这种说法在小说家——远有许啸天《清宫十三朝演义》等;近有金庸《书剑恩仇录》等——推波助澜之下,流传甚广。其根据除海宁陈氏眷宠不衰外,有乾隆六次南巡四到海宁,且必住陈家园林,并将陈园赐名为"隅园"(御园),后又改为安澜园,并在京师圆明园中筑"与陈园曲折如一无二"的"安澜园";陈家有御书匾额"爱日堂"、"春辉园堂",前者意为因爱父母苦日短而爱日,后者出于唐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陈氏调包易得之女后嫁常熟蒋溥,蒋甚得恩宠,官至大学士,蒋夫人所居住所名"公主楼"云云。然金庸先生明说,陈家洛是他所杜撰。他还告诉读者,"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证,认为乾隆是海宁后人的传说靠不住"。孟森的论据是:1. 乾隆南巡至海宁,是为了阅视耗资巨大的海塘工程。2. 乾隆每驻陈园,是因海宁小县,无别处可驻,后爱陈园"结构至佳",绘图以归,在圆明

园仿建，御制《安澜园记》已说明，园名“安澜”，不过“数典而仍其名”，两园“无涉”，且愿江河湖海皆“澜安”之意。3.“爱日堂”、“春辉堂”并非乾隆题写。前者是陈元龙侍奉康熙写字时，以其父年逾八十“恭请赐书”。后者是康熙特赐陈元龙之侄陈邦彦的，因其父早亡，其母守节41年将其抚养成人之故。4.乾隆时陈家实已衰落。陈世倌虽作过内阁大学士，但因过革职。乾隆公开斥责他“无参赞之能，多卑琐之节”。5.常熟人(包括蒋溥的后人)都说不知常熟公主楼。可以说，海宁陈氏谜团已由孟森解释清楚。金庸不无幽默地说，“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官书记载的乾隆生母钮祜禄氏，也有疑问。钮祜禄家境贫寒，13岁被“赐侍”四阿哥胤禛(雍正)。时胤禛已有了嫡福晋和两位侧福晋，均出身名门，钮祜禄氏只是侍女身份。康熙四十九年(1710)冬，雍亲王染疫，钮祜禄氏奉命服侍，病愈“遂得留侍”，第二年生乾隆。其后她仍无名份，继续被人们称“格格”达十余年之久(“格格”是满语“姐姐”之意，并非影视剧中“公主”的专称)，直到雍正元年(1723)二月被封为熹妃。但《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中保留了一件雍正二月十四日册封妃嫔上谕的原始档案，这件档案与实录记载二月十四日雍正册封妃嫔的上谕有惊人不同：被封为熹妃的竟然不是“格格钮祜禄氏”而是“格格钱氏”。《清世宗(雍正)实录》由大学士张廷玉主纂，乾隆钦定。为什么封为熹妃的“钱氏”到《实录》里被改成了“钮祜禄氏”？钱氏是什么人？如果“钱氏”与“钮祜禄氏”不是一个人，那这背后又有什么秘密呢？乾隆的身世仍是一个谜。

皇后风波

乾隆结发之妻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出身名门，祖父是康熙时力主撤三藩的户部尚书米思翰；伯父是历相三朝的元老重臣马齐。雍正五年(1727)选秀女时被选入宫，指配给当时已内定为皇太子的弘历为嫡妃。乾隆二年(1737)正位中宫。因死后谥孝贤，史称孝贤皇后。乾隆与孝贤情深

意笃,曾先后欲以其所生二子为嗣,但二子均不幸殇逝。孝贤因爱子一再夭折,伤心过度致病,于乾隆十三年(1748)病故,年仅37岁。

中年丧妻,使事业上正步入辉煌的乾隆受到惨重打击,他写了不下百余首悼念亡妻的诗,中有"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谁予随","廿载同心成逝水,两眶血泪洒东风"。陷入极度悲痛的乾隆暴躁无常,使原来因纠父之偏、施政宽缓而相对平静的宦海政局掀起狂涛。100多名大员因皇后丧葬(包括办理不力、违制剃发、哀戚不够等)被处分,从罚俸革职到赐死处斩。两个最大的皇子,大阿哥永璜、三阿哥永璋莫名其妙遭到痛责,说他们"无哀慕之忱",不尽"人子之道","断不可承续大统",致使永璜不到二年便忧惧而死,永璋也以25岁的英年早逝。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川陕总督张广泗,历任两江、云贵、川陕总督庆复,佟国维之子、隆科多之弟等大员因金川之役受挫相继被杀。另有大批官员将领被杀被贬。清史专家戴逸先生指出,孝贤皇后事件反映出皇帝个人意志和情绪对历史产生的重大影响。皇权对官僚机器的调整、廷臣的换班与两代人的权力交替这样带有普遍性的历史过程,以一种偶然性的形式得以完成。

野史传说,乾隆虽与孝贤恩爱,却又与孝贤之嫂、户部尚书傅恒的夫人偷情,福康安即二人私生之子。乾隆东巡,傅夫人在御舟之后别乘一舟。乾隆与其在舟中幽会,被孝贤撞见。孝贤爱子新逝,丈夫变心,悲痛欲绝,遂于德州投水自尽。这是编造的故事。历史上确有一位皇后与乾隆在巡幸途中情断缘绝,悲愤而死,不过不是孝贤,而是乌喇那拉氏。

乌喇那拉氏与孝贤同样早从藩邸,为侧福晋。乾隆封后时得封娴妃。孝贤死时,那拉氏循序应继为皇后。然乾隆内心深处不愿任何人取代皇后的位置,拖了一年多,才在皇太后一再催促下勉强立那拉氏为后。孝贤三年忌日时,乾隆反省自己,流露出对那拉氏的负疚:"岂必新琴终不及,究输旧剑久相投。"以后,乾隆与那拉氏生了两个皇子。而不过五六年,又冷淡下来。那拉氏性格倔强、缺乏体贴入微的真情,使乾隆怀旧不已。这期间,乾

隆较多接近入宫较晚的令妃魏氏,10年间与之生了4男(包括后来的嘉庆帝)2女,晋其为令皇贵妃。那拉氏的积怨则越来越深。乾隆第四次南巡至杭州,突然下令将皇后先行送还京师,置于别宫,收缴她从妃至皇后所有册宝,等于将其永远摒出后妃之列。正式公布的原因是"皇后在太后面前不能恪尽孝道,且自行剪发,迹类疯迷"。小道消息则是,乾隆在江南要立一汉妃,那拉氏以祖宗家法制止,引发帝后激烈冲突,适至杭州圣因寺行宫,那拉氏忿恚断发,乾隆震怒云云。翌年,那拉氏在屈辱中死去。乾隆一无恻隐之心,只交内务府(本应礼部)按皇贵妃规格办理丧事。此后乾隆不再立后。令皇贵妃魏氏因系嘉庆帝生母死后追赠孝仪皇后是另例。

康熙以后,清朝后妃制度大体定型,共六等:皇后、皇贵妃各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均从秀女中挑选。秀女分两种,一是满蒙汉八旗之女,13岁即须候选,三年一次,户部主持;一是内务府包衣之女,一年一次,内务府主持。前者多指配王公宗室子弟,后者多充宫女。后宫妃嫔,都应出自满蒙汉八旗或上三旗包衣人家,有汉姓的多属内务府秀女,并非民间汉女。断不能选汉人女子为妃。康熙后宫55名,妃嫔以上的27名;雍正号称苦行僧,后宫只有8名。乾隆后宫人数比康熙少、比雍正多。从墓葬看,乾隆先后有3位皇后、5位皇贵妃、6妃6嫔、12贵人、4常在,共41名。清史专家根据清宫档案和有关记载考证确切认定,上述41名嫔妃中至少有2名是江南汉女,一为禄常在陆氏,一为明常在陈氏。其中明常在陈氏封于那拉氏死后5个月,很可能就是乾隆四次南巡途中在江南要立的那一位扬州美女。乾隆无视祖制,不但纳汉女,而且加封号,从明常在、明贵人,一直到芳嫔、芳妃,使人们看到,事业巅峰时期的皇帝,一方面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一方面情感世界空虚孤独。至于一些野史影视将乾隆描绘为微服冶游、风流成性的公子哥儿,那绝不是雄踞九五、高度自尊的乾隆大帝的真实形象。乾隆生活很有节制,不喜饮酒,不行夜宴,处事不躁不乱,很有涵养。虽有三宫六院诸多嫔妃,却并不沉溺女色。况且绝色佳丽充斥离宫别院,他没有必要去偷偷摸摸做那种下作之事。

乾隆妃嫔中，人们热衷关注的还有所谓香妃。传说香妃是回部王妃，"美姿色，生而体有异香"，回疆平定后，被掳至京师。乾隆修宝月楼(今新华门)使居之，为取悦于她，对面又建西域式的回子营。但她始终不屈，身怀利刃伺机行刺乾隆。皇太后得知，趁乾隆祭天时召来赐死。这是绝好的小说题材，金庸《书剑恩仇录》即有此情节。但实际则十分平常。据考证，香妃原型是容妃和卓氏。和卓氏维族，与发动回疆叛乱的大小和卓木同宗。其家族没有参加叛乱，反协助清军作战。乾隆二十四年(1759)，其叔、兄、堂兄进京觐见，以平叛有功授公、台吉，留居京师。翌年和卓氏被接入京城团聚，很快破例选入宫中，封和贵人，后晋容嫔、容妃。宝月楼在容妃进宫两年前即已落成。回子营也是容妃来京之前为容妃叔兄家族所建。五十三年(1788)容妃善终。其时太后已逝十年，不可能是被太后强令自杀。容妃特别之处是她的维族身份。乾隆出于笼络，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方面给与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准她常穿回服，常赐给她羊肚片、酒炖羊肉等民族食品。

总的说，孝贤死后，乾隆永远失去了和谐温馨的婚姻生活。他自觉人生缺憾，80多岁祭奠孝贤时所做的诗句中有"乔寿有何欢"，"百岁妄希延"，"夏日冬之夜，远期只廿年"。他说长寿有何幸福而言，他不愿活到百岁。即百岁而终，与孝贤相见屈指也就还有20年了。

爱女和孝与宠臣和珅

乾隆政治上大权独揽，却高处不胜寒，是真正的孤家寡人。晚年耳聋眼花、精力体力并衰，竟有刚吃完早膳又索早膳的时候。如山积般的政务不堪负担，索然无味。家庭生活上，自孝贤身故他便养成独宿习惯，嫔妃入侍毕便挥之去，久已过着没有夫妻情感的孤独生活。60多岁后膝下鲜有子女承欢。在这种情况下，内有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外有宠臣和珅，成为他不可多得的感情寄托和心灵慰藉。

皇十女和孝公主出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乾隆自皇十七子永璘

出生后十年未育,于65岁意外得到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儿,如同枯树昏鸦的荒原,突现一条清澈碧蓝、欢声如歌的小溪,其欣喜怜爱之情无以复加。清朝宫闱制度,皇后之女封固伦(汉意为国家)公主,品级相当亲王;妃嫔所出封和硕公主,品级相当郡王。和孝生母汪氏非名门之后,只封惇妃,而乾隆却破例封和孝为等级最高的固伦公主,且为她的终身大事处心积虑、逾格操办,使她下嫁盛典及豪奢妆奁,成为清朝久传不衰的盛事之一。

和珅(1748—1799),姓钮祜禄氏,字致斋,满族正红旗人。相貌英俊,出身中等武官之家,其父做过福建都统。和珅乾隆四十年(1775)任御前侍卫,初次扈从乾隆出巡,"奏对颇能称旨",受到乾隆青睐。四十一年(1776)正月擢户部右侍郎,三月为军机大臣,四月授内务府总管大臣,十一月充国史馆副总裁,赏一品顶戴,十二月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这年和珅只有28岁。从此他飞黄腾达、身兼多职,十年做到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户部尚书。其间,四十五年(1780)五月,乾隆特下御旨,赐和珅之子名丰绅殷德,指为最心爱的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额驸。宠眷至极。

乾隆晚年,和珅恃宠弄权,索贿贪污,成为臭名昭著的清朝第一贪官。乾隆死后,嘉庆赐和珅自尽,查抄了他巨大的家产,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谣。和珅家产究竟有多少,据说,抄家清单的数字加上未统计者,达八九亿,相当于清朝国库十几年的收入,是法国路易十四私产2000余万的40多倍。人们以此数目过于巨大而怀疑其准确性,但和珅贪污之王的头衔不会有误。

乾隆为什么会宠信和珅?野史传说,乾隆为皇子时与雍正一妃嬉戏,妃被赐死,乾隆以指朱记妃颈,说,是我害了你,如你有灵,二十年后再与我相会。后见和珅,骤思往事,恍觉其貌与妃相似,密召近前,俯视其颈,指痕宛在。因备加怜惜。又有说,清代取消官妓,严禁官员嫖娼,官场风气雅好男色。和珅是为乾隆男宠,与乾隆有断袖之欢。这些说法均不可信。前者属无稽之谈。后者不可思议——乾隆比和珅年长近40岁,已是望70的皤然老翁,且为明君,不可能以此怪癖纡尊臣下。惟能解释的,是乾隆晚年的孤寂。

喜爱年轻人是老年人的惯常心理。特别是和珅不但仪容俊雅、绝顶聪明，讨得老皇上欢心，而且确实干练有才，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他通晓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且博学强记，于四书五经、书法绘画、诗歌辞赋无不精通。又善于理财，内务府在他治下从入不敷出到“岁为盈积，反充外府之用”，他更会想出种种办法，让各级官吏、富室盐商自觉自愿将搜刮来的财富献出，既满足乾隆的骄奢淫逸，又不动用宫中银两。如史家所言：“乾隆以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以其不出自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而和珅虽得宠，乾隆却乾纲独断，在大的方面没有给他擅权之机。对他进过谗言的阿桂、王杰、刘墉等宠信如故，对他玩的阴谋伎俩洞鉴其奸，时时予以戳穿。史家说，乾隆之于和珅，不过“如古之俳优弄臣”，并不像对阿桂那样“真依之为股肱”。

然乾隆错走一步，以和珅年轻权重，将掌上明珠皇十女和孝公主许给了他的儿子，并在八十大寿的前一年，为他们正式完婚。乾隆将晚年最宠爱的两个人撮合成了一家人，却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灭顶之灾。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乾隆去世。嘉庆帝几乎就在太上皇灵柩之前逮捕了和珅，抄家治罪，只是在和孝公主的泣请下方给和珅留了具全尸。

这是一个悲剧，最深处是乾隆晚年的孤寂、悲凉和无奈。他需要阿桂那样股肱之臣的辅佐，也需要和珅这样谄佞之臣的滋养。而后者似乎更显温馨亲切。

清朝第一贪官和珅知遇于乾隆；乾隆不幸使爱女的幸福牺牲于和珅之手。这是一个信号。一个盛世转衰、官僚政治最腐败的沉滓开始上浮的信号。

二 “盛世”背阴之处

皇权膨胀下的腐败政治

乾隆年间，特别是中期以后，吏治问题日益严重。炽烈贪风有如迅速扩散的癌症。最重大的贪污案可举出三起：

一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案发的两淮盐引(销盐许可证)案。时两淮盐政以备办乾隆南巡为由每盐引私自提取3两盐引银之事被揭露出来。自乾隆十一年(1746)起算，两淮盐政累计提取至少达1200万两白银。经查，除用于公务467万两以外，“竟隐匿不报”。三十一至三十三年(1765—1768)任两淮盐政的是晋福。自二十二年至三十年(1757—1765)任两淮盐政的是乾隆慧贤皇贵妃高佳氏的哥哥高恒。盐总商供称，另累计送给高恒13万5900两白银。乾隆断然处死高恒、晋福，籍没家产。高恒之子高朴未被株连，后任叶尔羌大臣。又成为走私玉石案的另一贪官。

一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案发的甘肃捐监冒赈案。乾隆三十九年(1774)，经陕甘总督勒尔谨疏请，甘肃获准开纳米捐监之例。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等人相互勾结，将捐监之米改收折色银两加以贪没，又以旱灾赈济的名义将本不存在的捐监之米冒销。四十六年(1781)，阿桂率军平定甘肃苏四十三起事，屡次奏报雨水太多延滞用兵，引起乾隆对甘肃连年奏报旱灾的怀疑。经查，甘肃捐监冒赈共侵吞了上千万两白银，案涉总督勒尔谨、布政使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以及甘肃省全部州县官。按贪污1000两即绞监候的规定，应斩首贪官达102人。乾隆将勒尔谨赐死；王亶望斩立决，将贪污处死的标准提高到2万两，仍杀了56人。加上被发配的46人，甘肃地方机构一度瘫痪。四十七年(1782)初，又发生闽浙总督陈辉祖抽换侵吞王亶望入官财物案。陈辉祖之弟陈严祖冒赈案中榜上有名被处死，陈辉祖引咎交纳议罪银三万两。但他没有记取教训，顶风作案，利用查抄王亶望浙江家产

之机，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以银易金，并将一些名贵字画古玩据为己有，不料被乾隆识破，虽只获利数千两，却因性质恶劣，先处绞监候，后赐死。

一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案发的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侵亏国帑案。国泰和于易简利用手中权力，勒索属员，遇有升调，惟视行贿多寡。以致历城等州县亏空八九万或六七万之多。与此同时，又向朝中要员于敏中、和坤行贿，寻求政治保护。御史钱沣揭露了国泰、于易简的贪污纳贿问题。乾隆帝命人调查，最后以侵亏库银200余万两，令二人自尽。

诸如此类的贪污大案，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从数万两到上百万两；从个人行为到集团行为，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原有的官吏考核制度和监察制度全都失去了作用。

乾隆朝惩贪之严与贪风之盛在历史上同样著名，但其原则一是“就案办案”；一是“与受同科”。前者使贪污网涉及诸多官员(有时往往几乎是一个地区的全部官员)摆脱干系；后者使被索贿者、被迫纳贿者噤若寒蝉，若揭发便“与受同科”、同样治罪。且惩贪之中又有耐人寻味的特例，这些均可使人看到清朝中衰的实情。最典型的是李侍尧纳贿案。李侍尧，字钦斋，历任大学士、两广总督、云贵总督，被乾隆称为“天下奇才”、“最能办事”、“最会办贡”之臣。李侍尧在云贵总督任上，收贿索贿，共贪银31000两，按当时标准够判31个死罪。然乾隆不欲其死。这固然有惜才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乾隆感到李侍尧属亲信奴才。负责初审的和珅拟斩监候。为保险起见，乾隆特地绕过严格的三法司审判程序，发最高审级、但往往走形式的大学士九卿会审。不料李侍尧罪行确凿，大学士九卿会议一致认为量刑过轻，请改判斩立决。乾隆又命各督抚发表意见。机敏过人的安徽巡抚闵鹗元揣摩出圣意，提出与大学士九卿会议不同的“拙见”。乾隆遂判李斩监候，且不过半年，即以甘肃苏四十三回民起事，特旨命李“赴甘肃总办军务”。随之又令李查办甘肃冒赈案，“管理陕甘总督事”。在乾隆庇护下，李侍尧死里逃生，再次飞黄腾达。乾隆是矛盾的：既要惩贪，又要用人。事实则是几乎无人不贪。他不愿意，也根本做不到彻底揭开盖子、解决贪污腐败问题。

“十全老人”乾隆，只乐于陶醉在盛世的辉煌之中，听不得任何规谏之言。乾隆五十五年(1790)，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尹壮图请停“议罪银”。认为以“议罪银”代替处罚官员助长了贪风：贪官会加倍贪污勒索以完纳罚罪之银；清官因无力缴纳银项，接受属员资助，再遇属员贪纵便难以认真查办。然因尹壮图疏中有“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亏空甚多”，“商民半皆蹙额兴叹”等，乾隆大怒，他让尹壮图指出“蹙额兴叹者”为何人？在何处？并让侍郎庆成偕尹壮图到直隶、山东、江南各省盘查亏空。乾隆十分清楚“吏治废弛”、“亏空甚多”都是事实，但却不愿受到臣下指责而损伤自己的完美形象，降旨声称，令尹壮图到地方盘查，是欲治其以“莠言乱政”之罪，如无亏，则证明尹是“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名邀誉之举”，是污蔑地方官贪污，泯没天下百姓感戴真诚，是将“朕五十五年以来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这等于明示地方官不要给尹壮图留有口实，且在尹壮图到达之前，先五百里通知地方官，地方官则即“设法挪移，弥缝掩饰”。尹壮图查无实据，只能自认虚诳，奏请治罪，被革职留任后不久辞官。乾隆站在专制皇权之巅，独断专行。满朝文武皆苟且庸碌、缄口言事，惟求招权纳贿，官运亨通，他非所闻。道光时大学士曹振镛有一为官之道的名言：“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帝归政前夕，贪污大案屡屡发生。九月，前闽浙总督富勒浑以索取盐商等银55000两，被抄家，发往热河；前闽浙总督雅德因以取盐商银45000两，被抄家，发往伊犁。十月，闽浙总督伍拉纳侵吞库银85000余两，收受盐规银15万两，受厦门同知黄奠邦馈银9200余两，家有如意100余柄；福建巡抚浦霖婪索馈银，贪黩不法，家存银28万余两，金700余两；按察使钱受椿审理此案时，私自为伍拉纳和浦霖抽换案卷，徇情藐法，三人俱被斩首。

避席畏谈文字狱

乾隆时期，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发展，思想文化高压政策的产物文字狱也发展到最高峰。乾隆曾标榜自己"从未以语言文字责人"，然乾隆一朝有案可查的文字狱即高达130余起，因之被处死的达160余人(包括17个疯子)，其中凌迟处死的22人。

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施政方针由宽趋严。十六年(1751)，发生了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字锡公，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及地方要职，以耿介直言著称。假托孙嘉淦所作的奏稿长达万言，其中遍劾包括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尚书讷亲等满朝文武重臣；矛头直指乾隆，反对他南巡，斥责他有"五不解"、"十大过"之"失德"等。当年七月，伪稿首先在贵州发现。乾隆深为震惊，当即严令各省督抚严行查拿。不料全国各地甚至边远的云贵土司都相继发现了传抄的伪稿。传抄流播之人更不计其数。案发不过数月，仅四川一省就抓获了280余人。一年多没有结果的追查中，挟仇嫌怨、攀援诬告、买嘱贿托、串供搪塞的所在多有，社会动荡、人心惶惶，若再继续，势必官吏欺瞒、民间株连，危害更大于伪稿本身。在乾隆授意下，军机大臣将传抄伪稿的卢鲁生定为主犯凌迟处死，同时处置了一些从犯及查办不力的官员，草草结束了这场株连上千人的伪稿案。伪稿案使乾隆感到太平盛世不太平，决心大力强化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于是伪稿案后，文字狱高潮突兀而起。

乾隆十六年至三十四年(1751—1769)，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多达50余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胡中藻，号坚磨生，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官内阁学士。他依附鄂尔泰，自诩为西林(鄂尔泰姓西林觉罗)门下第一人。鄂尔泰与张廷玉同为雍正老臣。乾隆后形成朋分角立之势。时鄂已故，乾隆一方面不放松惩治已

归乡的张廷玉，一方面拿胡中藻开刀，策划了这场打击鄂党的文字大狱。乾隆从胡中藻文字中断章取义、罗织的罪状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谤及本朝"；"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是"谤及朕躬"，"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说"等。胡中藻被处死。同胡中藻唱和的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被赐自尽，一干鄂党遭到沉重打击。乾隆有效翦除了朋党势力。此外乾隆以铁血手段彻底泯灭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观念与反清意识，自三十九年(1774)始，在纂修四库全书的同时，强制查缴禁书、特别是具有反清意识、民族思想的著述，制造了诸如王锡侯《字贯》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等惊心动魄的文字大狱。乾隆又严厉打击触犯专制权威的文字与思想。四十四年(1779)，智天豹命弟子张九霄将其自编的《本朝万年书》进献乾隆，因书中直书庙号、御讳，二人均被处死。四十五年(1780)广西生员吴英呈献条陈，指出蠲免钱粮"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以文中有"弘"字，犯了御讳，被凌迟处死，其子侄五人也被处死。经过如此血腥的镇压，朝野上下噤若寒蝉，全国城乡人人自危，陷于极度恐怖之中。

中国传统士大夫崇尚气节操守，推重"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历来有犯颜极谏、为民请命者。乾隆文字狱所代表的文化高压政策，"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给士风、学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嘉道之际悲叹"万马齐喑"、呼吁"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将之喻为"戮心"。"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的国家栋梁和民族脊梁，被"戮"而殆尽，所余只苟且模棱、阿谀奉承的无耻之徒与失去任何制衡的专制皇帝。这是盛世转衰所显现的最大悲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最大悲哀。

因循怠玩必然导致政务废弛。嘉庆以后恶果毕现。嘉庆帝说他"再三告诫，舌敝唇焦"，"笔随泪洒"，但诸臣仍"悠忽为政"。从中央到地方，玩忽职守极为普遍。以刑名案件为例，嘉庆二十三年(1818)，山东一省巡抚衙门未结积案达1374起，按察使衙门未结积案竟达6080起。广东省一邱姓因出

人命，向府、道、藩、臬、抚、督各级衙门控告了177次，共17年，竟然没有一个官员亲自提讯。地方冤案不得审理，纷纷进京控告，都察院、刑部又以不敢擅自做主为由，全推皇帝。中央同样，“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工部一书吏每当土木工程，便造假册冒支国帑，贪污数量高达数十万两白银，支取工程帑项须由该部堂官审批，此书吏通常“伺大员谈笑会饮时，将稿文雁行斜进，诸大员不复寓目，仰视屋梁，手画大诺而已”，最后还是一个工头告发，才败露伏法。兵部竟将大印遗失，半年后才发觉，可知至少半年未用过印信。即皇宫侍卫也“日渐废弛，至有侍卫旷班，累日不至。每夏日当直宿者，长衫羽扇，喧哗嘻笑”。圆明园诸宫门，“乃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前”。

大有大的难处——财政经济弊病

清史专家在举出康乾盛世三大隐患之时，除了皇权过度膨胀，其他一为人口；一为物价，均属经济问题。

应该说，人口与物价的增长，既是康乾盛世的辉煌标志，又是康乾盛世的可靠支柱。然其中的隐患是：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绝大多数地区仍然靠传统的生产方式维持生存；康雍乾以垦荒为中心的传统的人口对策，没有生产力发展的新因素，不能开辟吸纳人口的新途径，终究突不破人口发展“计时器倒转”的怪圈。经济发展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不能保持与人口增长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承载力，人口增长势必突破社会经济承载力的临界点。

一方面人们赖以生存、以土地为中心的资源毕竟有限，一方面传统社会固有的弊病——土地兼并、吏治败坏、贪赃枉法等造成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更使有限的资源相对于大多数人口匮乏到了极点。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抚杨锡绂即指出，湖南“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大批失去土地的自耕农沦为佃农、雇工和流民。

佃农队伍受到挤压，地主铲佃增租，更多的农民背井离乡，成为流民。他们中有的不顾清廷禁令，进入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区，风餐露宿、披荆斩棘，还要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到嘉庆，北京城内即有乞丐流民达十万多人。

在人口高压、农民丧失土地流离失所端倪已现的背景下，奢靡之风于上层士商人群和沿江沿海地区愈益蔓延、发展，形成蔚为奇特的景观。

乾隆帝是奢侈腐化的代表。乾隆父祖康熙、雍正属开创阶段，均注重节俭。康熙六次南巡，重点在治河，少有享乐游玩之意。乾隆帝南巡，虽也巡视河工、查访民情，却多了太平盛世、十全天子的盛大排场和奢华气象。水程，船只千百艘，舳舻相接，旌旗蔽空，拉纤河兵三四千人；陆路，毁民居坟墓良田，专修御道黄土铺垫、泼水清尘。沿途行宫、尖营、牌楼、彩棚、点景、香亭争奇斗妍、绵亘数十里。所到之处，地方官搭戏台，结彩棚，制龙舟，办筵席，放烟火，大事铺张。一次运河南岸立一仙桃硕大无比，御舟驶近，忽然烟火大发，光焰四射，仙桃裂开，中现巨大舞台，几百人正串演寿山福海的新戏。如此，劳民伤财，糜费极大。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寿辰，乾隆帝为之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十余里，“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乾隆帝又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苑囿。以园林为例。可称世界园林之最的圆明园，初建于康熙，大建于雍正，基本建成于乾隆。乾隆南巡所喜名胜，均命画图携归，一一仿造，增置园中，乾隆六十年间，圆明园无日不在建筑，扩至40景，所费以亿万计。热河避暑山庄康熙初建36景，乾隆增至72景。各地官员抢运贡品到避暑山庄，动辄车数万辆，每车引马骡六七头，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又人担、驮负、轿载，不计其数，势如风雨，“争道催促，篝火相照，铃铎动地，鞭声震野”，致使古北口外道路阻塞。民谣有：“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仍是热河也。”

官僚贵族奢华浪费惊人。如权臣和珅每日早餐均以新鲜珍珠粉配制，江苏吴县珠宝商石某把从海上采集的珍珠外裹赤金箔，及时派人送至京师

和府,"凡已旧及穿孔者,摒不服",一颗新鲜的珍珠要卖银一二万两。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一碗猪肉,要杀50余头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必得杀三四峰骆驼。八旗子弟成为坐享其成的寄生阶层,他们"妄费滥用,竞尚服饰,饮酒赌博",或典卖旗地,或将朝廷所发放的口粮卖掉以追逐时尚。为此乾隆不得不一次次拨公帑为他们回赎典卖的旗地、向他们发放各种救济银两。靠国家救济而生存的八旗子弟依然故我,日甚一日。

与此同时,财政危机逐渐表面化、尖锐化。清代财政收入"经制有常",自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正赋地丁钱粮基本不变,长期稳定在两千八九百万两上下,财政收支大体恪守岁入银4000多万两、岁出银3000多万两的格局,特别是岁出中的兵饷、百官廉俸、河工岁修银、漕运费等几大项开支绝不允许有大的调整。经过一百多年后,经济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使财政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境地。

首先,官营的与国计民生攸关的经济支柱滇铜、漕运和盐业,在物价持续上涨的冲击下,由于成本提高而一筹莫展。滇铜生产与铸钱直接有关,因而关系到国家金融的稳定。康熙晚年开始,清廷采取预借铜本、产铜后厂民纳课之外由官买余铜以还本的运作方式。乾隆年间物价上涨,厂民所得铜价难偿工本。但"官给之价,难议再加",于是"民则领后补前,官则移新掩旧",日积月累,形成"厂欠"巨案。漕运与京师皇帝百官八旗的口粮俸禄直接有关,因而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定,但情况与滇铜相仿。运漕旗丁本有官方所发例定行粮月粮,修造漕船亦有部定例价,乾隆年间物价上涨,"丁力未免拮据","应得之项,惟定在数十百年之前,今物价数倍,费用不敷"。运弁奸丁借此向州县索取贴费,数额从每船百余至二三百两银递增至五六百、七八百两。盐业与老百姓的生活直接有关,因而关系到国家社会的稳定。乾隆中叶以后,盐业开始出现危机征兆。淮盐市价腾涌,高出官府定价一倍有余;长芦盐因"物价增长,盐本加重,而盐价仍照原定数目,致形竭蹶",每年亏折银七八十万两,盐商赔累不起,纷纷破产。

其次,文武官员、满汉兵丁的收入受到了极大影响。乾隆物价水平较之

康熙上涨了300%,但文武官员、满汉兵丁的廉俸粮饷几乎百年不变。清承明制,内外文武官员俸禄极其微薄。虽雍正实行养廉银制度,但与实际需求仍相差过远,当时即有人指出:“养廉者其名,而养不廉者其实也。”乾隆中期以后百物翔贵,风尚奢靡,廉俸更加不敷。官员只得另谋生财之道。于是陋规——包括外官进贡京官的别敬、炭敬、冰敬,京官保举同乡捐纳的印结费,三节两寿的节寿礼外加门包银,馈送过境官员的程仪,上任点卯的卯规,到中央六部办事的部费等形成定规的规礼——成为大小官员在廉俸合法收入之外解决办公日用之需的主要经济来源。乾隆处置陋规总的原则是:“不败露则苟免,既败露则应问,较之婪赃,究为有间。”这种暧昧态度对于陋规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陋规,又加重了吏治腐败与经济危机,上至阁老大员,下至胥吏差役,都从陋规获取厚利,“州县有千金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这些全部以各种形式的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终至积重难返。

盛世的根基开始动摇。乾隆二十年(1755)以后,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全面发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中“立有会名”的秘密结社组织共215个。而天地会的倡立,青帮早期组织和哥老会前身“啯噜”的出现,则成为秘密会党兴起的标志。民间秘密教门组织空前活跃,乾隆三十二年(1767),收元教编造谣言“戊子、己丑天下大乱”,同年九月,弥勒教宣称“子丑动刀兵”,“将符顶在头上,可免灾难”。四十七年(1782)清水教称“入了这教有饭吃,就荒乱也不怕”;五十一年(1786)儒门教称入教“即可消灾获福,常保平安”;五十四年(1789)三益教称“将来弥勒佛转世掌教,有水火瘟疫诸灾,只有念佛尊奉,方能躲避”等。乾隆中期以后,公开的武装起事时有发生。较大规模的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山东清水教王伦起事;四十六年(1781)的甘肃回族、撒拉族苏四十三、田五起事;五十一年(1786)的台湾林爽文天地会起事;六十年(1795)的湘黔苗族石柳邓起事等。最终,嘉庆元年(1796),爆发了前后历时九年,规模最大的川、陕、甘、楚、豫五省白莲教起事。

乾隆的十全武功

乾隆五十七年(1793),乾隆曾写过一篇《十全记》,相对于"黩武"创造了"奋武"一词,总结了即位以来的十大"奋武",通称"十全武功"。包括:二次平定准噶尔之役;一次定回部之役;二次平金川之役;一次平台湾之役;一次降缅甸之役;一次降安南之役;二次降廓尔喀之役。

传统社会的所谓"武功",通常是指对异族或外国的大规模军事征伐,获得了耀武扬威、开疆拓土的绝大胜利。应该说,两次平定天山以北准噶尔部的战争、平定天山以南回部上层叛乱的战争、两次反击廓尔喀入侵的战争,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版图的最后确立、中央对边疆的有效管辖和捍卫,都是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格登山大捷"、午门受俘大典、阿睦尔撒纳逃死异域、两和卓木被双双擒杀尸首献于清廷、翻越喜马拉雅山远征廓尔喀以及最高统帅乾隆往往深夜披衣坐等前线军报、逢军情紧急立召军机大臣面授机宜、运筹帷幄决战决胜的一幕幕,都永远镌刻在英雄的史册上,成为得到当时与后世公认的煌煌武功。

然而,派大军渡海镇压台湾因"文武贪污、剥民脂膏"揭竿而起的林爽文起义,两次赴大小金川镇压少数藏民,也列入"十全武功",则不仅牵强而且无耻。特别是两次大小金川之役。大小金川是四川西北大渡河的两条支流,方圆不过百里,四周全是积雪终年不化的高山峻岭,土著藏民剽悍尚武,自古不敢轻言征剿。第一次征讨屡受挫,纳亲张广泗被杀,即傅恒也只能借名将岳钟琪之名以招抚草草收场。第二次征讨历时五年,虽然取胜,但以十几万大军进攻不超过三万户的两个藏族部落,鏖战于一隅不毛之地,前后费军饷7000万两,加上商人报效、临时开设的捐纳超过亿两,无论如何也与"武功"搭不上界。

至于缅甸、安南之役,简直就是以败为胜、谎报战功了。对缅之战共四大战役,前三战均以失败告终,几至全军覆没。三次统军之帅云贵总督刘藻

畏罪自杀，大学士兼云贵总督杨应琚被赐死，孝贤亲侄、天朝将军明瑞在重围中剪辫交家奴带出，上吊自尽。乾隆不得已派傅恒四次出师，结果在缅重镇老官屯由攻为守，陷入重围。幸亏缅方同意议和，傅恒草草签约、熔炮焚舟，仓促班师。傅恒因先染瘴疠，回国不久病死。乾隆打肿脸充胖子，称缅甸"毒疠之乡"，八旗劲旅不值得"尝试"，现已足示惩创，故此降旨撤兵。安南之役败得更惨。当时阮氏攻破安南王城，安南王向宗主国清廷求援。乾隆命两广总督孙士毅领兵八千号称十万进剿，收复王城，黎氏复位。然翌年元旦庆功宴时，阮氏以雄象百头打前阵大举杀来，清兵不敌象阵大败。孙首先弃城而逃，黎氏单骑尾追共遁。孙士毅不顾被分割包围在南岸的数千将士，刚过富良江即砍断竹筏浮桥，使他们无退路而全部战死。这一败仗，被乾隆钦定的《安南纪略》粉饰为"振旅而还，无损国威"，逃兵败将，则成了英雄，说属下硬行挽缰，让孙撤退，孙鞭打喝禁，后以孙为总督事关国体，方才"整队殿后而出"云云。

胜败乃兵家常事，乾隆也不能做常胜将军。但如此拼凑的"十全武功"，反映了乾隆追求绝对完美的"十全"的虚骄心态。

三　面对剧烈变化的世界

乾隆的西洋意趣与百年禁教

对西洋文化艺术的爱好和追求，乾隆与其祖、父康熙、雍正一脉相承。康熙前已有述，雍正喜欢郎世宁的画、西洋钟表、显微镜等，戴西洋假发画过像。乾隆喜爱西洋艺术乃至器物到了狂热的程度，他在圆明园兴建西洋宫殿式的远瀛观、西洋楼阁式的海宴堂，游廊满布西洋玻璃时辰表、珐琅走兽及大幅西洋油画；兴建各式西洋大水法（喷泉），4 只山羊和 10 只天鹅喷水，12 生肖青铜兽头按所属时辰依次喷水，正午时同时喷水等。他甚至公然向大贪官李侍尧索要西洋钟表贡品："多觅几件，再有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

惜价。”不同的是，康熙注重西方器物的科技工艺，务探精蕴，力图实用；乾隆则只喜欢异国奇珍的华丽外表和装饰，意在赏玩和炫耀，对自然科学研究望而却步。对此，乾隆自我解嘲道：“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习值髫年，而今老固难为学，自画追思每愧旃。”

乾隆对西洋艺术及器物的爱好，并不妨碍他政治上对西洋的防范。康熙最终禁止了天主教，乾隆即位后，在传教士郎世宁劝说下，有限开放教禁，除禁旗人信教外，他皆不问。但乾隆十一年(1746)发生了“福建教案”，福建巡抚周学建奏称，中国民人一经入教，坚心背弃孔孟之道，男女情欲本人力无法遏止，入教处女竟终身不嫁，可知西洋天主邪教幻术诡行，像福建福安这样的偏远小县几个教士几年传教，就有2600多人成为教徒！天主教在政治上、伦理上动摇清朝根基引起乾隆的高度警惕。主教白多禄斩立决，费若望等4名教士斩监候，十三年(1749)秋，对外佯称“瘐毙狱中”，实则秘密处死。以此为发端，乾隆谕令各省督抚严查天主教，开始了百年禁教最严酷的时期。

乾隆禁教趋严，主要出于防范汉族人民与西洋勾结、颠覆清朝统治。当时有一叫马朝柱的人在棚民中秘密串联组织反清活动，宣称西洋寨有幼主，名朱洪锦，是明朝三太子；他本人能行云雾中，三个时辰可抵西洋；朱三太子将在西洋起事，复兴明朝。乾隆震动极大，要求查明马朝柱所谓的西洋寨在什么地方，却一无所获。马朝柱被通缉20多年也未拿获。一切西洋人都成了乾隆想像中的敌人。

一口通商

乾隆前中期，中外贸易有了较迅速的发展，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由500多万两上升到数千万两。然英国的呢绒等毛织品价格昂贵，中国人很少购买，平均每年亏损一二十万两白银，其他向中国输入的产品小到文具大到煤炭，也都遭到了失败，长期处于贸易逆差，不得不把大量白银

运往中国。

当时虽为四口通商,但习惯上外商多集中在广东。而清廷主要通过广东称为十三行的洋货商行控制对外贸易。十三行是乾隆中期以后清廷特许建立、具有政治经济双重作用的外贸垄断机构,代理供销外商进出口货物,负责制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承包、代交、赔补外商的进出口税,授权监督管束外商,充当官府与外商间的中介,如有交涉事宜禁止外商与官府直接往来,须通过十三行转达。英国要改变对华贸易的不利地位,首先考虑的是要打破广东十三行的垄断,他们开始绕过广州向丝茶主要产地江浙发展。这一举动引起乾隆的高度警觉,他断然下令提高浙海关的税率,明示此举不在于增税,而在于恐外国商船赴浙日众,"浙民习俗易嚣",与外人交往"必致滋事",提高税率可使"番商无利可图",回归广东。乾隆二十一年(1757)十一月,乾隆正式降旨限广州一口通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由此确立的广州一口通商体制,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方告终结。

限定广州一口通商,使外商所需生丝茶叶等从江浙闽皖等产地长途转运,增加了成本,且收缩了市场,对外商极为不利。乾隆二十四年(1759),英东印度公司派所谓"英吉利四品官"洪仁辉,以控告粤海关勒索税银和行商欠债为由,驾小船北上抵大沽口,企图闯入京师"投递呈词",要求放松贸易,增开天津等口岸,允许在宁波通商等,遭清廷严厉拒绝。洪仁辉被押往澳门,圈禁3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奉旨将广东洋商齐集一处,宣布判决,同时将代写呈词的四川人刘亚匾当着洋商们的面拉出去砍了头。恐怖气氛中,李侍尧不屑而言:内地物产丰饶,岂需远洋微末不急之货?尔等老实在广州一处贸易罢!此即所谓"洪仁辉事件"。

不久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防范外夷规条》,这是清廷第一个管制外商章程。其中规定外商不得在广州过冬,不得乘轿;外国妇女不得进入广州城;外商必须居住在指定的行商商馆,平时不准随意出入,每月只有三次可在规定时间内到附近游览散步;中国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

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不得教授外国人汉语等。

中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传统经济、特别是沿江沿海地区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深层次的影响，促进了专业化手工业市镇及农工商一体化的专业化生产区域的形成和发展，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又刺激了国内商品经济的活跃，中国开始越来越深地纳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但清廷严重背离这一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从清初开海到19世纪初期百数十年间，对外贸易政策的总体走向是对本国商人出海贸易的防范和对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的控制越来越严。明清之际中国商人远洋航海能力并不亚于早期西方殖民各国，康熙末开始延续十年之久的禁南洋贸易极大摧残了中国远洋船队自身的实力，贻误了自我发展的大好机遇。此后虽然被迫取消禁令，但更加严厉限止出海贸易，规定出海人等必须由地方官给照，守口官弁查验放行；严禁米粮、铁、铁器等货物出口，甚至丝与丝织品等也曾一度被禁止出洋；出海经商之人必须于三年之内回国，否则为自弃化外的异类，不许返回祖国。

乾隆年间的外贸政策，从积极开海贸易、四口通商到一口通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并不完全等于"锁国"，只是将对外贸易置于更严厉的管制下。其时泉州、厦门、宁波等关口仍准与南洋贸易，亚欧美主要国家地区均与中国发生了贸易关系；广东沿海大小关口贸易继续进行，贸易额仍处于持续上升的趋势。这种状况，以盛世的光环掩盖了内在的隐患。这隐患便是：严格限制对外贸易虽不等于"锁国"，然从本质讲，仍属于闭关政策。这种政策的根源，经济上在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基础，自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而产生的因循保守倾向；政治上在于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产生对汉族人民可能与洋人勾结、颠覆清廷的猜忌和防范。中国能否抵御外国侵略，取决于中外综合国力的对比。限制对外贸易，既不能阻碍外国经济、政治力量的发展，也不能改变外国资本主义向海外扩张侵略的本性，反而严重损害了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窒息了沿海地区外向型商业、手工业、航海业的勃勃生机，妨碍中国人接触和学习世界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禁锢了

中国人的思想,扼杀了中国人的进取精神,从而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可以说,正由于清廷的闭关政策,使中国贻误了走向世界的机遇,拉大了同西方的差距。

马戛尔尼来华

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十八日,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勋爵率由军事、测量、绘图、航海、医护等各方面随员700余人的庞大使团,以补祝乾隆帝80寿辰为名,精心准备了600箱贵重礼物,分乘皇家战舰“狮子号”等5艘船只,经9个月的航行到达中国。

乾隆对此“初次观光上国”的外国使团十分重视,破例许英船从天津人口,沿途接待隆重,供给丰盛,且取消了每年例行的木兰行围,准备在避暑山庄接受英使朝觐。但马戛尔尼等尚未到达避暑山庄,便开始了所谓“礼仪之争”。

清廷要求英使觐见时行外藩朝贡天朝的三跪九叩大礼,即连续重复三次下跪、每次下跪都三次以头叩地,这是习以为常的通例。乾隆密谕负责接待来使的官员婉转开导英使遵守天朝法度,并具体指示,听说洋人有以布扎腿之俗,可如此说:“虽然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拜跪,但尔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等到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然而,英国使臣以维护对等独立国英国国王的荣誉加以拒绝。在反反复复、长时间的争执过程中,有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误解、欺蒙、花絮,也曾一度激成紧张的僵局。但八月十三日万寿节,乾隆帝以通融态度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英使马戛尔尼,马戛尔尼亦表现出相应的恭敬与礼貌。据史家考证,结果是马戛尔尼以三次单膝下跪、九次以头向地的方式完成了觐见之礼。

英使自避暑山庄返回北京后,清廷认为英使来华朝贡业已完结,即颁赐国书礼品,示意英使回国。而马戛尔尼所负外交使命尚无头绪,遂急递说帖,提出准许英商在宁波、舟山、天津贸易;准许英商比照俄商于北京设立商

栈，以便买卖货物；于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的小岛让给英人使用；给英人在广州附近有上述同样权利，且让英人自由来往；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口税，若不能全部免税，亦请照乾隆四十七年(1782)税率，从宽减税；禁止向英国商人于钦定税则之外另行勒索，并请颁给钦定税则抄本一份，以便遵守奉行等6项要求。

乾隆大怒，颁发敕谕逐一驳斥，并以“此事断断难行”、“皆不可行”、“更断不可行”、“此事尤不便准行”的强硬态度全部拒绝了英使的要求。同时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及粤海关监督，于英使臣过境时务须铠仗鲜明，队伍整肃，海疆一带如宁波、舟山等处，要严加防备。九月，马戛尔尼使团离京，十一月到达广州。在广州，马戛尔尼向两广总督递交了包括11项条款的书面要求，除在京已提出的6点要求外，还有英国商人可随意与任何中国人贸易，不必通过公行、行商；英人犯罪或有不法行为，其同国人如无参与帮助犯罪者，一律不负连带责任；如英商认为适宜或有必要长期留居广州者，应准其留居等条款。随后前往澳门，于翌年返抵英国伦敦。

乾隆接见英使后返京城，径直去了陈设英国“贡品”的圆明园。“贡品”中有先进的大型天文地理仪器，如代表当时英国天文学、机械学最高水平的天体运行仪、天球仪、地球仪、地理大座钟等。另有新式武器、乐器、轻便马车、船只模型等。英使记载，乾隆对其中装有110门大炮的“皇家号”军舰模型表现出浓厚兴趣。详细询问军舰机械零件等细节以及英国造船工业达到了何种水平。在英使炫耀英国这个西方头等强国物质文明发展的最新成就时，乾隆面部表情“安详而雍容”，使在场英人均感“皇帝莫测高深”。清史专家以为，乾隆是以虚骄掩盖他的深深不安。乾隆不乏对西洋大国的观察和了解，对日渐迫近的来自西洋大国的威胁也应该有所感觉。但他无论如何放不下天朝“圣主”、“千古第一全人”的架子，去重新认识清朝衰落与西方崛起的痛心现实，只能勉力支持，在昔日光辉的追忆中，继续他的十全梦。

马戛尔尼窥破了乾隆盛世炫彩下掩盖着的衰落趋势，一针见血指出：“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

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有纪律和安全了。”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二,乾隆病危,第二天去世。

思考题:

康乾盛世何以由盛转衰?

参考书目:

1. 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年。

2. 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中华书局 1987 年。

3. 郭成康等:《康熙盛世历史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2 年。

第十讲

守不住的大清门

守门之君道光帝

打开天朝大门的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

大门失守之后

一　守门之君道光帝

爱新觉罗·旻宁(1782—1850),嘉庆帝次子,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六个皇帝,年号道光,死后庙号宣宗,史称道光帝、清宣宗。

道光帝1820—1850年在位,他的一生似乎与"门"有缘。隆宗门、午门、虎门、国门,最后是墓门。当然其中最核心的是国门——大清门。道光生活在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自幼目睹祖父乾隆的雄才大略,决心"事事效法祖宗",长期保持清朝的鼎盛局面。根深蒂固的守业思想,使道光成为有清一代最拘泥守成的帝王。守门的道光帝恪遵古训,兢兢守成,铸成其一生的悲

剧，同时亦为时代之悲剧。

隆宗门之变

道光是嘉庆皇帝的第二个儿子，嘉庆的长子不满三月便夭折，因此他受到嘉庆帝长子般的喜爱和重视。道光六岁起进入上书房，接触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从小立定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长大成人后，他又潜心于“帝王之学”，以“至敬”、“存诚”、“勤学”、“改过”四句箴言自勉，希望将爱新觉罗家族的文治武功发扬光大。嘉庆十八年(1813)发生的隆宗门事变，成为他继位的关键。正因隆宗门守御之功，最终奠定了他的储位之基。

嘉庆十八年(1813)，北方大灾。春夏旱，秋霜冻，民大饥，食草根树皮。而官府仍然催科派差，敲诈勒索，老百姓怨声载道，人心思乱。七月，八卦教分支坎卦教荣华会首林清、震卦教九宫教首李文成、离卦教首冯克善在河南道口会盟，合三教为天理教，决定九月十五日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和京城两地同时举事。林清回到大兴，从加入天理教的太监口中得知，紫禁城貌似森严，实际戒备空疏，遂定先取紫禁城，然后闭门待李、冯之援。林清认为，只要夺取大内，占据京城，嘉庆必然避往关东，天下唾手可得。林清等行事并不机密，京畿早有风闻。大兴、宛平等地竟传谣：“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而清朝官吏并没有引起警觉，更没有奏报嘉庆。嘉庆毫不知情，仍在木兰围场行围打猎。

九月十五日清晨，百余名天理会教徒分东、西两路接近紫禁城。东路20余人行至东华门被清军打散，只有5人在内应太监的引领下冲进皇宫。西路教众在太监张太策应下，顺利进入西华门，闯入紫禁城。紫禁城防卫异常空虚，宫内官兵不过100多人。道光当时正在上书房读书，得报有人攻打皇城，急忙赶至隆宗门应敌，只见一人已登上宫墙，急取鸟枪射击，当即射中。随即又有几人爬上墙头，道光瞄准为首持白旗的人，连发数枪，将那人打落墙外。其他几人见状被迫撤退。官兵见皇子这般勇敢，纷纷壮了胆，用

弓箭朝墙上猛射一气。结果敌人毫发无伤，倒是在隆宗门上留下了两支箭镞作为永久的纪念。这时庆亲王率领健锐营、火器营援兵赶到，天理会教徒寡不敌众，被杀的杀、捕的捕，起事失败。道光下令仔细搜查，勿使一人脱逃，然后带兵到西厂一带防查，又急就一折派人连夜送呈嘉庆帝。嘉庆帝回宫后，下"罪己诏"，哀叹事变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同时对皇子道光临危不惧的表现大加赞赏，加封他为智亲王，增俸12000两，甚至将其所用鸟枪也赐名"威烈"。有人对此专作一文，写道："林清似为宣宗起，一霎晴雷震太空。鸟枪一举，储位遂定，天云而雷，殆有天意。"

午门受俘

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1820年10月3日)，道光即位。即位十来天，就接到了张格尔叛乱的奏报。张格尔是新疆喀什噶尔人维族回教白山党首，幼居浩罕国，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勾结浩罕王叛乱，道光七年(1827)攻陷西疆喀什噶尔、和阗、叶尔羌、英吉沙尔四城。道光用两年的时间平叛。其间调兵遣将，运筹帷幄，根据乾隆朝西北用兵的地图指示机宜。并严守祖宗恩威并重、剿抚并行、宏观指挥、不为遥制的作法，终于取胜。道光八年(1828)五月，道光在午门同乃祖乾隆一样举行了风光已极的献俘大典。丹陛之前御道两侧陈列着全部卤簿仪仗，旌旗猎猎、器械森然。鼓乐齐鸣中，身着礼服的道光，缓缓登午门，升御座。随着赞礼官一声"进献俘虏！"丹陛大乐声中，千里迢迢被押解进京的张格尔北向跪伏。兵部尚书跪奏请旨。道光威严下旨："所献俘囚张格尔交刑部，著王大臣会同刑部严讯。"刑部司官将张格尔押出天安门。大乐奏起，王公百官望阙行庆礼，三呼"万岁"！与乃祖乾隆献俘大典不同的是，所献俘囚没有被从宽赦免，更没有赐予宗室之女，而是被"寸磔枭示"。

隆宗门之变的天理教起事属于农民起事，午门献俘的张格尔叛乱属于民族叛乱，这些都属老问题、老对手，道光恪遵祖训，都能够很好地加以解

决。道光帝在平定张格尔叛乱后称:"朕志先定,默叩天祖,勉竭寸忱,非敢邀功拓土,惟以矢守旧疆是慎",表达了他恪守祖业的心志。

墓门之"慕"

道光帝在位 30 年,一直兢兢业业,孜孜求治,希图保住大清的基业。但面对江河日下的形势,他的作法无非是恪遵祖训、谨取守势的小改小革,如严格捐纳、整顿科举、清查陋规、整治贪贿之类,多数还根本不见成效,没有新的东西和新的建树。道光大力提倡节俭,历代皇帝均以"孝为天下先",道光帝是以"节俭为天下先"。他取消南巡和木兰秋弥,只在南苑行围。他将宫女大量放还出宫,皇子公主婚仪从简。五公主出嫁时,规定包括嫁妆在内的一切费用不得超过 2000 两。他自己的御膳不得多过四样菜,有时只要一碗豆腐烧猪肝,还规定宫中妃嫔侍女非庆典不许吃肉。皇后生日千秋节属国家盛典,皇家御宴上却一人只有一碗打卤面。如果道光不是生活在 19 世纪中叶,而是此前的某一时期,他肯定是一名理想的守成明君。

但道光恰恰生活在中国社会经历大转变的 19 世纪中叶,当遇到外国列强的入侵时,面对新问题、新对手,恪遵祖训的守成之君则成了泥古不化、守不住国门的守门之君——从虎门销烟,到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大清门。

道光死于道光三十年(1850)一月十三日。在此前十余天皇太后病逝。道光以孝著称,恪守传统的守丧方式:十冬腊月,以 68 岁的高龄,在临时用泥草搭的"倚庐"中,睡草甸、枕草把,喝稀粥。王大臣劝他回宫,他不答应,终于病倒,以至于辞世。

按清制,道光本来应葬在东陵。他选中东陵宝华峪,从节俭出发,历经七年,建成一座较小的陵寝。然监造官员贪污中饱、偷工减料,建成后的第二年地宫出水。于是拆除,又在河北易县西陵龙泉峪重建。两建一拆,反比他陵都费。道光之陵在众陵中规模最小,不设"圣德神功"碑亭。道光在遗嘱中说:

各陵五孔桥南均有圣德神功碑，清汉二通，覆以碑，制度恢宏，规模壮丽。在我列祖列宗之功德，自应若是尊崇，诏兹来许。在朕则何敢上拟鸿规，妄称显号，而亦实无称述之处，徒增后人之讥，朕不取……

十分悲凉。道光之陵的隆恩殿全用金丝楠木建造，不施彩绘，以蜡涂烫，天花板上雕有群龙图案，这是其他陵寝没有而道光自己要求的，所谓“云龙钻穴，龙口喷水”，使龙升于天。除外，殿内门窗隔扇梁柱藻井也都雕以数以千计的云龙蟠龙，形成万龙聚会，龙口喷香的景象。咸丰二年(1852)二月，道光与他的三位皇后合葬龙所包围的陵墓中。这座陵墓，由道光自己命名为“慕”。墓门上镌刻着他对祖先、对清朝已逝辉煌的无限仰慕和怅惘的心语：

敬瞻东北，永慕无穷。云山密迩，呜乎，其慕与慕也。

二　打开天朝大门的鸦片战争

令守门之君道光帝死不瞑目的，是打开天朝大门的鸦片战争。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 年 6 月 3 日)，道光帝发布谕旨，令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林则徐共销毁 19176 箱零 2119 袋鸦片，殊不知引来一场对清方而言毫无准备的战争。战争因鸦片而起，故称为鸦片战争。相隔万里的英国发动了这场战争，发动战争的目的则是为了打开清帝国的大门。

大门口的陌生人

15 世纪后欧洲开始崛起，打破了旧有的国际秩序。西欧各国不断扩充海军力量，以经济实力作为后盾，通过海盗式掠夺、商业战争、超经济的政治外交手段等方式向亚、非、拉地区扩张渗透。英国是欧洲最西部的一个岛

国,领土面积仅为中国的1/36,人口是中国的1/16。作为欧洲崛起的代表,英国迅速成为世界一流强国。政治上,17世纪40年代,英国首次在世界上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权。经济上,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又首先成功完成产业革命。到1840年,英国原煤产量达到3600万吨,占世界总量的82.2%;生铁产量达142万吨,占世界产量的63.8%;英国工业产量占世界的45%,工业总产值占世界30%还多。军事上,英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战舰150余艘,海军士兵9万余人,水手2.2万人。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号称"日不落帝国"。

英国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正是靠着"美洲的自然资源,亚洲的资源和工艺,非洲的黄金和人力",才变成"世界原料的加工厂"。英国的国内市场也十分狭小,必须通过国际贸易向海外倾销大量过剩的工业品。因此,英国商人早将目光瞄准了他们脑海中富庶的东方大国——中国。

1600年,英国政府成立东印度公司,主要负责同印度和中国进行海外贸易。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商业垄断公司,在英国政府特殊政策的支持下,渐次拥有陆军和海上舰队,成为英国在亚洲的殖民机构。1787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批准东印度公司的请求,任命卡思卡特为全权大使,率使团访华。临行前,乔治三世告诉卡思卡特,这次出使除正常开展商务活动外,要向清朝政府提出割地要求,希望中国能提供一个岛屿作为永久的货栈。特使卡思卡特在来华途中得病身死,使团不得不中途返回。尽管这次出使毫无结果,却拉开了英国政府利用外交手段向中国扩张的帷幕。1792年,英国政府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遣爱尔兰人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国务大臣邓达思命令马戛尔尼向清朝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希望在"靠近茶叶优良产地,即位于北纬27°~30°之间的地方",建立一个属于英国的商业基地。马戛尔尼使团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来到中国。乾隆帝断然拒绝了马戛尔尼所有请求,他并不反对同英国进行商贸活动,但更注重商业活动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内容。马戛尔尼使华的初衷并未实现。关于这次外交活动的权威性评价是:

大使受到了最礼貌的接待，最热情的款待，最严密的监视和最客套的打发。

1816年，英国政府任命阿美士德为全权大使第三次出使中国。阿美士德此行肩负着四项任务：1. 保证对华贸易；2. 争取在中国多口通商；3. 保护东印度公司在华利益；4. 派驻公使进京。阿美士德来华后，和前任马戛尔尼一样在觐见礼仪上与清廷发生冲突。此次嘉庆帝没有其父乾隆那么好的脾气，断然拒绝接见阿美士德，英国使团只好无功而返。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及民间商人也积极寻求经济手段打开中国的国门。伦敦100多家公司联合成立了伦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希望"中国为英国制造业提供一个销量庞大而又迅速扩张的市场"。曼彻斯特的工厂主浪漫地想着："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然而中国经济的特殊形态却使英国商人的美梦成为泡影。鸦片战争10年后，一位叫米契尔的英国官员认识到中英两国经济形态的巨大差异，他评论道："在收获完毕以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起去梳棉、纺纱和织布。这个国家9/10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细的本色布都有。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因此，"我们的制造商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做法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就会一目了然。以粗布而论，我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传统小农经济对工业品的顽强抵制，加上清廷所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英国商人很难通过正常的贸易渠道打开中国市场。最终他们找到一种特殊的商品，即鸦片，由此展开了罪恶的鸦片贸易。

鸦片与禁烟

鸦片是从罂粟果实中提炼的一种毒品。罂粟最早产于古埃及，唐朝时传入中国，为观赏植物，后来用作药材。明万历末年，烟草传入中国。荷兰

人占领台湾后，为防治疟疾，将烟草、鸦片、砒霜混合吸食。这种吸食方法经厦门传入内地，至 1840 年前，造成了 250 万“瘾君子”，他们精神萎靡，四肢无力，“为无用之人，日复一日，终至奄奄以待毙”。

输入中国的鸦片起初量少价昂，一般人难以染指。16 世纪始，葡萄牙人以印度为基地向中国输入鸦片，但每年最多不过 200 箱。乾隆三十八年(1773)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鸦片专卖权，鸦片输入量迅速增加。鸦片战争前 40 年，英、美等国鸦片贩子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约计 40 万箱(每箱 100 或 120 斤)，总价值约为 3.46 亿银元，折合白银约 2.5 亿两。

道光时各地烟馆林立，上自王公宗室、大臣官僚，下至官兵百姓、士农工商、和尚尼姑、市井无赖，均吸烟成风。连道光本人也一度成瘾。《蓉城闲话》载：清朝诸帝惟道光曾吸烟成瘾。《养正书屋全集·赐香雪梨恭记》亦有道光自述即位之前吸烟之事：

> 新韶多暇，独坐小斋，复值新雪初晴，园林风日佳丽，日蚀微研朱读史，外无所事，倦则命仆炊烟管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曰如意。嘻！

他何时戒掉的不得而知，然从中可得知吸烟的普遍。其中，各级官员吸食最多，“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军中吸烟之风亦非常流行，“各省兵丁吸食鸦片者甚多”，士兵“筋骨疲软，营务废弛”，“操防巡哨有名无实”。更严重的是，鸦片泛滥使白银大量外流，国库空虚，人民生计艰难，“渐成病国之忧”。

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引起清廷高度重视，1838 年发生的禁绝鸦片论争成为当时引人瞩目的焦点。以“遇事敢言”而闻名当世的鸿胪寺卿黄滋爵向道光帝进言，请求严禁鸦片。他主张禁烟期限为一年，改变以往重海口轻内地的办法，在全国范围内禁绝鸦片。同时认为，面对鸦片屡禁不止的局面，应采取“以人为本”策略，严厉处罚吸食者，如逾期不戒，则处以死刑。对官员加重惩罚，“除本身治罪外，仍禁其子孙考试”。道光帝将此折发给地

方大员讨论。回奏的28份奏折认为黄滋爵的建议过于激进,只有8份表示完全赞成。道光帝重视大臣们的意见,对严禁一事未作明确表态。但此后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道光帝的态度。一是爱新觉罗家族内部发现了吸食鸦片者,这是道光帝万万不能容忍的。庄亲王奕賨、辅国公溥喜等在京城东郊尼姑庵灵官庙被查出吸食鸦片烟。道光帝盛怒之下进行了严厉处罚:革去庄亲王奕賨、辅国公溥喜爵位,分别发往黑龙江、吉林效力赎罪。二是居然在京师腹地天津城破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贩运鸦片案。1838年11月8日,直隶总督琦善在天津缉获鸦片13万两。第二天,道光帝下诏:"林则徐着进京陛见。"随后,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主持广东禁烟事务。

林则徐到广州后,不遗余力地进行了禁烟运动。共收缴鸦片21306箱,合237万多斤。

1839年6月2日,林则徐先行来到海边告祭水族暂避免遭烟毒。6月3日,虎门销烟。林则徐端坐虎门寨前礼台之上,一声令下,礼炮轰鸣,销烟开始。兵丁将海水引入事先挖好的两个大池中,投入鸦片,浸泡后撒上石灰,池中盐卤很快沸腾起来,烟雾冲天。成千上万的围观群众发出排山倒海的欢呼声。傍晚,池中鸦片完全销熔。兵丁打开涵洞让销熔的鸦片随退潮的海水流入大海。

销烟前后用了半个月,除八箱留作送京的样品外全部销毁。当时住在澳门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写道:

> 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了……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

鸦片战争始末

英国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及贸易活动打开清朝大门的希望,一再受挫。最终找到鸦片这种特殊商品作为突破口,又面临着清廷的全面禁绝。英国政府想到了战争这种最野蛮却最直接的解决方式。

早在林则徐向英国鸦片贩子收缴鸦片时，战争的种子已经埋藏。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以“英国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承诺：收缴造成的全部损失由英国政府承担。1839 年 10 月 1 日，英国政府决定发动侵华战争。军政大臣麦考莱下令：“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对三分之一的人类的主人作战。”作为战争前奏，随后一个月内英军对中国进行了两次军事挑衅，即第一次穿鼻之战与官涌之战。相对于英方的积极备战而言，清廷可说是毫无准备。道光帝和满朝文武都坚信，“英人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就在英国军舰兵临广州城下的同时，道光帝发布谕旨：“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战事未起，清方已输掉先机。

1840 年 6 月下旬，英国远征军侵入中国海域，封锁广州口岸和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远征军舰队由三部分组成，共计 47 艘战船。其中，海军战舰 16 艘，东印度公司武装轮船 4 艘，运输补给船 27 艘。总兵力约六七千人，分三批到达中国。其中海军两千多人，陆军四千人。陆军由英国陆军和孟加拉志愿兵两部分组成。英军并未直接进攻广东，仅做出封锁珠江出海口的军事行动。英军确立了“有效打击应打到接近首都地方去”的作战方案：“占领舟山群岛，并封锁该岛对面的海口，以及扬子江口和黄河口。”7 月 3 日，中英双方在福建厦门发生海战。清军击退了英舰“布隆迪”号的进攻，同时也付出防御工事被毁、9 死 16 伤的代价。7 月 5 日，英军进犯定海。由于英军炮火猛烈，清军难以抵挡，第二天定海陷落。总兵张朝发中弹不治身死，知县姚怀祥投水自尽。

定海失陷后，道光帝坚持主“剿”，相信“调兵合剿，不难即时扑灭”。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英军继续北犯，势如破竹，8 月 11 日抵达了京津门户——大沽口。道光帝这才发现“坚船利炮”的英军远比泛滥的鸦片更有威胁，君临天下的姿态也发生了逆转，制敌原则由主“剿”变为主“抚”。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进行了谈判，表示只要英国舰队撤回广州，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九月中旬，英国舰队陆续南撤。道光帝听说英军撤离的消息后，顿时松了口气，认为一切都归于“片言片纸，远胜十万雄师”的主“抚”策略。同时任

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与英军进行交涉。将坚决主“剿”的林则徐、邓廷桢交由刑部议处,不久又将二人革职。

11月6日,英国宣布浙江停战。停战的原因一方面是两江总督伊里布外交斡旋的结果,更重要的则是英军在舟山群岛因水土不服引起了瘟疫传播。1840年下半年中,英军因染上瘟疫死亡的士兵达450人,是整个鸦片战争阵亡人数的5倍。住院人数更是高达5300多人。11月底,琦善到达广州。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琦善下令解散全部水勇,裁撤2/3的水师兵船。由于中英双方底线不同,谈判很快陷入僵局。

1841年1月7日,英军进攻大角、沙角炮台,战事重起。清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终因实力不济,两个炮台均告失守。主将陈连升阵亡,士兵战死280余人。1月26日,英军出兵占领香港岛。次日,道光帝下令对英宣战。2月26日,英军对虎门炮台发动了总攻,战斗持续了大约7个小时,最终以清军战败而告终,虎门炮台陷落。英军仍延续了虎门之战中的无伤亡神话。广东提督关天培壮烈牺牲。他的英勇无畏,感染了战场上的每一个人。当家人领取他的遗骸时,连英国敌舰都高鸣礼炮以示悼念。

虎门之战失败后,道光帝做出人事调整,罢免前方主帅琦善,任命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果勇侯杨芳为参赞大臣,率各省防兵17000人奔赴广东作战。3月5日,71岁的杨芳来到广州。杨芳是道光名将,因狂奔千里生擒张格尔而名噪天下。杨芳一到广州,立即会晤已被革职的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商讨御敌之策。3月16日,英军进犯凤凰岗。杨芳亲自督战,击沉英军舢板两只,毙敌数名,取得了广州战事以来的首次胜利。然而,局部的胜利并不能挽回整个战局,在英军的猛烈轰击之下,广州内河的战略要地丧失殆尽。5月24日,英军对广州城发动进攻。26日,靖逆将军奕山在广州城头挂起白旗,宣布投降。广东战事清方全面失败。

广东战事结束后,英国方面也更换了前敌主帅。1841年4月,英国政府召回义律,任命有丰富殖民地统治经验的璞鼎查为全权代表。8月10日,璞鼎查到达澳门,制定了继续北上的作战计划。英军将北上的第一个进攻

目标锁定为厦门。厦门是东南沿海的门户,也是清廷经营的重点防御地区。但当时中国最坚固的防御工事在英国舰炮面前是那么地不堪一击。8月26日英军发动进攻,次日厦门城陷落。

璞鼎查的下一个目标是浙江定海。9月28日,英军进犯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和王锡朋等率5000名战士英勇抵抗,多次打退敌军的进攻。双方整整激战三昼夜。10月1日拂晓,英军集结40余艘军舰,围攻清军阵地。三总兵弹尽粮绝,力竭战死。定海再次陷落。英军乘胜进攻镇海。镇海自古以来就是海防重地,是宁波的门户。浙江防务最高行政长官、两江总督裕谦把守镇海。裕谦是当时最有作为的满族官员之一,是主"剿"战略的坚决拥护者。镇海的防御力量有清军3000余人,火炮150多门。裕谦认为,抵抗英军的关键并非炮台工事,而在士气人心。因此将骁勇善战的1000名徐州镇官兵作为应战核心。10月10日,英军采取海军掩护地面部队的策略进攻镇海。裕谦终于见识了英国火炮的威力。英军先用远程大炮摧毁了镇海的炮台工事,同时军舰上的火炮越过山岭轰击陆地作战的清军。裕谦根本无法做出有效还击,无奈之下投水自尽,以死殉国。裕谦成为鸦片战争中清朝殉难级别最高的官员。这种悲壮的忠诚,虽受到道光帝的嘉奖,却并不能挽救战争的失败。几个小时后,镇海失陷。浙江防务的全面崩溃使道光帝无路可退。10月18日,道光帝任命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调集12000士兵收复失地。奕经本是皇族中的纨绔子弟,毫无军事经验。反攻行动仅仅持续了4个小时便宣告失败,不但没有收复失地,连驻军基地慈溪亦被英军占领。

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失败,使道光帝彻底失去取胜的信心,任命伊里布、耆英为钦差大臣,赶往浙江前线向英军求和。为进一步达到侵略目的,英方拒绝议和。1842年5月18日,英军集中了浙江地区所有兵力,进攻杭州湾门户乍浦。乍浦守军奋起还击,使英军遭受重创。陆军中校汤姆森被击毙,英军付出了9人毙命、55人受伤的惨重代价。更令英军感到胆寒的是,乍浦驻军宁肯战死,不愿被俘,出现了全家自尽的悲壮场面,显示了中国人民

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坚定信念和永不屈服的民族性格。6月16日，上海门户吴淞口、宝山陷落。同时，第二批远征军抵达吴淞，英方陆军人数由2000余名骤增至1万多名。7月21日，英军放弃上海，进犯长江的第一道防线——镇江。镇江城内的1600余名清军面对数倍于自己的强敌，奋勇抵抗，使英军遭到了开战以来最为严重的损失，杀敌39人，伤130余人，几乎相当于英军所有战役中的伤亡总和。远在欧洲的恩格斯这样评价镇江战役："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战。攻陷镇江后，英军集结了70多艘军舰，沿长江继续西进。8月初，英军抵达南京草鞋底江面。此时的道光帝已彻底放弃抵抗，令伊里布、耆英"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全力与英军议和。对于谈判过程，一位在场的英国军官这样写道：

> 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中的字句和语法，中国的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我们赶紧离开。

1842年8月29日，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侵华全权代表璞鼎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通商口岸；清廷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即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协定关税。随后，中英双方在广东又签订了一系列补充条款，主要内容有：规定进出口税率为5%；领事裁判权；侵犯领海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

中英间的这场战争是由鸦片贸易引起的，最终签署的条约却没有解决鸦片贸易问题。这或许意味着战争并没有结束。可悲的是，清统治者没有从战败中猛醒，意识到与西方列强的差距，而奋发图强。道光帝甚至连英国到底在什么地方，有多大面积都不知晓。

三 第二次鸦片战争

“修约”交涉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俄等国相继与清廷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等。美国特使顾盛签约后得意地说：

> 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及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个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

经济利益是英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然而，战争的胜利并未给英国人带来想象中的商业利益，大量工业品继续滞销。1843 年至 1855 年间，英国在华倾销的工业品总值持续徘徊于 100 万至 250 万英镑之间，同战前相比几乎没有增长，倒是中国丝、茶等产品对英出口却逐年增加。为改变对华贸易的不利局面，1854 年，英国政府提出对《南京条约》进行修改，希望增开通商口岸，英商可以自由航行内河及出入内地，同时废除内地转口税和确定鸦片最低税率。

欧洲大陆的法国在 19 世纪上半叶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与殖民帝国，而将侵略的触角伸向中国。与英国通过贸易进行扩张的对华政策不同，法国的外交重心在于谋求得到远东控教权，利用扩大天主教在华势力的方式以收政治、外交、经济之利。

1854 年 10 月，英、法、美三国代表到达天津，向清廷提出联合“修约”请求。咸丰帝除答应其中公平审断民夷相争、减免上海欠税、酌减广东茶税三项外，对其余“荒谬已极”的要求断然拒绝。

“修约”交涉未果，英法政府决心使用武力。英国公使包令公开宣称：

"除非有一个武力示威的支持和强迫，是得不到条约修改或通商贸易情况的改善的"。

1856年，英、法、美三国再次提出"修约"，同样被清廷严正拒绝。于是，英、法政府开始积极寻找战争借口，准备再次向中国发动战争。

"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

英、法发动战争的借口分别是"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

"亚罗号"是一艘从事走私销赃的海盗船。船主是中国商人方亚明，住在香港的维多利亚镇。为走私方便，他聘请了一名爱尔兰人作为船长。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广州河面例行巡查时，发现"亚罗"号的非法行径，于是逮捕了其中12名中国水手，当时外籍船长并不在船上。这本是中国内政，船长也反复声明自己当时并不在场，英署广州领事巴夏礼却捏造出船长亲眼目睹中国水师在捕人时扯下英国国旗的谎言，要求释放水手并作出书面道歉。"一只划艇，属中国人所有，买了一面英国旗，这就使它成为英国船吗？"两广总督叶名琛断然拒绝了英方的无理要求。

法国的战争借口是所谓"马神甫事件"。马赖，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甫。1852年，马赖违反中法《黄埔条约》外国传教士只准在五口通商地区进行活动的规定，擅自闯入湘、黔、桂等地进行传教。1855年，马赖来到广西西部偏僻的西林县进行非法传教活动。他破坏当地风俗，干涉教徒婚姻，规定教徒及其子女必须与教徒婚配，并公然违反天主教戒律，勾引奸淫妇女。马赖的种种恶行使当地群众忍无可忍，于1856年将他告到官府。新任西林知县张鸣凤秉公执法，按照《黄埔条约》中"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的规定，将马赖处死。法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打出为"保护圣教"而战的旗号，希望对华战争既能保证其远东利益，又能得到国内天主教会的支持。

"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完全是英法发动战争的借口。早在"亚

罗号事件”发生前两周，英国内阁就做出决定，“要达到中国的心脏，除了挥动利剑直捅以外，别无他法”，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同时由英外交部密函法国外交部，建议共同出兵攻打中国。“亚罗号事件”一发生，英国领事巴夏礼即致函两广总督，“我在写信给阁下的同时，也写了报告给英公使与英国皇家海军驻省河的司令员。”

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

1856年10月22日，英国军舰闯入珠江口，攻占广州外城炮台，战争爆发。12月，法国任命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对华作战。战争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战事主要集中在广州地区。10月25日，英军攻占珠海炮台。29日，在强大火力掩护下，英军攻入广州城，但因主力援军未至，随即撤离。11月12日，英军集结军舰6艘、火炮179门，对虎门炮台发起进攻。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横档炮台失守。登上炮台后，英军发现清军的防御工事较1841年大大改进，拥有火炮200余门。次日，虎门炮台全线失守，英军取得珠江口控制权。

第二阶段从英法联军进攻广州至《天津条约》签订。1857年12月，英军集结军舰近50艘、士兵10000余人，法国远征军16艘战舰同时到达广州河面。12月28日，英法联军开始进攻广州城。联军连续对广州城轰击整整27个小时，几乎将广州城夷为平地，两广总督府的每间屋顶都布满弹痕。一位英国战地记者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 炮轰继续着，没有排炮，没有快放，没有激动。每一炮都在许多分钟的瞄准后准确地打中城墙上的目标。

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次日广州城沦陷。1857年1月9日，联军委员会建立了以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傀儡政权，开始对广州实行军事管辖。柏贵“与家丁数人，独住四堂门外”；巡抚衙门亦“层层守以洋兵，盘诘甚严”。两广总

督叶名琛则沦为阶下囚，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监狱，4月9日客死他乡。

英法联军主力在广州过冬后随即北上，集结于天津湾附近。5月20日上午10点，第一次大沽之战爆发。清军虽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武器相差甚远而仅坚守了135分钟，大沽炮台陷落。英法联军继续北上，5月26日抵达天津，并扬言攻取北京。清廷慌了手脚，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与联军议和。6月26日、27日，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相继订立。主要内容有：各国公使进驻北京；增开南京等十处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外国军舰、商船可在各通商口岸停泊游弋；修改税则，降低商船吨税；中国对英赔款400万两白银，对法赔款200万两白银等。

《天津条约》签订后，咸丰帝大为不满，认为"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省城四项，最为中国之害"，命桂良趁中英上海谈判修订税则之机，以免去所有入口税课为条件，罢议上述四项要求。清方大臣自知毁约理亏，亦恐重开战火，即采用旁敲侧击方式含混地提出取消公使驻京等要求。英方则看出桂良等人上海之行的目的，坚决表示："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双方在公使驻京问题上达成妥协，即公使在京外留驻，只是定期或因公务需要才呆在北京。同时中英签订海关税则，规定：进出口货物税率为5%，洋货运往内地加征2.5%的子口税；鸦片进口税为每箱30两等。从此，鸦片成为合法贸易商品。

第三阶段为换约作战阶段。1857年11月，英国政府任命普鲁斯为新任驻华公使。普鲁斯由香港抵上海，加紧与清方商谈进京换约事宜。与此同时，清廷趁英法联军撤离天津之机着手布置新一轮天津海口防务，任命蒙古第一名将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修复并新建大沽炮台，从全国调集兵力1.4万人进行防卫，使大沽防御能力恢复至战前的水平。

1859年6月20日，英、法公使率舰队来到天津白河口外。英使普鲁斯向清廷提出经由白河进京换约的要求，遭到拒绝。马克思对此评论道："中国当局反对的不是英国外交使节前往北京，而是英国军舰沿白河上驶。"普

鲁斯将打通白河口的任务交给英军海军司令何伯,再次发出战争信号。清廷本不愿开战,前敌主帅僧格林沁认为,“念两年抚局,一经开炮,则局势全变化,仍复隐忍静伺”;咸丰帝得知联军进入大沽亦发布谕旨,强调“勿遽开枪炮,以顾大局”。然战争还是不可避免,英方宣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6月25日,第二次大沽之战爆发。拂晓,海军司令何伯率英舰11艘、法舰1艘向大沽方向进发。英舰“负鼠”号和几艘炮艇强行拆除清军铺设的铁链、木栅等障碍。下午3时左右,英军向驻守大沽炮台的清军开炮。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分别指挥南北两岸炮台奋起还击。由于准备充分,下午4时,联军参战舰艇几乎全被击伤。其中旗舰“鸻鸟”号、炮艇“鸬鹚”号被击毁,炮艇“茶隼”号和“庇护”号被击沉。何伯狼狈逃往法舰“迪歇拉”号。海战失败后,联军陆战队千余名士兵在海口南岸强行登陆。南岸炮台守军英勇抗敌,激战一昼夜,打退了侵略者数次进攻,英法联军遭到惨败,被迫南撤。这次战役是开战来清军取得的首次大捷。参战的11艘英军舰艇中,有6艘丧失战斗力,其中4艘被击沉或击毁。参战英军1200余人,死伤578人;参战法军60人,死伤14人。

第四阶段从英法大规模扩军到《北京条约》签订。英法联军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英国,舆论大哗。英国政府立即表态:必须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首相巴麦尊扬言,“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英国政府非常重视这次失利,八天内举行了四次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对华策略。在首相巴麦尊的积极鼓噪下,英国决定再次扩大侵华战争。法国政府为保障其在远东的利益,接受英方建议,决定在侵华问题上联合行动。

1859年11月,英、法政府分别任命额尔金、葛罗为全权代表,格兰特、孟托班为联军总司令。英、法政府分别从本国及其殖民地雇佣征调大批军力,其中英军派出军舰近80艘,士兵2万余人;法军调遣军舰40艘,士兵约7000人。1860年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群岛。6月,英军主力集结于大连

湾，法军主力集结于烟台。联军最后仍然选择了天津作为北上进京的突破口。清廷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并未将各海口防兵撤回，反而增派士兵 1.3 万人。8 月 1 日。联军攻陷北塘炮台。21 日大沽炮台全线失守，24 日天津陷落。

咸丰帝闻听战报，惊恐万分，决定与联军求和。9 月 18 日，英方提出两项要求：一是英、法代表亲自朝见咸丰帝；二是张家湾的守军立即撤离。清廷拒绝英方的无理要求，求和谈判完全破裂。21 日，英法联军在八里桥突破清军最后一道防线。次日，咸丰帝出逃热河，留下六弟恭亲王奕䜣收拾残局。到热河行宫后，咸丰帝陆续命令南方与太平军作战的曾国藩、负责剿捻事宜的袁甲三等选拔练勇北上作战；降旨山东、山西、河南、陕甘等地及东北三省的督抚、将军督师勤王。

10 月 6 日，联军得到充分休整后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城。当天，英、法侵略者闯入皇家园林圆明园，犯下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滔天罪行，对这一世界文化艺术瑰宝进行了强盗般的野蛮洗劫。最早进犯圆明园的是法国步兵，甫一进入，他们"全部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这一堆无价之宝"，表现出贪婪的丑态："有的抱着皇后的红漆箱"；"有的半身都缠着织锦、丝绸"；"有的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时钟、挂钟，匆匆忙忙地走开"。英国骑兵比法国人迟到片刻，然其凶恶的劫掠面目却比法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泰晤士报》的随军记者记录下当时英军抢劫的场面："进入皇帝的宫殿后，谁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玉的时钟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劫掠整整持续了三天。10 月 18 日，英法联军为销毁劫掠罪证，在圆明园内清帝临朝之所正大光明殿部署焚毁圆明园的行动。3500 多名英军和数百名法军分别从南、北两面纵火焚烧，圆明园成为汪洋火海。

10 月 24 日、25 日，恭亲王奕䜣分别与英国公使额尔金、法国公使葛罗交换《天津条约》，同时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割让九龙司给英国，使其"归届香港界内"；退还没收的天主教堂财产，"并任法国传教士在

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使”；赔偿英、法军费银各800万两。俄国和美国也趁火打劫，分别强迫清廷签订中俄《塔尔巴哈台议定赔偿条约》和中美《赔偿美商民损失专约》，毫不费力地从中国掠得60多万两白银。俄国还利用清廷疲于镇压太平天国和应对英法联军之际，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144万多平方公里，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获利最多的列强。

四　大门失守之后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将中国纳入到世界贸易体系当中。中国传统社会在西力东渐的作用下开始发生变化，出现诸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和新情况。

租　界

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与外侨居留地不同，租界是外国政府强行租借中国重要工商业城市中的某一地区，由其进行有效法律约束和行政管辖，作为外国人聚居的地方。

1845年11月，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签订《上海租地章程》，规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屋及居留之用”，从此开租界之滥觞，出现了中国领土中国人不能出入、居住的怪现象。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各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建立租界，共计27处。租界分两种：一种是“公共租界”，主要有上海英、美租界合并后的“公共租界”和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一种是单一国家的“专管租界”，如“法租界”、“美租界”等。

为加强对租界的有效管辖，列强推行了一整套殖民主义的政治制度。

“工部局”是租界的最高行政机构，负责租界预、决算及市政建设与管

理，掌控着财政、税收大权。“警务处”负责维持租界的统治秩序，下设巡捕房。

“警务处”成为镇压、残害中国人民的暴力工具。1853 年，上海英租界“警务处”设警察 9 人，两年后增至 30 人；1930 年，上海公共租界雇佣的警察竟达到 4800 人。除庞大的警察队伍外，“警务处”还雇佣着大量暗探搜集情报，被上海人形象地称为“包打听”。

巡捕房设有监狱。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出狱后曾谈及巡捕房狱中的悲惨遭遇：“每举足不择腰膂腹背，既仆地，数狱卒因而击之，或持椎梼其胸间，至闷绝乃牵入铁槛内。”年仅 20 岁的革命家邹容更在巡捕房狱中被迫害致死。

“会审公廨”是租界内的殖民审判机构，对外国人的违法行为独立做出裁决，不受中国法律约束；涉及中、外共谋犯罪案件由双方法官共同审理。“会审”制度完全为洋人所把持，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说，他在华期间“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杀死中国人的外国人被判过刑”。

许多租界内还设有武装部队。如上海公共租界的“万国义勇队”规模达上千人，分为轻骑队、机关枪队等编制。

资本主义列强通过控制租界的行政权、司法权和财政权，将其变为真正的“国中之国”。英驻沪领事阿礼国蛮横地宣称，上海英租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租界亦造就出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畸形繁荣局面。上海租界的普遍设立，使其由县城迅速成长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航运枢纽和最大的工业城市，甚至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天津是八国租界所在地，经过开埠几十年的发展，成为近代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一到租界，就觉得辉煌华美，繁荣兴隆，物质建设的完备，外观的奢丽雄伟，足以使人羡美赞叹。”

中国人却在租界中受尽了洋人的压榨和侮辱。上海“法租界”公园章程第一条规定“不许中国人入内”；第二条却规定“有人牵领或戴着口罩的狗可以入园”。时人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脂膏，我们同胞的血肉，他们只是用我们的脂膏和血肉为他们自己谋幸福享受。这里是罪恶之薮，侵略之源，不过是人间地狱的活现。

海　关

近代中国的海关利权长期落入洋人的掌控之中。

康熙年间，清廷在上海设立江海北关，监管东部沿海的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列强开始觊伺中国的海关利权。1853 年，小刀会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外滩海关被捣毁。列强趁机当天就派兵占领了海关衙门，同时英驻沪领事阿礼国宣称，应重新建立一"正直而有效率的海关"。次日，列强们便打着"保障中国关税征收"的幌子，出台了上海海关临时管理办法。办法规定：

英、美船货出口的结关手续由英、美领事馆办理；准许货运承办人、进口商和航运商使用票据担保，取代过去现银完税的办法；所出票据须 40 天内向中国海关监督凭票付款，船舶方能离岸。

不久因各国商人的普遍反对，"领事代征制"形同虚设，上海一时成为免税的自由港。

为改变局面，上海道台吴健彰在陆家嘴附近两只老兵船上设立临时海关。英、法领事当即表示不承认临时海关的合法性。结果临时海关孤零零地立在水上，来往的贸易船只没有一艘前来纳税。万般无奈下，吴健彰只好同英、法、美三国驻沪领事于 1854 年 7 月共同组建"上海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第一个由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江海关外籍税务监督正式设立。从此海关大权开始落入洋人手中。

1867 年，清廷成立总税务司，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的后任是英国人赫德，他在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上一呆就是 50

年。赫德把持海关大权的50年中,拼命压低中国关税,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倾销工业品最便宜的市场。上海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入超港口和走私基地。

银　　行

外国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业。

1845年,英国东方银行首先进入中国,在上海设立分行——丽如银行。1864年,英国汇丰银行在香港设立总行,次年在上海设立分行。上海分行成立时,汇丰银行仅有存款300万港元,到1913年竟发展到两亿九千万元,在全国13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成为规模最大的外国在华银行。汇丰银行操纵中国金融业达85年之久,被世界银行业誉为"万能的垄断者"。从1874到1890年,清廷先后向汇丰银行借债17笔。作为交换,英国得到对中国海关、盐税和厘金的监督权;借款全部还清之前,海关总税务司一职只能由英国人担任等利益。

在巨额利润的驱动下,各国银行先后进入中国。仅在天津英租界的维多利亚大道上,即设有英国的汇丰、麦加利银行,美国的花旗、运通、大通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其场面即使与"华尔街"相比都毫不逊色。

外国银行的大量进入,一方面严重阻碍了中国自身金融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市场完全由外国银行控制,对外贸易毫无自主性。外国银行还发行钞票以操纵中国币制。为牟取暴利,各国银行大量发行本国纸币,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其后果是千千万万户中国家庭的破产。

思考题:

请发表你对"守门"的看法。

参考书目:

1.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

2. 萧致治:《鸦片战争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

3. 〔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第十一讲

下层民众反抗清朝统治和列强侵略的运动

洪秀全与拜上帝教

天京事变

义和团运动评价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和激化了清朝后期原有的社会矛盾,同时,加入了新的矛盾因素。前者势必引发下层民众反抗清朝统治的波澜壮阔的运动,后者则使下层民众的反抗运动与列强侵略的新的矛盾因素紧密相关而有了新的手段、新的内容和新的目标。太平天国与义和团即是清朝后期这样两次最大规模的下层民众反抗清朝统治和列强侵略的运动。

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的内容和经过,大家一般均耳熟能详。本讲仅介绍几个热点问题及人们印象中有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以探讨清朝后期下层民众在救国救亡道路上的求索。

一　洪秀全与拜上帝教

洪秀全的奇异梦境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与一个在科场上屡屡败北的落拓文人和他创造的拜上帝教有关。这个落拓文人名叫洪秀全。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春秀，小名火秀，广东花县官禄㘵村人。他7岁入塾读书，16岁时因家贫失学务农，18岁受聘为本村塾师，31岁以前的岁月均在读书、应试、追求功名的反复循环中渡过。他曾先后四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均未考中。一次次梦想的破灭，使他的神经与身体难以承受。第三次科考失败之后，大病40余天，经历了一场奇异梦幻，后来以此创立了开启太平天国运动的拜上帝教。

洪秀全因病获奇梦的过程，据太平天国文献记载是这样的。

道光十七年（1837），洪秀全再次落榜病倒客栈，被人从广州抬回了花县。他昏迷不醒，忽觉满眼是刺目的金光，金光中隐约有一龙一虎一鸡。恍惚中，他随着龙虎鸡来到了一处光明华丽的处所。无数高贵而优秀的男女欢呼着向他敬礼。一位慈祥老妇导引他进入一条清澈的溪流，为他洗涤全身。又一阵恍惚，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金碧辉煌的宝殿。宝殿中有一群年高德劭的人，其中不少古圣先贤，他们一起执刀剖开他的肚腹，为他换上新的脏器。他非但不痛苦，反而有一种得到新生的愉悦感。他无端地知觉到——这里是"天国"，那身穿黑龙袍、蓄着金色胡须、端坐在宝座上的老人是"上帝"、"神爷火华"……老人流泪道："尔回来了，朕的孩子！全世界的人皆朕生养，人人食朕粟、衣朕衣，却无一人记念朕，更有甚者，竟以朕赐之物礼拜魔鬼！尔切莫效法之！"他擎出一柄宝剑、一颗印玺，交给洪秀全道："朕今赐尔法宝，命尔�服邪神，灭除魔鬼！"洪秀全手执法器，自觉已成帝王。老人复对洪秀全道："尔放胆去做，朕必佑汝！"说着亲领洪秀全出殿，命其向

下俯视，道："且看世上之人，尽皆心邪行乖也！"洪秀全俯览全世，只见众生一切苦痛与罪恶皆现眼前……正自嗟叹，老人自背后猛推一掌，道："勿负朕托！"洪秀全自云端直跌下去……洪秀全猛然睁开眼睛，穿衣起床，向其父长揖道："天上至尊的老人已命全世界之人归向于我，世间万宝皆归我有了！"说着转身出屋，左右跳荡，前后冲突，如执刀剑拼杀状，口中大呼道："斩妖！斩妖！这里有一只！那里又有一只！尔众妖魔！且抵得住我宝剑一挥乎！"家人以为他中了邪，请来巫师逐鬼。他却微笑道："那些妖魔怎能反抗我呢？许许多多都不能反抗我。我必要斫死它们。尔等何须如此？"言毕倒头昏睡。一连40余天，洪秀全时睡时醒。睡时，他觉得自己又升了天，看到那黑袍金须的老人在训斥孔子，责其经书不能阐发真理，孔子俯首汗颜，唯唯告罪；遇到一个他称为长兄的中年人，中年人带他追杀妖魔到天涯海角。众妖魔变化无穷，他玺印一举，宝剑一挥，无论何种妖魔，无不立行遁去。醒时，他劝周围人敬拜老父，常垂泪道："你们同妖魔交好，不敬拜老父，真的，真的，你们没有心肝，没有良心！"有人戏称他万岁，他欣喜然诺；有人呼他为疯子，他反斥其人道："你才真是疯了！"他曾做诗一首，曰："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丈，易象飞龙定在天！"一日清晨，洪秀全将要离床之时，忽闻村外树上有春天的鸟鸣。遂顺口吟道："鸟向晓兮必如我，我今为王事事可。身照金乌灾尽消，龙虎将军都扶佐。"吟毕，他觉头脑骤然清醒，大病竟已除了。

洪秀全将愈时，其父在门缝中发现一纸条，上书"天王大道君王全"七个红字，遂将"洪春秀"改名为"洪秀全"。人都说他病愈后变了一个人：身体增高增大。发黑，须长而作朱砂色。面圆颜白，鼻高耳小，双眼大而明亮，每看人则目光射出。声音清晰洪亮，发笑声震屋瓦。姿态高贵庄严，目不斜视，耳不旁听，寡言少语。坐时体直容壮，双手置膝，腿不交股，行时步履不疾不除。体力特殊强健，知识力亦罕见绝伦。

“梦醒状态”与拜上帝教

据太平天国研究专家简又文等先生考证，洪秀全第三次落第回乡，连续患病40余天得此奇梦，并非为号召人心编造的神话迷信，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洪仁玕幼年时亲眼目睹其病发之状，对外国传教士详细口述笔述，而传教士韩山文亦必详慎审查，信其言为真实，方肯书之传世；又有洪秀全两兄亦亲见其事，后奉诏著有《共证福音书》等。

洪秀全患病及得奇梦，源于精神受到巨大刺激而诱发的急性精神病。1953年，简又文先生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及伦敦大学的香港精神病院院长叶宝明医生探讨此事，叶宝明医生于1954年发表长篇论文，剖析了洪秀全的病与梦。他指出，洪秀全患的病，精神病术语叫做“梦醒状态”。“梦醒状态”有两种，一种为神经昏乱即歇斯底里；一种为精神分裂，洪秀全属前种。洪秀全在大悲苦与大失望之后，其忧郁、愤恨、羞耻等同时迸发的激烈情感，引发了急性精神病——歇斯底里的“梦醒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由于神经昏乱的作用，会出现光怪陆离的幻觉，随之发生“一串连贯的故事”，而患者，具体为洪秀全，则成为参与并实行此故事的主角。故事中，患者完全征服了一切个人的挫折与失败，已往所不能实现之大欲望，尽得满足和填补，犹如白日做梦，然不能分清真实世界与梦幻世界。洪秀全在科举失败的残酷中愈发地自我认同，自我肯定。无能为力和自愧无用之感，经过他的幻觉明显化成了相反的方面：相信自己是纯洁无辜的，本应生活在幸福的天国之上，现在到世上承受这份苦难，正是上帝对他的考验，要他承担起斩尽世上妖魔的重负，他从而相信自己是无所不能的。这种病状延续到真正梦醒之后。患者虽然意识到那是一个梦，但逼真的梦境仍然留在患者的意识中继续出现，与真实的世界并存。当真实生活中遇到某种契机，使梦境得到印证和解释时，便会使患者潜意识的观念成为“妄想狂”的有意识的“强迫观念”。这正是洪秀全创教建国的滥觞。

洪秀全第四次科举失败、穷途末路之时，突然想到了五六年前那场大病中的奇梦。他不再悲戚，买舟还乡，途中高吟反诗："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坤乾。"到家后将经书怒掷于地，破唇大呼道："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不久，他偶尔翻阅了一套束之高阁的小册子——《劝世良言》，那是他道光十六年(1836)[1]第二次科场失意后，在广州街头遇美国传教士施迪芬布道而获赠的梁阿发所撰基督教福音书。一读之下，大为惊异，竟从书中看到了他梦到的一切……他亢奋到极点，感到大彻大悟，获得了上天堂之真路和永生快乐之希望。洪秀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奇梦，正由于他过去曾不经意地读过这套书，书中内容留在了他的潜意识中。当他受到极大刺激、神经昏乱之时，这套书的内容及他固有的大志、观念、经历、妄想，便从潜意识中调动出来，构成满足他大失望大失落的一串梦境的材料。如今他重读此并无印象的书，与梦境互相印证，竟相符合，随即欣喜若狂。正不知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

洪秀全摒除了已往一切内心的痛苦，自信受命于天，在天父上帝之下自居天王，欲肃清妖魔，建立天国，开始了他的宣教活动。最先接受并皈依洪秀全拜上帝教的，是他的两个密友，冯云山(1815—1852)和洪仁玕。洪秀全铸斩妖剑，整日挂在腰间，口出狂言道："手提三尺定山河，四海民家共饮和。擒尽妖魔归地网……太平一统乐如何。"同时，带领二人四出毁坏神像，撤弃孔子牌位。行动激烈，态度暴戾。父老纷纷斥责，族人群起而攻之，就连书塾也因此解体。洪秀全等人不得不离开家乡，到广西传教。一段时间后洪秀全返回花县，继续授馆。一面不断将自己的感性知觉上升为理性教义，又以通晓易懂的语句，编写成"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教化民众的诗文。洪秀全从个人境遇出发的反叛意识，形成了推翻旧世界、开创新天地的系统理论。

---

〔1〕太平天国文献均记载洪秀全于道光十六年丙申第二次应试。但实际上道光十六年丙申没有乡试。

这理论的特点，是确立统一的意识形态：皇上帝是天上凡间主宰一切生死祸福的独一真神，大共之父。只要一心遵从天父天兄旨意，即可实现美好的理想。这理论的基点：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建立统一和谐、公平正直的社会秩序；君王不滥杀，人民不为盗；强不犯弱、众不暴寡。这理论的核心，是平等平均："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洪秀全以中国传统观念、道德伦理为民立"正"，以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几千年的"大同"梦想，描述他的天国：一个同居共财、温暖温馨的大家庭，人人都是皇上帝的儿女而具有同样高贵平等的人格，各尽所能，乐于助人；没有战争、欺诈和掠夺……而这一切都要通过推翻清朝统治、杀尽妖魔方可实现。这些理论，尽管只是带有传统文化烙印的乌托邦式的空想，却反映出当时下层民众寻求解放、反对压迫的强烈愿望，理所当然地成为太平天国凝聚天下人心的旗帜和反清革命的理论依据。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教，已非他在《劝世良言》小册子中读到的原来意义上的基督教。从教义、内容到目的、宗旨，拜上帝教都可以说是一个有着类似基督教的外壳，实则是中国化的、为中国农民运动所用的一个新的宗教。

洪秀全作为一介书生飞黄腾达的仕途，从破灭到以拜上帝教的信仰绝路逢生。他在潜意识和真意识中杂合西方基督教素材和中国传统观念创造出的新的信仰，必然是对传统观念的反动，对现行政权亦即清朝统治的反动。至少这一点，成为他与农民为主的下层民众相结合的契机。一旦下层民众找到了这种与他们的梦想有着相同点的新的信仰，一旦这种新的信仰掌握了下层民众，一场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的的风暴便降临了。

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

道光二十七年(1847)夏中旬，洪秀全来到广西桂平紫金山黄泥冲与冯云山会合。洪秀全惊讶地发现：一别三载，冯云山竟然将他创造的思想信仰

成功地传布推广，发展了三千徒众，成立了“拜上帝会”。而他本人则从梦境中授命于天的上帝次子，成为了实实在在“拜上帝会”的教主。“拜上帝会”使洪秀全个人的宗教理想现实化，进一步激扬了他的宗教热狂，坚定了他自认上帝次子，身膺天命，除妖拯民，为人间帝王的信念。他与冯云山同心合力，传教布道，四处“讲道理”，分发传教诗文。拜上帝教以广西紫荆山区为中心，迅速蔓延开来，甚至发展到了广东。终于有一天，官府拘捕了冯云山。洪秀全大惊失色，以营救冯云山为名返回广东。洪秀全自兴教以来，基本一路顺利。冯云山被捕，是否使他突然感到虚弱胆怯，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呢？冯云山说服押送他的兵丁入教而获释。道光二十八年(1848)冬，二人会于花县。其间，二人常与同志契友到山野间聚会，论理读经，密商大计。应该说，洪秀全、冯云山是因个人避祸，离开广西或者说逃离广西的。在长达一年半多的时间中，洪冯置“拜上帝会”与“拜上帝会”的会众于不顾。但是，种已播下，箭已上弦。“拜上帝会”群龙无首，发生了种种变故，却仍坚持下来。两广民间夙有神灵附体传言的迷信。“拜上帝会”陷入低潮之时，会内屡屡发生此“奇异”之事。神鬼借人、实则反对派势力借神鬼说话，劝诫责骂、妄作预言，散布对拜上帝教教义乃至洪秀全本人的猜疑和不满。会内人心惶惑，几至分裂崩溃。在这情况下，山民领袖杨秀清及萧朝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先后“神灵附体”，分别代“天父”、“天兄”传言，以严厉肃穆的神态，理义精辟的言辞，震慑了会众，确立了天父天兄及天王洪秀全的绝对权威，扫除了反对派别，巩固了“拜上帝会”。道光二十九年(1849)夏，洪秀全、冯云山重回广西，接受了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的事实，承认了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天父”、“天兄”直接下凡，使更多的信徒聚于“拜上帝会”的麾下，最终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 年 1 月 11 日)，洪秀全 38 岁生日那天，祭起了金田起义的大旗，建号太平天国。

拜上帝教教主与太平天国领袖

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天国全军50万众、舳舻万艘,自武汉压江东下,攻入南京,即改南京为天京,以之为都城,自此至1864年天京陷落,与清廷对峙了14年之久。其间,太平军北伐、西征、东征,先后攻占600多座城市,势力发展到18个省。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整体进程中,人们更加强调洪秀全"教主"的身份,认为他迂腐无能,陶醉在自己一手创造神话天国中,"僻处深宫,从不出户",不问政事、军事、国事,一心钻研宗教理论,千方百计在每一个细节上比附基督教的各种经典,更加离奇地编造新的宗教神话,更加频繁地发布大量宗教文书,将军国大事完全交给了杨秀清等人。清朝官方亦传言洪秀全是个木偶,并无其人,太平天国真正的领袖是杨秀清。

要弄清洪秀全是不是太平天国真正的领袖,需要了解太平天国实际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成为太平天国的国教。太平天国颁布了大批宗教文书,从基督教《旧约》、《新约》等译本、拜上帝教各种诏、檄、劝世文、天情道理书,一直到针对孩童的《三字经》、《幼学诗》,使洪秀全拜上帝教的理论观念深入到太平天国每一个成员之心。而几乎所有拜上帝教文书都是基于基督教教义、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及现实需要加以改造的。如太平天国《十款天条》源于摩西《十诫》,除了中国化而通俗易懂外,将吹洋烟(即吸食鸦片)等也列入其中。太平天国的社会组织政教合一。《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最基层每25家设1所两司马礼拜堂。每礼拜天25家人众由伍长率领到礼拜堂,听讲道理,赞美天父皇上帝。两司马礼拜堂以上设立各级礼拜堂,由相应的军政官员主持宗教活动。再上,是与天王同为上帝之子的东、西、南、北、翼五王,五王共同主持高层的宗教会议,其中又有两王分别代天父、天兄传言。最高层为教主天王洪秀全。然因当时处于战争时期,以上规定至少两司马礼拜堂制度同《天朝田亩制度》其他

规定一样，并未全面付诸实行。礼拜堂并非独立的教堂建筑，而是在公衙、馆宅之中设一“天父堂”礼拜上帝。太平天国的宗教活动分日常、礼拜天、不定期三种。太平天国规定，日常每天早晚天国上下均须举行礼拜祈祷活动。“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凡传令听讲道理，如各官有无故不到者，枷七个礼拜，责打一千，再犯斩首不留……”晨昏祈祷的锣声首先从天王宫内传出，而后一家传一家，直至全城每一角落都闻其响声，再由守城士兵传递至郊外远处。闻声之人，从上至下，无不下跪祈祷。晨昏之外，饭前也须祈祷感谢上帝。同样鸣锣聚众，率诵赞美，末句高呼“杀尽妖魔”，开饭。礼拜天的宗教活动更为隆重正规。礼拜六半夜全体军民即开始祈祷，直到礼拜天天明。正午及黄昏又有两次宗教集会。其时店铺关张、百工歇业甚至休战。不定期的宗教活动“讲道理”，一般在重大军事政治行动之前举行，由各王或主将在旷场中间所筑高台宣讲，其时各军环集、平民男女老幼云集于各师旅之间，听者往往逾万人。各种宗教活动中，太平天国领袖们会晤，共同讨论宗教问题，共同祈祷天父皇上帝的呵护与扶助。洪秀全本人每月则有一二次率各王至天门外特设之“天台”，举行礼拜天父皇上帝的仪式。“天台”高二三丈，方广四五丈，四圈有栏杆，用黄布遮台角。礼拜时焚檀香，数十面大锣齐鸣，声彻满城。这显然是对历代君主亲率百官至天坛行祭天大典的仿效。这个政教合一的地上天国，有着浓重的中国传统的家庭色彩。皇上帝不是西方抽象的形而上的上帝，而是具体的有妻有妾、儿孙满堂、留着金色胡须的慈祥的天父。长子耶稣和次子洪秀全从皇上帝元配老妈肚里所生。洪秀全入世又从天上另一位亚妈肚肠所生。耶稣与元配天妻生有三子二女。洪秀全也有天妻天子。这个政教合一的地上天国，体现着中国老百姓平等平均的千年梦想。从皇上帝为天下共父的观念出发，人人都是皇上帝的儿女，都是平等的兄弟姐妹，都有尊贵的灵魂。洪秀全又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将皇上帝命太平真主拯救人世的旨意解释成要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理想。

从以上出发，便不难理解：洪秀全是拜上帝教的教主，同时，兼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

事实上，洪秀全也确实领导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全过程。他创造拜上帝教的思想信仰、发动了金田起义。他两次建立领导核心，前期永安建制，分封诸王，使太平天国初具规模，加强了领导力量，提高了太平军战斗力，为太平天国的迅猛发展打下了基础；后期在“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局面下，选拔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主持军事，任命洪仁玕提理天朝政务，使太平天国继续坚持下来。他颁布了两个重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纲领。前期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建立新的平等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其完备性和深刻性使太平天国运动达到了中国历代农民运动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境界。后期“旨准颁刻”洪仁玕撰著的《资政新篇》，拟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期望“与番人并雄”。虽然由于“不合时宜”，两个纲领都未能实施，却反映了洪秀全作为领袖应有的眼光和素质。

天京事变以后，拜上帝教失去了往日风卷残云的战斗精神，逐渐蜕化为一种空洞无物的宗教形式。咸丰十一年(1861)底，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联合向太平天国发起了进攻。同治三年(1864)年初，天京成为一座处于重重包围之中的孤城。洪秀全却宣称天父托梦让他“勿再自理庶政”，对与宗教无关的大部分事务抱轻蔑态度。人们对拜上帝教的信仰越是动摇，他越是以十倍的虔诚与疯狂笃信自己编造的宗教神话，喋喋不休地向人们和自己反复申明天父、天兄，梦中见到的一切，带领军民频繁举行礼拜祈祷皇上帝的隆重仪式，几乎每天午后都放炮九声，将有关诏旨悬于门外，“所言皆天话，梦话，并无一语及人间事”。就像溺水的人紧紧抓住一根稻草，以为这样，便可收拾天国人心，挽狂澜于既倒。面对将领让城别走的劝谏和无兵无援的奏报，他憔悴的脸上浮着病态的红晕，厉声道：“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朕之天国，稳如磐石，又安可坏毁！”1864 年 6 月 3 日，洪秀全染病身亡。临终前，他下了最后一道诏旨：“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

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

1864年7月19日，天京城破。

二　天京事变

天京事变的责任者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关节点之一。

1856年秋，东王杨秀清伪托天父下凡，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9月1日深夜，驻扎在江西的北王韦昌辉突然率船200余只，军士3000余名赶回天京，于2日凌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东王府，杀了熟睡中的东王杨秀清及其妻小，接着大肆残酷屠杀所谓东王党羽，连婴儿也不放过。天国军民丧生者达两万余人，无数长发尸骸从天京观音门漂流出江。督师武昌的翼王石达开获悉赶回天京，诫责韦昌辉滥杀无辜，企图平息势态。不料韦昌辉竟欲加害石达开。石达开发现处境危殆，连夜杀出城外。他留在天京的一家老小数十口人，却未能逃脱厄运，在新的屠杀中无一幸免。两个月的恐怖统治，天京军民忍无可忍，合力杀了韦昌辉。但悲剧并没有结束，石达开回朝辅政半年，受到洪秀全百般猜忌，竟率十数万精兵良将离京出走，只给天京和天王六七千老弱残兵。

天京事变谁是责任者，成了长期以来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段时期中，人们以为出身地主的韦昌辉罪责难逃：或是“擅杀”（洪秀全、杨秀清均无责任）；或是“滥杀”（洪负主要责任或杨负主要责任）。但实际于理不通。如果是北王擅杀东王，那么，当时驻江西瑞州的韦昌辉，驻江苏丹阳的秦日纲何以能同时得知杨逼封万岁的消息，同时赶回天京？后到的石达开何以仅仅指责韦昌辉杀得滥了，并不指责其擅杀呢？如果说北王滥杀，那么“滥”，是指超出了洪秀全规定的限度。但韦昌辉大屠杀自七至九月，长达三个月之久，洪秀全并未采取任何制止的措施。是否洪

秀全当时没有能力制止呢？不是。韦不过带了3000心腹回到天京，而天京兵力有十余万之众。并且，从最初能够鞭责韦，最后能够诛杀韦来看，洪秀全完全可以采取行动，事实却相反。惟一能解释得通的结论是，韦昌辉奉洪秀全诏旨，袭杀了杨秀清，又在洪的默许或支持下，进行了滥杀。随着事态发展，韦昌辉从洪秀全、石达开态度的变化，觉察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逼走石达开，杀其家小。然终在洪秀全撤去支持以后，成为天京事变的牺牲品和替罪羊。

如果从韦昌辉公报私仇、积极扩大事态乃至后来不以大局为重，杀石达开家小甚至包围天王府，认为他确有责任的话，那么，洪秀全更有责任，天京事变中韦昌辉不过是执行者，洪秀全则是幕后操纵者。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宏图未竟、与清朝对峙的关键时刻，把屠刀加在了主要助手杨秀清身上，加在数万久经战火洗礼的天朝"老兄弟"身上，致使已成瓮中之鳖的湘军得到反败为胜的喘息机会，致使天国人心失散、朝纲紊乱，各方面都出现了危机。杨秀清有责任，天京事变中韦昌辉不过因滥杀及包围天王府蒙上了树立个人权威、争权夺位的嫌疑，而杨秀清则骄横跋扈，无视领导集团洪杨韦石的团结，邀封万岁，激化了内部矛盾，以致酿成了天京事变。石达开有责任，天京事变中韦昌辉杀了二万多人，其中不少为"给事"、"仪从"、勤杂人员及妇女老幼，兵员至多不过一万余人，而石达开出走，带走了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十多万人，造成天国兵员严重损失。韦昌辉的责任同上述相比，又应如何评价呢？

那么是否罪在洪秀全？换一个角度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最高领袖和灵魂，深得天国上下拥戴。杨秀清虽然代天父传言，但毕竟是四兄。后又专横擅权，在群众中已生怨望。洪秀全为维护天国领导集团的团结，曾做了很大努力，甚至俯伏在地，准备接受杨的杖责。直到杨邀封万岁时才起意杀之。如果杨取代了洪，同样可能出现另一幅混乱血腥的画面，甚至结局会更惨。如此说来，洪秀全有什么可指责的呢。是否罪在杨秀清？杨秀清确实讲排场、搞特权，导致个人野心膨胀。但是杨秀清讲排场搞特权的程

度，是与太平天国自天王始讲排场搞特权的程度成正比的。如天朝礼制规定：天王轿夫 64 人，东王轿夫 48 人，最次至两司马也有 4 人。又如天王从永安突围时有 36 妻妾，到天京后妃已达 88 人。在远没有完成推翻清朝的事业时，天王就躲进深宫过起皇帝瘾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上是东王一直在总理军国大政。东王几次借天父传言，或当面直谏，甚至想杖责洪秀全，都是因洪脱离群众、作威作福而起的。如此说来，杨秀清有什么可指责的呢。是否罪在石达开？石达开出走天京，是遭忌惧祸，并无意带走合朝好兵好将。他晓谕军民的告示中明白地写着："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但是，跟他出走的竟有十数万人。这是天朝军民理想信仰受到严重打击的结果。如此说来，石达开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个人责任不容易搞得清楚，也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天京事变的悲剧

天京事变中，洪秀全指使北王杀了东王。然后又杀了北王，挤走了翼王。他胜利了。但他真是胜利者吗？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已不是单纯的组织手段，而是农民运动的思想理论武器、天国各项政治经济策略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才能够动员成千上万农民，席卷半个中国，与清政权对峙十余年之久。然而，也正因为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一切——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根本的出发点和支撑点，一旦坍塌，天国大厦便难于维持。洪秀全早期曾反复教诫人们："人自相残甚恻哀"，如今他却亲手导演了不仁不义、残杀"胞弟"的惨剧。人们心目中平均平等的理想天国以及作为其化身的洪秀全的神的形象，一齐破灭。有民谣道："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依旧做长工。"清方的记载则是："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统，依旧让咸丰。"这恐怕反映了太平天国中农民与地主两类人的思想。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不再相信他人，他大封同姓，以洪家天下代替皇上帝天下，以"上帝天国"，后又以更为明确的"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取

代原来的“太平天国”之称。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如果说，洪秀全多年来没能积累领导实际斗争的经验，难以承担杨秀清留下的重任还不是最可悲的话，那么，最可悲的是他没有认识或不愿认识，他需要完成从神到人的转变这一点，相反却更加固执地要过神的生活。天京被困，形势阽危之时，他仍不问世事。李秀成向他建议保存实力、弃城北上，他断然拒绝了，不是出于革命的英雄主义，而是出于自己受命于天、必有天相的可悲可怜的信念。天京陷落前夕，他染病身亡，直到最后也没有屈服。他的死，是悲壮的。当他孤独地踯躅在天堂地狱之际，他或许应该从天京事变与他的死、与他尤其要为之恸哭的天国之“死”中，找到一些联系。

天京事变中，杨秀清被杀，两万多将士殉他而去，杨秀清失败了。但他真是失败者吗？杨秀清原是广西桂平紫荆山一个烧炭佬、拜上帝会最早参加者之一。可以说，“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使上下军民“只知有天父兄，不知有妖魔鬼”的奥妙，只有他及有数的几个人明晰。他目不识丁却极为聪慧，危难之际机智地代天父传言，扫除了反对派别，挽救了拜上帝会。他本人也因之跻身于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层，成为仅次于洪秀全的领袖人物。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教，杨秀清使人们对拜上帝教的信仰达到狂热。在甚至包括洪秀全在内的拜上帝教狂热信徒中，杨秀清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以非凡的政治军事才能和领导组织才能运筹帷幄，娴熟地使用天父附体的手段，指挥天国一切军政大事。使太平天国初期“令行禁止，臂指自到”，“拓土开疆，日辟百里”，取得了重大胜利。可悲的，也许正是杨秀清在宗教生活中的过于清醒，这种清醒，反映到现实政治斗争中，则扭曲成了另一种热狂。杨秀清本已掌握了天国宗教、政治、军事一切实权，并得到了洪秀全承认。然而，杨秀清的个人权欲却在无限制膨胀。他把东王府变成了天朝之外的又一天朝，设立了全套政权机构，一切刑赏生杀，升迁降调，皆专决之。开科取士，竟公然以“四海之内有东王”为试题。其部下也公然声称要“护卫东王早作人主”。他借天父附体，为所欲为。从下令斩杀怠慢他的官员，到企图杖责天王本人，直至向天王邀封万岁，激化了与洪秀全和其

他领袖的矛盾，最后死于非命。悲剧也许正在于他不能失败。如果他失败了，太平天国的神话将无从自圆其说而难于维持。三个月后，杀害他的韦昌辉和秦日纲伏诛。天朝将他的死难之日定为东王升天节。天国军民永远怀念他，怀念同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天国全盛时期。悲剧也许并不仅仅在于他不能失败，而在于应该失败的都没有失败。杨秀清死了，但谋求个人权势的风气继续严重腐蚀着太平天国。天京事变以后，高级将领拥兵自重，争权争利，"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下级将士人心离散，只因清廷采取"斩而不赦"的政策，"故未散也"。洪秀全又欲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竟一气儿封了2700多个王。这一做法，加剧了争雄割据的倾向，挫伤了广大将士的情感，使"内乱猜忌之萌，愈散漫不可制"。使太平天国的迅速崩溃，成为必然。

天京事变中，韦昌辉设计或参与设计了阴谋，但他真是阴谋者吗？韦昌辉出身于广西桂田村一个地主家庭，本人是个监生。他接受了冯云山对洪秀全所创拜上帝教的宣传，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随其父韦元玠决然入会，"不惜家产，恭膺帝命，同扶真主"。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金田韦昌辉家作为据点，没有韦昌辉倾全部家产的资助，就不会有从金田起步的太平天国运动。道光二十九年(1849)夏，"天兄"在一次"下凡"中正式明确韦昌辉也是天父亲子。后又屡次降旨，要韦昌辉"扶实天王"，并具体嘱咐："尔要时时灵变，肚里翻翻转，每事总要遵条命做事。""天兄"圣谕似乎成了韦昌辉全部活动的准则。韦昌辉位于杨秀清之下，处处忍让，事事小心。甚至一次其兄与杨妾争房产，杨秀清怒欲斩之，发韦昌辉议罪时，他竟建议将其兄五马分尸，谓"非如此不足以警众"。然而他还是免不了受到杨的呵斥、排挤，甚至杖责。人非草木，在他的心中，肯定心怀怨恨。一旦杨秀清威胁到天王洪秀全的地位，需要他"恭膺帝命"、匡扶真主时，公仇加私怨，便使他"见机灵变"之才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从最初的变产入会，到最后在天京事变中诛杀杨秀清，韦昌辉的主流始终是"恭膺帝命，同扶真主"。政治斗争是残酷的，他既已举起了屠刀，客观形势就不允许他轻易罢手。一不做二不休，有为个人

计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至少在开始阶段，是为天国计，或者说是为天王计。确实，他企图杀害赶来制止滥杀的石达开并因此包围了天王府，甚至在石达开脱险后，仍丧心病狂地杀害了石一家老小。然而，应该看到，这是一位醒悟到杀身之祸将及于自身又不甘心就戮之人，满怀冤屈和怨恨的绝望挣扎。韦昌辉作为阴谋者被处死了，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悲剧，不在于他的死——作为直接的刽子手，他罪有应得、死有余辜。悲剧在于他不是阴谋的策划者，也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代表的是农民阶级，是天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他光明磊落地代表着他们，杀害了数万太平天国的优秀将士。最后也断送了自己。

天京事变后，石达开率 10 万大军出走天国，制造了分裂。但他真是分裂者吗？石达开是广西贵县龙山人。“家富读书，文武备足”，有轻财好义之名，是客家人的领袖。他参加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只有十九岁。同是不惜家产资助革命，石达开却比韦昌辉更有头脑。他也是太平天国领导核心的成员，但很少在记载宗教活动的《天父天兄圣旨》中出现。由此可知，他并不热衷于洪、杨等编造的粗陋教义。现实生活中，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辖军队几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外国人麦高文评论说：“这一位青年领袖是英勇侠义、勇敢无畏、正直耿介的；正是全军的中坚人物。他的头衔称为‘电师’，这正表示他的行动。他是饱受教育而又能行动的人。”其敌曾国藩、左宗棠也客观评论说：“石‘逆’狡悍如为诸‘贼’之冠”。韦昌辉伏诛后，石达开作为天朝军民惟一希望回到天京，坚辞“义王”尊号，总理军国大政，企图重振太平天国国势。然而，由于洪秀全的猜忌、排挤，他的雄心化作泡影。他留下的布告“沥剖血诚”，惟独没有说要分裂。至多是说现在被迫离开天京，但还要“力酬上帝徒，勉报主恩仁”。待到灭尽清妖，一统太平之时，再“各邀天恩荣”。石达开出走后，聚集分散的反清力量，转战各地，最后在大渡河被清军包围。他想舍一己救三军，受骗被俘。同治二年五月十日，在成都被凌迟处死，时“神气凛然，无一毫畏缩态”。悲剧，不在于石达开制造了分裂，而在于他不是蓄意的分裂者。他并无长远打算，始

终与太平天国同为一体。如果他出于深谋远虑主动分裂，以他的崇高威望，以他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和所控制的太平天国几乎全部精兵良将，重打鼓另开张，又将会怎样呢？

韦昌辉、石达开在当时同属于有作为的青年。他们的性格不同，所走的道路不同，人们对他们的毁誉也不同，然而他们都曾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惜抛却身家性命，向旧世界进行了猛烈冲击。可悲的是，他们一个迷信于天上的神，一个矢忠于地上的主，他们都有着不能自已的“私”。他们没能冲破樊笼。在并非由自己选择的历史环境中，他们不可能冲破樊笼。石达开临终前发出了绝望的慨叹：“天邪人邪？劳终无益。时乎运乎？穷竟不通。”

天京事变又何止是几个领导者的悲剧。天京事变以后，形势逆转，东西两线的进攻停顿下来，使本已一筹莫展的清军获得了喘息和反扑之机。西面，湘军卷土重来，攻占武昌、汉阳、进逼九江、安庆，直扼太平天国的咽喉；东面，清军重建江南、江北两大营，重新形成了对天京的包围。尤其可怕的是人心失散，兵匮将乏，大纲紊乱，国事多舛。可以说，1856 年天京事变之时，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太平天国就已先行死去。如果不是长江数省的大旱使无数农民流离失所，如果不是早期太平天国的影响使走投无路的农民觉得它还是一面旗帜，一线希望，而继续纷纷加入，支持了它，如果不是后期以陈玉成，李秀成等为代表的广大将士奋力拼搏，它的失败，本已屈指可待。

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又存在了八年。这八年中，有重破江南、江北两大营的捷报，有向西方学习政治、经济的探索，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令人扼腕的叹息，也有迭起的高潮。但天国的元气，信仰的灵魂——太平天国的支点，却永远丧失了，注定了天国大业无法从根本上振兴。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天京城破。所余 1 万太平军将士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巷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曾国荃下令将城内仅余三万余人屠戮殆尽。“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其幼孩未满两三岁者亦所戮以为戏，匍匐道上。”

天京事变的根本原因

太平天国的悲剧是如何酿成的？如果考察一下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的历史，会发现这样一个趋势：平等到不平等；平均到不平均。这样说也许并不确切。太平天国平等平均的理想和并非平等平均的现实，从最开始就存在着距离。天京事变前夕，这种距离是越来越剧烈地扩大了。

太平天国宗教教义的核心，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此为基础，产生了平分土地的"天朝田亩制度"。这种政治上的平等、土地上的平均，是传统社会农民阶级最高的理想和最革命的要求。

初期太平天国的实践与这种理想基本合拍。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是团结的。清方记载，他们"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于一堂，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尤其是紧要关头，杨秀清假借天父传言时，洪秀全能从大局出发，予以承认。并在永安建制后，根据斗争需要进而规定："所封诸王，俱受东王节制。"而杨秀清也借天父传言竭力维护洪秀全的领袖地位，说天王是上帝派来的惟一真主，说"天王一出言，尔等要尊。尔等要真正扶主顾主、不得怠慢"等。太平天国的人心是一致的。金田团营的群众，根据同食同穿的规定，"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这样的均产制度，太平天国的人数愈为增加。

但是，到了咸丰元年(1851)底永安突围，特别是建都天京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太平天国开始追求正统、权势："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严"；"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正式规定和实行了甚至比清王朝还要繁多、森严的等级制度。随之，领导核心的团结开始涣散。自洪秀全起，驱除阎罗妖、建立平等平均太平天国的理想同并非平等平均的实际生活的距离已经拉大。填补这其间空白的，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权欲与享乐。

可以说,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理想与现实、神权与政权矛盾的总爆发。而天京事变的导火线,是杨秀清邀封万岁。杨秀清的办法,是以洪秀全之道还治洪秀全之身——拿着太平天国平等的理想,找现实中的君主洪秀全兑现。假托上帝之口,他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这必然引起不共戴天的矛盾冲突。此时的洪秀全已不是那个"太平一统乐如何"的穷塾师,而是满脑子三纲五常的真君主。他对杨秀清代天父传言有一个演变过程——从最初的真心支持,到后来的违心忍耐,"养海量",此刻则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关头。而杨秀清向洪秀全要求的,也并非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而是他个人权势在现实生活中的名正言顺。这绝不会得到太平天国广大军民的支持。

历史的多元化走向——假如全师北伐

天京事变的爆发,有其必然性。这一必然性,可以从太平天国历史的另一个关节点——北伐,反观识之。

咸丰三年(1853)二月十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派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北伐。这是推翻清朝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战略行动。当时,全国反清形势成熟。太平天国政治上定都天京,经济上占有江南富庶地区,军事上进入所向披靡的全盛期。而清朝八旗绿营腐败不堪,湘军淮军尚未建立,外国侵略者尚守中立。一位太平天国史学家曾说:"太平天国后来的进程证明,这是他们攻取北京惟一的一次机会。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机会。"北伐军取得了辉煌战果,曾一度逼近北京。清王公大臣"皆涕泣丧胆,眼眶肿如樱桃","都中大员、家眷及官绅无不各鸟兽散,正阳门大市若荒郊,无人迹",咸丰甚至下令备800辆马车运载后宫、文书、祭器、细软等去热河,痛哭以为"贼势已成",欲效法崇祯帝自缢殉国。但因偏师北伐、势单力薄,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终致失败而痛失良机。

早在永安突围,围攻长沙之际,太平天国内部就围绕着"向何处去"的问

题展开了两种意见的激烈争论。一种意见是取河南为家，把大本营、根据地推进到北方，夺取全国政权。一种意见是以江南为家，建都金陵，经营南部中国和天京“小天堂”。这两种意见后来似乎达成了某种妥协——既建都金陵，又派兵北伐。但实际上是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既然已在金陵建都，战略重点就必然要放在南部中国，特别是争夺长江上游的战斗上，不可能全师北伐，甚至不可能派出精兵良将进行北伐。同时，追求权力享乐、贪恋“小天堂”安逸生活的思想腐蚀了天国将士。杨秀清患眼疾，计议由天王洪秀全率师取开封，再派军北伐。然天王深居宫中，不愿出征，改派罗大纲。罗虑及孤军深入，拒不受命，方派林、李。而林、李孤军待援时，胡以晃抗命不援，仅由曾立昌等四人率7000援军到达临清。四人意见不合，沿途扩充的盐枭、溃勇等新兄弟又挟制老兄弟屯兵不进，破城后烧杀抢掠，纷纷逃回老家，多数被清军及团练捕杀。天国再派秦日纲赴援。秦“颇恋美色”，半路折回，竟说：“北路官军甚多，兵单难往。”林、李待援无望，冒死突围，分别在河北连镇、山东冯官屯覆灭。

人们常常设想：假如太平天国全师北伐，假如北伐主帅是杨秀清、石达开，假如太平天国不是定都金陵，而是“取河南为业”……这并非没有可能。金田起义之前，太平天国领袖们明确提出：“一打南京，二打北京”；打下南京后，将帅力主“先定河南，三路出师，会猎燕都！”天王东王也“计及分军镇守江南，欲望河南，取河南为业”。即以少数军队驻守南京，主力北上，取河南为根据地，直捣北京，推翻清朝，建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然多种史料记载，“金陵已破，洪、杨二贼欲分军，洪留南而杨往北，有舟子谏阻”，东王听了这水手之言，“故而未往”。这是十分偶然的。历史确有多元的走向，如果东王没有听这水手之言，全师北伐，又将会如何呢？

杨秀清统帅北伐军，虽为“全师”，但兵力不会比实际上林凤翔、李开芳的北伐军超出太多。时太平军号称百万，实际只有20万，能直接作战的兵力更少。林、李所率两三万北伐太平军尽皆精锐，且已约占太平军兵力的1/3。然杨秀清不但是军事家而且是政治家，他可以在河南开封开仓济贫，

建立圣库制度、守土乡官制度,并募兵设立土营,联合淮北捻军张乐行,使之经营豫东皖北,建立北方根据地,保证北伐军的粮饷供给;可以在河南滑县劳天父下凡,如过去萧朝贵借天兄附体说观音"是天兄耶苏天王洪秀全之妹"一样,宣称白莲教、天理教、八卦教等信奉的"无生老母"是"天父之妹"、"天兄天王之姑",使京直鲁豫民众全数倒向太平天国,从而将两三万北伐军变成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沿途"各州县存城之兵,多者七八名,少者一二名……守城无兵,势必望风瓦解",而北京当时兵数为11万余人。其中"充当杂差、仅食养赡钱粮"的老幼废疾者就有4万多。八旗绿营腐败不堪,既无战斗力,也无临战经验。各营管事吃空额,"虚伍缺额,不足十之一二",攻克北京,逼咸丰自尽,几乎是顺理成章之事。洪秀全留守天京,分兵之后,可重新部署,提前将后期年轻统帅提到领导集团,成立自任统帅、北王韦昌辉为副,陈玉成、李秀成、罗大纲、李世贤为主将,洪仁发、洪仁达、蒙德恩参赞军务的领导核心,朝气蓬勃,众志成城。外部虽有清军江南江北两大营围攻不舍,太平天国却可坚守不战,有我无敌地进行国家建设,坐等随杨秀清迅速北进、主战场逐渐北移的围魏救赵之机。在清廷不断抽调兵力北援、"精锐俱已调出",北伐军逼近北京、江南北清军有北援勤王之势时,抓住时机,西征北进东伐,建设新区,而后集中各路大军粉碎江南江北大营。那么,下面的历史将会如何发展呢?

可以想见,古老的中国会出现三个政治中心。恭亲王奕䜣会在热河即位,成立一个绝对与洋人勾结的新政权,并集结兵力,准备反扑;杨秀清会代天父传言,让天王暂缓移驾北京,或将精兵良将留守天京,仅由少数人护送天王北上;洪秀全会权衡利害,褒奖东王翼王、有功各王及全体北伐太平军将士。以北京为北都,两京并为小天堂,暂缓北上。南北兄弟姐妹同杀妖,扎稳马,时候一到再团圆。而各国侵略势力只能暂时保持中立。英法正在支持土耳其与沙俄打克什米尔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正在紧张关头。这种形势,给了三个政治中心按各自意志发展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一共有两年。

北京实现了农民“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的梦想，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家庭，取消了商业。全体市民不分老幼，男的集中到男馆，女的集中到女馆，太平军这项工作一向“进行得雷厉风行，到得一家，当场令全家大小，收拾几件随身衣物，立即各归各馆”，“迟延者鞭捶促之”。家人“只许隔街说话，万分伤心，不许流泪”。“或有男至女馆，女至男馆，一经败露，即时斩首”。馆众实行一种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制度。统一作息，集体劳动、作战，一切财产均归圣库，一切生活用品均从圣库统一配给。没有多久，北京的市民便会厌倦。没有家庭、天伦之乐、精神寄托、物质享受，没有可以放松一下、属于自己的最后一块小小天地，如何能够忍受！特别是当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被赶出家门，当包括有功之臣在内的人们由于夫妻私会，被杀被斩的时候，太平天国上层官员却过着浮华奢靡、妻妾成群的家庭生活。经济生活的停顿，使得这座繁华的大都市成为了荒漠。大锅饭，又使得人们消极怠工好逸恶劳。如同实际上的天京，因牌尾馆是老弱病残之馆，没有战斗及重体力劳动任务，结果人们装病入馆，有时竟达七八千人之多。坐吃山空，粮食先是定量供应，到第二年，各馆只能食粥。新兄弟势必大量逃亡，清朝遗留旧势力和地主绅士阶层势必蠢蠢欲动。惊恐、不满、失望的情绪，像可怕的瘟疫悄然而迅速地蔓延，笼罩全城。天京情况会与北京相似，城市陷入困境；天京比北京有条件实施自己的梦想，可于江南一带试行天朝田亩制度，但剥夺地主土地，势必引起地主的疯狂反抗。各地团练纷纷成立，太平天国不得不以武力推行这一制度。若北京杨秀清野心昭显，洪秀全会将精力集中到可能发生的重大变故上，停止土改，回师备战。为军饷计，如太平天国后期的实际那样，反而会规定赋役制度，承认传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洪仁玕提出的发展近代工商业的计划，在太平天国建立自给自足农村社会的理想中，英雄无用武之地；在太平天国生存未卜的政治形势下，只能是一纸空谈。热河奕䜣政权，则一如清末而提前或更加彻底，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与此同时，设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又建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在各省设军火局、高薪聘请洋人教习近代军事，用大量金银

购买坚船利炮。以出卖主权领土为条件，争取借洋兵助剿。列强的态度也日趋明朗。法国公使表示愿助清廷剿贼，“所有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俄国表示愿助清廷鸟枪1万杆，大炮50尊，与清廷水陆夹击太平天国。英国公使表示愿为清廷代购船炮并提供部分军火。他们一旦得手，非但太平天国难于立足，即中国亦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杨秀清居大功，势必更加自傲，北京至天京大道上信使如梭，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名义遥控天京政局，对洪秀全指甲大的事都要指手画脚。终于有一天，杨秀清派人向洪秀全宣天父圣旨逼封万岁，公然登上北京的金銮宝殿。韦昌辉会扣押北伐太平军留在天京的全部家眷，准备二次北伐，南北太平天国的火拼势不可免。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可能会力谏洪秀全以大局为重，取消对北京的备战。而洪秀全会将三人贬出天京，重用庸碌无为、只知奉迎拍马的宵小为大政辅弼。石达开会力谏杨秀清维护天王洪秀全的最高权威，杨秀清却会以天父名义对石达开百般斥责。石达开自觉不保，会率北京全部精锐10万人，乘夜出走，南返天京。洪秀全、韦昌辉又会怀疑其中有诈，闭门不纳。石达开留下一篇沥剖血诚的告示，西走川滇。

两年，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自毁长城。如此格格不入的绝对平均主义与皇权主义，又如此理所当然地支撑着他们的理想大厦。按照这种思路向前走，他们甚至不能不自毁长城。他们最终导致了内部的讧乱与分裂，招致了来自地主与农民两个方面的反对和怀疑。中外反动势力的机会到了。英法俄美在克什米尔、缅甸、日本、美洲大陆的战事结束，转回中国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决意将自己出卖给“与国”的清廷，和一个被自己整治得衰弱不堪的太平天国。中外反动势力几乎是欣喜若狂地联起手来，分割包围了北京、天京和西去无援的孤军石达开。太平天国将士们在天国的每一寸土地上拼死抵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庄严而悲壮地为中国农民的理想国画上了句号。

当我们回到太平军北伐的起点，回到历史转折的关节点，不能不恸对一个事实：历史固然有多元化的走向，却殊途同归。太平天国不管是哪一位，

如何领导北伐，在历史转折的关节点作何种选择，其与天京事变相同的结局已经被注定了。

三 义和团运动评价

义和团运动始末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早从山东下层民众“练拳保家”，“守望相助”的梅花拳发展而来。1900年，义和团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旧时人称“庚子拳变”。

这是一场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撼的运动！先是各种神秘可怕而又激荡人心的预言、揭帖飞速地秘密流传：“大劫当头，只在今秋，白骨重重，血水横流，恶者难免，善者方留，但看铁马东西走，谁是谁非两罢休。”“兹因天主耶苏教，欺神灭圣，忘却人伦，怒恼天地，收住之(云)雨，降下八百万神兵，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欺(期)。不久刀兵滚滚，急速退教，速进佛门。义和团上能保国，中能安民，下能保身。见帖速传，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村之灾，如不下传者，即有吊(掉)头之苦。”这一阵紧似一阵的低语声汇合起来，成了疾呼、呐喊：“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及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往天。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从山东到直隶，各种红黄揭帖“张满街衢”，遍发城乡居民，甚至送发京官大宅、外国使馆。城市农村、街头巷尾处处树旗设坛、请神降仙。猪八戒、孙悟空、二郎神、马超、济公、吕洞宾、柳树精、黄天霸、华佗……仿佛倾人们所知，一齐出现在请神咒语之中。荒诞的迷信、复仇的火焰、求生的本能、洗雪家仇国恨的强烈欲望，混杂在一起，成了一股极大的狂热力量。

山东义和团相约起事的传单一出，不分男女老幼，“千人立聚，兵刃森立，俨同敌国”，“虽在数百里外，亦征徙往应”，“官员莫敢谁何”。他们头抹红绡，腰系红带，腿扎红布，身佩小黄纸护身符，手持各种原始武器，宣泄般地打毁教堂、斩杀洋人和或为虎作伥或仅入洋教或只用洋货的二毛子乃至十毛子，破坏一切与“洋”字有关的东西，同时屡屡击败前来镇压的清朝军队。他们相继焚毁火车站、机械制造局，破坏铁路，并进入天津、北京。犹如干柴烈火，京津立刻成为了神坛香案的海洋。居民纷纷把洋油灯扔到窗外，洋油倒在街上，全城几乎每家门口都贴上了表示信奉义和团的红纸条，几乎满街来往的都是头包红布、手执刀枪的义和团成员及其仿效者。他们在内外城门、大小衙门、各个路口日夜盘查过路行人，捉杀企图混逃出城的洋毛子和二毛子。他们无法无天，公然喝令达官贵人下马下轿，公然进入王公将相府邸设坛居住，甚至把一些以洋奴才著称的官吏捉到神坛前，勒令跪香或杀之祭刀。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起，义和团在北京连续焚烧崇文门、右安门、宣武门内、正阳门外的教会设施以及老德记西药房之类专门贩卖洋货的商店，前门外大火延续三日之久。六月中旬，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接着围攻各国使馆。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宣布招抚义和团、对列国宣战。不少义和团到庆王府挂号，打起了“奉旨义和神团”的旗号。义和团运动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发展起来，黑龙江、盛京、直隶、河南、山东、山西……整个北部中国沸腾了。南方如四川、江苏、湖南及厦门、福州等地奋起响应，仇洋灭教、设坛练拳者也所在多有。

早在四月，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即先后向清廷提出强硬照会：拘办拳民，惩处弹压不力之官员，否则各国将派兵“自卫”。五月十四日八国联军 2000 余人首次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因铁路被掀、义和团围攻而伤亡惨重，五天仅行半程，狼狈退回。随后，各国军舰炮轰大沽口，迅速占领之。进而会合已在天津的各国军队共 12000 人，与义和团展开了历时近一个月的天津争夺战。清廷对义和团的方针虽然从“剿抚兼施”变成了“以抚为主”，但从开始就露出了居心叵测的端倪。清廷颁布义和团团规，宣布凡违背团规者即是

匪徒、假团，格杀勿论，并令各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星夜驰赴京师，以镇压“京城内外扰乱已极”的“匪徒”。使河南、山东、山西、贵州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有组织地以“假团”名义迫散和大规模屠杀义和团的事件。另一方面，清廷对洋人明打暗拉，令荣禄率军“实力保护”各国使馆，向被围使馆送水果蔬食，明示“此种乱民”当“设法相机自行惩办”。所下宣战诏书既未说明向哪一国宣战，又未递交给任何外国政府，以致有的封疆大吏不得不请示：“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应恳明示，以便相机应敌。”八国联军攻克天津后，又进兵北京兵临北京城下。慈禧太后携光绪等从德胜门仓皇出逃。义和团在一条条胡同拼死据守、浴血抵抗。然而武器、力量的对比，决定了北京城破的结局。从天津到北京，八国联军所过之处大都变成“瓦砾之场”，至少有 50 万人无家可归，“尸骸枕藉，道路相望”。八国联军入城后，疯狂屠杀残存的义和团及无辜平民，用机关枪扫射“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而自八国联军进攻天津之日起，就有清军将领公然下令“痛杀义和团”。北京城破后，慈禧太后更是急忙发布上谕，指斥义和团“借端肇衅”、“激成巨祸”，下令“严行惩办”，“毋稍姑息，以绝祸根”。以至八国联军“巡逡”途中，往往看到各城镇已高悬被清军斩杀的拳队领袖之首。

义和团失败了。

历史上对义和团的评价

有一首歌谣总结道：“义和团，起山东，三月起、六月红，九月末了散了营。”1900 年 3 月到 9 月，是被义和团主宰的怪诞而神奇、悲壮而惨烈的半年。应该如何对其做出评价呢？

“文革”以前，人们歌颂义和团、全面肯定义和团；“文革”以后，人们突破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樊篱，一些人完全否定义和团，认为义和团是愚昧落后、反对文明、破坏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本讲评价义和团以前，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历史上对于义和团的各种评价。

义和团失败后，以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代表的在华洋人和传教士们，把义和团斥为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所产生的“黄祸”。断言这种“黄祸”还会反复出现，就像太阳明天早晨一定会出来那样。而“文明”国家的任务是“推迟或制止它的出现，或者采取某种行动使它转移到无害的渠道上去”。20世纪初期马士所著《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史》发挥了这种观点，长期被英美学者奉为义和团研究的圭臬。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把义和团看做是党祸之争的产物，认为戊戌变法失败后，宫廷策谋废立，外国使团不予支持，激起后党仇外之心，遂借义和团以发难。他们又把义和团看做是排外和迷信心理造成的一种“极奇特之病态”的结果，认为尊王攘夷的传统观念，请仙跳神的传统习俗使义和团民们愚蠢得发了狂，遂做出杀教士、挑铁道、攻使馆等野蛮反对进步文明之事。这一观点为二三十年代很多中国近代史著述所接受和沿袭。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曾将义和团的排外指为“野蛮暴乱”，认为“义和团与外国争权，所争之事未尽合理”。但后来则看到：“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经过那些血战之后，外国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义和团之揭竿起也，虽未达其灭洋之目的，而亦开历史之辉光”，成为“中国自立之绝大起点”。使各国“尽戢其野心，变其政策，不倡瓜分而提议保全支那之领土，开放支那之门户”。

列宁则在1900年12月发表于《火星报》的《中国的战争》一文中质问：“中国人的确憎恨欧洲人，然而究竟他们憎恨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憎恨呢？难道能不憎恨吗？”著名作家马克·吐温1900年11月在美国公众教育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说。他宣布：“义和团人是爱国的。我，就是义和团！”

五四运动先行者之一陈独秀1924年9月在《响导》周刊发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他指出：“义和团的野蛮，义和团的顽旧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气，我都亲身经历过。我读过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不承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之悲壮的序幕。”

综观以上对义和团的评价可以看到,有诋毁也有赞誉。人们按照自己的立场,自己的思维方式思考、评论、总结1900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这异常而又正常的事件。然而,真正的权威只有一个,那便是历史自身。

对义和团口号的分析

义和团运动应该是1840年以来中国农民爱国斗争的一个小结。在此之前,中国农民的爱国斗争走过了两个阶段。一是鸦片战争时期沿海农民自发反抗外国侵略的阶段;一是太平天国时期内地农民反抗清朝统治的阶段。前者农民反抗外国侵略,遭遇到了"洋鬼子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的怪圈,"忽闻和议成","解网纵兽奔",他们爱国斗争的壮举屡屡被反动的清廷出卖。后者农民反抗清朝统治,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遭遇到了"洋兄弟"助清妖的"终天之恨",他们爱国斗争的壮举被清廷与外国侵略者联合绞杀。义和团则曾在不同时间、地点、背景下提出过"灭洋抗官"、"扶清灭洋"、"保清灭洋"、"扫清灭洋"的不同口号,表现了1840年以来中国农民爱国斗争水平的提高与深化。

义和团的口号,万变不离"灭洋"。"男的拿起刀,女的拿起枪,为的咱们国,为的咱们活!""先练义和团,后练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教!""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毋庸讳言,"灭洋"包含着笼统排外的成分。正因为如此,这场斗争被一些人视为是愚昧野蛮的中国人、中国文化反对进步文明的欧洲人、欧洲文化的斗争。义和团的确烧教堂、掀铁路、剪电线、杀害洋人乃至他们未成年的孩子,惩治一切和洋字有关的人,破坏一切同"洋"字有关的物。但是,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他们看不见义和团排外所发生之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腥血与怨气!""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中国当然也在内)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何能独责义和团?"(马克思语)义和团拆毁铁路、电线,焚毁

火车、车站，最重大的事件是破坏芦保铁路与京津铁路。值得注意的是，参加拆毁铁路的不单单是义和团员——"沿途各村愚民"，"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蜂起应之，约四万余人，无不红巾黄裹"，"是'匪'是民，无从分别"。恩格斯指出："英国资本极力要修建中国的铁路，但是中国铁路意味着小农经济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的破坏；由于那里甚至没有中国的大工业来予以平衡，亿万居民将陷于无法生存的境地。"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修筑铁路对于他们来说是文明的，对于从事野蛮落后的生产方式，却因文明先进的生产方式而破产、流离、无以为生，永远无望达到文明先进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加倍的野蛮。他们理所当然地深恶痛绝那些洋人"借以祸中国"的东西，"见即怒不可遏"，必欲毁之而后快。这的确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斗争。然而，文明与野蛮的界限竟如此模糊而难以区分。进入文明而明火执仗的强盗，与尚处野蛮为捍卫自己生存权力、仇视这些文明强盗乃至强盗文明的中国农民，究竟谁比谁更文明，或者谁比谁更野蛮呢？义和团最令人发指的罪状是杀人。杀外国使臣、杀传教士、杀洋人、杀信洋教、用洋货的"二毛子"。据具体统计，庚子年被杀教士男女竟达 78 名，其中包括他们的 29 名小孩。恩格斯却指出："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的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外国传教士确实曾把西方的先进文化，诸如天文、算学等传入中国(即便十分有限)，但那已是十分久远的事了。中国人看到的是随着外国列强的步步入侵；在华传教士大都充当了可耻的坐探和先锋。他们无视中国主权，刺探情报，为非作歹，奸淫掳掠，草菅人命，甚至和地方官同坐大堂、公然干政；看到的是很多投靠教会势力的天主教徒，为虎作伥，狐假虎威，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德国霸占胶州湾的一年半中，山东路、矿、教三类涉外案件竟达 1000 余件。义和团已远远超出了"民教仇杀"的水平。北京教区主教法国人樊国梁 1901 年指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主要不是宗教性的，而是政治性的运动。"任何战争、争斗都有无辜的牺牲者。义和团所杀人中有无辜者，然而无辜的中国老百姓在 1840 年以后，或者就在庚子年间

死于洋人屠刀之下的有多少呢？似乎从来没有人全面统计过。一侧是触目惊心的78、29，一侧是零。不是表示“没有”的零，而是表示“无数”的零。公理正义的天平，应该向哪一方面倾斜呢？

义和团运动是悲壮的。如果说它的壮，在于“灭洋”，那么，它的悲，也同样在于“灭洋”。笼统排外的“灭洋”，毕竟带有落后愚昧的色彩。有排必有尊，义和团只能尊崇精神。京津地区流传着很多弘扬这种精神的传说。一次义和团与洋鬼子激战，打得只剩下一个童子。这童子一急，一拳头顶回一列火车。一次一个大师兄被包围，誓死不降。官军洋兵放起了火。只见烈火中突然站起一个巨人，拔起一棵大树，把官军洋兵打了个稀里哗啦，有几个骑马逃跑的，他远远啐了口唾沫，把他们都淹死在唾沫坑里。于是留下了一句老话儿：“官兵多，洋兵多，中国人，吐口唾沫就成河。”面对着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用先进武器武装到牙齿的外国侵略者，义和团员们穿着八卦兜肚，吞符念咒，喊着“刀枪不入”冲杀向前。“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这情形何等壮烈，又何等悲惨！八国联军的蹂躏、辛丑条约的重负，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冷酷的现实。精神是永远需要发扬的，但血的历史事实证明，武器的优劣，科技水平的高低，经济实力的大小，同样不容忽视。

义和团的“灭洋”，尽管迫使帝国主义改变了瓜分中国的策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争取了20世纪初期空前发展的时机，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政治、经济前提，但主观上的笼统排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地主阶级顽固派利益一致，从而使这一运动蒙上了更为深重的悲剧色彩，一度被顽固派利用，成为打击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改革派的工具。

义和团口号中，不变量是“灭洋”，变量是对清王朝的态度。义和团对清王朝态度的转换，表现了1840年以来中国农民爱国斗争水平的提高。最初，义和团“灭洋”与“抗官”紧密结合。“大师兄，砍洋头，大师姐，杀官兽，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事实上由于清军助纣为虐，对义和团采取“务求根除”的屠杀政策，灭洋与抗官、反帝与反清，也不能不紧密结合。据记载，在

义和团发祥地山东，曾多次发生过义和团与清军较大规模的战斗，参战团民动辄达数百数千人。1900 年以后，义和团运动势如燎原。甚至深入到京城，渗透到军队。荣禄密电中透露："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卒中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清廷军队失控，京城难保，加之在废立问题上与列强发生矛盾，踌躇再三，采取了对外宣战，对内承认义和团的做法。这一阶段，几乎所有的义和团，包括原来"抗官灭洋"的义和团都打起了"扶清灭洋"、"保清灭洋"、"兴清灭洋"或"奉旨义和神团"的旗号。由于义和团没有统一组织，他们对于清廷的认识或认识程度是不相同的。但大多数义和团此时的"扶清"，已不是原来意义的"保清"了。"扶清"、"助清"表现出一种脱离了君臣关系的联盟关系。时人袁昶敏锐看到："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扶清灭洋"，不能说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口号。这一口号，客观上顺应了当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减少了统治者的阻挠和破坏，起到了动员全国各阶层民众投身于反帝爱国浪潮的积极作用。历史的悲剧在于，义和团民宥于农民阶级局限，并不能把握这一策略，并不能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复杂关系。虽然不少义和团没有"挂号"，虽然不少"挂"了"号"的义和团保持了相对独立性、不听清廷调遣，但"扶清灭洋"的口号仍然或多或少地模糊了他们对清朝统治者的认识。特别是进入京津地区的义和团，队伍庞大，鱼龙混杂，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更多受到了统治者愚昧、迷信、排外思想的影响；受到了统治者的欺骗、愚弄和利用。正是清朝统治者煽动义和团对教民"按户搜杀，以绝乱源"，规定"杀死一名夷人赏五十金，生致者加倍"，杀妇女婴儿的依次受赏，并下达奖励各省拳民焚毁教堂之诏令。正是清朝统治者中的顽固派，利用义和团仇恨二毛子的心理，将义和团众带入宫中，企图借义和团之手杀死改革派代表光绪，发动政变。正是清朝统治者把义和团推上前线充当炮灰，自己却在幕后同列强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并将不服从调令的义和团以假团名义围杀无遗。

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的壮举最终被清廷出卖，被清廷与外国侵略者联

合绞杀了。当八国联军的铁蹄践踏着北京长街，当义和团的英雄儿女在朝阳门、东便门，在每一条胡同、每一寸土地上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清朝头子慈禧出逃。她于途中无耻地向帝国主义乞降，欲“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同时下达了痛剿义和团的谕令。各地地主、官僚纷纷和外国侵略者携起手来，成千成万地屠杀义和团及无辜群众。野蛮地凌迟、枭首，文明的洋枪、重炮，一齐化作血雨腥风笼罩了整个中国。

中国农民经历了单纯反侵略的失败，经历了单纯反封建的失败，最后终于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终于举起了“扫清灭洋”的大旗。尽管他们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在反帝反封中又一次遭受到了失败，但却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主要构成部分——农民的爱国斗争逐渐成熟了。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种趋于成熟的爱国斗争，使中国农民投身于先进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之中，成为了推翻三座大山的主力军。

中外反动势力勾结所取得暂时胜利的代价，如周恩来所说，是“反动的封建王朝与伟大祖国的概念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彻底分离；中华民族在先进阶级率领下开始走向反帝反封建，乃至彻底反帝反封的道路。”

思考题：

总结 1840 年以后农民爱国斗争的探索与实践。

参考书目：

1. 钟文典：《太平天国开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
2.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 年。
3. 〔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

第十二讲

主宰晚清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

一朝选秀
三次垂帘
千古评说

慈禧太后(1835—1908),姓叶赫那拉氏,满洲镶蓝旗人(后抬镶黄旗),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咸丰二年(1852)18岁时被选入宫,封兰贵人。四年(1854)封懿嫔。六年(1856)生同治,晋懿妃。七年(1857)封懿贵妃。十一年(1861),同治即位,尊圣母皇太后,上尊号慈禧,时年27岁。曾于同治、光绪两朝三次垂帘听政,扶立光绪帝载湉和宣统帝溥仪两个小皇帝,是为晚清实际的最高统治者。

慈禧太后在人们印象中历来是一个祸国殃民、狠毒凶残的"妖后"形象。近年来,这种形象从影视剧发端开始软化和模糊。一些人称慈禧"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是一个有着高雅情趣的老太太"。一些

人称慈禧"精于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没做过什么对国家有利的事","误国已是公论"。不少人莫名糊涂,他们发现,原本熟悉的慈禧太后成了面目皆非的陌生人物,需要重新认识了。"玉座珠帘五十春,临朝三度抱冲人",慈禧太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一　一朝选秀

身世谜团　由于目前没有找到相关的档案记载,对慈禧从出生到入宫前经历的研究始终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如慈禧出生地,目前就有"北京说"和"山西说"。"北京说"依据的是有关慈禧父祖官方文献记载的推论。"山西说"认定慈禧是汉人,1835 年出生在山西长治县西坡村一个贫穷农民的家庭,取名"王小慊"。4 岁时卖给本县上秦村宋四元为女,改名"宋龄娥"。12 岁时又被卖给潞安府知府,改名"玉兰",后被知府夫人收为养女。咸丰二年(1852),以惠征之女身份应选入宫,从此平步青云,直至皇太后。"山西说"的主要依据是,西坡、上秦两村及附近村庄百余年来世代相传慈禧是本地人,即在"阶级斗争"最严酷的"文革"期间也坚持不改;西坡、上秦两村有慈禧四、五辈的侄孙、侄孙女;有慈禧出生地遗址、生母之坟、慈禧童年住过的宅院;有载有慈禧乳名及"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的王家"家谱";有慈禧寄来的信(残片)、照片及祖传光绪、宣统年间皮制清朝帝后宗祀谱等。慈禧生活习惯与言行也有出身山西的蛛丝马迹,她爱吃山西人食品;爱吸长治人爱吸的水烟(不吸关东烟);爱听山西上党梆子,善唱山西民歌;任用山西长治人作御前侍卫、御厨、奶妈;授意潞安知府在长治建一园林,亲以"颐和园"谐音命名为"义合源",并曾计划将潞安府改建成"中京";"只认识汉字,不认识满文"等。"山西说"能否成立的关键之一,是惠征有无可能买山西长治上秦村"宋龄娥"为婢,后又收为养女。按"山西说",慈禧于 12 岁道光二十七年(1837)被卖给潞安府知府。从惠征履历看,他一直任京官,没有做过潞安府知府。道光二十九年 (1849) 四月始外放,任山西归绥道(今内蒙古

呼和浩物一带)道员,比“宋龄娥”卖到潞安府的时间晚了两年。然慈禧家与山西有关的人物还有一个,即慈禧的外祖父、归化城(今呼和浩特附近)副都统惠显。有无可能是惠征夫人住娘家时买的“宋龄娥”?或者如同有人推测的那样,“宋龄娥”是被卖给了一个知府或知县,又由他们送给了道台惠征。至于为什么要收养女,“宋龄娥”脚心长有贵痣之说恐怕靠不住。有可能的是,惠征原有爱女(慈禧之妹),买“宋龄娥”为了顶替己女参加选秀。秀女即是宫女,亦称下屋女子,凡太监不能近的事,如伺候主子穿衣盥漱、便溺洗涮、坐内寝更等均由下屋女子承担。下屋女子当差10年后主子赏银出宫自行择配。故旗下女子不愿进宫,多数由穷家女子顶替。如被选上,主家“送给一份被褥、衣服、奁具,穷家女子得之也知足”。“山西说”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关注,认为是“对慈禧研究中一个薄弱环节的重要补充”。如果“山西说”成立,那么慈禧不仅竟是汉人,其早年家贫的传说也从根上找到了依据。

从秀女到贵妃 咸丰前后共有皇后妃嫔19人,最爱敬的莫过于皇后钮祜禄氏,其次是丽贵人,再其次是兰贵人即后来的慈禧。慈禧得宠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美貌。为69岁慈禧画像的美国女画家卡尔认为慈禧是一“极富魅力极和善之妇人”,年龄看上去超不过40岁,其神情之佳,一见即能使人喜悦,与世界传说其为一残暴不可理喻老妇,完全不同。慈禧身高不及5尺,全身各部极为相称。漂亮的面容,与柔嫩之手、苗条之体、黑漆之发相得而益彰,明亮的眼睛,高高的鼻子,眉目如画,樱桃小口,下颌虽阔,但不带一丝顽强的态度,耳官平整,牙齿洁白如编贝。嫣然一笑,姿态横生,精神焕发,神采照人。加以明珰满身,珠翠盈头,一副纤丽庄严的态度,非笔墨所能形容。由此推想慈禧50年前芳龄少女之时,其美貌对咸丰具有勾魂摄魄的魅力,当十分可能。二是才华。咸丰批阅奏章之时,慈禧时常侍候左右。她聪慧过人,耳濡目染加之处处留心,于政务渐至了然于胸,能够协助咸丰清检封事、代为分类,及咸丰晚年她更进一步代阅奏章、参与机要。政治才能之外,慈禧有文学书画才能。据载,慈禧“平日最喜研攻中国之文学”,“能为诗词,出笔清新,非同凡响。又能为古文辞,得大宗气派”,慈禧“于古名家之

诗文词,能滔滔背诵,如数家珍","又往往为曼声以歌之。每当妙处,辄为击节称赏,历一二小时不已"。"退入寝宫假寐时,必随带能诵诗文之宫监一二人进内,为之诵读名家诗词以娱之,其声朗朗然达户外","尤善书法,能做擘窠大字","笔力绝劲,不作一毫巾帼气","不特能书,兼能为画。其所画着色之花草,神采如生,不减名家",人皆以"文学太后"称之。慈禧又有戏剧才能,她酷爱并擅长京剧等北方戏曲,能编排戏词、纠正曲误,"尤善编剧本"。咸丰亦酷爱京剧,善长绘画、书法,与才貌双全的慈禧应该说有共同语言。三最为关键,是为咸丰生了惟一儿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不出一年,慈禧即被晋封为懿贵妃,后宫位次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

两宫皇太后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咸丰帝于承德避暑山庄病逝,咸丰帝独子载淳即位,改元同治,嫡母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生母懿贵妃那拉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当时,慈安住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东暖阁,慈禧住西暖阁,故又有"东边的太后"(东太后)和"西边的太后"(西太后)之称,是为两宫皇太后。

慈安太后钮祜禄氏,生于满洲官宦人家。她之所以得到咸丰格外垂青,不仅由于她与咸丰少年结为夫妇,伉俪情深,更重要的是她美德出众,有"女圣人"之称。咸丰死后,两宫并尊。慈安比慈禧还要小两岁。在人们的印象中,慈安老实忠厚,听任慈禧的摆布。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说咸丰病重之际密书一纸遗诏交付慈安:西宫绝非可倚信者,若其骄纵不法,汝可召集廷臣,将此旨宣示,立即赐死,以杜后患。咸丰死后慈安即将此诏示以慈禧。慈禧震恐,小心数年。恰遇慈安小病,慈禧进参汁时竟割臂肉同煎。慈安大为感动,取出咸丰遗诏当面焚毁。此后,慈禧渐至放肆专权,慈安悔之晚矣。事实上,东太后慈安并非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生性懦弱、绌于政治。咸丰初年正位中宫,内外已有圣明之颂。咸丰死后肃顺专权。为不致走漏消息,慈安与慈禧俯巨缸而语,密筹大计,一举发动政变,杀了肃顺。据说肃顺以为皇太后浑厚易制而放松了警惕,不意其先发制之,临刑时颇自悔恨。肃顺以为"浑厚易制"的皇太后,显然是东太后。人们通常说慈禧太后揽政 48 年

(1861—1908)、3次垂帘。实际其中慈禧与慈安共事20年(1861—1881),3次垂帘听政均是慈禧与慈安共同行事。两宫垂帘听政,天下称东宫优于德,大诛赏、大举错,实主之;西宫优于才,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时谘访利弊,得心应手。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要西宫为她诵而讲之,有时一月不决一事。然至军国大计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同治初年,东宫断然重用曾国藩,凡天下军谋吏治及总督巡抚之黜陟,事无不谘,言无不用。所谓"中兴"之业于此发肇。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锡封为侯伯,实际出自东宫决断,西宫同意。同治八年,太监安德海打着奉西太后之命的旗号往南方采办宫中用物,一路飞扬跋扈、索贿纳贿,过山东境,巡抚丁宝桢劾奏之。东宫当即命令丁宝桢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一时中外交相称颂,皆服丁公之胆而颂东宫之明。西太后性警敏,锐于任事,东太后"悉以权让之,颓然若无所与者"。西太后亦感其意,凡事必请示东太后而后行。东太后则更加谦让,事无巨细,必待西宫裁决,或委托军机处主持。如此看来,东太后竟是大智若愚。

光绪七年(1881)三月,慈安病逝于钟粹宫,时年45岁。对东太后之死,历来有"病死说"及"被害说"两类说法。"病死说"是官方说法,也得到史家较为普遍的认可。慈安并非初次发病,其前还有两次,均类于心血管急症。慈安死前数月,慈禧称疾,"不能视朝政"。时内忧外患,朝廷事无巨细,均要慈安一人定夺,压力骤然加大,"无疑损害了她的健康",以"微疾上宾"病重而亡,不能说是意外。"被害说"出自野史传说,基于慈禧与慈安结怨已久。这一基点无可置疑。两宫皇太后表面亲同姐妹,实际积有深嫌。慈禧有很多理由对慈安恨之入骨。首先,同为咸丰妻妾,慈安是皇后,她不过"母因子贵",这是夺夫之恨。其次,同为垂帘,慈安坐享其成,天下赞颂,做好人;她拿主意、理朝政,却众口微词,成恶人。这是夺名之恨。第三,她亲生的儿子同治,对她的感情远远不如对慈安。遇有两宫意见不一致,同治往往站在东太后一边。这是夺子之恨。最后,慈安杀了安德海。安德海不过一奴,但慈安"打狗不看主人面",既翦除了她的羽翼心腹,又使她恶名远播,这些都不

能不使她对慈安的仇恨深刻到难解难分的地步。矛盾、仇恨，尽管从根本上不共戴天，但发展到“毒杀”也还要有一定的条件。“被害说”的证据有待于继续发掘、考证和研究。在此之前，“被害说”则不能确定。

二　三次垂帘

慈禧的政治生涯与“垂帘听政”紧密相连。第一次垂帘是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十二年(1861—1873)，计 13 年；第二次垂帘是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十五年(1874—1889)，计 15 年；第三次垂帘是光绪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1898—1908)，计 10 年。慈禧统治中国的 48 年中，有 38 年垂帘听政。另外 10 年号称“还政”，但重大决策仍要由她做主，实是不垂帘的垂帘。

辛酉政变

慈禧登上其主宰晚清半个世纪之久的政治舞台，始于咸丰十一年(1861)的第一次垂帘听政。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慈禧随咸丰帝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一年的时间，清朝国家迭遭巨变。英法联军先后两次劫掠、火烧圆明园及清漪、静明、静宜三园；留守的恭亲王奕䜣被迫与英法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又被沙俄以“调停有功”勒索、掠夺了东北约 15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太平天国再破江南大营，进军富庶的江苏浙江，直逼上海，31 岁的咸丰有家难归，病入膏肓，终至辞世。

当时，惟一的皇子载淳只有 6 岁，皇后钮钴禄氏亦即后来的慈安只有 25 岁；载淳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亦即后来的慈禧只有 27 岁。咸丰临终前口授遗嘱，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命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肃顺、六额驸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赞襄一切政务。并将两枚随身印章，作为下达诏旨的符信。一枚文曰“御

赏”赐给皇后;一枚文曰“同道堂”,赐给嗣皇帝载淳,由懿贵妃保管。“御赏”印盖起首之处,为印起;“同道堂”印盖结尾之处,为印讫,只有盖了这两方印,谕旨方为有效。后人评说,咸丰设计的权力分配格局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两位皇太后和幼帝为一方,8位赞襄政务大臣为一方。不突出任何一方,缺任何一方又不可。这既不是垂帘又不是辅政,而是“垂帘辅政,兼而有之”。然咸丰尸骨未寒,他精心设计的政治格局,便在两宫皇太后与奕䜣合谋策动的“辛酉政变”重击下碎成了齑粉。

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没有把小皇帝和两位年轻寡妇放在眼里。据载,其时诏旨皆出自载垣、端华、肃顺之意,“口授军机处行之,多未进呈御览,中外遑遑”。肃顺等甚至明目张胆提出:奏章一律不进呈皇太后览阅,皇帝谕旨由八大臣拟定,皇太后只管钤印盖章,无权更改谕旨内容。两宫皇太后坚决驳回,明确指出,两宫太后代表皇帝皇权,拥有拟定谕旨的授意权,章奏及所拟谕旨的审阅、批览、否决、修改和钤印颁发权,这是不可退让的原则问题。双方剑拔弩张,僵持不下,“议四日”,最后,八大臣无奈让步。两宫皇太后刻骨铭心感到皇权旁落的危机和受人欺凌的险境,初步意识到要扳掉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此时,得恭亲王奕䜣一党奥援的御史董元醇上疏,提出暂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改派近支亲王辅政的建议。八大臣皆远支宗室,勃然抗论,以本朝无太后垂帘故事,命军机处拟旨痛驳,然后将董折及所拟谕旨一同交上去。两宫皇太后十分气愤,将所拟谕旨留中不发,企图回京再做处理。但八大臣不依不饶,甚至不顾后果,以全员“搁车”(罢工)的办法要挟两宫太后。两宫皇太后无奈,只得姑且将董折及所拟谕旨同时下发。八大臣弹冠相庆,取得第二回合的胜利。两宫皇太后则最后下定了铲除八大臣的决心。她们行苦肉计,借故将心腹太监安德海杖责,“罚”回京师,与恭亲王奕䜣联络。奕䜣赴热河奔丧,排除八大臣种种阻挠,与两宫皇太后联合,秘密商定铲除八大臣之策。而后,奕䜣先行回京布置,拉拢争取了掌握京畿与直鲁重兵的兵部侍郎胜保和僧格林沁的支持。两宫皇太后则力排肃顺等人阻拦,下令回銮京师。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初

一日，在胜保接应下，两宫皇太后一行抵京进宫，当天即与奕䜣会面秘商，决定将八大臣逮捕治罪，并拟定了两宫皇太后临朝听政、奕䜣为议政王的新的中枢机构。翌日黎明，载垣、端华刚踏入宫门，就被事先埋伏两旁的侍卫逮捕。肃顺扶柩抵密云，亦被抓捕到案。随之宣布八大臣之罪，赐载垣、端华自缢，将肃顺斩首，景寿等5人分别罢黜或遣戍。而后，载淳正式即位登极。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这一年是辛酉年，史称"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是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执政大权的宫廷政变，是清朝历史上第一次皇太后正式垂帘听政，也是慈禧本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开始。

失败的母亲

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二十六日，同治17岁，两宫皇太后撤帘归政。不到两年，十三年(1874)十一月初八，同治病危，两宫皇太后二次垂帘。

同治帝(1856—1875)，姓爱新觉罗，名载淳，咸丰帝独子。在位13年，年号同治，死后庙号穆宗。同治帝是清朝最后一位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皇帝。一位史家说，同治时代被时人誉为"中兴"，而中兴的辉煌事业却与同治无缘。同治一生都隐匿在其母慈禧的巨大光晕之下，属于他的只有一段可悲可叹无可奈何的风流故事。

同治六岁登基，两宫皇太后垂帘。志大才高、权欲熏心的生母慈禧将全副精力和兴趣都集中在国家大事上。或许她以为是她给了儿子生命，为了儿子皇位的稳固，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发动了辛酉政变，又宵衣旰食、日理万机……但她远远离开了亲生的儿子。这不仅仅在于她没有时间和精力以母亲的温馨关心和看顾儿子，更在于她将儿子作为皇帝物化成了大清国家的标志和符号，以相应标准衡量和对待之，特别是以一个高高在上施恩者的姿态对待之，难得笑脸，只有板着面孔、无穷无尽的说教、苛求和训斥。同治理所当然投向了温柔慈爱的慈安，对之孝顺孺慕，如同亲母。对慈禧则敬畏有加，暗暗滋生着越来越大的逆反心理。

同治与慈禧第一次公开对着干，是擒杀安德海。安德海出生于历史上的太监之乡直隶南皮，早年自宫入内。他机灵乖巧，擅长溜须拍马，没几年便得慈禧之欢，成为心腹太监。辛酉政变时，他行苦肉计，回京传递两宫密信，成为铲除肃顺一党的"功臣"。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后，安德海仗势骄狂跋扈，"渐干国柄"。他屡进谗言，使慈禧夺了奕䜣议政王之权；又笼络朝野，招降纳贿，使文武百官奔走于他的门下，势焰骎骎，有如明朝权宦魏忠贤。使同治对其恨之入骨的是，安德海狐假虎威，竟当着慈禧教训同治要好好读书，还派人监督同治，将同治一言一行全都报告给慈禧，让慈禧责罚。同治经常在宫中用刀砍小泥人的头，边砍边咬牙切齿地说："杀小安子！"同治八年(1868)，两宫皇太后颁旨为14岁的同治帝筹办大婚。安德海向慈禧讨了到南边采办大婚物品、监制龙衣的差使。清朝鉴于历朝宦官干政的流弊，宫中立有铁牌，严禁内监交接外朝、干政、出京，如有违反，一律处死。安德海仗着慈禧势力，无视清朝家法，大张旗鼓招摇出京，被山东巡抚丁宝桢以没有勘合、假传圣旨、擅自出京并搜出十数箱珍宝及外官请托密函之由，一举拿下。丁宝桢折子到时，慈禧恰巧受了点凉，没到养心殿，这折子便被同治一把抓到手里，他兴奋不已，径找慈安当靠山，传旨将安德海就地正法。

同治与慈禧第二次公开对着干，是选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两宫皇太后主持为同治挑选后妃。经过反复筛选，剩下四位，刚好是一后一妃二嫔之数。关键是如何排位次。慈禧中意富察氏。富察氏小同治三岁，出身满洲正黄旗，天生丽质，性格柔顺。慈禧喜欢有一位低眉顺眼的儿媳，在顺从、迎合自己的前提下，和和美美地过日子。慈安则中意阿鲁特氏。阿鲁特氏长同治两岁，是清朝惟一蒙古状元崇琦之女，相貌虽然不算出众，但雍容端庄，气质高贵，诗书娴熟，德才兼备，慈安认为同治亲政在即，需要一个稳重有主见的贤内助统率六宫。同治知道"娶妻娶德，娶妾娶色"，若要选色，皇帝定制六等妃嫔，将来有的是机会，但皇后不同。他听说阿鲁特氏是个才女，隐隐有了一定的倾向性。选后之前，慈禧带着不容争辩的教训口吻叮嘱同治：凤秀女儿是满八旗世家，家世、人品都没得挑，当年乾隆爷孝贤后就是

富察家的女儿。崇琦女儿相貌平常，大你二岁，且是蒙古八旗。自康熙爷到现在二百来年，皇后都出在满洲世家。这个例儿可不可以破，你可想好了。同治逆反已极，几乎立刻就做出了对着干的决定。正式选定后妃的程序，是设一铺着明黄色桌围的御案，上放作为皇家定亲信物的一柄如意、一对大红彩缎荷包、两对镶黄边绣鸳鸯的荷包，由皇帝亲手将其分别交到中意的候选者手中。如意代表皇后；大红荷包代表妃；鸳鸯荷包代表嫔。候选者接过就算定了终身，只等大婚之日迎进紫禁城了。两宫皇太后与同治就坐后，四位名媛被引导进来，请安后侍立一排。慈禧拿起如意，郑重递给同治，又一次加重语气叮嘱道：皇帝，你可想好了。同治答应一声，双手接过如意，毫不犹豫走向阿鲁特氏，将如意给了她。阿鲁特氏成了大清第十代皇后。

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中，同治大婚。翌年，两宫撤帘，同治亲政。同治亲政的一年多中，他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修园，一是冶游。修园出于孝心，想为两宫皇太后营建一方颐养天年的乐土，特别是稍稍转移母亲的恋权之心。冶游出于逆反。同治本对后妃无所偏心，慈禧却延续选妃时的矛盾，几次三番无端讽劝皇帝广沛甘霖，"眷顾"慧妃富察氏，同治索性发狠不召任何妃嫔侍寝，独宿乾清宫。然同治毕竟年少、不耐寂寞，加之修园为贪官所骗，朝上亲王重臣哭谏，朝下两宫太后数落，他自卑、心烦到了极点。于是破罐破摔，听从佞臣宵小的教唆带引，微服冶游，狎邪淫乐于琉璃厂、八大胡同、茶园酒肆、青楼妓院。

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初，同治发病，高烧不退，全身现疹。太医诊断为"痘症"。"痘症"便是天花，是当时无法可治的烈性传染病。脉案呈上，经过几天酝酿，两宫再次垂帘，同治十分悲凉失落。同治的病曾一度见好，痘疹饱满成熟、出了脓头，这标志痘症最险的关口已经闯过。然而不料，十九日病情又突然转危，6天后，腰部溃孔与臀部脓疮连到一起，溢出的脓每天多达一茶碗。十二月初五，同治病故。各种传说立刻不胫而走，最多的是：同治并非死于痘症，实是死于梅毒。从保留下来的脉案和宫中应对措施(如供痘疹娘娘等)看，同治确实患了天花。而同治微服冶游，也是不争的史

实——醇亲王所掌神机营精确指明了皇上私出的时间地点。同治临终前的病状表明，最大的可能应该是痘症、梅毒两症并发所致。慈禧有无为了保皇家和自己颜面，故意讳疾忌医，不惜牺牲儿子生命或竟促其早赴黄泉呢？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同治只活了短短的19岁。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另一个悲剧人物是他选定的皇后阿鲁特氏。同治死后，慈禧不为同治立嗣，却为咸丰立嗣，立了载湉为光绪帝（将来生子兼祧同治）。她个人可以继续以皇太后垂帘听政，不致成为被架空的太皇太后。而同治皇后阿鲁特氏的位置则陷于尴尬。慈禧自始就不喜阿鲁特氏。据说左右劝阿鲁特氏亲昵慈禧，阿鲁特氏正言道：敬则可，昵则不可，我是由大清门迎入的皇后，非轻易所能动摇。慈禧听说，更加切齿痛恨，必欲置之于死地。同治死后，慈禧召阿鲁特氏近前批其颊，骂道：是你害死我的儿子，你还想当皇太后吗！不让她参与治丧、立嗣。她悲痛已极，饮食不进，捎出口信请父亲崇琦拿个主意。崇琦含泪给女儿批了一个"死"字，于是，阿鲁特氏"忽薨"。

悲剧人物还有一个。不是别人，正是慈禧。慈禧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可怜儿子的煎熬中生活。40多年后，慈禧御前女官德龄目睹：每逢同治生辰忌日，太后均整日静坐，脸上满堆着阴沉愁苦的颜色，眸子里充满两眶苦泪，回忆同治和他每一件琐事的细节。

悲剧重演

与第二次垂帘相始终，慈禧与同治的母子悲剧在慈禧与光绪身上重演。

同治死后，慈禧非常悲痛，她曾说："自此我之境遇大变，希望皆绝。"正在此时，瘦弱、敏感、年仅4岁的光绪进宫。光绪是她妹妹的孩子，长相气质很可能会有与她相似的特征，使她感到亲切，萌发了重做母亲的想法。她将作为母亲早年未曾给予同治的关怀和照顾，给予了光绪，亲自包揽了他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光绪肚脐有病，慈禧天天给他擦洗身子，

衣服一日三换;光绪身体瘦弱,慈禧命御膳房荤素合理搭配,每日改换花样,少食多餐;光绪怕雷,每当闪电响雷,慈禧便让他钻入自己怀中,紧紧搂抱着他,拍他入睡……光绪5岁时,慈禧亲自为他启蒙,写纸片教识字,并口授四书五经,亲自挑选学问闻名遐迩的翁同龢为他的师傅。每个女人都有母性本能,面对幼小单薄的光绪,很难断言慈禧内心不会涌动着温柔的波浪。

一位学者用人格心理学分析慈禧和光绪。他说,有一种弗洛姆称之为"恋尸定向"的人,这种人冷淡乏味,脸上常现出一种嗅到臭味似的表情,其基本作为是控制他人,当控制他人的企图不顺利,就会实施暴力和虐待。慈禧是典型具有恋尸定向的女人。小孩对温和与凶恶的分辨既清晰又敏锐,光绪自幼瘦弱,又有些神经质,慈禧使他产生强烈的恐惧感,后发展成了抽象恐惧即恐惧症,不但跪安时浑身发抖,听到锣鼓、物体碰撞声、吆喝声也心惊肉跳,被称为"小胆天子"。埃里克森指出,人在1~3岁左右如得到良好照顾和父母鼓励,则会对人和环境便建立信任感、终身具备健康的独创意识,反之,则会对人和环境产生不信任感,终身缺乏自信心。据他的观点,儿童每当想起自己被父母讥笑时,就会产生一种逆反心情,这种逆反心情又诱发了内疚感,他会觉得对不起父母,继而否定自己的行为。长此以往确立不了自信,行为犹豫不决、猝然中止。自卑、缺乏能力、没有自信伴随了光绪一生,皇帝的地位却使光绪有极强的尊严感而对慈禧本能地逆反。其积极逆反是发奋读书、立志成为有道明君。中国注重孝道,早年光绪与慈禧也确实有过一段亲密时光,这就使他逆反行为的另一极是深重的内疚——不自信、犹豫不决、行为猝然中止。因而光绪始终做不到与慈禧一决雌雄、彻底决裂的地步。

光绪十五年(1889),慈禧强行将自己弟弟桂祥的女儿立为光绪皇后,"一则于宫闱之间可刺探皇帝之动作,一则为将来母族秉政张本"。立后过程又一次验证了光绪扭曲的心理人格。当洞房花烛、夫妻相对时,光绪没有正常人那种迫切、兴奋的初夜激情,他只觉疲倦和厌恶。慈禧为了政治需要和永远控制他,粗暴地强加给他不喜欢的女人,使他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又一

次遭到了毫无道理的挫败。初为人妇的皇后并不了解和理解光绪，吹灭蜡烛，静候年轻的丈夫。她失望了。或许一贯逆来顺受的光绪本还企图按照丈夫应该做的去做，但生理上出了毛病，未能成功。这种打击对一个男人来说非同小可，可以说是致命的。光绪自卑、沮丧到极点，竟借口有病，取消了翌日在太和殿宴请后族的例宴，以致京城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光绪潜意识中无非想借此发泄一下对这场丑恶婚姻的愤懑之情，然这种无奈无力的"抗争"，只能给他以后的人生带来更大不幸。

初夜不谐，皇后有充分理由看不起光绪。光绪则对这位他不爱却不敢惹也惹不起的名义妻子采取冷淡态度，而逐渐爱上了活泼可爱的珍妃。慈禧最初没有在意，甚至有些欣赏凭本事笼络丈夫的珍妃——她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但光绪亲政后，慈禧最不愿看到的事发生了，光绪周围逐步形成了敢于同自己分庭抗礼的政治势力——帝党。珍妃胞兄志锐、老师文廷式，恰是前期帝党中的活跃人物。慈禧深知光绪的性格特点，首先从后宫狠下辣手。于是媚主专宠，对皇后无礼；无视祖制留宿养心殿；女扮男装，照相取乐；僭越乘舆等都成了珍妃的罪状，其中最大的罪状在于惑主干政及通过门下太监卖官鬻爵。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二十日，慈禧痛责珍妃。责罚珍妃细节，清档未载。但从所存一份完整的珍妃病案中，可知所谓"褫衣廷杖"并非空穴来风。珍妃受责后"人事不省"，"六脉沉伏不见"，"抽搐气闭，牙关紧急，周身筋脉颤动"，"筋惕肉颤"，"痰中带血"，20余天方才逐渐恢复。紧接着，慈禧将珍瑾二妃降为贵人，严厉惩治光绪、珍妃手下的亲信、太监。奏事处总管太监郭小车子等交内务府慎刑司立毙杖下；珍妃景仁宫30余名首领太监几乎无一幸免遭受了残忍的"气毙"之刑(即以浸湿的7层绵纸封堵7窍后施杖刑，直至杖毙)。据说先后死于此案的太监达60余名。原珍妃宫女也被逐减大半。同时慈禧毫不手软地打击帝党。珍妃之兄志锐被撤差，贬斥乌里雅苏台；师傅文廷式翌年被革职逐回原籍，永不叙用。慈禧发动的这场宫廷大难，重点在于打击帝党、教训光绪，让他痛彻骨髓地认识到不可无视、动摇和觊觎慈禧的地位权力，同时捎带整肃宫闱，维护代表

慈禧的皇后的崇高地位。慈禧的目的基本达到。但整个过程中,珍妃以直言抗辩、反唇相讥慈禧干预朝政卖官鬻爵表现出的骨气和勇气,使慈禧看到了又一个阿鲁特氏。尽管一年多后,珍妃从嫔位恢复为妃,然从那时起她已种下了日后必被置于死地的祸根。戊戌变法失败后,珍妃冒死为光绪求情,被慈禧打入冷宫。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出逃前夕,终将囚禁了三年、年仅 25 岁的珍妃推入井中。

有人说,"光绪一生,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其中无夫妇之爱,对光绪的打击最大。一个人性爱行为的失败、家庭生活的坎坷,预示着他在其他方面成功的艰难。慈禧将光绪培育成为一个人格心理有严重缺陷的人,突出表现为懦弱自卑、犹豫不决、难以独当大任。慈禧一手造成光绪傀儡皇帝的地位和个人生活的失意,更加强化了他上述人格心理所具有的严重缺陷。光绪主持的维新变法陷于败北,从他人格心理发展的角度几乎是必然的。而这一次失败,远远超出了光绪个人挫折的范围,其影响所及,直接造成了中华民族更为深重的灾难。

三 千古评说

甲午战败

光绪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一年二月(1894 年 7 月—1895 年 3 月),中日之间发生了甲午战争。战争以清朝失败而告终——宗藩朝鲜沦于日本之手,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宝岛台湾,赔款两亿两白银,准许外国侵略者对华资本输出……甲午战争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帝国主义列强俄、法、英、美、德国紧步日本后尘,纷纷向清廷提出领土要求,攫取在华利益,抢占租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朝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清朝何以走到这一步?谁应承担甲午战败的责任?过去在讨论这些问

题的时候，人们往往考虑是清朝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妥协、投降和卖国，其代表人物下是李鸿章，上是慈禧。

评说甲午战争中慈禧的作用，一般均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安危与慈禧享乐问题；一是和战问题。

在国家安危与慈禧享乐问题上，人们普遍以为，慈禧为了个人的享乐不顾国家安危。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慈禧竟然拿北洋海军的军费去修颐和园。

那么，为修颐和园究竟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呢？人言言殊，不知其详。据说将清漪园改建颐和园的初期预算为白银1万万两，可用以增建10支“北洋舰队”而有余；而实际挪用估计达1000万至3000万两。近年来，一些清史专家认为，慈禧太后没有挪用那么多的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首先清廷规定北洋南洋海军每年各400万两的经费，从来没有全部兑现过，有时“仅及原议拨四分之一”，有时“大半无着，岁各仅得银数十万”，即便全部挪用，也不足人们印象之数。其次颐和园为海军衙门承修，经费也为海军衙门筹措，但并不等于海军经费全部或大部均用于修建颐和园。从史料看，修建颐和园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1. 海军军费。总理海军事务的奕譞、奕劻曾奏称，如海军经费每年果能全数拨给，则每年可勉强腾挪用于颐和园工程20万两左右，但这是他们的设想，有无实行，目前没有史料证明。2. 海军巨款息银。李鸿章与奕譞以办“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名义令各省捐输(实是“筹银”)、存天津洋行生息银两。至甲午战前，这笔“海军巨款”100多万两本金一直未动，息金40多万两颐和园如何动用，史料未载。3. 光绪十五年(1889)后的“新海防捐”垫款。所谓垫款是要由上述“海军巨款息金”归还的。“新海防捐”每年约收180万两左右，为颐和园垫了多少，后来还了没有，不得而知。从现在保留的颐和园算房56项工程(占全部工程的2/3)工费料费估算，颐和园工程修建经费大约在五六百万两白银。颐和园修建经费所花费的这五六百万两白银，是光绪十二年(1886)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间陆续支出的。而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1888)已奠定规模，大小

舰船25艘全部于光绪二年(1876)至十四年(1888)间购置。光绪十三年(1887)以后没有添置舰船、装备海军,并不等于为修颐和园。当时清廷财政困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复杂深刻,李鸿章等是湘淮军起家、代表地方势力进入上层的实力派,受到多方猜忌。慈禧限制北洋海军发展另有深意,不能简单归结为修造颐和园。

但是,慈禧个人的生活享乐,确实对甲午战争的发展造成了恶劣影响。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初十,是慈禧六十大寿。慈禧非常重视,两年前即成立了“庆典处”。除了准备在颐和园举行盛大典礼而大兴土木外,还准备仿照乾隆为皇太后祝寿的方法,在从紫禁城至颐和园所经道路分设60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的景点,每处用银4万两等。江南苏杭三织造衙门特造彩绸10万匹,粤海关监督采办足金1万两供庆典之用。慈禧六十庆典成了当时清朝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连发动战争的日本侵略者都看到,“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庆典加紧筹备之时,中日战争爆发。而当有人提出撙节庆典费用以供战费所需时,慈禧怒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必令彼终身不欢!后清军接连失利,黄海之战北洋水师严重受挫,金州、大连相继陷落,旅顺万分危急,慈禧不得不停办颐和园受贺事宜,在紫禁城内的宁寿宫度过了六十岁生日。然仍奢华已极,前后将近一个月,共用银541万余两。当时户部给前线的战争筹款只有250万两,不足庆典一半。史家叹道,如果当时没有慈禧六旬庆典,全国上下全力对日作战,战争结局或许全然不同。

在和战问题上,人们以光绪为主战派;以李鸿章为主和派;慈禧开始主战,后来转而支持李鸿章主和。

慈禧开始主战,与她一贯的思想、做法是一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军在八里桥之战中遭到惨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决定逃往热河避暑山庄,时为懿贵妃的慈禧极力谏阻,请求咸丰留在北京,继续抵抗,为此触怒了咸丰,险些引来杀身之祸。后奕䜣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懿贵妃深以为耻,曾劝咸丰废约再战。因咸丰病危,只好作罢。此次战争初期,慈禧

与光绪一样估计不足。光绪事事均请示慈禧。慈禧的态度主战无疑——光绪对诸大臣说:“朝廷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也主战”。中外舆论也认为,光绪主战,慈禧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在慈禧看来,蕞尔岛国小寇,不堪一击,不待时日便可一举荡平。然随着战场失利的消息频频传来,慈禧由主战转向主和。这倒不完全是战争教训了慈禧,使她变得实际一些;也不完全是担心战火将波及清朝龙兴之地盛京。促使她转向主和的决定因素有二:一是旷日持久的战事,势必影响她的六十庆典活动。一是帝党的形成。其中第二个因素又是最重要的因素。甲午年中日开战前后,围绕着“主战”,光绪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整顿军机处;一是筹措巨额战费。光绪十年(1884),慈禧与奕譞联手发动“甲申易枢”,将奕䜣为首的军机大臣全部罢黜,代之以平庸的礼亲王世铎等人。面临战争,这一班子明显运转不灵。光绪任命主战大臣翁同龢、李鸿藻、刚毅为军机大臣,又鼓动词臣上书,吁请十年前被罢黜的奕䜣重新出山,“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在内廷行走”。汪鸣銮、志锐、文廷式、李盛铎等锋芒毕露的台馆之臣亦聚集在光绪麾下,对慈禧心腹发起猛烈攻讦,要求将他们逐出军机。在筹措巨额战费的过程中,“帝党”分子提出,国家处于战争期间,应将慈禧寿典“所有点缀景物,一切繁仪,概行停止”,“移充军费”。光绪遂一度停了颐和园工程。在慈禧看来,改组军机处,那是夺取她控制朝政的大权;停建颐和园,那是藐视她的存在、触犯她至高无上的尊严。平壤之战清军失利,左宝贵等将领壮烈牺牲,统帅叶志超一夜狂逃300里,退回中国境内;黄海之战中日战平,邓世昌等壮烈殉国,李鸿章抛出所谓“保船制敌”的方针,命北洋水师全队避入威海卫港内,从此不准出港与日军交战。慈禧则终于站到台前,公然干预光绪的执政。

她连续召集重臣会议,提出议和。每次会议,光绪支持的主战派与慈禧支持的主和派均发生激烈争执。慈禧索性抛开光绪,通过奕䜣、李鸿章两条线加紧开展调停、议和活动。与此同时痛下狠手,教训光绪、整饬后宫、打击帝党,于是发生了前述珍妃一案。十二月十八日,日军攻陷刘公岛,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慈禧派出李鸿章乞和。翌年三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在日签署

的马关条约文本送到北京，须由光绪"用宝"（签押）后，再送往山东烟台与日本换约。这是从未有过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动，地方封疆大吏纷纷致电、上奏坚决反对；京官据不完全统计，反对签约的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大员10余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有50余人次，没有奏事权的低级官员达575人次之多；刚参加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也上书反对签约，一时间，"拒和迁都，毁约再战"的呼声震撼朝野、震撼人心。光绪请慈禧懿旨定夺。不料慈禧称病闭门不见，做出"已归政"的架势，冠冕堂皇说："一切请皇帝旨办理。"光绪"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四月八日，光绪最终批准马关条约。光绪与师傅翁同龢"战栗哽咽，相顾挥涕"，痛不欲生。十天以后，光绪下令大小官员一律到内阁观看他的一篇朱谕。这是他战败的交代。他字字血泪地说，嗣后"君臣上下，惟当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勿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他只说要增强军事力量，他没有说，和约的签订是因为慈禧已"意有所归"。

戊戌政变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正在生成。这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

光绪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决心变法图强。慈禧亲信荣禄等则私下活动，联络六部九卿共同上书请慈禧复出，再度垂帘。光绪忍无可忍，甚至通过庆亲王奕劻向慈禧捎话："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光绪以其懦弱、畏怯的天性向慈禧要权，这几乎是他一生中破天荒之举，不料慈禧竟授权，命奕劻传话："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光绪立刻急切付诸行动，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了变更旧法，博采西学，发愤图强的决定。6月11日至9月

21日短短的100多天中，光绪接连发布了100多道新政诏书，有时一日数令，倾泻而下，令人目不暇接。最多一天竟颁布了11条维新谕旨(9月12日)。这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传播的变法诏令受到维新派和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但仅凭一个无权的傀儡皇帝所颁发雪片般的诏令，即想在短期内改变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社会，将之纳入近代化轨道，谈何容易？掌握中央和地方实权的大员，除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外，几乎没有人执行变法诏令。束之高阁还算好的，绝大多数是群起反对，变法受到了极大阻力。光绪不但大感意外，而且非常气愤。他像所有幼稚的年轻人一样，想当然地将他的对手简单化、绝对化，归结为是慈禧的"后党"捣乱。他不再考虑策略，色厉内荏、咄咄逼人地向后党开刀。集中表现为抛开现行体制另起炉灶。9月4日，将礼部原六堂官全部罢黜。5日，超擢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为四品军机章京，此后"凡有章奏，皆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并免去李鸿章在总理衙门行走的职务等。其结果是过早激化矛盾，向慈禧发出挑衅，鼓励后党分子向他动手。

慈禧早有防备，光绪"定国是诏"发布后第四天，慈禧即迫令光绪一天中连下三道上谕：第一，以"渐露揽权狂悖"的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第二，打破太后归政以后不再接见官员的成例，规定新授任的二品以上官员，均须具折后再到太后面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须一体向太后具折谢恩。第三，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统领精锐的北洋三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与光绪有声势无实效的措施相比，慈禧这几招，招招是显露杀机的辣手。开缺翁同龢，无异于去掉了光绪的主心骨，抽掉了帝党的顶梁柱。要新任之官向太后谢恩，实际是慈禧通过抓人事大权而干政的信号。荣禄的任命，更等于慈禧在军事上控制了京畿。经过数十年的虐待和摧残，慈禧了解光绪的个性深处的懦弱、颤栗、不知所措和无抵抗主义，单凭感觉就知道如何制服他。她做了上述部署，就不再做什么，仍旧在颐和园里写字看戏，静观事态发展。不出慈禧所料，光绪"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他

本抱着慈禧支持的侥幸心理。慈禧上述措施在他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他的天真和懦弱使他有预料却无防备,也无法防备,于是突出了意料之外。但他已无退路,只能硬着头皮顶下去,大力推行变法维新,造成某种既成事实,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随着变法的深入,慈禧和光绪的分歧越来越大。9月14日,光绪第11次赴颐和园,请示开勤懋殿办事,拟安插维新派康有为等人为勤懋殿顾问。这是康有为的建议:仿先朝开懋勤殿议事,选举英才,并邀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革之事全盘筹算,然后施行。如此一来,军机处将被架空。有说当光绪向慈禧提出这一请求的时候,"太后不答,神色异常",从慈禧的表情,光绪感到变法已出现危机。有说慈禧被激怒,痛责光绪坏祖宗之法,要把祖宗家业葬送康有为之手。光绪虽当时硬顶:"儿宁可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后人耻笑。"但面色苍白、大汗淋漓,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自七月以来京师便流传"换皇上"的谣言。光绪得知自己将在九月间奉慈禧一起到天津阅兵,那是否是慈禧以其心腹荣禄发动兵变、废立皇帝、解决新党的一着将军之棋呢?15日,光绪带给维新派一道密诏,说他已感到皇位不保。维新派几经筹商,由康有为向光绪举荐了握有兵权的袁世凯。16日,光绪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候补侍郎,专责练兵事务。此举引起后党惊惧,荣禄谎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命袁世凯迅速回防,以防他变。京津气氛顿时紧张。维新派决定铤而走险,当晚,谭嗣同秘密到京郊法华寺游说袁世凯,要他率敢死将士数百名,拥光绪帝登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慷慨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又说: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谭嗣同无奈,只好同意等到天津阅兵时再作计议。

同一天,御史杨崇伊(李鸿章亲家)通过奕劻递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特别指出要防止维新党同东人(日本人)勾结乱政。当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来中国访问,"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为顾问官"。慈禧不

担心维新派上书言事，却担心他们掌握武装、与外国势力联合。当天傍晚，光绪离开了颐和园，并将于20日会见伊藤博文；袁世凯则将于20日陛辞出京。慈禧对此不能不防，遂决定乘时政变。19日，慈禧带领随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到紫禁城皇宫，光绪慌忙出迎。慈禧不理，径直进入光绪寝宫，将所有章奏归拢在一起，携之而去，一面怒冲冲指着光绪道："我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道："我无此意。"慈禧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事为辞，临朝训政。从这晚起，光绪即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此后，他虽还有些活动，但已处在慈禧及爪牙的严密监视之下。21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诏书，宣布太后训政，并命逮捕康有为等。康、梁逃往日本。谭嗣同拒绝出逃，他向友人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8日六君子被杀。新法除"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次第举行"，京师大学堂继续筹办外，全部取消。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从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训政，变法共进行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对慈禧为何发动戊戌政变，众说纷纭。一种意见认为慈禧始终站在顽固、守旧立场上阻挠和反对变法。这是几十年来的传统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慈禧和光绪嫌隙已深，光绪要自主，她内心益愤，便想索性废掉光绪，于是一开始便作了部署，"由他去办，胡闹几个月，似办不出模样再说"，最终发动政变。一种意见认为慈禧说不上有何政见。光绪皇帝和慈禧的争论，纯粹是家务之争，如果把主张变法的名义奉送给慈禧，使之成为改革旗手，那么光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但康有为却坚持"扶此抑彼"，认为慈禧"是个万万不可造就的东西"。一种意见认为戊戌政变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政策之争，毋宁说是慈禧察觉了康氏有针对她个人的举兵夺权计划。

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把慈禧说成完全因反对维新而发动政变，至少是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看得过于简单了。不应把慈禧简单划归入保守派之列。

慈禧早年曾力排保守权贵的势力，支持洋务运动，也曾对光绪的变法愿望予以赞同；她与光绪还是有亲情的。与其说她的思想接近保守派，不如说更接近洋务派；她并不是变法不可逾越的障碍。溥仪《我的前半生》指出，“戊戌变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清政府各个派系之间妥协的产物，是他们面对清王朝所处的实际困境而共同寻求的解救之道。”早在变法活动酝酿之初，慈禧即曾对光绪道：实行变法乃是我一贯的主张，早在同治初年就曾依曾国藩所奏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如能通过变法，使国家富强，你可放手为之，我绝不从中作难。但如日本那样，连衣服皇历都学洋人，“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不过告诫光绪“毋操之过蹙而已”。康有为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请变法，并代御史杨深秀草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代侍读学士徐致靖草拟《请明定国是疏》，建议光绪明定国是立即变法。1898 年 6 月 11 日，是慈禧面告光绪：“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于是，光绪方发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把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作为清王朝的国策，使维新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此时慈禧的态度不仅不反对，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同情和支持变法。即开缺帝师翁同龢也不是慈禧而正是光绪帝，戊戌运动史专家孔祥吉说，“在后党及守旧派喧嚣一时的攻势面前，翁同龢动摇退缩，这使光绪非常失望，加之翁在军机处的显赫位置，已构成对新政很大的障碍，这是导致光绪将翁开缺的主要原因。”由于政治变革过急过剧，超出了社会公众的承受能力，使社会秩序处于极端危机的状态中。戊戌政变发生的前几日，北京城谣传要尽撤六部九卿、督抚司道；尽除满人，剪除发辫；裁撤内监等，加之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采取了错误的孤立与排斥慈禧的政治战略，最终导致了政变发生。

这其中有两个事件值得思索。第一个事件是光绪密诏事件。近代史专家经考证认为，康有为在密诏上做了手脚。除将光绪给杨锐的密诏伪造成给他本人的密诏，将授命“筹商”者由军机四卿改为以他为主外，重要的是将光绪帝原意——设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变成了要康等设法“相救”，这便导致了激化矛盾、围园劫后的行动。变法失败后，康、梁讳

言围园劫后、发动政变的密谋，称此为守旧派的诬陷。但史家从日本档案中发现了亲历其事之毕永年的《诡谋直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康、梁等密谋“兵围颐和园”、由毕永年带100人进园“往执西后而废之”的计划。第二个事件是袁世凯告密事件。长期以来，人们以袁世凯《戊戌日记》为根据，认为戊戌政变因袁世凯告密而起。事情经过是：八月初三日深夜谭嗣同秘访京郊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要他杀荣禄，围颐和园。袁世凯慷慨相允。八月初五日袁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囚禁光绪，临朝训政，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经史家考证，这是袁世凯为洗刷自己在日记中的精心伪造。理由是：1. 政变之初，慈禧捕拿维新派名单中没有袁世凯告密围园劫后的“逆首”谭嗣同，所列罪名不过“结党营私，莠言乱政”，没有围园劫后之谋。2. 袁世凯“抵津”时“日已落”，时京津火车通行不久，没有夜车，荣禄万难当夜赶到北京。而慈禧八月初四即已返回大内，控制了光绪，初六日上午正式宣布训政，可见慈禧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引起。3. 京师后党刚毅、奕劻、徐桐等均与袁世凯有交，袁世凯且有初四一整天的时间，围园劫后如此大事，为何舍近求远，一定要回天津告密？4. 据袁世凯说，初五日返津见荣禄刚要告密，忽有客来访，只好等明天再说。慈禧有旦夕之祸，只因有客将此事延宕一天，于理不通。5. 翌日袁世凯向荣禄告密，二人因事涉皇上，“筹商良久，迄无善策”。时是慈禧身处险境，二人却因商保光绪又耽搁一天，更说不通。事实应该是这样：袁世凯参加了维新党密谋。初五日返津。初六日，荣禄已从先期来津拜访的杨崇伊那里得知了慈禧发动政变、施行训政的消息，对前来拜访的袁世凯“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以为密谋败露，“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向荣禄忏悔，并将谭嗣同夜访、围园劫后的密谋和盘托出。袁世凯事先没有告密，是获知慈禧已发动政变后，出卖了维新派，供出了他们的密谋。袁世凯招供的内容反馈到北京，后党才知有兵变围园之谋。于是事态扩大，不经审讯于八月十三日处决六君子，宣示罪状中方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

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

从上述两个事件可知，第一，维新派确有针对慈禧的举兵夺权计划，尽管这一计划流产，但可推知，其“扶此抑彼”的方针定会有所表露，从而造成矛盾激化；第二，慈禧发动政变，并非因得知“围园劫后”的密谋，而是在其前先已发动。这说明，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是各种因素的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慈禧既握大权，又有政见。权柄不能授之与人；变法不能突破底线，不能变制。否则，不是你死，便是我活。

清末新政

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剥夺了光绪全部权力，将戊戌变法淹没在血泊之中、变为短命的“百日维新”。然而，仅仅两年多，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一系列的历史巨变，慈禧自己走上“变法”之路，推行“清末新政”近 10 个年头，其深度和广度，甚至超过了戊戌变法。

戊戌政变后，慈禧曾散布光绪病重的消息，以便除掉光绪。不料洋人出面要给光绪看病，慈禧不敢惹洋人，只好作罢。她又想出先为同治立嗣再除光绪的办法，选的皇储是端王载漪之子溥儁，拟元旦时请各国公使道贺支持，然遭公使们拒绝。溥仪《我的前半生》说，不是公使们对慈禧为人有什么不满，而是英法美日各国“不喜欢那些亲近帝俄的后党势力过分得势”。慈禧虽“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将溥儁改称大阿哥。但洋人庇护康有为，又反对废光绪和立皇储，等于直接干涉和反对她的统治，其内心的愤恨难以形容。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将反洋教斗争发展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灭洋仇教”的义和团运动刚刚在山东兴起之时，慈禧的态度是坚决主剿。她多次谕令地方督抚“实力剿捕，毋得养痈贻患”。义和团迅猛发展、进入北京后，以“外国人欺我太甚”而耿耿于怀的慈禧在“剿”“抚”问题

上举棋不定。一件未经甄别的紧急情报让慈禧下了决心。这件情报把洋人在各地的暴行解释为想逼慈禧归政于光绪。慈禧大怒，立刻下诏"宣抚"团民，下令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和兵营，发出内帑赏给团民，悬出赏格买洋人的脑袋。为了表示决心，她把主"剿"的兵部尚书徐用仪等砍了头，并以光绪名义发布了对各国宣战的诏书。慈禧的决定遭到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团乞和，并积极活动，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慈禧开始动摇。她一方面要求各省将军督抚布置战守事宜；继续利用义和团围攻使馆、抗击八国联军；以"杀死一名夷人赏五十金，生致者加倍"，杀妇女婴儿的依次受赏，煽动义和团对教民"按户搜杀，以绝乱源"；将义和团众带入宫中，企图借义和团之手杀死光绪。一方面令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于北御河桥树立"钦奉懿旨，保护使馆"的木牌；分别致书俄、英、日、德、美、法等国元首，请其出面"排难解纷"、"挽回时局"；将两广总督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与列强谈判。八国联军则没有停止进攻。从天津到北京，八国联军疯狂屠杀义和团及无辜平民，所过之处"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尸骸枕藉，道路相望"，至少有五十万人无家可归。8 月 13 日夜，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慈禧太后携光绪从德胜门仓皇出逃西安。

慈禧于途中命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议和，同时将战争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下达了痛剿义和团的谕令。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交涉，除参加侵略的俄、英、美、日、德、法、意、澳八国外，又加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共同拟定议和大纲 12 条。慈禧见没有将她列为祸首，也没有要她归政光绪，如获大赦。当日电复原则上照允。并发布上谕，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为尽快地达成和议，全部接受列强提出的条件。1901 年 9 月 7 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廷与 11 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慈禧完全屈服，清廷成了洋人的朝廷。

在和议未成之前，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 年 1 月 29 日），慈禧于西安发布了实行变法的上谕，此为清末新政之始。此谕指康有为之法

“乃乱法也，非变法也”，“翦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如今皇太后和皇帝“母子一心”，“一意振兴”，实行变法，“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此谕还限期要求朝廷百官，驻外使臣，各省督抚就如何变法各抒己见。二十七年(1901)三月初为“变通政治，力图自强”，下令成立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人组成的督办政务处。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二十日，慈禧离开西安的前四天，又发懿旨，表示要坚决变法：“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慈禧为首的清廷在这个时候决意变法，当然首先有讨好列强、博取其信任，以期早日签订和约的用意。买办官僚盛宣怀看到变法上谕后即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释前嫌。”他为清廷草拟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这样写道：“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正式发出的国书中“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这些都明白反映出新政的实质。

慈禧回到北京后，从1901年到1905年，先后颁布30多道上谕，推行新政。主要内容有：一、改革官制。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为适应“新政”需要，设商部(后来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练兵处(后来与兵部合并，改为陆军部)，增设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学部。并宣布裁汰先“冗衙”、胥吏、差役；停止捐纳实官；废除勒索性“陋规”、“供应”等。二、改革经济。制订商法，提倡奖励实业，振兴商务，鼓励私人出资兴办企业、交通，保障工商业者权益和提高工商业者地位。三、改革教育。停科举、设学堂、奖游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大、中、小学堂；二十八年(1902)再次通令各省选派学生到东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学成者回国给予任用。二十九年(1903)颁布学生章程。对各级学堂毕业生分别授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名衔，且规定前科考进士必须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三十年(1904)，颁布第一个以法律形式公布并在

全国推行的近代学制《学堂章程》。三十一年(1905)正式宣布自翌年起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四、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除武科举。二十九年(1903)于北京成立练兵处,各省设督练兵公所,编练新军。袁世凯统率的北洋六镇是最先成立的新军,清朝末年各省新军亦在此时开始形成。三十年(1904),颁布《陆军学堂办法》,令各省建立武备学堂,各主要城市建立军事学堂,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事。五、改革法律。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清廷参照西方各国法律,修改《大清律例》,开始编纂新法典。废除枭首、凌迟、黥面等酷刑,并颁布了禁缠足、禁鸦片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法令。等等。

对慈禧推行新政应该如何认识,史学界众说纷纭。

一种意见以为,慈禧实行新政,并非说明她是"中国近代化的最大保护神",慈禧实行新政首先是迫于内外交困的形势;其次为拉拢资产阶级立宪派;第三为安抚要求立宪的官僚。

一种意见以为,慈禧有合乎时代潮流、值得肯定的一面。她面对新事物、新问题,并非绝对死守传统、顽固不化。在不危及自身统治的前提下,并不反对改革,能够降诏求言,重用人才。

一种意见以为,血的教训使慈禧认识到,为保大清江山,祖宗之法可变、必变,否则只能"愚昧贫穷软弱"。慈禧新政的一些措施,不仅超越了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但她仍然逃避不了历史的谴责,因为正是她丧失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大好时机。当她实行新政、承诺预备立宪时,一个新的政治气候已经形成。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的较量,取代了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的较量。

一种意见以为,慈禧新政与百日维新二者在骨干构成、历史前提、提出形式及主要内容等方面不存在本质差别,慈禧新政同样是一次没有成功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总的来看,慈禧在新政的名义下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许多都是戊戌变法内容的具体化、实践化和延伸化。毋庸讳言,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中国的

近代化进程。但新政既没有起到加强清朝统治的效果,也远不足以使社会各阶级、阶层感到国家已有了新的气象和起色。如果说当年光绪依靠康有为等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在社会上层中曾经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以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和沉重赔款负担为背景,相同内容的重演已经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效果了。赔款、练兵、新政所需的巨额"筹款",足以抵消任何新政带来的些许希望。慈禧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更是掩盖不了的事实。如一位学者所说,在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大众心理面前,新政的任何措施事实上都走向了其目的的反面。"大变革的浪潮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作为异族势力的满清王朝企图竭尽全力左右这种变革,然而,反清的思潮、军队的涣散已在所难免。事实上,最后灭亡清朝的恰恰就是这些军队。政府在国外培训的留学生,国内训练的新军队,它所鼓励的从事国内经营的商人,各省组织的谘议局,所有这种种势力都或早或晚地掉转了矛头,直指清王朝。"

清末新政,是慈禧的最后一幕。而慈禧在开始实行清末新政的时候,已使我们感到,她的政治生命行将终结。

思考题:

慈禧是个怎样的人?

参考书目:

1. 王道成:《垂帘兴风云——慈禧太后》,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
2. 左书谔:《慈禧太后》,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 德龄:《我在慈禧太后身边的日子》,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

第十三讲

统治集团部分成员发起的求强求富运动

睁开双眼看世界

近代工业化的艰难起步

北洋海军

国门洞开后，中国社会为之一变，开始进入全球竞争时代。无情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只有国家富强，才有能力同他国竞争，以求独立发展，否则，则沦为积贫积弱之国，为他国所欺。1860年代始，清统治集团部分成员自上而下地倡导了求强求富运动。“当世立国之要，必以富强自保为首务”，谋求自强成为时代最强音。

一 睁开双眼看世界

统治集团的经世派

嘉庆以降，清朝社会危机加剧，在匡世济民、兴利除弊思想指导下，统

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以陶澍为领袖核心，包括官员林则徐、贺长龄、黄爵滋，士大夫魏源、包世臣、姚莹、龚自珍等人的“经世派”。

陶澍是经世思潮的倡导者。他主张以“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鉴古乃为知今，更多关心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陶澍还是经世思潮的实践者。他在任职两江总督期间，力行改革：政治上首重整饬吏治，“吏治不清，而欲民生之康乐，不可得也”；经济上鼓励扶持新兴的商人力量，首倡漕粮由船商海运，改官营纲盐为商营票盐；教育上广建书院，举荐贤才。“经世派”对江河日下的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认为“今日之时势，观其外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也”。

龚自珍是揭露批判黑暗现实的代表人物。他抨击政治体制“尽奄然而无生气”；官员腐败，“无有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甚至直指皇权“一夫为纲，万夫为柔”，造成“独制无所制”的压抑局面。他尖锐地指出，其时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豪强兼并，无田者半天下”；人民日益贫困化，“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世风陈腐，人才匮乏，“士子以腐烂时文互相弋取科名以去，此人才所以日下也”。“经世派”批判现实的目的，并非为了推翻现有政权，而是希望更好地进行封建统治，因此纷纷提出“补偏救弊”主张，要求改革变法。“经世派”的变革是对封建体制本身的改革和完善，“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因此改革内容多涉及传统经济，如漕运、河工、盐业、水利等方面。

鸦片战争的发生，令经世学风为之一变。鸦片战争前，主持禁烟事宜的林则徐在广州“察访夷情”，发现当地官员对外一无所知，甚至“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有感于斯，林则徐组织编译了《四洲志》、《各国律例》、《华事夷言》等一系列介绍国外历史地理、风俗政制的书籍。《四洲志》一书较系统地介绍了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历史地理概况，成为国人认识外部世界的起点。鸦片战争后，国人从“我为上国，率土皆臣”的迷梦中警醒，“惟知九州以内，至于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的华夷观念亦发生转变，开始关注域外情形，从而形成边疆及世界史地研究的热潮。

一大批闪耀经世光芒的研究论著相继出版，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姚莹的《康輶纪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萧令裕的《英吉利记》，等等。经世派在介绍域外地理知识的著述中，着重指出了欧美各国的富庶强大。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一书中写道：伦敦“居民 140 万，街衢纵横贯穿，百货山积”；巴黎“城内有大书院，设医院十四所”；瑞士“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淳良，乃西土之桃花源”；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国人从闭关锁国中走出，开始睁开双眼看世界。

可见，这一时期的经世思潮核心有二：一为体制内的自改革；一为对外部世界的学习与开放。

师夷长技以制夷

鸦片战争失败，令中国人感受最深的是英军的“船坚炮利”。

众所周知，火药、火器本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然至明中期时中国的火器制造已落后于西欧。明朝军队对倭寇作战中，缴获大量葡萄牙及日本生产的火绳枪，同时还俘虏一批能造枪的工匠。明政府派专人向俘虏的工匠学习造枪技术，不久造出中国自己的火绳枪，称为“鸟铳”。清朝入主中原后，承袭了明代的造枪技术。鸦片战争时，“鸟铳”成为清军火器装备中最主要的武器。“鸟铳”为铁质，长两米，射程约百米，射速每分钟一至两发，是当时清军士兵配备的最先进的武器。

英军士兵使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两款枪支：一是伯克式前膛枪，燧石点火，长 1.16 米，射程 200 米，射速每分钟两至三发；二是布伦斯威克式前膛枪，击发枪机点火，长 1.42 米，射程 300 米，射速每分钟三至四发。

从双方枪支情况来看，清军在点火装置、枪身长度、射程及射速方面均落后英军。而且，清军仅有一半士兵配备了“鸟铳”，另一半则仍停留在刀矛弓箭的冷兵器时代。

清军火炮装备源自康熙年间传教士南怀仁监制的加农炮，近百年来未

有实质性变化。清军火炮质量极差:1835年广东提督关天培在号称当时最坚固的虎门炮台施放火炮,当场炸裂6门。甚至多门火炮并无炮架和瞄准器,士兵只能依靠经验施放。这样的火炮在战争中威力如何呢?整个鸦片战争中,清军火炮没有炸沉一艘英国舰船。

舰船是英军的制胜关键,也是中英差距最大的武器装备。当时英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配备各类舰船400余艘。英舰底部为双层船体,俗称"夹板船",舰体较大,排水量从百吨级到千吨级不等,配备火炮几十门甚至上百门。清军水师则为缉拿海盗、防卫炮台而设,因此尽管舰船数量达数百艘,但船体狭小,每艘船只装有十余门火炮。

武器装备上的悬殊差距,使清军无力对英军进行有效进攻,只能将主要精力用于防御。清军在战争中主要的防御工事是炮台。然而,清军炮台仍为旧式高台型火炮阵地,停留在欧洲中世纪时期的防御工事阶段。这种落后性,甚至连西方新闻记者都能指出进攻的方法:

> 岸边炮台都是裸露的,根本无法抵挡一艘巨型战舰的火力和与之配合作战的海军陆战队的攻击。陆战队总能在这些炮台力不能及的侧面和后方找到绝佳据点进行攻击。

清军舰船根本毫无能力与英军一战,负责东南防务的邓廷桢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发出"船炮之力实不相敌"的无奈感慨。

鸦片战争的失败,上至皇帝群臣,下到士人兵勇,皆充分认识到西方武器的先进。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完成《海国图志》初稿五十卷,提出全面学习西方军事科技的整体构想。魏源指出,应在广州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聘请法、美两国工程师进行指导;雇佣西方军事专门人才教习驾驶轮船、施放火炮技术;改制科举,别设水师一科,能制造船炮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轮船施放枪炮者为行伍出身,水师营官均由此途升转等。《海国图志》一书全面考察了世界各国的史地沿革、政治军事、物产风俗等,内容广博,体例宏大。魏源通过对世界格局的洞察,有力批驳了将西方科技当作"奇技淫巧"

的说法，认为西方的先进科技“即奇技而非淫巧”，应虚心学习，“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思想的核心。按魏源的说法，“长技”主要是指军事科技，即战舰、火器与养兵练兵之法。魏源强调西方先进军事科技的引进，成为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理论先导。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主导的求强求富运动，正是贯彻“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并将其付诸实践。

设立同文馆与派遣出国留学人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对外交涉日益频繁，办理“夷务”亦成为清廷的重要政务。1861年1月20日，清廷批准恭亲王奕䜣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设置大臣、章京两级官员，渐次成立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等处理各国交涉事宜，常设司务厅、清档房处理行政事务。1883年又增设海防股。总理衙门在秉权当政的恭亲王奕䜣支持下，职权范围越来越大。除办理外交事务外，总理衙门还负责诸如购买船炮、设立工厂、创办铁路矿务、海关通商等一切涉外事务，成为晚清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光绪年间刑部郎中沈端林这样评价道：“总理衙门之事，固不独繁于六部，而实兼综乎六部矣。”

总理衙门成立后，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外语人才匮乏。“洋人之到中华，每以语言不通，律法不同，尊己抑人，任情蔑理”，让中国官员在谈判桌上吃尽了苦头。为扭转此种局面，同治帝颁布谕旨，诏令“设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同文馆甫一设立，便遭群儒抵制，众人深以“师夷”为耻，无人愿入馆进学。清廷只好强令八旗官学从中拣选学生入馆学习。为鼓励学生入馆，清廷规定每月补助银三两，后陆续增至六两、十二两，而当时任教尚书家庭的翰林每月也不过八两银子。同文馆下设英、法、俄、德四国语言文字馆，“以习西言西字为其宗旨，译书为要务”。不久，上海、广州也分别仿照京师同文馆，设立广方言馆（上海）和广州同文馆。同文馆的设立，为中国培养了

第一批新型翻译人才。学员毕业后,洋务企业竞相聘用,纷纷设立译书机构,极大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1867年,恭亲王奕訢上奏请求同文馆下设天文算学馆,从满汉举人、恩贡生员及前项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官员中进行选拔,入馆学习。此动议引起了轩然大波,清廷内部发生一场论争。论争一方是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保守官员,他们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中学大大优于西学,岂有向西人学习的道理?当时总理衙门总揽全局的做法,也让他们不能接受。他们指出,奕訢此举在于变易"义理为本、艺事为末"的立国根本,祖宗之法不可变,如果变易,"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到此丧矣,机械变诈之行自此起矣"。论争的另一方奕訢等人则认为,中国目前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只有富国强兵、举办洋务,方能收长治久安之效。长期以来,士大夫"徒以道义空谈"非但于事无补,反而误国。清廷最终对论争双方做出调解,倭仁"与国家休戚相关,不应坚持己见";奕訢"不避嫌怨,力任其难",决定创办天文算学馆。然天文算学馆应试者寥寥无几,清廷只好将"监生杂项人员"一律收考,最终勉强录取30名。初期学生第二年就淘汰了一大半。天文算学馆下设天文、算学、格致、医学四馆,正式将自然科学引入教育体制之中,成为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此后,福州"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北洋水师学堂"等一批新式专业学堂相继建立,迈开了求强求富、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一步。

国内设立新式学堂的同时,有人提出应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此人即自费赴美留学的容闳。国外的生活经历使容闳意识到,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教育是关键。他在自传中写道:"教育已经明显地扩展了我的心灵境界,使我深深感到自身的责任。"回国后,容闳向曾国藩、李鸿章提出官派留学生的计划,得到二人的有力支持。李鸿章几次上奏疾呼:"选派留学生,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之根本。"不久,清廷批准曾、李等人的建议,出台官派赴美留学计划:设"幼童出洋肄业局",下设监督二人,由翰林陈兰彬担任正监督,容闳任副监督;选拔120名幼童,分四批出国;学生年龄最小不得低于12岁,

最大不得超过20岁；学业以西学为主，辅以中国教师教习中学；学习期间，一切费用由政府承担；学成后学生不准自谋职业，听候政府调用。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30名幼童启程赴美留学。首批赴美幼童主要来自广东。至1875年10月，120名留学生分四批全部派往美国。1881年，第一批留学生面临高中毕业，容闳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希望中国留学生能够进入美国西点军校和海军军校继续深造，却遭拒绝。美国国务院表示："军事学校一律不接受中国学生。"清廷一怒之下，招回了所有在美的留学生。据统计，赴美留学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余人，大都成为近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邝荣光是开平煤矿的采矿工程师，由他绘制的《直隶省地质图》和《直隶省矿产图》，成为中国最早的具备专业水准的地质图。詹天佑成功设计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滦河大桥，且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创造性地发明了"人"字形结构铁路，有力回击了外国媒体"建造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世"的谬言。留学生中从事教育者5人，其中2人担任大学校长。唐国安任清华学堂校长时，全力支持青年赴美留学，促进了清末留学事业的发展。留学生中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12人做到领事、代办以上。醇亲王载沣赴德访问时，德皇威廉二世要求载沣行磕头礼，梁诚据理力争，迫使德皇改为鞠躬礼。留学生有20人投身海军，回国后分入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北洋水师，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们保家卫国，英勇参战，其中7人为国捐躯。留学生的杰出贡献使清廷深受震动，甲午战后，大批学生开始出洋留学。

二　近代工业化的艰难起步

谋求自强成为时代之主题，清廷之共识。中央有恭亲王奕䜣、侍郎文祥等满清贵族坐镇，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呼应，兼之冯桂芬、郑观应、郭嵩焘等思想家配合，一场前所未有的求富求强运动在近代中国开展起来。自强运动的核心在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清廷先后

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商人自办等方式，创办了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军事、民用及交通工业。

治器与治器之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在与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清军统帅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现洋枪洋炮往往成为出奇制胜的关键。1862年6月，李鸿章组建的淮军专设洋枪队，开中国军队近代化武器装备之滥觞。然而，英、法军官购置枪炮时经常以次充好，将本国军舰的退役枪炮卖与清军；而且价格昂贵，一枚12磅炸弹要价30两白银，甚至一颗铜帽索要19两白银。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决定自造枪炮。1861年12月，曾国藩创办第一个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轮船，但其成立伊始就暴露出生产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的弱点，生产一度停顿，最终裁并于金陵机器局。

1863年4月，李鸿章命参将韩殿甲设立上海洋炮局，制造开花炮弹、自来火等件。随后李鸿章又令知州刘佐禹与英人马格里别设一局，以制造炸弹为主。1863年底，丁日昌回到上海，李鸿章命其设立了第三个洋炮局，专门仿造国外的各种新式炮弹。上海洋炮三局中刘佐禹局办得最为出色，洋炮局下设西洋机器局，以蒸汽机为动力，雇用了数名西洋工匠。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个机器工业，标志着中国工业化的开端。李鸿章攻占苏州后，将刘佐禹主持的洋炮局从上海迁出，设在苏州的太平天国纳王府。洋员马格里先后从国外购置机器，洋炮局一周可产2000余枚炮弹，同时亦可制造各种规格的开花炮，大大超过了上海的两局。后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又将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成立了金陵制造局。李鸿章的洋炮局办得卓有成效，亦引起清廷的重视。1864年5月，总理衙门大臣奕䜣从保卫皇宫的火器营中挑选了8名武弁、40名士兵前往苏州洋炮局学习。

1865年，李鸿章将上海两个洋炮局合并，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

称"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下设五个分厂,各负其责:一厂负责制造枪炮,二厂生产和修理船舶,三厂炼钢,四厂制造火药,五厂制造机器。后又添设炼钢厂、栗色药厂和无烟药厂。钢厂里的炼钢炉每日产钢三吨,用来制造炮筒和枪管,栗色药厂制造栗色饼药,专供新式大炮使用。无烟药厂则生产无烟火药,提供快枪快炮使用。江南制造局还附设翻译局,专门负责翻译国外的科技书籍,同时建立图书馆、工艺厂、库房、公务厅、地图局、大船坞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其产品由国家统一调配,并不作为商品出售,属官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数年间制造轮船四艘,洋枪、大小开花炮、洋火箭等数千件,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军事工业。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指出:"凡直隶督臣及江南各省所用武器,均为江南制造局提供。"另一位洋务健将盛宣怀则宣称:"金陵、天津、福州、广州、汉阳等军工厂之兴起,都借鉴了江南制造局的成规。"江南制造局成立后,曾国藩奏请江海关一成洋税作为轮船制造专用经费,正式雇佣洋工匠开始造船。造船厂分三个部门,分别生产船壳、锅炉和汽机,以三名洋匠作为领工。1868年,江南制造局生产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轮。船身由坚木制成,内部机械为外国机器,汽炉、船壳为总局自造,全长18丈5尺,宽2丈7尺2寸,牵引力392马力,载重600吨。曾国藩命名该船为"恬吉"号,取四海风浪恬静,总局事务吉利之意。第一艘成功下水后,江南制造总局几乎每年都有一艘新船下水,最大船只为1900马力,载重2800吨。然而,轮船自造并不意味着中国已成为军事强国。江南制造局生产的轮船无论样式、性能、功用及成本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国际水平。清廷斥巨资制造枪炮轮船,目的在于巩固国防,抵抗西方列强,江南制造局显然难当重任。几年后江南制造局轮船停产,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江南制造局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走向工业化的艰难曲折。首先,江南制造局在国际竞争中设备简陋,技术陈旧。江南制造局的枪支生产以仿造为主,经过无数次试验,最终成功仿造出美式林明敦枪。所产枪支不仅外型完全一样,性能亦相差无几。正当成批生产运往军队时,新式后膛枪已为各国通用,林明敦枪已然落伍。其次是资金不足。每生产一种新式武器,都需数十百万两白

银以置办机器、购买原料乃至搭建厂房。太平天国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冲击，使本已陷入财政危机的清廷更是雪上加霜。资金不足严重制约着江南制造局的生产。由于不能及时更换设备，生产小口径手枪的生产只能以人工为主，年产枪二千余支。第三是管理混乱。江南制造局属官办企业的传统体制，人员冗杂，糜工费料，舞弊肥私等情况时有发生。第四是厂址不当。江南制造总局设于上海虹口，距煤铁产地较远，原料供应困难，运资昂贵。然而，作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先驱，江南制造总局毕竟制造了中国的第一艘兵轮、第一台车床、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铁，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工程技术人员。

近代中国的电报业

电报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战争结束后，俄、英、美等国不约而同提出在中国铺设电线的要求，一时成为中外交涉中引人注目的焦点。清廷在对电报电线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使出了惯用的斡旋伎俩——"严正拒绝"。时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借口为朝廷献计献策，写下著名的《局外旁观论》，极力鼓吹全国应普遍铺设电线。清廷疑惧交加，密函封疆大吏商计对策，封疆大吏则大多持坚决反对态度。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认为，铺设电线"于中国毫无所益，而徒贻害于无穷"；福建巡抚李福泰更视电报为洪水猛兽，称之"惊民扰众，变乱风俗"。只有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提出因势利导的观点。他认为，洋人如此"积极热心"，硬行坚持不允其架线，其实无法阻挡。铜线花费并不大，与其任由外人控制，不如自行举办。从这一认识出发，李鸿章曾亲手破坏外国人在中国铺设的电线。1865年，上海驻华领事巴夏礼向李鸿章提出铺设淞沪电线要求，遭到婉拒。英商决定先斩后奏，暗地在浦东自行铺设电线数十里。消息传来，李鸿章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密令上海县令动员乡民，乘夜拔毁所有英商铺设的电线。天亮后，英商看到昨日还林立路旁的电线杆，一夜之间踪影全

无。因属私设，无从告官，徒落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874 年，日本发动侵台战争。清廷由于通讯工具落后，消息闭塞，战前仅从洋人那里风闻日本将攻打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通过书信与驻直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商讨调兵事宜，用了 1 个月才初步确定作战计划，到调动士兵、起运轮船等准备妥当，已经整整过了 3 个月。军机延误，注定了不利的战争结局。这给沈葆桢以极大刺激，使他从最初反对铺设电线，转而坚决支持李鸿章的主张，将电报比做万里长城，提出铺设福州—马尾—厦门—台南一线电线的建议。清廷批准了沈葆桢的建议，却未予以应有重视。加之当时风气不开，各级官吏并不了解电报的巨大作用，相反大多数人认为铺设电线发展电报，列强侵略会更加便利；有人甚至危言耸听，指称铺设电线会断绝地脉、打扰祖宗清宁等。最终，沈葆桢东南架线的宏图未能实现。正当清廷上下对电线铺设与否争论得不可开交之时，列强加紧了使电报进入中国的行动。1869 年，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和挪英电报公司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正式合并为新的大北电报公司。大北电报公司雄心勃勃，将触角伸向欧亚大陆。它首先取得沙俄政府支持，打通波罗的海一线，将俄国与丹麦连成一片；继买通日本政府，在俄海参崴铺设通往日本长崎、横滨的电报线；然后在未征得清廷同意的情况下，暗地铺设香港—上海—长崎的电线。南洋大臣李宗羲并未提出抗议，反而希图借助英美等国的斡旋力量。但哪有洋人反对洋人的道理，英美都表示支持大北公司。美国驻上海领事西华说："这是我们向中国提出这类要求的最好时机，目前中国没有美国的电线公司，我们出面为丹麦公司说话，也许比为美国公司说话更有力。"李宗羲"以夷制夷"策略的失败，使原本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双方关于是否拆除已铺设电线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最终双方达成初步妥协：原则上清廷答应大北公司要求，在规定期限内不准其他公司另设电线；大北公司则须为清廷提供一定的无偿服务，凡清总理衙门及南北洋各省督抚的电报咨文，一律免除邮资。其中，大北公司提出"不准别公司在中国海边安设水线"的要求，隐含不准中国自办电报的阴谋。双方经过数月磋商，才改定为"不准别国公

司"安设水线。在中外铺设电线之争中闽浙总督李鹤年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收受大北公司贿赂,一再上奏反对拆除英商已铺设的电线。当清廷批准自行铺设从外国人居留地福州南台到外国船舶停靠港口罗星塔全长19公里的水线后,他提出由大北公司承建,由丹麦人承担费用。同时批准铺设由福州到厦门的陆线,仍由丹麦人承建,且允其自建一条平行线路,竣工后两线均由大北公司管理。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当地华商纷纷要求将陆线收归国有;清廷乃同时收到沈葆桢等人严惩李鹤年的奏报,遂令其将陆线收回。李鹤年左右为难:一边洋人得罪不起;一边圣意难违。他四处派人大造舆论,鼓动民众反对铺设电线,结果,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自行铺设电线的闹剧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1877年5月,直隶总督李鸿章最终主持自行铺设了从天津机器东局至直隶总督衙署长达16公里的电线,电报亦即开通。李鸿章惊叹:"洵属奇捷,神奇可诧!"随后命于大沽、北塘炮台铺设直达天津电线,自此号令淮军各营,顷刻响应。1880年9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于济宁、苏州等七处设分局,委派盛宣怀等人筹办津沪电报。与以往举办洋务不同,李鸿章创办电报最初采取赢利性的商办模式。然不久,复改商办为官督商办。商人们自有苦衷:一是电报所经过地段太长,只能靠官府之力保证线路畅通;二是电报所经过地方多为军事要地,商务用途不大。津沪电报局开办后卓有成效,特别是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使其名声大振。李鸿章事后回忆:"当年朝鲜内乱,我能够及时调派南北水陆各营,多亏电报帮了大忙。其速度乃前所未有,总理衙门与我密商出洋使臣人选及南方要务军情,均可同步反映。"光绪九年至十一年(1883—1885),一条信息之龙由无到有,由短到长,在南中国海岸线上舞动。京沪粤新线成为近代中国电报业的主动脉,由南到北将整个中国联系起来,电报总局亦从天津迁往上海。新线分官线与商线:凡连接沿海沿江通商口岸有钱可赚者为商线,属电报局管理,如京沪、长江、京通各线;凡地处偏远,因军事需要而设,线路绵长难以赢利者为官线,属官电局经营,如山海关、旅顺等线。值得一提的是京通线,全长180里,将

京师与全国各地相连。19世纪90年代,电报局业务遍及南北各省。李鸿章兴奋地说:“五年来,我国创设沿江沿海各省电线,总计一万多里,国家所费无多,巨款来自民间。当时正值法人挑衅,将帅报告军情,朝廷传达指示,均相机而动,无丝毫阻碍。中国自古用兵,从未如此神速。出使大臣往来问答,朝发夕至,相隔万里好似同居庭院。举设电报一举三得,既防止外敌侵略,又加强国防,亦有利于商务。”

中国第一个官办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

中国开埠后,传统航运业渐趋没落,国内航运市场纷纷被外国公司抢占。此时清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关于轮船航运的论战。内阁学士宋晋等人提出,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耗巨资却无成效,希望立即停止轮船自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官员坚决反对,认为轮船自造不可废止。针对造船养船花费巨大的实际情况,李鸿章主张应打破陈规,令商人出资租赁或开办公司,萌发设轮船招商局之念。

前台湾道吴大廷筹办轮船招商局时发现,办局存在“五难”,即招商难、设埠难、保险难、揽载难和用人难。他进而提出三项解决办法:允准商人兼运漕粮,收取廉价租金,批准转运煤铁。这份咨文分送南、北洋大臣处却遭遇不同命运。南洋大臣何璟以筹办不妥为由将此事搁置不理;北洋大臣李鸿章却详加审阅,强调“官为之倡”而“勿绳以官法”。1872年7月,李鸿章令沙船界头面人物候补知府朱其昂制订轮船招商章程,拨借北洋军饷20万两白银,在上海筹备设立招商局。1873年元月,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朱其昂任总办,业务涉及漕粮运输与客货运输。轮船招商局属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

轮船招商局成立后首先遇到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竞争。旗昌公司联合其他外国船运公司将运价压低一半,力图一举击跨新组建的轮船招商局。招商局通过吸纳商股、延揽漕运等方式度过了难关。旗昌却在竞争中败下

阵来，股票下跌一半，濒临破产。招商局决定购并旗昌轮船公司。旗昌没料到收购者竟是轮船招商局，恼羞成怒，将拍卖价格翻倍。督办盛宣怀依然收购了旗昌。正当盛宣怀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有人检举他收购旗昌时有舞弊肥私行为。李鸿章只好将其撤职。会办徐润亦因垫支公款投资房产亏欠招商局16万两白银。不久，轮船招商局明亏暗耗，面临破产边缘。李鸿章做出人事调整，委派上海电报局总办郑观应总负其责。郑观应上任后，内部进行人才使用、职责分工、赏罚分明等一系列改革，外部与竞争对手太古、怡和公司签订齐价合同，制订船运统一价格。轮船招商局业务量开始平稳上升。两年后，李鸿章正式任命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时，却遭到了回绝。郑观应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吐露了心声：招商局虽为官督商办，可诸位总办、会办由北洋大臣任命。虽然李鸿章目前器重我，却不可能永远担任北洋大臣。我恐怕将来招商局有起色时，北洋大臣已换作他人，不会像现在这样信任我。李鸿章重新启用了盛宣怀，任命他为督办。盛宣怀仍坚持官督商办传统，认为“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盛宣怀就任后，着手清理积年旧账，同时赎回典卖给旗昌洋行的招商局船产。轮船招商局很快扭亏为盈，分别还清近年积欠的洋债和国债。齐价合同到期之际，太古、怡和公司对招商局发动了新一轮攻势。太古公司首先发难，将汉口运费由七八折降至五六折，接着降到三四折，最后竟跌到一折。怡和公司紧跟其后，亦将运费降至一折。盛宣怀认定不赢利的价格战不会长久，并未加入价格战的行列，仅将折扣降至保证成本的四折。果如盛宣怀所料，太古、怡和公司很快便支撑不住，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招商局再次与太古、怡和公司签订齐价合同。盛宣怀派人暗地核查齐价合同的执行情况，结果发现，太古公司在发往武昌的客轮中，54位乘客中竟有33人买的是儿童半票。盛宣怀严厉谴责太古公司的舞弊行为，使其在合同面前做出“下不为例”的承诺。面对新的平等竞争，盛宣怀改变以往只办大宗业务的经营策略，提出“结客心”的新要求，对中小散户及新客源亦予充分重视。轮船招商局的面貌焕然一新。至1884年，轮船招商局拥有商股资本300多万两白银，大小轮船50余

艘，业务遍及长江沿岸。立足国内航运市场的同时，轮船招商局积极开拓国际航运市场。1873年开辟了上海至日本的航线，后陆续增开东南亚各国航线。1880年“和众”号远洋船由上海起程，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到达了美国的旧金山。

三　北洋海军

海防塞防之争

中国向来有轻海防重塞防的传统，历代统治者大都认为，茫茫无涯的大海是天然的东南屏障。鸦片战争前，清朝边疆防御的重点依然是西北边境。

清初因郑氏父子雄踞台湾，海防曾极盛一时，沿海省份的水陆官兵要比内地多几倍，海防之固，史无前例。平定台湾后海防渐趋空虚。道光时期东南水师编制有5万之众，可用之兵却只有几千人。广东水师曾举行一次技能测验，测试内容为弓箭发五箭，鸟枪射十枪。结果却令人汗颜：半数以上一枪不中、五箭全空；仅中一箭或一枪之人占绝大比例；打中四枪或射中三箭者乃极少数。当时规模最大的船仅长11丈2尺，宽2丈，装十门旧式土炮，且年久失修。可见轻视海防的程度。

鸦片战争中清军水师不堪一击，令清廷深受震动，海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鸦片战争后，曾国藩首倡建立新式海军的构想。外国兵轮的“助剿”大大加速太平天国败亡的事实，使曾国藩益加感到水师之重要。他向朝廷建议说，首先建造船厂，然后仿西法设立海军，采用洋法进行操练。李鸿章亦认为东南海疆长达万里，海防尤其重要。这时却发生了“阿思本事件”。1862年，曾国藩嘱托回国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代为购置军舰。李泰国在英国挑选了7艘船舰，却擅自任命英海军上校阿思本为中国舰队司令，并私签合同，规定这支舰队有选择地接受中国皇帝的命令。清廷拒绝承认

合同有效，将所购船只转卖他国，粉碎了李泰国和阿思本妄图控制中国海军的阴谋。清廷也付出了惨重代价，除赔上购船经费外，又白白损失了 90 万两白银。自此十余年间无人再敢提及筹建海军之事。

19 世纪 70 年代，中国边疆危机显现：先是西北接壤的沙俄侵占伊犁，后有隔海相望的日本进犯台湾。清廷内部出现海防与塞防的论争。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认为，伊犁已被俄人占据，难以立即收复，不如以守为主，伺机而动；西北用兵所省军饷全部用于海防，集中力量守卫东南海疆。王文韶为首的塞防派则强调西北塞防为本中之本。这时同治帝驾崩，第一次海、塞防之争归于平息。

光绪帝即位不久，山西巡抚鲍源深以国家财政紧张为由，恳请停止西征。陕甘总督左宗棠立即表示反对，认为停兵节饷实与投降无异，果真如此，非但陇西告急，甚至连北路的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等处也保不主。清廷对海、塞防之争做出折中：加强海防，筹建海军，以北洋为试点；委派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海防筹饷为第一要务，将粤海、潮州等地四成关税及江浙等省厘金、每年 400 万两的白银全部用于筹建海军。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诞生了。

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海陆协防的军事体系：一为“守定不动之法”；二是“挪移泛应之法”。守定不动是指加强海口炮台防御，铁甲舰于口外守护；挪移泛应即兵船与陆军随时游击，严防敌军登陆。

清廷本打算委派李鸿章、沈葆桢二人共同筹办海军，李鸿章分管北洋，沈葆桢分管南洋。然沈葆桢不久离任南洋大臣，海军事权操李鸿章一人手中。为与国际接轨，李鸿章奏请将清朝国旗由三角龙旗改为宽 3 尺、长 4 尺的长方形国旗。不久，庄重大方的新国旗在中国军舰上飘扬。

海军衙门

1884 年，中法两国因越南问题重开战事，将战火蔓延到东南沿海。法

国当时为第二大军事强国，拥有仅次于英国的海军力量。8月23日下午2时，法舰“窝尔达”号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拉开了马江之战的序幕。战斗仅仅持续40分钟，南洋海军除“艺新”、“伏波”两舰负伤逃脱外，其余九艘主力战舰全被击沉击毁。

南洋海军遭到重创后，清廷进一步认识到海军建设之重要。1885年9月，李鸿章应召陛见，在京停留20余日，活动频繁。慈禧太后亲自召见五次，密商海军发展大计。李鸿章广泛与醇亲王、军机大臣、总署官员等交换意见。他指出，国外海军均设领导机构，西方为海军部，日本称海军大臣。中国海防分南、北两端，事权既归中央，地方督抚又有差调之权，管理混乱；不如专设海军部或海军衙门，专门管理指挥。

后据英国情报人员报告，李鸿章此次入京本有三条建议：一是修筑京津铁路；二是设立中英银行；三是筹建海军部。前两项因有人反对未能实现，只有筹建海军部获得批准。

10月，清廷在京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任命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大臣，庆郡王奕劻、李鸿章为会办，善庆、曾纪泽为帮办大臣。海军衙门简称“海署”，人称六部之外的“第七部”。

海军部设立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西方媒体对醇亲王、李鸿章和曾纪泽为首的海署核心给予很高的评价：

> 这三位高级官员的确是既有能力又值得信赖的人物。他们很有希望能为帝国作出一番事业。

海军衙门的设立，标志着海军成为正式的独立军种。醇亲王奕譞就任后，对南、北洋海军进行改组，将经营重点放至北洋海军，同时将沿海防务指挥权、船厂机器局经营权收归海署，并重新编订了海军操练章程。经过海军衙门及李鸿章的苦心经营，1888年北洋海军渐成规模，拥有大小舰船25艘，其中：巨型铁甲船2艘，高速巡洋舰7艘，炮船6艘，鱼雷艇6艘，练船3艘，运输船1艘，一时成为亚洲最强大的海军。

人才缺乏和财力窘迫是当时海军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李鸿章曾痛心地呼吁："海军至今不名一钱，不得一将！"北华捷报亦敏锐指出："海军衙门目前非常简陋，想担负起它所指定的任务，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海军衙门的主要官员均为兼职人员。醇亲王奕譞兼管神机营；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曾纪泽供职总理衙门和同文馆，同时兼任户部、刑部、吏部侍郎。海军衙门中没有一位海军专业人才，反成为官员徇私舞弊、安插子弟的肥缺。海军衙门章京除李鸿章力荐的傅云龙是汉人外，其余全为旗人。

建设海军耗费巨大，为清廷求强求富活动中投资最多之项目，海军经费常常入不敷出。海军衙门成立后，原经南北洋征解的海军经费收归中央，但数额未变，仍为400万两。捉襟见肘的海军军费屡被挪用。清廷甚至发布上谕，要求海军衙门"正款备海军之用，杂款供修建颐和园之用"。1888年底，醇亲王奕譞致函李鸿章，希望以捐助北洋海军为由，要求地方督抚筹集200万两白银，用来修建颐和园的万寿山。李鸿章和诸位督抚心领神会，很快"补正杂款"260万两。这笔钱后来虽用于开平矿物局及出使经费，却妨碍了当时北洋海军的发展。

北洋海军的覆灭

北洋海军成军后，东起鸭绿江，南到胶州湾，以大沽、旅顺、威海为防御重点，初步形成了海上防御体系。

大沽是北洋海军的第一个军事基地。大沽毗邻京津，为京师海上门户，亦是李鸿章的根据地，便于李鸿章控制指挥。鸦片战争以来，大沽口历经三次外敌入侵，仅存5座破损的炮台。李鸿章视察大沽情形后，认为破损炮台的台基尚可利用，但需加固营垒，前边加筑西式护台。李鸿章增建炮台多座，调运新式大炮，出海口由北洋舰队与淮军共同镇守，大大增强大沽的防御能力。不久，5座船坞构成的大沽军港体系渐次形成。除船坞外，李鸿章还设立了与之配套的煤厂、汽机房、锅炉房、熟铁厂、炮厂等一系列工业。

然这毕竟是第一次尝试。大沽船坞建成后，李鸿章才发现其只能够容纳体积较小的炮艇，铁甲舰、巡洋舰根本无法容身。镇远、定远、扬威等巨型战舰终日停泊在港湾之外，遇有问题只能到上海的洋船坞中修理。建立新港迫在眉睫。李鸿章最终选择了旅顺。

旅顺扼渤海咽喉，守津京门户，且水深口小，常年不冻，是难得的天然良港。为避免同样的失误，李鸿章特意委派英、德两国专家赴旅顺挑选筑台和建坞的具体地点。旅顺港历时10年建成，耗资300多万两白银，前后分两期竣工。第一期工程结束后，旅顺港渐成规模，拥有炮台20余座，大炮80余门，拦水坝、积水渠、铁路及碎石马路、电报局、医院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第二期施工时，李鸿章采用公开招标形式，权衡再三，选定一法国公司承建。法国工程人员顶着英、德等国压力，使旅顺港工程顺利完工。此后，李鸿章又建成供停泊操练之用的威海卫基地，从而形成大沽、旅顺、威海的三角防御体系。

清廷发展海军的同时，日本也在疯狂备战。日本政府先后7次通过海军扩张法案，着重发展海军事业。仅1893年，日本军费达到国家财政预算的32%。日本政府制订了详细周密的扩张计划："为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为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1894年7月23日，日军攻入朝鲜皇宫，建立傀儡政权。次日，朝鲜傀儡政权宣布废除与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向中国宣战。

7月25日，日本在丰岛海面偷袭中国护航舰和运兵船，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17日上午，11艘北洋水师战舰奉命护送援军至鸭绿江口的大东沟，返航途中，装扮成美国船舰的日军战舰12艘突然发动袭击。中日海军在黄海海面进行了正面较量。双方激战5个小时，北洋海军5艘军舰被击沉，6舰负伤，死伤官兵千余人。日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5艘战舰受到重创，死伤600余人，先行撤离战场。

北洋水师退回到旅顺港内。前敌主帅李鸿章却消极避战，积极寻求外交途径求和。半个月后，日本陆军相继攻陷大连、旅顺，北洋水师主力回撤

威海卫。1895年2月2日，日军占领威海，对北洋海军形成合围之势。2月10日，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下令用水雷炸毁搁浅的定远舰后服毒自杀。11日晚，水师提督丁汝昌求和无望，销毁提督印后吞服鸦片自尽。北洋将士推选左翼总兵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向日军投降，杨用霖当场拒绝，饮弹自杀。洋员浩威以丁汝昌的名义向日军递交了投降书。可怜丁汝昌死后蒙羞，家产全部抄没，子孙亦流离失所。直到宣统二年，在威海商民的联合提议下，清廷才为其平反昭雪。

2月17日，日本舰队排成单纵阵型，高挂日本国旗，以胜利者的姿态徐徐驶入威海港。除载送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等6人灵柩的康济舰外，北洋水师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军舰降下中国国旗，换升日本国旗，全部编入日本舰队。下午4时，康济舰在汽笛的哀鸣中，冒着潇潇冷雨，凄然离开威海。

清廷苦心经营30余年的求强求富运动，随北洋海军的覆没终告失败。

思考题：

如何认识统治集团部分成员发起的求强求富运动。

参考书目：

1. 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3.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三联书店，2002年。

第十四讲

先进知识分子的维新与革命

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

甲午战败，清廷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新道路。概乎其要，分为两途：一为保全清廷、实行君主立宪的戊戌变法；一为推翻清朝、实行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

一　戊戌变法

马关条约

辽东半岛失守，清统治集团部分成员30余年的求富求强运动在不足半年的时间中毁于一旦。清廷对战争彻底失去信心，转而积极向日本求和。

战前意气风发的李鸿章也不得不沮丧地承认自己乃一“裱糊匠”，称：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1895年1月，战事还未结束，清廷任命户部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使，赴日本广岛谈判停战事宜。日本方面以张荫桓使团“全权不足”、不符合国际惯例为由，拒绝与其谈判，同时点名李鸿章担当全权大臣，指出“中堂如果来敝国，自乐与晋接”。

威海卫战役后，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慈禧太后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本马关谈判。临行前，李鸿章就日方提出的“割地”、“赔款”要求，向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请示让步条件。李鸿章在军机大臣会议上首先表态：“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尔。”光绪帝师翁同龢亦指出，赔款一事可作让步，割地则不可行。另一位军机大臣孙毓汶则认为，割地议和是惟一可行之道。由于内部意见未获一致，李鸿章一方面作好谈判准备，奏请曾任驻日公使、通达日语的嗣子李经芳随行；另一方面希望借助英、俄的外交调停以拒绝日本的割地要求。然英、俄均表示不愿插手。

1895年3月19日下午，李鸿章一行33人，带着光绪帝“商让土地”的谈判底限，来到日本马关。次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展开艰苦的谈判。议和期间，李鸿章在返回住地时遭到日本激进分子小山丰太郎的刺杀。李鸿章左侧眼镜片被击碎，子弹从左眼下部打入，伤及颧骨。李鸿章遇刺事件一时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迫于压力，日本政府对刺客小山丰太郎做出无期徒刑判决，并宣布无条件停战三周。

谈判中，日方态度强硬，条件极为苛刻。兹选录双方第四回合谈判记录如下：

伊藤博文：停战期限短促，和议条款应迅速签定。条款节本请中堂大人过目，只有同意和不同意两种选择。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辨么？

伊藤博文: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鸿章:第一款要求赔偿军费2亿两,为数巨大,不能担当。

伊藤博文:减到这个数目,已不能再减。战争继续打下去,赔款更多。

李鸿章:还请再减一些。借款利息太重,中国无法承担。

伊藤博文:这与日本国无关,借债还款是中国自身的责任。

李鸿章:泰西各国交兵,并无将所占地区全行割让的先例。

伊藤博文:西方成例对日本无效。

李鸿章:台湾全岛日军并未侵占,为何强行要求割让?

伊藤博文:这是彼此商让之事,不论兵力到不到。

李鸿章:我不肯让,又将如何?

伊藤博文:如果一定限于兵力所到,日军占领山东及东北各省,贵国是否全让?

伊藤博文:中国的吉林、黑龙江一带为何让与俄国? 对于台湾日本也可援引此例。

李鸿章:割让俄国之地人烟稀少,而台湾已立行省,不能相提并论。

伊藤博文:尺寸之土,都乃皇家之地,哪有荒凉与繁盛之别?

李鸿章:总之,二万万赔款数目太大;营口请贵军退兵;割让台湾万万不许。

伊藤博文:不能照办。

李鸿章:不许反驳么?

伊藤博文:日军已在广岛准备六十余艘船只,运输量为两万吨,兵粮亦已齐备。

李鸿章:赔款还需再减5000万,台湾不能相让。

伊藤博文:如此,我们立即出兵台湾!

3天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正约共11款,主要内容有:清廷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

即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完全控制;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沿内河驶入搭客载货;允许日本在华设厂,其产品远销内地时只需交纳进口税,准许在内地设栈寄存。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后危害最大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了辽东半岛、台湾等领土;赔款2亿两白银,相当于清廷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新增4个通商口岸,使长江流域全境对列强开放;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使列强均以"利益均沾"为由,纷纷到中国筑路、设厂、开矿,直接掠夺生产原料和劳动力资源。

《马关条约》中有关辽东半岛割让日本的规定使俄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俄国政府为此特别召开会议,决定不惜发动战争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同时俄国向德、法两国政府建议,如日本永久占领中国本土,三国应"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法国与俄国是欧洲盟国;德国与俄国为邻,希望俄国将注意力转向远东,以减轻其东部边境压力。于是,三国决定共同干涉还辽事件。4月23日,三国驻日公使分别向日本政府递交照会,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俄国向远东增派21艘军舰和3万多陆军,法、德两国海军陈兵于日本海附近。日本经此一战已疲惫不堪,借助英美外交调停失败后,确定"对于三国纵令最后不能不完全让步,然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的方针。5月5日,日本政府宣布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三国在未征得清廷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同日本做出善后决定: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中国向日本补偿赔款(即所谓"赎辽费")3000万两白银。

《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日本的消息传到台湾,民众"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台湾兵民表示"台存与存,台亡与亡","设日本以干戈从事,台民惟有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徐骧等组织的义军与清军刘永福部联合起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割台武装斗争。台湾军民进行了近半年的英勇抵抗,先后歼灭日军近卫师团近一半的兵力,给侵台日军以沉重打击。

日本政府先后调遣5万多陆军及海军舰队，才将台湾全境侵占。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清廷面临空前的统治危机。李鸿章启程后便遭遇朝野内外的一致唾骂，将其称为"汉奸李二"。钦差大臣刘坤一、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等500余名现职官员纷纷上奏光绪帝，要求拒签和约。亲历战争的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亦无法承受"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的后果，沉浸在"陆军见敌即溃，海军经战即败，真成无一可恃者！"的悲愤之中。

1895年7月，慈禧太后迫于压力，免去李鸿章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之职，令其在京赋闲。亲政不久的光绪帝发出"朕何以为天下之主"的哀叹，表示"不甘作亡国之君"，决心有所作为。甲午时期的主战人物翁同龢、文廷式等人开始在政坛崭露头角。

公车上书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至北京，舆论大哗。甲午战前，社会舆论对清廷获胜普遍持乐观态度。当时国人的印象中，西洋诸国之强大已为不争事实；东洋日本却乃一蕞尔岛国，地狭物乏；中国自仿行西法以来，"凡事皆一洗因循之习"，北洋水师炮台巩固，直与泰西无异。基于此种印象，"民间谈及日人，辄裂眦咬牙，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意"，速胜、决胜论一度甚嚣尘上。当时发表的《防倭不如剿倭》一文可谓典型：

> 欲求制人而不受制于人，则莫如鞠旅陈师，直抵长崎、横滨等口岸，更迭明攻，往返暗袭。所用军器，枪炮而外，专以火箭、喷筒焚毁其板屋营帐为务。在船如是，登岸亦复如是。不必十万人，已足令其全国惊心，合境丧胆。

甲午战败，国人自然无法承受。《马关条约》签订时，正值三年一次的会

试在京城举行。消息传来,举子考生们再也无法安心应试,纷纷向清廷上书请愿,请求光绪帝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入京应试举人称为"公车",因汉代以公家车马递送应举之人赴京赶考得名。此次请愿运动历史上称之为"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有两种情形:一是公车以省为单位,经由都察院代奏;二是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组织的"公车上书"。其中以后者影响为大。为劝阻光绪帝在和约上签字,康有为写下18000余字的请愿书,联合18个省份1300多名举人签名请愿。康氏《公车上书》虽未上达光绪,却在民间引起广泛反响。《公车上书》系统地反映出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其主要内容有:一、应敌对策,即拒绝与日本议和,反对割让台湾,应迁都西安继续作战;光绪帝下"罪己诏"以"鼓天下之气";练兵以"强天下之势"。二、自强之策,即富国之法,包括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元和邮政等;养民之法,包括务农、劝工、惠商和恤穷等;教民之法,包括改革科举、广办学校报馆、设图书馆等。三、改革官制,即裁汰冗员、广开言路、公举人才、重视外交等。"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科第8名,授工部主事,得以施展政治抱负,着手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

康有为是维新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熟谙西学,洞察外情,21岁时首次"薄游香港",接触先进的西方事物,"览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遂对西方法律制度产生兴趣。3年后康有为经过上海,"大购西书以归讲求",开始潜心钻研西学。康有为注重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从自然科学的"声、光、化、电、重"诸学至社会科学的"各国史记、诸人游记"均广泛涉猎。同时,康有为怀着"经营天下"的志向,努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1886年,康有为写成3.8万字的《教学通议》,提出尊周公、崇周礼的思想学说,意在借用"周制以时王为法,更新之后,大势转移"的事例提倡"颁行新制",实行政治改革。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赴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当时正值中法战争结束,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且逢慈禧太后宣布次年光绪帝大婚仪式后正式归政,有望朝纲重振,他第一次伏阙上书,开始了其政治运动的生涯。在《上清

帝第一书》中，康有为首先强调目前中国正面临着“外夷交迫”的严峻形势，“外攘夷狄”首先须“内修政事”，要“内修政事”首先须“变成法”；其次，针对传统体制“自督抚、司道、守令乃下臣民，如门堂十重，重重隔绝；浮屠百级，级级难通”的现状，康有为提出“下情既亲，无不上达”的“通下情”要求。最后，康有为提出皇太后、皇帝用人要“慎左右”，真正做到“去谗慝而近忠良”。《上清帝第一书》甚至预见到，由于日本的侵略野心，中日必将一战，战则中方必败、必致辱国丧权。这一预言居然在6年后的甲午战争中变成了现实。然康有为10年之内“富强可致”、20年即可“雪耻”的政治抱负很快便遭挫折。尚属一介布衣的他无权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只能托朝中高级官员代递。户部尚书翁同龢认为该文“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尔”；工部尚书潘祖荫“垂接颜色”，反教康有为以“熟读律例”；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长“闻之辄蹙额，相见必力阻之”；吏部尚书徐桐更是“以狂生见斥”。康有为一次上书宣告失败。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开始讲学，培养了一批维新运动的青年骨干。康有为讲学饶为生动，讲授内容“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弟子梁启超追忆道：“先生每逾午则升坐，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历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退省则醰醰然有味，历久而弥永。”康有为非常关心学生，“先生、父兄合二而为一”，门徒很快增至100余人。学生对他“奉之如神明，故习心无不化，信之为圣哲，故新异无不从；依之如慈母，故艰苦无不悦”。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维新学派，“蓝夏布长衫、散裤脚，为康门之寻常装束，俗人一望而知其为康门也”。

讲学期间，康有为逐渐创立变法运动的理论体系，完成两部重要著作，即《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对长期以来古文经学的支配地位提出大胆质疑，指出两千年来的“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从而动摇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康有为在1892年开始编写《孔子改制考》，1898年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全书

共21卷,约34万字。康有为认为,孔子"恒托于古"的改制恰恰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依据,孔子作六经目的在于"拨乱世致太平",因此"以春秋继周,改周之制"。他进一步指出,人类社会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历史阶段循序前进,中国目前正处"据乱世",须通过改革变法进入"升平世",即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康有为将民权、选举等政治制度附会到孔子身上,认为孔子是维新变法的"改制教主"。康有为的"伪经"、"改制"说引起了晚清思想界的"火山大喷火",却并未达到意想中的宣传效果,当时大多数官员和读书人对其说法并不认同。1894年,御史安维峻指斥《新学伪经考》"腾其簧鼓,扇惑后进",奏请禁毁;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亦上奏朝廷,请求将"《孔子改制考》一书板本,自行销毁"。康有为密友朱一新对其"合己说者则取之,不合者则伪之"的学风提出批评,认为"其说尤近于诬"。维新思想家何启、胡礼垣认为两书起到"今学牵于古法,时事蔽于陈言"的消极作用。甚至连变法运动的另一主将谭嗣同都表示"不敢苟同"。此一局面反映出康氏变法理论的先天不足,也为百日维新的迅速失败埋下伏笔。

甲午战争失败后,经过梁启超几个昼夜的奔走呼号,进京参加会试的18省举子,都被鼓动起来。康有为用一天两夜,赶写万言书即《第二次上清帝书》,力言拒和、迁都、变法三项建议。举子们在松筠庵集会,讨论和通过上书的内容,到会者数百人,据说签字的有上千人,虽主和派派人到各省会馆,恐吓举子撤销签名,但仍有603人不愿屈服而保留签名,遂联名交都察院代呈,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当天,因为光绪已在"马关条约"上盖了玉玺,都察院拒收"公车上书",举子们上的书只在坊间刊刻流传,未能径达光绪御览。光绪看到的,是康有为在"马关条约"签订一个月后递上的所谓《上清帝第三书》。整个奏折一丈多长,一万多言,书中有:先事不图,临事无益,亡羊补牢,犹为未迟。只要当机立断,速图自强,尚可振衰起弊,救民救国。"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整

理;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危,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可以强大,孰轻孰重可以辨之者"。"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文中详陈变法图强的方略,建议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严惩主和派与战败者,破格起用新人,变法图强,练新军、选新将、用精械,筑铁路、开矿山、建轮船、修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贫,停科举、建学校、办报馆、改革官制等。这些闻所未闻的精辟论说在经历了甲午战争痛创后的光绪心中引起强烈共鸣。他下令誊抄四份,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军机处存记,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时时展阅。后光绪在朝臣章奏中发现了不少类似章奏,遂命军机处将康有为等 9 个条陈发到各地督抚将军处讨论。并下谕道:"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治宜。况当国势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弥祸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旧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这已是变法改良的先声了。

1895 年 8 月,康有为自筹经费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万国公报》为双日刊,除转录其他报刊外,每期均有康氏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的不署名专论。《万国公报》创刊后影响逐渐扩大。创立伊始,"当时莫知报之由来,有以为出自德国者,有以为出自总理衙门者"。该报发行两个月后"舆论渐明",发行量达到 3000 余份。京城达官显贵免费阅读后,"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

康有为还积极组织聚会,为变法筹集资金。当时京城十分闭塞,整个琉璃厂居然找不到一幅地球图。翰文斋书肆建议开始"书藏"以通西学。康有为与户部郎中陈炽等人组织的宴会有声有色,英、美公使、外国传教士及京城官员纷纷加入,同时得到地方督抚的热烈响应。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等方面大员均捐款 5000 两白银,宋庆、聂士诚等将领亦慷慨解囊,捐款数千

两不等。李鸿章也送来白银2000两,希望能够参加集会,却遭到众人拒绝。传教士李提摩太记录了康有为初次拜访的情形:“当康有为来访的名片递给我以后,我立即跑出去见这位名学者。他希望和我们合作,从而使中国更生。”当他看到康有为的维新计划时发现,“我们的见解如此相同,怪不得他来看我!”

1895年10月,康有为出京南下,到江宁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康有为组织了上海强学会。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序》中阐述了学会成立的必要性:“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人才,在学术,将学术在合群,累合十百之群,不如累合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巨也。”随后,康有为、梁鼎芬共同起草《上海强学会章程》,规定强学会的性质和宗旨,乃“专为联人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是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学之未修,故政治不举。今者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总会立于上海,以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康有为离京后,北京强学会以强学书局开设为标志也宣告成立。12月16日,北京强学会将《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记闻》,成立了自己的机关刊物。《中外记闻》为双日刊,月底装订成册。内容以摘录清廷奏章、英国路透社电报、外国及各省新报为主,另有翻译西方格致书籍和梁启超、汪大燮主笔的论说。1个月后,上海强学会亦创刊机关报——《强学报》。

京、沪两地强学会成员多为支持光绪归政的官员,他们咄咄逼人的态势令慈禧太后感到了不安。慈禧太后以“不学无术之徒妄事揣摩,辄于召对之时语气抑扬,罔知轻重”为由,将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右侍郎长麟革职,强调“嗣后内外大小臣工倘敢有以巧言尝试者,朕必加以重罪”。1896年1月,御史杨崇伊奏参北京强学会植党营私,请求严禁。慈禧太后发布上谕,宣布“查明封禁”北京强学会。张之洞得悉北京强学会遭封禁的消息后,立即解散上海强学会,令“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京沪两地强学会遭禁后,康有为南返桂林;梁启超则从北京来到上海,与汪康年一同创办以“变法图存”为宗旨的《时务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长文《变法

通议》,集中阐述了变法的迫切性,指出:"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变法通议》一文"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有力地推动了维新思想的传播。《时务报》发行数月,销量达到上万份,创造了"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的奇迹,成为变法思想的"舆论领袖"。

百日维新

光绪二十三年(1897),西方列强相继在中国强占港口,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早在1896年6月,俄国趁李鸿章赴莫斯科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机会,便与之签订《中俄密约》。主要内容有:日本如侵占俄国、中国、朝鲜领土时,中俄两国互相支援,中国所有口岸对俄国开放;中国允许俄国修筑一条穿越黑龙江、吉林至海参崴的铁路等。11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次年,德国强迫清廷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为99年;并宣布德国享有山东境内各项工程的优先权,将山东全省变成其"势力范围"。俄国则让强租旅顺和大连湾,租期为25年;租借地以北设"中立区",界内铁路、矿山及其他工商利权不得让与他国,划定东北三省为其"势力范围"。其后,法国强租广州湾,将广东、广西、云南变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威海卫和香港"新界"地区,将长江流域划为其"势力范围";日本政府则宣布福建为其"势力范围"。亡国阴影笼罩在每一个国人心头。

民族危机形势的日益严峻,使维新运动迅速高涨起来。1896年至1898年间,全国共建立40多个维新团体,创办报刊30余种。

1897年8月,湖南时务学堂在巡抚陈宝箴的积极筹备下宣告成立。陈宝箴对时务学堂寄予厚望,希望将其办成一所"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的"培植人才"学校。与原先新式学堂招生门可罗雀的冷清局面不同,时务学堂招考告示仅公布数日,报考学生竟超过2000人,大大超过拟

定录取的60人,"后至者犹以未与考为恨"。时务学堂以熊希龄为提调,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时务学堂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改良思想的新式人才,有力宣传了维新思想。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在陈宝箴的支持下成立了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讲学为主,官绅数千人前来听讲,盛况空前。在南学会的有力推动下,湖南全省各府州县纷纷设立学会,计有群萌会、延年会、学战会、法律会等各种名目,一时间湖南"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风气日开,较之江海各省,有过之而无不及"。变法思潮日趋高涨,渐成风起云涌之势。1897年10月,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与《国闻汇编》。严复将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学说引介到国内,成为维新思想的重要资源。严复指出进化论的核心在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社会同样如此。他用科学事实驳斥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论,提出"继自今,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的论断,积极鼓吹变法。严复在《国闻汇编》连载其名著《天演论》,大大丰富了维新思想,变法言论亦为之一变,"每以《天演论》为其根据"。维新党人则欢呼雀跃,康有为称赞严复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梁启超从《天演论》中深受启发,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进化论学说;黄遵宪更是将《天演论》长期供养案头。天津《国闻报》与上海《时务报》南北呼应,成为变法思想的舆论阵地。

1898年1月,康有为再次赴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指出:"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上,省括即发,海内惊慌,乱民蠢动",中国"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如不当机立断,发愤维新,"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情绪激烈,言词痛切。这封上书未能递到光绪皇帝手中,但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并在天津、上海、长沙维新派的报纸上发表,影响很大。

康有为上书言事之举得给事中高燮的支持,他向光绪帝"密保",请求召见康有为。按照清朝惯例,皇帝召见之人须具有四品以上官衔,重新秉政的

恭亲王奕䜣以康氏不够资格为由将此事搁置。而光绪帝此时已有“变法”之意，召见军机大臣翁同龢，咨询变法事宜。翁同龢主张应从内政改革入手，得到光绪帝赞许，先后发布三道上谕，要求实力整顿吏治，保荐贤才，裁汰冗员，从速开办制造厂局。1月24日，光绪帝命军机大臣于总理衙门延见康有为。

康有为当面批驳了兵部尚书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点，“祖宗之法”为治理祖先基业而设，如今祖宗留下的国土尚不能保全，又谈何“祖宗之法”？刑部尚书廖寿恒问：“变法从何处开始？”康有为答：“应从改变法律制度着手！”军机大臣李鸿章质问：“难道六部都要裁撤，政治制度全然抛弃么？”康有为答：“今日乃列强并起时代，造成中国目前危局的就是这些旧制度；欲改革政治，理应废除旧法！”户部尚书翁同龢问：“变法所需巨款从何筹集？”康有为答：“各国变法都有先例，日本设银行发行纸币，法国实行印花税，印度加征田税，以中国之大，只要改变制度，筹款并不发愁。”

康有为的变法方案引起光绪帝的高度重视，下令将其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进呈，且可上奏言事。康有为遂奏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了系统而具体的变法建议：

> 一大誓群臣，“诏定国是”；二开制度局于宫中；三在午门专设“上书所”，广开言论。

5月，清廷政局发生重大变动，阻碍变法的恭亲王奕䜣病故。康有为得知消息，立即请求主持朝政的翁同龢“促其亟变法，勿失时”。同时光绪帝亦在颐和园紧锣密鼓地同慈禧太后商量变法事宜。光绪帝表示：“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定国是”，宣布变法。上谕内容如下：

>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

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材。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命谭嗣同送部引见，梁启超总理衙门察看具奏。光绪帝对康有为的变法方案十分欣赏，希望对其委以重用，但遭权臣荣禄、刚毅等人反对而作罢，任命康有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准予专折奏事。

光绪帝雷厉风行的变法活动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惕。6月15日，清廷政局再次发生重要人事变动，光绪帝连续发布五道上谕，令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京，不久顶替翁同龢出任户部尚书；兵部尚书荣禄署理直隶总督等。一位外国人评论道：

15日的诏书构成了一次政变，它的重要性在于即使不是真正废黜了，也实际上废黜了皇帝，这样说不算夸大。恭亲王奕䜣之死，已经使光绪皇帝失去了一位老一辈的庇护者，而慈禧太后又立刻进了一步，胁

迫这位可怜的年青皇帝革去了他的最忠诚的支持者翁同龢的官职。同时，慈禧强迫光绪下令，授任新职的高级官吏必须到慈禧面前谢恩。这就意味着，她将亲自垂询这些高级官吏对当前事件的见解，并亲自向他们颁发怎样处理这些事件的谕旨。

从6月11日起的103天里，光绪帝先后颁发200多道新政"上谕"，主要内容有：经济上，奖励保护农工商业，京师设农工商总局，各府州县设立农会，翻译农书，兴办农垦；各省设商务局，讲求商务，兴厂制造；京师设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由国家编制预算决算；令旗民自谋生计等。政治上，大小臣民皆可上书言事，不得压制阻挠；裁撤冗员，精兵简政，如詹事府、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等机构；军事上，军队采用西洋兵制，改习洋操，并裁汰绿营练勇；文化上，设新式学堂，提倡西学，北京设京师大学堂，省会设高等学校，郡城设中等学校，州县设小学校，兼习中学西学；改革科举制，废八股改试策论，新开经济特科，允许自由设立报馆和学会，派遣留学生出洋游历学习等。

光绪帝锐意推行新政，大胆起用维新人物参与政事，赏梁启超为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四品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暴风骤雨般的新政措施引起朝中保守官员的反对。总理衙门大臣、礼部尚书许应骙认为，"经济特科无益"，应裁减名额，并归入八股。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以为守旧误国者戒"弹劾许应骙，奏请将其革职。许应骙在为己辩护的同时对维新派反戈一击，回奏弹劾康有为，指责其"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问"，建议"罢斥驱逐回籍"。

不久，新旧之争进一步升级。主事王照上书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及各国，设立商部和教部。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认为不妥，拒绝代递。当时光绪帝刚刚颁布"广开言路"谕旨，要求各部不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为"儆戒将来"，光绪帝下诏将礼部尚书、左右侍郎、署理左右侍郎六堂官全部革职。变法条令中裁撤冗员一项，光绪帝将京师10余处闲散衙门尽行废

除，"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对于如何安置这些失业京官，光绪帝心无定算。康有为甚至认为，"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

光绪帝一系列"举朝震骇"的变法举动，使朝中不少守旧官员深怀忌惮。早在变法前，荣禄曾策划恳请太后归政，后因变法呼声四起作罢。有人问及，"皇上如此妄为，变乱祖制，可奈何？"荣禄答曰："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

变法期间，光绪帝 12 次入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驻跸"；慈禧亦对外宣布，"积久弊生，不得不改弦更张，以为救时之计"。8 月 24 日，光绪帝发布上谕，宣布 9 月皇帝与太后同往天津参加新军检阅。康有为担心光绪帝及新法遇废，决心采取行动。

康有为认定新军主帅袁世凯是挽救变法的合适人选，"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遂向光绪帝上折力荐袁世凯，请求破格提拔，"重其事权"。9 月 16 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提拔其为候补侍郎，专管练兵事宜。同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华加剧了紧张局势，外界盛传"伊藤将参与变法事宜，充当光绪帝政治顾问"的消息。光绪帝咄咄逼人的亲政态势令慈禧太后惊恐异常，决心发动政变。袁世凯进京陛见后，荣禄调聂士诚部守卫天津，断绝袁军入京之路；调董福祥部密入京师，以防不测。9 月 17 日，御史杨崇伊上奏请求"皇太后即日训政"。20 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重新"训政"，囚禁光绪帝于瀛台。

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大肆捕杀维新人士。康有为逃往香港。梁启超、王照流亡日本。谭嗣同拒绝出逃，他向友人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8 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及康有为弟康广仁等六人遇难，史称"戊戌六君子"。一位文学家这样评价道：

> 六君子就义，当时的确给予社会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一般青年知识分子，因那一回政变的刺激，从桎梏麻醉中觉醒过来，中国的革命也就急激地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们常提及所谓中国气派、中国精神，

古代不必多说，就近代而言，六君子之死就是中国精神的表现。

新法除“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次第举行”，京师大学堂继续筹办外，全部取消。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从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训政，变法共进行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二　辛亥革命

孙中山与兴中会

康有为拥护光绪帝维新变法的同时，孙中山公开走向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

早在甲午战争前夕的1894年，孙中山即北上天津，向直隶总督李鸿章上书，提出发展工商业、选拔人才的改革方案。然当时正值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忙于政务，对孙中山的热切救国理想未予理会。孙中山遭际冷遇后，坚定了革命之志：

> 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不久，孙中山远赴重洋，在美国檀香山（今夏威夷）华人华侨中组织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明确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

1895年10月，孙中山、陆皓东共同策划在广州发动起义。由于起义计划泄露，事未发便遭镇压，陆皓东被捕遇难，孙中山被迫流亡异国。

1900年，义和团爱国运动在华北地区兴起。孙中山认为“目前北京风云变幻，是一个亟需注意的时机”，一方面积极酝酿在广东发动起义，一方面与宫琦寅藏等日本友人返抵香港，同两广总督李鸿章谋求联合策划两广“独

立”。不久，北京形势紧张，清廷急调李鸿章入京。孙中山赶至上海与李鸿章会谈“合作”事宜，遭到同样冷遇。

和谈失败后，孙中山全力策划惠州起义。10月6日，起义爆发。郑士良率革命军600余人向清军发动袭击，杀敌40余人。起义军连战连捷，却因后方补给严重不足，起义最终失败。郑士良就地解散部队，逃往香港。

惠州起义增强了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信心，大力宣传了革命思想。孙中山总结道：

> 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

《猛回头》与《革命军》

清末随着社会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扩大，出国学习的留学生愈来愈多。在国外的留学生接触到国外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逐渐摆脱君主专制的思想桎梏，认为“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天下民之国”。爱国救亡思潮成为时代主旋律。

陈天华所著《猛回头》一书，生动描绘出当时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份？”1900年，俄国出兵强占东北。1903年，俄国政府仍拒不履行《辛丑条约》，向清廷提出企图永远占领东北三省的侵略要求。留日学生200余人组织成立拒俄义勇队，自愿随同清军一同作战。拒俄义勇队回到国内后，清廷却认为其“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下令严厉镇压，“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经

此事件，留日学生界彻底抛弃对清廷的支持，皆认为“报国无路”，公开打出反满反清的旗帜。孙中山此时亦从河内来到日本，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孙中山在东京秘密组织军事学校，培养了一批青年骨干，为日后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同时，不满18岁的留日青年邹容在上海发表《革命军》一书，使国内革命思潮迅速高涨。邹容以雷霆万钧之势宣传了革命的必要性，他写道：“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摆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之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我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革命军》一书出版后，反响强烈，成为青年人的必读之书，销量达100万册，成为晚清最畅销的书籍。鲁迅后来评价道：“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接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章太炎随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出革命并非只重破坏，亦为社会改良重建手段，“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章太炎将革命的对象直指君主专制制度，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的惊人之语打破了皇权神话。

清廷对高涨的革命思潮惊恐万分，下令查封登载《革命军》的《苏报》，逮捕章太炎。章太炎面对前来抓捕的工部局警察，大义凛然道：“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章太炎被捕后，一些青年学生跑到邹容住所门口，投掷砖块，骂道：“章某已入狱，尔不入狱，为无耻。”邹容承受重压，次日投案自首。此即近代史上著名的“苏报案”。不久，邹容因病死于狱中。

同盟会的建立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中国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以东京为本部,国内设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国外则设南洋、欧洲、美洲和檀香山4个支部。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使革命力量有了核心的领导阶层,“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先后在国内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规模较大的有:1906年底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的钦廉潮湖起义;1908年的云南河口起义;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等等。虽然这些大大小小的十余次起义均告失败,革命党人却在不断的挫折中积累了宝贵的武装斗争经验。

经过湖北革命党人的艰苦工作,湖北新军1.5万人中,有革命党人将近2000人,同情革命者4000余人,与革命为敌者仅1000多人,其余则为中间摇摆分子。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起义。次日,革命党人控制武昌,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

10月12日,武汉三镇均被攻克,武昌起义胜利。

武昌起义后的一个多月里,全国14个省先后脱离清王朝的统治,宣布独立。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清王朝气数将尽,处于风雨飘摇的崩溃边缘。

这一年为辛亥年,史称辛亥革命。

思考题:

中国有无可能走维新之路,为什么?

参考书目:

1. 孙孝恩、丁琪:《光绪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

2. 刘振岚:《戊戌维新运动专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3.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第十五讲

乱世枭雄袁世凯

小站练兵

“新政第一人”

清帝逊位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出身官宦家庭,自幼过继叔父袁保庆。早年科举不第,弃文投军,任袁保庆盟兄弟淮军将领吴长庆“庆军”营务处会办。光绪八年至二十年(1882—1894)长期驻朝鲜。甲午战后李鸿章荣禄荐赴天津小站以西法督练“新式陆军”,形成日后北洋军阀班底。戊戌变法时先参与、后出卖维新派。义和团时期,署理山东巡抚,率新军坚决镇压义和团并参加“东南互保”。1901 年,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练兵处会办,编练北洋常备军 6 万余人,形成北洋军事政治集团。溥仪即位后,摄政王载沣罢免其一切职务,令回籍“养疴”。辛亥革命爆发后出任总理内阁大臣,借革命党人声势逼清帝退位,于 1912 年 2 月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5 年,复辟帝制,改元“洪宪”。83 天后被迫取消帝制,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一 小站练兵

督练新军

甲午战争中陆军惨败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使清朝上下决心改革旧军队，编练新军队。

1894年，清廷开始着手筹建新式陆军。刚从朝鲜战场上撤回的袁世凯，抓住时机，向光绪帝奏陈旧有军队的诸种弊端，疾呼练兵制械非改弦更张，无法抵御外患。光绪帝将他派到负责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重要机构督办军务处差委。

然袁世凯不满足在督办军务处担当的可有可无、难以展才的闲差。他四下活动，动员叔祖袁甲三、堂叔袁保恒、袁保龄、养父袁保庆在京时的几乎全部旧关系，采用重金贿赂、拜师请托、义结金兰等手段打通关节，逐渐取得了慈禧太后和满族亲贵、地方大员的信任。

军机大臣李鸿藻尤其欣赏袁世凯，认为他"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令他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务营之弊"。户部尚书翁同龢称袁世凯"不滑，可任也"。地方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也都积极上书保荐袁世凯。这些人党派森严，相互之间矛盾极深，有的是一辈子的政敌。但他们却众口交赞，一致举荐袁世凯这位小小的前驻韩商务委员。袁世凯攀援权贵的活动能力可见一斑。

根据兵部尚书荣禄的授意，袁世凯拟订了整套编练新军的计划书，包括拟建新式陆军的营制、饷章、聘请外籍军官的合同等，上呈督办军务处，并强调清军甲午惨败"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因"诚如宪台原奏，不得不为易辙之图，作补牢之计也"。

1895年底，督办军务处大臣奕劻、李鸿藻、长麟、翁同龢对编练新军做

出人事调整:原驻小站编练定武军十营的胡燏棻改任津芦铁路督办,由袁世凯接任训练新军。随后各亲王、军机大臣正式向朝廷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创建新式陆军,派员督练。清廷正式命袁世凯赴天津接管定武军十营,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袁世凯取得了督练新军的实权,8天后,前往小站接管定武军。

小站镇又名新农镇,东临渤海,位于大沽要塞通往天津的中途,距天津仅60余里,离北京也不过300里,是京津南大门。小站交通便利,地域辽阔,人烟稀少,是屯田养兵的优良所在。早在明朝隆庆年间,抗倭名将戚继光即在此处驻扎重兵,建村庄,设驿站,传递军情。清同治年间,李鸿章奉慈禧太后之命,派淮军将领周盛传率"盛军"7000余人驻兵小站,镇守大沽要塞,军屯、练兵达20年之久。甲午战起,"盛军"奉调东北与日军作战,全军覆灭,小站营房空无一卒。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奉命编练定武新军,原驻天津马场,因营房不够,移驻此地。胡燏棻"定武军"在小站附近设有10个营盘,装备洋枪洋炮,分步、炮、工、骑4个兵种。步兵3000人,炮兵1000人,工兵500人,骑兵250人,共计4750人。聘请德国教官汉纳根主持训练。汉纳根是李鸿章兴建北洋海军的重要人物,曾主持大连军港设计。丰岛海战时,他曾在"高升"号上,"高升"号被日军击沉,清军700人死于海中,他则以"善泅幸免"。黄海海战时,他曾在旗舰"定远"号上,与丁汝昌、刘步蟾等清朝将领并肩作战。然汉纳根原非海员,黄海战后即请调至小站与胡燏棻共练新军。

袁世凯接办督练新军后,以胡燏棻"定武军"为基础,派人到河南、山东、皖北、苏北招募步兵2000人,到奉天招募骑兵250人,并购置大批马匹,加上"定武军"原有的4750人,全军共计7000人。袁世凯并奏请把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采取德国和日本建制,分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以步队为主,炮队为辅,马队巡护,工程队供临时调遣。其中步队5000人,分左右两翼,设统领2人。左翼2营,右翼3营。翼下有营、队、哨、棚。步队每营1000人,设统带1员,帮统1员,下分4队。左翼由重炮队接应,右翼由快

炮队接应。炮队 1 营共 1000 人，设统带 1 员，分右翼快炮队、左翼重炮队和接应马炮队 3 队。马队 1 营共 500 人，设统带 1 员，帮统 1 员，下分 4 队；工程队 1 营共 500 人，设管带 1 员，帮带 1 员，委员 1 员，下分桥梁、地垒、电雷、修械、测绘、电报 6 司队。

新建陆军的武器装备全部使用从德国购置的曼利夏步枪、马枪、手枪和格鲁森速射炮；全军配备外国帆布制造的帐篷 2400 个；每二营配备行军电台；每哨配备洋表、双筒望远镜和指南针；每官长配备督队腰刀一把，手枪一只；每兵士配备洋制雨衣、雨帽和洋毯。新建陆军在军事组织机构方面，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袁世凯自任督练官。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以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教习处(后改为洋务局)等，负责训练、运输、军械、辎重、军法和研究西方军事等。制定了各种章程，使军队的组织、制度和规模逐渐完备。

新建陆军聘请 10 余名来自德国、日本、美国等国的外籍教官。其中巴森斯负责全军训练，伯罗恩为德操教官，祁开芬为炮队教官，挪威人曼德为马队教官。全军一律习洋操，按照德国陆军教条进行训练。因新军训练以德国军事教官为主，袁世凯在军营中设立德语学堂教授德语，又在小站营盘设立速成武备军官学校，后改为讲武堂，聘请汉纳根为教官。另设步兵、炮兵、工程兵等随营军事学堂及学兵营，教授兵法、枪炮、算学、测绘、地理、战阵攻守等，培养造就新的军事人才。

新建陆军的军官骨干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为袁世凯的个人亲信。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是袁世凯河南老家的故交，得袁世凯资助进京应试，连中举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袁世凯督练新军时其母病故，在籍丁忧。袁将其奏请调来，赞划一切，成为最得力的智囊军师，人称“水晶狐狸”。另有不少袁世凯驻朝鲜时的老部下。一是袁世凯为消除清廷满族权贵怀疑，特请陆军大臣荫昌推荐的军事骨干。荫昌推荐了武备学堂毕业生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袁世凯委任王士珍为工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工兵统带，冯国璋为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总办。三人

后来成为袁的得力干将，人称“北洋三杰”。一是袁世凯请李鸿章推荐的军事人才。不管来自哪一方面的军事骨干，袁世凯均以拜把兄弟、收义子门生、搞政治联姻、进行金钱收买等手段，把众将官笼络在手中。袁世凯与徐世昌结为盟兄弟，段祺瑞成了袁的干女婿，段芝贵是袁的干儿子，将家庭教师周某许配给冯国璋。袁世凯在淮军多年，深知“兵为将有”的重要性，一心要把新军变成私人武装。除他之外，任何人不能驾驭。一次，袁世凯与张之洞闲谈，张之洞问其练兵秘诀。他说：“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复杂，其实很简单，主要的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袁世凯一方面对新军将领百般拉拢，只要他们绝对服从，从不惜予以高官厚禄；一方面对不愿绝对服从的将领，则请其“吃刀”，将其降薪、降职，乃至撤职。将领们的进退荣辱完全操于袁世凯之手。为追求名利地位，他们只能唯袁世凯之命是从，且都怀有一种对袁世凯报恩的观念，后来大都成为袁世凯的亲信心腹和北洋军阀集团的要员，即所谓小站系北洋军阀。

新建陆军各营均供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大肆宣传袁是军队的衣食父母，祝他官贵寿考。每天上下操集合时，将领都要问士兵：“咱们吃谁的饭？”士兵们齐声回答：“咱们吃袁宫保（清廷封袁世凯为太子少保，称“宫保”）的饭！”官长又问：“咱们应该为谁出力？”士兵们又齐声口答：“咱们替袁宫保出力！”

袁世凯认识到，新建陆军是创练新军的模范，将来若再度添练，必定由这支军队抽调骨干担任教练，这样自己便成为全国新军的总首领。于是，他“每日与士卒共奔走”，“汰弱募强，拟订规则，考将弁，申号令，殊形忙苦”，事无巨细，靡不亲躬，将全部心血倾注到练兵中去。

从武卫右军到北洋六镇

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与董福祥“甘军”、聂士成的“武毅

军”，一同隶属于直隶总督荣禄之下，并称北洋三军。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建武卫军。武卫军分为前、后、左、中、右五军。荣禄任武卫军统帅兼统武卫中军，聂士成统武卫前军，马玉昆统武卫左军，袁世凯统武卫右军，董福祥统武卫后军，每军9000余人。

武卫右军即由新建陆军改编而成，兵员1.7万人，是武卫军中最完整，最精锐的部队。1900年，袁世凯补授山东巡抚，带武卫右军随赴山东。袁世凯将山东旧军34营改编成步、马、炮20营，定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人数1万余人。经过八国联军之役，武卫军前、后、中三军几乎全部崩溃。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不但没遭损失，反而得到扩充，成为北方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授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赏戴双眼花翎加太子少保，他奏陈改革军制，拟定“新军募集操练规则十九条”，获准。袁世凯遂大举扩充军队，将“武卫右军”调回小站进行训练，并添置洋枪洋炮，加强兵力。袁世凯计划先编常备新军左右两镇。所谓镇、协、标、营、队等于现在的师、旅、团、营、连。军是战时组织，视敌情或两镇一军，3镇、4镇为一军。统军将领、即后来的军长称“总统”或“军统”；统镇将领即后来的师长称“统制”或“翼长”；统协将领、即后来的旅长称“协统”；统标将领、即后来的团长称“标统”、统营将领、即后来的营长称“管带”；“队官”或“哨官”就是后来的连长，“帮带”或“督队官”就是后来的副营长。还有一种混成协，是不同兵种混合组成的旅，规模比普通旅大。

清廷在批准袁世凯训练新军条例的同时，命各省严行裁汰绿营防勇，精选若干营，按新军营制编练常备军，其余编为续备军。然各省督抚多敷衍应付，或将绿营、防军、练军改头换面；或临时募集以充其数。此与清廷改革武备目的格格不入。1904年，清廷设练兵处，由袁世凯任练兵大臣。以袁世凯心腹徐世昌为总提督，王士珍为军政司正使，冯国璋为军学司正使，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练兵处职权非常广泛，凡新军章制操法、将领奖惩升迁、军官培养、派员留学、枪炮弹药、后勤马匹等无所不包。练兵处既是新军编

练的最高领导机关，又是新军编练的督察机关。

袁世凯改“武卫右军”为“北洋新军”，成立3镇，计63营，每镇辖步炮马工辎21营，扩兵到2.5万人。1905年复改为“北洋常备军”，新建3个镇，军队扩充到8万人。除第1镇由满人铁良统率外，其余5镇均为袁世凯嫡系，主要将领均为小站练兵出身。北洋六镇基本形成，成为清末新式陆军的基础力量，即后来北洋军阀的渊源。

小站练兵起家的北洋军阀后来出了4个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6个民国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王世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以及34个督军。

1906年，练兵处合并陆军部，袁世凯练成新军9镇4混成协，清末新军主体基本练成。新建陆军是当时装备最精良、最先进的军队，实开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其中，袁世凯功不可没。小站练兵的初始阶段，袁世凯并非一帆风顺。练兵三个多月时，袁世凯遭到言官跋扈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的参劾。奉旨查办的荣禄，在袁世凯的巴结逢迎下，第一次目睹洋操，为将其收为己用，不但以“查无实据”，疏请清廷“勿庸置议”，而且赞其“血性耐劳，勇于任事”，是“不可多得”的将领。袁世凯愈益投靠荣禄，仰仗荣禄自固。1897年6月，袁世凯因练兵有功，晋升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袁世凯从此开始官运亨通。

二 “新政第一人”

身兼八大臣

1902年后，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北洋督练公所督办、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一人身兼八任，势力从军事扩张到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局面。袁世凯的权势已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

在当时西方人眼中,李鸿章是"中国改革第一人",是中国的改革之父。而袁世凯是李鸿章的最佳继承人,他"一直负责推动整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少数可以左右李鸿章之后政局、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人物。

一位采访过袁世凯的美国记者指出,袁世凯是清朝趋向改革和进步的高层官员中的"第一人",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他"虽然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素质全面",具有"异常才智"且"野心勃勃"。

袁世凯善于利用政治时机并有能力将自己推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吸取了中日战争和义和团式反西方的教训,主张尽量寻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谅解,以便推动保守的渐进改革。

清末新政

1901 年 3 月,清廷成立推行"新政"主持机关督办政务处,颁布了一系列新政法令。因有戊戌变法的前车之鉴,不少官员对此次新政持消极观望态度。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则以"急进改革者"的面目出现,当月即向朝廷条陈筹办新政办法 10 条,包括:设立课官院和课吏馆,对官吏进行新政集训;命学生学习实用书籍和外国学术;各省设官报局,开启民智;派遣王公官员出国考察;设立商会,兴办商务等。并首先在山东身体力行,积极推进新政。开办了课吏馆、校士馆,成立了山东大学堂(今天山东大学前身),创办了商务总会,设立了银元局等。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参预政务大臣等职后,对各项新政,袁世凯更是事事率先倡办。"清廷革创之政,几乎均出其手"。袁世凯除通过把持"练兵处"控制全国练兵的用人、经费、军械制造、考察等权,迅速完成编练北洋六镇外,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均有革创。

政治方面的改革,袁世凯以整饬吏治为中心展开。有提陋规、改公费,设官吏考验处、调查处,"开官智",培养新政人才等。"陋规"又叫"规礼",是

年节时令，下级向上级奉送成为“常例”的金钱和礼物。清代官员俸禄微薄，办公用度浩繁，经年已成积习。长官为饱私囊，无不取之多多益善；属员为保禄位、谋肥缺，无不非分钻营、搜刮馈献。袁世凯认为吏治最大问题“莫如收受陋规一事”。他采用的是提陋规、改公费的老办法：按各官向来所得多少，明定等级，酌给公费，多者月给1000两，少者100两、50两，不得私相授受，否则严加治罪，如此养官之廉，止官之贪。在清末那样腐败的环境下，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可想而知。设立官吏考验处、调查处，是袁世凯对新老官员考核的改革措施，考验科目有5项：阅历、批判、律例、行止、口力。调查分平时与临时两种。平时主要了解官吏政绩、采访舆论；后者查办奏参要案、总督指交事件、各官互相禀讦事件、绅民控告官吏事件等。培养新政人才的办法主要有：设课吏馆，不久改为直隶法政学堂，专招候补候选官员学习。每年招120人（后增收山东等五省举贡100人），分预科（半年）、正科（一年半）。正科课程有：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交涉约章、政治学、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国际公约、国际私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裁判所构成法、应用经济、财政学、警察学、监狱学、统计学、中外通商史、日语、演习裁判等，绝大部分由日本教员讲授。毕业后分优劣委派差缺。法政学堂附设幕僚学堂，专教幕僚。另外州、县新任官员就任前，先赴日本游历3个月，参观行政、司法、各官属及学校、实业，而后再赴新任。又有委派归国留学生到新政机构工作等。义和团事件后，《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训练3000名警察，取代军队进驻天津，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袁世凯还努力推动地方自治运动，1907年天津举行了全国首次地方市政选举。

经济方面的改革围绕提倡实业。提倡实业的指导思想是辟利源而资生计，增财政而富国家，办实业而抗洋货。为发展工业，袁世凯成立了直隶工艺总局。工艺总局创办初、高等工业学堂、劝工陈列所、教育品制造所、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种植园、官纸厂、劝业会场、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场，附设有夜课补习所、仪器讲演会、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等。工艺总局通过

多种方式劝导、推动工商业振兴，派工业学堂教员到街头讲演、劝工委员分赴各地调查各州、县出产及工业情况，劝导官绅合办工厂；号召各界人士“同心努力，急起直追，或独出资财创办工场，或纠合同志设立公司”；举办展览会；试办工业售品所，出售所属工厂产品，办理本省寄售业务，但不代售洋货。1905、1906两年评定模范工厂75家，颁发金质奖牌38枚、银质奖牌47枚。工艺总局还派人赴湖北学习织造麻织品，赴江西景德镇学习制瓷，赴日本考察造纸、织布方法；呈请农工商部批准给予轧豆榨油机、机器轮磨、折叠桌、黑胰发明者以专利权等。这些均使“实业”二字深入人心，“学界中人有工业教育之想，商工界人有工艺创造之思”。创办的企业有织染缝纫公司、造胰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机器造纸有限公司、电灯有限公司、济安自来水有限公司、北洋劝业铁工厂、实业工艺厂、北洋烟草公司、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1903—1907年间，直隶地区开办工艺局、所、厂85家。为振兴商务和接济北洋官兵用煤，袁世凯还设立了滦州煤矿有限公司。八国联军入侵时，开平煤矿矿局督办张翼图谋私利，欺蒙清廷，同德人德璀琳和英商墨林等人签订契约，将该矿改为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中外合办，在英国注册，实为英国骗占矿权。1902年，袁世凯发现该矿及所拥有之河道、口岸、土地等落入英国之手，立即同英国驻华公使交涉，并再三诘责张翼、德璀琳，同时上奏清廷，请饬外务部向英切实声明，断不承认所签私约，尤不能把口岸、河道、土地移交英国公司管理。开平矿权不属英国，如英人必欲合办，必须另订章程，以使“我之产地、利权不至凭空断送于外人之手”。临城煤矿亦系钮秉臣、龚照玛擅自与比利时人沙多私立草约，将该矿产业、房地统交沙多管理，名为合办，实同盗卖。1905年，袁世凯奏请将原合同作废，派唐绍仪、梁敦彦先后与沙多重新订立中外合办章程，最后议定借款300万法郎合办，将矿产主权收回。京张铁路是中国自筹资金、自行设计、独立修筑的第一条官办铁路。袁世凯委任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路务，奏准所用钢轨、枕木、机器、车辆等材料免纳厘税。京张铁路路长170余公里，经居庸关、八达岭，层峦叠嶂、地形复杂，工程浩大艰巨。洋人曾轻蔑断言，中国修筑这样铁路的

工程师尚未出世。1905年，京张铁路开工，历时四年全线通车。我们今天仍热情传颂着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其实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主要是袁世凯的作为。一位美籍华人史学家说："它（京张铁路）是由袁发起、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1902年，袁世凯在保定创立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农业机器，聘请日本人指导，经营保定郊区200余万株桑秧和小站400余顷稻田。农务局附设农业学堂，教授蚕桑种植及糖酒制造。该局曾开展了农产品评会、试办农会、劝导种树等活动推广农副业。

文教方面的改革，主要围绕废除科举。1903年2月，袁世凯与张之洞联衔上疏，指出"致治必赖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建议将各项考试取中名额按年递减，分两、三科减尽。以往举贡、生员按不同情况，令其分别入新式学堂、速成师范学习，或另给其他出路。1905年7月，袁世凯领衔与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等联名上折，指出目前"危迫情形"，"实同一日千金"，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数十年后，人才始盛"，奏请立即停止科举，推广学校。清廷允准，谕令所有乡、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从此科举制度永远废除。

科举制的废除，打破了1200多年来以科名选拔官僚的体制，为推广新式的学校教育从制度上扫清了障碍。1903年，袁世凯设直隶学校司，督办全省教育。学校司下设专门教育、普通教育和编译三处及研究所，派遣查学员考核官绅办学情况；通令各地成立劝学所、宣讲处、阅报所，进行引导宣传；通令各州、县自筹资金，分期分批组织士绅赴日本考察教育，了解各类学校的编制、组织、教育学、管理法等。为兴办学校，普及教育，袁世凯尽力设法筹拨资金，劝导地方出资办学，同时亲自捐款两万元。为解决新式学堂的师资问题，袁世凯聘请美国人丁家立担任高等学堂西学总教习，令其在天津大学堂学生中选拔优等生，充当府设中学堂教员，并设师范学堂，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以解决师资困难。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1907）统计，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

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总计8723所，学生16.4万多人，位居全国第二；学务资产480万两，名列全国第一，直到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仍保持优势，这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打下的基础不能无关。

倡导立宪

一位采访过袁世凯的美国记者指出，袁世凯推动的改革不是要"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而是"在维护皇权前提下"的改革维新。这一改革维新的极致，是倡导立宪。

袁世凯奏请"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不久，清廷颁布上谕，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军机大臣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绍英等五大臣携带随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五大臣出洋考察经费难以筹措，袁世凯带头认捐，从直隶拿出白银10万两，并允诺以后每年筹款十万两，作为出洋考察经费。

五大臣由北京启程之时，发生了革命党人为抵制清廷假新政而制造的爆炸事件。五大臣出洋考察被迫改期缓行。一些官员更加感到立宪的必要与紧迫。如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电中说："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然益证立宪之不可缓也。"

袁世凯此时却改变策略，成为立宪的阻挠者。载泽抵达英国伦敦后，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曾问及谁是阻挠立宪之人。载泽愤而作答："小阻盛宣怀，大阻袁世凯！"袁世凯实是在审时度势，估量立宪派与革命党的力量。

五大臣分批出洋考察归来，一致奏请实行立宪。袁世凯见立宪已为铁定之局，"以为此种好机会，略一布置，即可成功"，改消极观望为积极参与，逢人便称："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他向政务处建议：中央政府五品以上官员均应参议要政，预立上议院基础；各州、县有名望的绅商俱应参议地方政务，预立地方自治基础；预备立宪先在一省试办，逐渐推广，并提出将直隶作

为试点之省。

他面奏慈禧太后，立宪应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清廷宣布“仿行宪政”、设宪政编查馆后，袁世凯将亲信孙宝琦、杨士琦、张一麐、金邦平等人安插进去，分任提调、起草员等职，实际控制了政治改革方案的制定。

清末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一次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牵涉到所有政治集团和官员的切身利益。袁世凯的野心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守旧派以军机大臣铁良为代表，提议将地方督抚原有兵权、财权收归中央。他们纷言立宪之非，激烈攻击袁世凯，要求撤销编制馆，饬令袁世凯速回本任。立宪派以御史赵炳麟为代表，明确表示：“中国现在一时难以成立下议院”，责任内阁没有下议院监督，便成“二三大臣专权”。这不是君主立宪体制，而是“大臣专制政体也”。“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议院无期成立，下民莫敢谁何，颠覆之忧将在眉睫”。

赵炳麟等人敏锐地察觉到袁世凯假立宪、真专权的野心。宗室贵族得知袁世凯不让他们干预政事，气愤填膺。一次会议上，醇亲王载沣甚至从腰中拔出手枪，抵住袁世凯胸膛，厉声道：“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太监听说袁世凯提出裁撤太监一事，也恨之入骨。排袁之声一浪高于一浪，纷传袁世凯权高势重、居心叵测，将步曹操、刘裕后尘，不利于皇室。

袁世凯觉得气氛不对，接连上疏，朝廷均未理睬；召见时，又面奏令守旧大臣休致，遭慈禧太后严厉斥责，并示之以参劾他和奕劻的奏章。袁世凯感到处境危险，恐惧万分，借检阅新军秋操为名，急急请训出京。

慈禧太后怕成立责任内阁后君权旁落，加之对袁世凯已生疑忌，没有同意设立责任内阁，仍保留军机处。袁世凯没有捞到副总理大臣的职位，反而因中央官制改革被迫辞去兼职，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管辖。1907 年，将世凯调离北洋军，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1908 年 10 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故去，宣统帝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载沣当政后，对袁世凯势力的过分膨胀深感不安。宣统元年(1909)以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将其开缺回籍养病，剥夺一切军

政大权。

然而，袁世凯已利用新政时期急剧扩张的军事政治实力，将其“爪牙布于肘腋”，“心腹置于朝列”了。

三 清帝逊位

再度出山

袁世凯被赶出朝廷后，“隐居”河南彰德。他在洹河北岸购买原天津盐商何炳莹的一座别墅，扩充改建。整个巨宅约 13.3 公顷，四周筑高大围墙，建有炮台。宅中置花园，名“养寿园”，开渠引漳河水入园，小溪长流，山林峻石，亭台水榭。袁世凯时常流连于山水之间，头戴斗笠，手执钓杆，时闭目养神，时凝望沉思。

袁世凯名为“退隐”，实无时无刻不在窥测方向，准备东山再起。他在家中设电报处，通过电台频繁与亲朋故旧往来通讯。北洋旧部、各地官绅纷纷向他报告朝中一切巨细信息。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武汉三镇失守，湖广总督瑞澂、第八镇统制张彪弃城逃跑。陆军大臣荫昌前往救援，然所率两镇陆军几乎全是袁世凯旧部，指挥不灵。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再次向载沣提请起用袁世凯。英、法、德、美等国害怕影响在华利益，亦纷纷向清廷施压，指名要求起用袁世凯。美国、法国银行团的代表司戴德和贾恩纳指出：“袁世凯在训练新军方面做过许多工作，看来他是制止叛乱浪潮、争回不忠的军队以及同起义首领中的某些人达成协议的惟一人物。”美国政府甚至知会清廷：“不是任用袁世凯作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要任用他作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

1911 年 10 月 14 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早就等着这一天的袁世凯，竟亦以“足疾”为由推辞不就。他上疏称：“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

奕劻深知袁世凯不可能无条件出山，即派徐世昌前往彰德。袁世凯与徐世昌密商后，提出了六条：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解除党禁，委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全权，须与袁世凯以十分充足的军费。此六条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袁世凯要的不是督办剿抚事宜的湖广总督，而是内阁总理大臣和军事大权。

时全国各地先后爆发起义，革命党人节节胜利。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载沣只得授予袁世凯军事大权，以冯国璋统率前线第一军，段祺瑞统率第二军，均隶属袁世凯指挥，有“不得力将弁”，准袁世凯“随时撤换”，“统制以下如有煽惑观望及不遵命令、退缩不前者”，准袁世凯“即按军法从事”。

10 月 27 日，屯军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电奏清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革命党人一律特赦擢用等 12 条，并致电革命党，表示绝不会督师南下与民军作战。29 日，山西新军起义，阎锡山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30 日，昆明新军起义，蔡锷为军政府总督。31 日，南昌新军起义，也成立了军政府。清王朝危在旦夕。

载沣于 30 日以皇帝名义连发四道上谕：实行宪政；迅速起草宪法；革除亲贵秉政，成立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大赦国事犯。这实际上是对袁世凯六条要求的回应。

袁世凯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31 日离开彰德，到信阳与荫昌进行交接。11 月 1 日奕劻奏请辞职，清廷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著其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

8 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一周之后，袁世凯进京组阁，迫使摄政王载沣退回藩邸。

南北议和

袁世凯掌权后，对革命党既打亦拉，频频试探革命党的态度。

革命党人态度不一。已进入革命党人阵营的旧官僚黎元洪指出："这个时候，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归他，他更比从前加一倍的狠，我们更无有法子了。袁世凯握有大权，然后驱逐满人，自践帝位。"同盟会第二号人物、民军总司令黄兴致信袁世凯："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乞毋坐失"，劝他起义反正。同盟会员汪精卫更是公开鼓吹："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凯)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

袁世凯命令北洋军攻占汉阳，按兵不动，逼迫革命党坐到谈判桌前。当时南方各省纷纷独立，脱离清廷统治，但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11月30日，南方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举行第一次联合会。同日袁世凯通过英国领事馆向南方各省代表会议提出和谈。南方各省代表认为与力量强大的袁世凯对抗没有必胜的把握，且若袁世凯能够反戈，倒向共和，可避免过多的流血牺牲，早日实现推翻清朝的目标。各省代表会议决议，若袁世凯反正，即公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并公举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拟定和谈纲要四条：一、推翻清朝；二、主张共和；三、礼遇皇室；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清廷则授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为和谈全权大臣。袁世凯委派唐绍仪为和谈总代表，所定基调冠冕堂皇："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将来国民程度渐渐开通，懂得共和的真谛，再慢慢改为共和政体"。

12月17日至31日，南北代表共举行5次和谈，史称南北议和。

以总统之位换共和之制

对于南北和谈欲以总统之位换取袁世凯支持共和的建议，袁世凯的态度开始是佯装大怒："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继而吐露真言："汝曹握兵权者亦复如此，我尚何言！但使我有面目与世人相见足矣。"帝国主义列强则纷纷支持袁世凯，向清廷及民军施加压力。英国公使宣称："我们对于袁世凯极为尊敬，并怀有极其友好的情感。"袁政府将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法国政府也表态："袁世凯殊有统一全局之力量"，"于皇室及民党间，皆能保其良好之感情，或者彼渐超然于此二者之上，而为将来中国之真主人乎？此则吾外人之大幸也"。

12月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29日，17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于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诞生。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态度很明确，他曾对胡汉民、廖仲恺等人说，袁世凯诚不可信，然利用他推翻260余年的满族贵族专制则强于用兵十万。纵使袁世凯继行专制体制，其基础也远不如清朝，推翻他要容易得多。今日可首先推翻清朝，成一圆满之段落。当选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当天，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孙)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袁世凯哪里肯信。孙中山宣誓就职当天，袁世凯唆使北洋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40余人联名电奏，强硬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

1月3日，南方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各部总长人选，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袁世凯立即发出质问：两方原已决议，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现南京忽已组织政府，且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即宣示驱逐满清政府，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假如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临时政府及总统是否立

即取消？袁世凯一面在南北报章大造“收拾大局非袁莫属”的舆论，一面命各军加紧备战，准备“痛剿”民军。

孙中山见袁世凯没有和谈诚意，决定自任总指挥，出兵六路北伐。13日继莫文蔚部首战告捷后，北伐军已在安徽、河南、湖北等战场初战告捷。然而，孙中山外部受列强恫吓，内部受反对派掣肘，汪精卫之流更指责孙中山贪恋总统之位破坏议和。孙中山不得不终止北伐。

孙中山致电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世凯亲信纷纷劝导袁世凯当机立断。张謇致电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南勋北怀，未可得志，俄蒙英藏，图我日彰。即公所处，亦日加危。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位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唐绍仪亦致电：“清必倒，民国必成，宁使人诽谤为王莽曹操，而西方华盛顿不能专美于前。孰得孰失，当能决之。”袁世凯百般试探，认为万无一失后，决定“劝幼帝退位，以国让民”，“另拟优待皇室条件，征南方同意”。

逼宫逊位

袁世凯的总统之位有了保证，则加紧了逼宫的步伐。

16日，袁世凯与内阁大臣联衔上奏，劝逼清帝逊位。袁世凯亲自到养心殿见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溥仪后来回忆，当时他幼小无知，只见一个陌生的矮胖老头跪在红毡垫上与隆裕太后相对流涕、伤心欲绝，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更不知貌似忠心耿耿的矮胖老头袁世凯，哽咽说出的竟是一派逼他退位的劝诱恫吓之词：

> 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好比尧舜禅让，是顺民心之所归，非历代亡国之可比。我朝继继承承、尊重帝系。然孔孟之道是民重君轻。且民军欲改民主。况此次战祸东西友邦贸易损失已非浅鲜，尚居中调停，是因我只是政治改革而已，再发展下去，则难免不无干涉，民

军亦会更恨朝廷。读法兰西革命史，如若路易王室早顺民情，何至被杀无遗！民军所争的是政体而非君位，所要的是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使列祖列宗震惊，被赶出紫禁城？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19日，袁世凯会见英国公使朱尔典，提出由清廷授予他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暂设天津，企图将清廷与南京临时政府同时抛弃。

皇室亲贵、蒙古王公彻底看清袁世凯的野心，纷纷组织勤王敢死队、宗社党等组织，准备武装反对共和。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明确提出：清帝退位，清政权同时消灭，不能把政权私授臣民；袁世凯不得于民国未举之前接受清廷授予的统治权、再于北京成立临时政府以自重；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为大总统。

袁世凯只有再逼清廷实行共和。他内部贿买近臣奕劻、那桐、太监小德张等，不断危言耸听恫吓隆裕太后；外部密令北洋将领公开电奏反对帝制，赞成共和，明示清廷已无兵可依。

26日晚，保皇铁杆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人炸伤，在饮袁世凯所送止痛药时莫名其妙身死。隆裕太后被迫做出皇帝退位、颁布共和的决定。

为催促清帝早日退位，袁世凯以段祺瑞等名义发出通电：

共和国体，原已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公迭次阻挠，以致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威迫，四面楚歌，京津两地，暗杀制动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实难数。事至今日，皇上欲求之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2月11日，隆裕太后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清帝退位条件最后修正案”表示认可。主要内容有：清帝仍保留皇帝尊号，并仍住在宫廷内；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且每年供给四百万元；宫内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民国

对皇帝原有的私产特别加以保护；皇族的王公世爵照旧保留，私产一律得到保护。

袁世凯将尚未颁发的清帝退位诏书电达南北议和代表伍廷芳、唐绍仪，并转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黎元洪等。接着又发一电，向南京临时政府保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电文称：

>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清帝正式逊位。

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灭亡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时代随之结束。

思考题：

如何理解袁世凯的"走向共和"？

参考书目：

1.〔澳〕西里尔·珀尔：《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
2.〔加〕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 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